

余炎光〔美〕陈福霖主编

南 粵 割 據

——从龙济光到陈济棠

广东人民出版社

534746

南粤割据

—从龙济光到陈济棠

余炎光〔美〕陈福霖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南粤割据
——从龙济光到陈济棠

余炎光〔美〕陈福霖主编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2印张 1插页 276,000字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00册

ISBN 7—218—00282—X/K·57

*
定价4.15元

目 录

第一章 絮 论

一、军阀割据混战局面的形成.....	1
二、南北军阀的特点.....	9
三、军阀割据统治广东的概况.....	12

第二章 龙济光入粤，军阀割据形成

第一节 辛亥革命后的广东政局

一、广东光复.....	17
二、军政府的成立及其措施.....	20
三、革命政权的严重危机.....	27

第二节 龙济光入据广东

一、二次革命和广东的独立.....	31
二、龙济光入据广东.....	34

第三节 龙济光的暴政

一、竭力维护封建统治.....	38
二、施行横征暴敛.....	42
三、钳制思想文化.....	46

第四节 广东人民的“讨龙”及龙济光的挣扎

一、中华革命党领导的反龙斗争.....	50
---------------------	----

二、护国战争的兴起.....	54
三、变换手法，负隅顽抗.....	61

第三章 旧桂系据粤与祸粤

第一节 桂系军阀进驻广东

一、广西独立和军务院的成立.....	65
二、桂军入粤和龙济光败退.....	73

第二节 桂系在粤统治的加强

一、借“护法”之名，图割据之实.....	75
二、剪除异己，扩充实力.....	80
三、排斥孙中山，改组军政府.....	86

第三节 桂系军阀祸粤

一、强化封建军事专政.....	90
二、加紧豪取掠夺.....	96
三、出卖主权、大借外债.....	101
四、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04

第四节 桂系军阀的败退

一、援闽粤军的组成和发展.....	107
二、粤军回粤.....	111
三、席卷全省的反桂斗争.....	114
四、桂系军阀退出广东.....	118

第四章 陈炯明的叛变和割据粤东

第一节 陈炯明的蜕变

一、革命政权的支柱.....	122
二、割据野心的膨胀.....	127
三、武装叛变.....	133

四、独霸广东.....	141
-------------	-----

第二节 割据粤东和最后败亡

一、退据粤东.....	146
-------------	-----

二、最后败亡.....	154
-------------	-----

第五章 滇桂军入粤及其叛乱

第一节 白马会盟，滇桂军入粤

一、杨、刘、沈的崛起.....	159
-----------------	-----

二、白马会盟.....	167
-------------	-----

三、入据广东.....	171
-------------	-----

第二节 滇桂军的叛乱及其被平定

一、江防事变和新街叛乱.....	174
------------------	-----

二、杨、刘在广东的倒行逆施.....	184
--------------------	-----

三、杨、刘的叛乱及其被平定.....	191
--------------------	-----

第六章 新军阀的形成和混战

第一节 蒋介石的篡权阴谋

一、孙中山、廖仲恺去世后的粤局.....	209
----------------------	-----

二、三二〇事件.....	215
--------------	-----

三、整理党务案.....	228
--------------	-----

第二节 李济深的短期统治

一、北伐胜利和迁都武汉.....	231
------------------	-----

二、广州“四·一五”政变.....	236
-------------------	-----

三、镇压南昌起义军.....	245
----------------	-----

第三节 “张黄事变”

一、张发奎回粤.....	251
--------------	-----

二、“张黄事变”.....	255
---------------	-----

三、镇压广州起义.....	265
四、“张黄事变”的失败.....	269
第四节 陈济棠的兴起和粤桂战争	
一、陈济棠的兴起.....	273
二、粤桂战争.....	278

第七章 陈济棠统治的建立及其失败

第一节 陈济棠统治地位的确立	
一、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加剧.....	286
二、宁粤分裂.....	292
三、陈济棠统治地位的确立.....	301
第二节 陈济棠的军事专政	
一、建立严密的军政机构.....	309
二、镇压工农革命运动.....	312
三、加强对政权的建设和控制.....	317
第三节 陈济棠的经济建设	
一、重视经济建设的起因.....	322
二、整顿财政金融，发展商业.....	325
三、推进工农业生产.....	332
四、改善市政、交通.....	338
五、经济建设成就的原因和局限.....	342
第四节 陈济棠的文化教育	
一、发展教育事业.....	348
二、提倡尊孔读经.....	351
三、社会生活畸形发展.....	356

第五节 陈济棠的失败

一、陈、蒋矛盾加剧.....	359
二、“六一事变”.....	363
三、陈济棠下台.....	369
结束语.....	371
后记.....	377

第一章 緒論

对于中华民国时期封建军阀割据混战的历史的研究，近年来开始日渐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视。经已面世的研究成果，从数量上看不算太少。以专著来说，国内出版了袁世凯、张作霖、吴佩孚等人的传记多种；国外和港、台地区则除了袁世凯、冯玉祥、阎锡山、张作霖、吴佩孚、陈炯明等人物传记外，还有《军绅政权》、《军阀政治》、《中国军阀政治》等综论性著作以及对四川、滇系、桂系等军阀的分区研究专著，其数量比国内出版的还多（见本章附录）。至于在国内外发表的学术论文，那就更是数以百计的了。

认真拜读所有这些论著是不可能的。但择其主要的并就其总体而论，给人们一个明显的印象是：对于军阀史的研究，还是处于一个不成熟的、初步的阶段。形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史学界长期以来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所造成。这些传统观念，使人们把军阀看成都是反动透顶的人物，或者是当作跳梁小丑、讥笑怒骂的对象，不能登大雅之堂。因此，不值得历史科学工作者去研究，研究了的成果，也不值得出版，出版了也不具科学价值，甚至是不屑一读。这种观念，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内外都存在着，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认为当今的军阀史研究还处于一个初步阶段，仅举两点就足以说明：第一、研究课题不够广泛、只偏重于1916至1928年间北

洋军阀的盛衰史，而对于在此时期以后，或者是北洋系统以外的各个地方军阀的研究，就显得太少了①；第二、许多论断不够成熟，多数只是一些探讨性的看法，在史学界也未形成较为肯定的一致意见，就以军阀的定义及其形成原因这类带有关键意义的命题，国内外的史学界在原则上似乎大同小异，但在具体理解、运用、阐述上就有着较大的分歧。

1980年以来，西南六省（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工作者，先后成立了“西南军阀史研究会”及各省的分会，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如上所述的传统、陈旧观念，相对地集中力量，对北洋军阀以外的另一派系军阀——西南军阀，进行了群体或个案的研究，并已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几年来，他们发表的学术论文，仅汇集成册的就有五辑，100多万字。这些成果，可以部分地补救研究课题不够广泛的缺陷。但是，对整个省（区）军阀割据统治由形成到消亡的历史作整体的研究，除云、贵已有专书出版外，其他则正在起步。我们这本《南粤割据——从龙济光到陈济棠》，亦是这个“起步”中的一项浅薄的尝试。即使这样，我们也吸取了国内外前人的研究成果，对于封建军阀在广东的割据统治的有关问题，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

① 比较例外的是陈福霖对盛世才的研究。参阅《地方主义和中央政权：盛世才在新疆》（1933—1944），载于《歧路中的中国：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1927—1949》，美国西方观感出版社，1980年版，第127页至149页；《盛世才在新疆的改革纲领：理想主义抑机会主义？》载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十二期（1983年6月）第365页至384页。

一、军阀割据混战局面的形成

军阀史研究的对象，当然是封建军阀的割据、统治、混战的历史。因此，必须首先给“军阀”下个较为确切的定义，才能使研究方向有所遵循。

我们认为军阀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但作为军阀，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有一支或大或小的听命于私人的军队；第二、有一块或大或小的相对独立的以军事力量统治的地盘；第三、压迫、剥削统治区的人民，反对革命。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构成军阀的三个基本条件中，对于前两条，几乎所有从事军阀史研究的国内外史学家，以及历史上的一些政治家、军事家，在给军阀下定义时，不论他们提出多少个基本条件，都同意这两条。^①正如对中国军阀史研究颇有造诣的加拿大学者陈志让说：“凡是这些有关军阀的定义，都同意有私家军队和控制地盘作为军阀的两项基本的特征。”^②但是，对于这两项为人们所同意的基本特征，应该如何理解？或者需要作进一步的阐述时，就出现了诸多的分歧。综合这些分歧，大致是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见解：

一种意见认为，只有同中央政权对立的、在各个大小地区进行封建统治的军事割据，才能称作军阀。按照这个论断，中国的军阀割据混战史，只存在于1916—1928年间。从军阀的代表人物

^① 例如美国学者薛立敦在他的著作中亦持这种主张。在国内的学者中，例如陈旭麓认为，军阀“最基本的有两条：一是有枪，二是有地盘。”（见《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二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

^② 陈志让：《军阀之定义和派系》，《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所集刊》（英文本），第31卷3期，第578页。

来说，袁世凯、蒋介石都不能排入军阀之列。因为他们既是代表中央政权，特别是他们的军事势力又可及于全国，所以不属于封建割据。持这种主张的包括多数的外国学者。^①

另一种意见则几乎与此相对立，认为由袁世凯的北洋军阀开始，到蒋介石的新军阀以及与此同时在各省各地区存在的大小军阀，只要是具备了上述的三个条件，都是军阀。所以，军阀割据混战的历史，由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至1949年中华民国终结，始终存在着，只是各个地区的具体发展情况有所不同。持这种主张的主要多数是内陆学者。^②

还有一种意见则介于上述二者之间，认为袁世凯本身是典型的封建军阀，而蒋介石则是以打倒军阀为目的的国民革命的领导人。他领导了北伐战争，消灭了北洋军阀，统一了全国。尔后的蒋介石同国内各派系的战争，是代表中央政权讨伐地方军阀的战争，不是军阀的混战。持这种主张的多数是台湾的学者。^③

从三种观点看来，应该说，都各具一定的合理因素，但都嫌论据不足，以致还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定论。以第一种意见而论，作为军阀主要象征的北洋军阀中的皖、直、奉系军阀，尽管他们的军事势力还不能及于全国，但在1916—1928年间，都或

① 薛立敦在他另一本著作《分裂中的中国：中国历史的共和时期，1912—1949》中就持这种主张，参见该书第57—106页。

② 例如已故的著名学者柴孟源，在《要重视西南军阀史的研究》一文中，就持这种主张（见《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二辑，第11页）。此外，陈旭麓、谢本书、王永康等在他们的文章中均认为，1949年才是军阀史研究的“下限”。

③ 例如李守孔的《国民革命史》（台湾1965年版，第493—520页），陈能治的《北伐后中国地方主义的发展，1926—1936年的四川、广西和山西》（载张玉法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八辑，台湾1982年版，第153—169页），两篇文章都有类似观点。

长或短地控制过北京的中央政权，向全国发号施令。他们在混战的时候总有一方以中华民国的正统政府自居，甚至当国民革命军北伐直接威胁他们统治的时候，他们也还统治着中央政权，而指责国民革命军是反对中央的大逆不道者。他们的状况同蒋介石尔后在南京建立的中央政权并无二致，和蒋介石在军事上对立的人甚至比他们统治时更多一些。所以，皖、直、奉系是军阀，蒋介石不是军阀的说法，仍欠说服力。

我们认为，对于“私军”和“地盘”这两者，只能从广义来理解，如果划出一个界限，那就混乱不清了。例如袁世凯和蒋介石的军队，都是在相当程度上受私人控制的军队，他们控制中央政权的时间较长，而且曾在短暂停间里，其军事势力可以及于全国大部分地区，但严格说来，他们都没有真正统一过全国。他们同地方军阀、包括直、皖、奉系军阀相比较，只不过是袁、蒋的军事力量较强大，势力较集中，控制的地盘较大，除此而外，再找不出他们之间有任何本质的区别。如果离开了本质而只论其他，那么，就会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个实行地方割据的军阀，当他势力扩充而统一全国以后，他就肯定不再是军阀了。这样的论点，在理论上似难以成立。所以，把直、皖、奉系列为军阀而袁、蒋不列作军阀，似欠合理。

至于除了“私军”、“地盘”以外的其他特征，那就更加是众说纷纭，各执一是了。比较多的看法，认为有帝国主义支持或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是构成军阀的不可缺少的条件①。关于这点，早

① 例如胡梦华在《中国军阀之史的叙述》一文（载1931年12月出版的南京《中央日报》大道副刊）中，就认为军阀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谢本书和王永康也认为：“作为军阀，他们必须是：……和地主豪绅买办勾结，对外还投靠帝国主义”（见《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26页）。

在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就宣告：“凡为军阀者，莫不与列强之帝国主义发生关系”；^①稍后，孙中山在《北伐宣言》中也提出过“军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这一观点。^②以后，许多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就更进了一步，把军阀看成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但是，截至目前已经公开了的资料表明，同帝国主义有勾结，成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或统治工具的，只不过是那些势力较大，或者是控制过中央政权的军阀，例如袁世凯、蒋介石以及直、皖、奉系、旧桂系、陈炯明等等。这些人在军阀中只占少数、更多数的地方军阀，究竟同帝国主义有无关系，即使有关系，能否谈得上勾结，目前还找不出足够的材料加以证明。至于一些地方军阀同帝国主义有些来往，或者购买帝国主义国家的武器，或是借帝国主义统治的港澳地区及租界方便条件来从事活动，只要他们没有以出卖主权作为交换条件，似应看作是一种贸易或往来，尽管这种交易不很光彩，也不能说是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正是这样的理由，我们便没有将这一条列为构成军阀的必备条件。

压迫和剥削其统治地区的人民，反对革命，这个基本特征，我们认为必须列入，乃是从人们所公认的“军阀”是一个贬义词这点出发。从整体的一般意义来说，军阀是反动人物，或者是反革命派。当然这并不排斥某个“军阀”在一定的时期内做过一些有利于人民、有利于革命的事情。但这是属于个案研究的范围，属于对某个人物的具体评价，并不影响“军阀”这个群体的一般定性。否则，国民革命的目标“打倒列强、除军阀”就无法解释了。据此，压迫和剥削人民，反对革命应该成为构成军阀的一个基本特征。

^{①②}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如缺少了这个特征便作出定论，那些为国家民族利益、在一定时期中与控制中央政权的反动派对立的、有地盘的地方军队，岂不是都成了“军阀”？例如：孙中山领导的以南方四省为基地进行反袁的“二次革命”的军队，以两广为基地的“护法军政府”、广州非常大总统府、大元帅大本营；以蒋介石为领导的、1927年4月以前以广东为基地的国民革命军；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等等。自然不能将他们排入军阀割据之列，这是不容置疑的。根据同样的理由，我们也不主张将与中央政权对立、“闹分裂”，作为“军阀”必备的一个标志。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表明：从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至1949年这38年间，除了民国元年有过一段极为短暂的表面统一的时期以外，中国一直未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中央政权，控制着中央政权的任何军阀都不能使其号令施行于全中国。所以，对待“中央政权”的态度，没有必要列为“军阀”的基本条件。

对于军阀割据混战形成的原因，也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早在1928年，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就作了这样的阐述：“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①在此前后，国内的一些学者，也持有与此相类似的观点。^②从一般意义来说，这个论断应该说是正确的。但是，人们在进一步阐述这个论点的时候，就往往强调了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政策这一面，甚至将它说成是最主要的原因，^③这就不完

①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49页。

② 例如前引胡梦华文。

③ 包括前引的胡梦华文，谢本书等文，甚至毛泽东在后来阐发自己的观点时也把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政策说成是最主要的原因。

全确切了。

为了更加准确地表述这一命题，似乎有必要把它分成两个层次来说明。第一是军阀割据形成的原因，也可以说是军阀形成的原因。应该说，封建性的自然经济及与此有关的长期在中国社会保留下来的一系列封建因素，乃是最主要的原因；帝国主义的侵略、分裂中国的政策只能是很次要的原因，所以人们才往往在“军阀”前面冠以“封建”这个定性。第二是军阀混战不断发生的原因。可以说，既然有军阀割据，就有扩张和反扩张，混战是必然出现的，所以封建因素还是主要原因，但是，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政策，在造成军阀混战中所起的作用，比在军阀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就大得多了。

众所周知，在清末民初，封建性的自然经济，依然在中国社会占着统治地位，使得各个省，甚至各个地区，都具有了即使在同外界隔绝的情况下仍能独立存在的条件，这就为封建性的割据提供了“地盘”。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经济侵入，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封建性的自然经济正在逐步解体，农民大量破产、失业，这又为封建军阀提供了广泛的兵源。由于封建意识形态的影响和传统思想观念的渲染，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村多数人的思想上勾勒出一幅充满着“家长统治”、“忠顺服从”、“宗族观念”、“地方主义”、“五同”关系，迷信鬼神等封建色彩异常浓郁的图画。上述这些，才是构成军阀得以产生的最基本条件。辛亥革命冲垮了统一的清王朝，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而民主政治、新的统一的社会秩序又迟迟未能建立起来，这便为军阀的产生提供了时机。因而，辛亥以后，封建军阀才在各地陆续涌现，其大的操纵全国政权，小的独霸一个省、区。后来，加上了帝国主义的操纵，便使中华民国陷入了四分五裂、军阀混战

连绵不断的境地。

二、南北军阀的特点

中国最早出现的军阀，乃是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北洋军阀集团。

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爬上了大总统的职位以后，便在中国北方建立了由北洋军队统治的军事封建专政。他控制了大半个中国以及中央政权，他成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买办阶级的代表，成了革命发展的最大障碍。即使是北洋军阀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军事封建专政，中国南方仍有一些省不完全听命于袁世凯，在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以后，这种相对的独立状态更是日益明显。

1916年袁世凯死去以后，北洋军阀尽管经已分裂成直、皖、奉等各个集团，但他们依然牢牢地控制着中国北方这块“地盘”，依然由他们轮番地执掌着中央政府，他们在各自控制的地区，同样地进行着军事封建专政。

辛亥后并不完全听命于袁世凯的南方各省的军事力量，在护国战争兴起以后，便同北洋军阀处于完全公开对立的地位。随着护国战争的发展，这些军事集团的头目，纷纷在自己统治的各省或地区，先后建立了军事封建专政，成为了地方军阀。当时同北洋军阀相对立的军事力量，主要是分布在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湖南六个省，所以在这六个省出现的各个派系的大小军阀，人们统称为西南军阀。

北洋军阀和西南军阀，是中国两个不同系统的军阀集团，它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具备了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军阀的基本

特征，正如孙中山所指出：“南与北如一丘之貉”。①但是，它们之间还是各有特点，这些特点，大致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产生的背景。

北洋军阀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1895年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及至1902年袁世凯正式成立的“北洋常备军”，北洋军阀的框架就开始树立起来。到了辛亥前后，北洋军阀成了一支左右中国政局的重要军事力量。所以，姑勿论它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仅从北洋军阀产生的背景，可以显示出两个特点。一是它的产生是为了挽救封建专制制度的败亡；二是它完全由袁世凯一手扶植起来的私家军事力量。由于这两个特点，决定了这个军阀集团由始至终都是站在封建势力一边，与人民为敌，一直是革命的对象。同时又决定了这个军阀集团是一个组织较为严密的封建性团体。袁世凯在世时固然十分明显，袁世凯死后即使分成几个派系，各个派系也都继承了这种封建性的传统，由始至终几乎都是由某一两个头目占据着统帅地位，统属关系极少发生变化。②

西南军阀的正式形成是在反袁的护国战争以后，可以说是在反对封建皇朝复辟声中产生。各派军事力量的头目，在辛亥革命时期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过中华民国的“共和”政权。他们的出现有先有后，力量有大有小，所抱的目的也有差异。这个背景，就决定西南军阀中的某些派系，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可以参加反对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革命斗争，成为革命的暂时同路人。西南军阀不是一个统一的军阀集团，他们各自为政，互不相统属，同一派系的部队来源也不一样，派内有派，统属关系时有变化。

① 《孙中山全集》，第四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71页。

② 薛立敦：《中国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第1—30页。

第二，所处的地位。

北洋军阀的军事实力一直较为强大，而且由始至终控制了中央政权，袁世凯在世或死后都是如此。所以他们的存在，对于中国政局的发展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他们又以代表国家自居，可以为所欲为，横行无忌。不只在同西南军阀的争权夺利中处于有利地位，在同帝国主义的关系中也占据优先。他们公开同帝国主义勾结，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得到了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西南军阀的力量较为弱小、分散，他们只是一个省或地区的统治者，只有保守原来地盘的实力，而无争夺中央统治权的力量。并且，他们表面上还要听命于由北洋军阀控制的中央政权的号令，他们同北洋军阀对抗时往往被视为“叛逆”行为。正因为西南军阀的地位远不如北洋军阀重要，所以并不是所有西南的大小军阀均会引起帝国主义的重视，因而同帝国主义的关系不一定都很密切。

第三，发展前途的过程。

北洋军阀由始至终与革命为敌，变化不多。在北伐战争中，一部分被消灭，一部分投降，也有一些改换旗号后保留下，但已经不算是北洋军阀而是新的地方军阀了。①

西南军阀则比较复杂，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不只是各派系间相互力量有转变；一个派系内部包括派系的主帅也时有变动。他们当中一些头目，时而参加革命的行列，时而又站到反革命一边；既可以成为反对北洋军阀或蒋介石的力量，又可以服从北洋军阀或蒋介石的号令而参预镇压革命力量。他们的多数，直至1949年才消亡；其中有不少代表人物还终于走上革命的道路，为

① 例如冯玉祥、阎锡山、韩复榘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北洋军阀和西南军阀各具的特点差异极大，所以，南北军阀之间长期以来都是处于对立的状态。这种对立的本质是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斗争，但又渗入了帝国主义的操纵和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因素。由中华民国建立至1928年这段期间，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打倒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封建主义。因此革命战争往往是从南方开始，革命所依靠的军事力量，主要是西南各派军阀，即使在孙中山认识到“南与北如一丘之貉”以后，这种状况亦未能完全改变。所以，西南军阀的各个派系，几乎都一度在革命的旗帜下同北洋军阀对峙。

南北军阀之间虽然是对立为主，但也时常互相勾结，这显然是它们的共同本质所确定的。勾结的目的，几乎都是为了共同对付革命力量。一种情况是，西南一些派系的军阀投革命之机以后，并不能达到他们为所欲为的欲望，便与北洋军阀相勾结，从革命队伍内部来破坏、反对革命；另一种情况是，当他们自己的派系，正面临着被革命势力或其他军阀势力消灭的危险时，便勾结北洋军阀以便取得支援，以图苟延残喘。南北军阀的相互勾结，往往给革命力量造成极大的压力。

至于蒋介石成为新军阀，其产生背景及发展历程，与北洋军阀不尽相同，但当他消灭了北洋军阀以后，却取代了北洋军阀的地位。他与西南军阀的矛盾和勾结，与南北军阀的矛盾和勾结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这里不准备详加阐述。

三、军阀割据统治广东的概况

辛亥革命以后，广东成立了以同盟会员为主体的军政府。这

个军政府（后改都督府）存在的一年多时间里，力图推进民主政治，不注意掌握军队，政府的领导人都没有实际的兵权。原来驻扎在广东的清朝陆军及地方部队，“反正”后虽作过改编，但整个领导系统变动不大，“二次革命”后又被龙济光改编。因此，一直到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时，也没有形成一支粤系军队。

由陈炯明统率的“粤军”，组成于1918年，后来在福建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成为孙中山所依靠的一支重要的革命军事力量。到了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前后，粤系军阀才正式形成。1925年底，陈炯明的势力被消灭，粤系军阀实际上瓦解。1931年陈济棠在广东建立了独立于南京中央政权的军事统治，乃是粤系军阀在新时期的延续与发展。

总的说来，粤系军阀还没有形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封建军阀集团，它不仅没有与北洋军阀或蒋介石新军阀长期抗衡的能力，甚至也不能同西南其他派系军阀的实力等量齐观。加以广东人民有着光荣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传统，广东又是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的基地。这一切，就使得军阀在广东的割据统治状况，出现了不同于其他省区的特色。

第一、割据统治广东的军阀，不是以粤系为主，而是以外来军阀为主。由1913年至1936年这23年间，统治广东的外来军阀，便有龙济光、旧桂系、滇桂军，以及李济深和黄绍竑，外来军阀在广东割据、混战的时间长达十二、三年之久。这些非粤系军阀，都是垂涎广东这个富庶之地，抱着掠夺广东人民的财富这个目的而进入广东，他们在广东大事搜括，中饱私囊以后，才以各种方式离粤。他们在广东的割据统治，给广东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从这点看，显然和云、贵、川、桂等省区几乎都是由本省军阀进行割据统治的状况不同。

第二、在广东统治和混战的军阀，占据广东的时间都不很长。在这23年间，龙济光、旧桂系、陈炯明、滇桂军、李济深和黄绍竑、张发奎和黄琪翔、陈济棠等人，先后在广东建立过统治，但他们割据的时间，最长的也只有五、六年，短则只有一两个月。这和各省区的军阀统治较为稳定、时间较长也有很大的区别。

第三、割据广东的军阀，几乎都是打着革命的旗号。除了龙济光以外，其他军阀都是以讨袁，追随孙中山革命，或者贯彻孙中山的遗志而入据广东，甚至龙济光本人，也曾一度列名为讨袁的护国军军务院的抚军。这个现象，使在广东割据统治的军阀，更具欺骗性。这也和其他地区的军阀明目张胆地进行封建军事统治有所不同。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由1913—1936这23年间，军阀在广东的统治并不是连续不断的。由于广东是民主革命的基地，有些时候还是由革命军队所控制。即使一些原来是革命军队的领导人，后来蜕变成了军阀，但当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之中，没有最终成为军阀以前，还不能作为军阀的割据统治来对待。例如叛变以前的陈炯明，北伐出师前的在广州的蒋介石，对于他们，只能将其叛变的迹象或事实予以揭露，以说明他们后来转变成为军阀并不偶然。

至于在广东建立过军阀统治的代表人物，他们许多人在成为军阀以前曾经为革命作出过贡献，例如陈炯明等；有些甚至在割据统治时期也为人民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例如陈济棠；有不少人在结束了军阀统治以后，走着曲折的道路，但最终参加了人民革命的行列，为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尽了应尽的努力，如李济深等。所有这些，都不能因为他们一度成为军阀而将

他们的一生加以否定，但详尽地评价他们的功绩，则不是本书所能承担，我们尽可能在有关章节中作些必要的介绍和说明，力图全面、客观地反映出他们的功过。

上述的这些概况，在下面的各个章节中，将会得到进一步的阐述。

附录 仅我们读到的就有下列一些专著：

1. 薛立敦 (James Sheridan)：《中国军阀：冯玉祥的一生》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
2. 吉林 (Donald Gillin)：《军阀：阎锡山在山西》 (Warlord: Yen Hsi—shan in Shansi, 1911—1949)，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3. 罗逊柏 (Lucian Pye)：《军阀政治》 (Warlord Politics)，纽约柏拉加出版社，1971年版。
- 4 陈志让 (Jerome Ch'en)：《袁世凯》 (Yuan Shih—kai)，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
5. 凯普 (Robert Kapp)：《四川与民国：地方军事主义和中央政权》 (Szechwan and Chinese Republic: pror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
6. 齐锡生 (Hsi—Sheng Chi)：《中国军阀政治》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
7. 杨格 (Ernest P·young)：《袁世凯的总统任内：民国初期的自由主义和独裁政治》 (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 Liberalism and Dictatorship in Early Republicam China)，美国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
8. 墨可马 (Gavan McCormack)：《张作霖在东北，1911—1928年》 (Chang Tso—Lin in Northeast China, 1911—1928)，

美国斯坦福大学，1977年版。

9. 吴应锐 (Odoric Wou)：《近代中国的军事主义：吴佩孚的生涯，1916—1939》(Militarism in Modern China: The Career of Wu P'ei-fu, 1916—1939)，英国多信出版社，1978年版。

10. 高斯雅 (Brian Crozier)：《失去中国的人：第一本完整的蒋介石传记》(The man who lost China: The First Full Biography of Chiang Kai-shek)，纽约史及那出版社，1976年版。

此外，还有台湾出版的董显光的《蒋总统传》，熊式一的《蒋介石的一生》等等，总数在20本以上。

第二章 龙济光入粤，军阀割据形成

第一节 辛亥革命后的广东政局

一、广东光复

1911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11日，光复武昌，成立中华民国鄂军政府，并宣告中外。于是，全国各省纷纷响应，到11月7日为止，湘、陕、赣、晋、滇、苏、浙、黔、桂、皖等省先后宣布独立，并都成立了军政府。广东则迟至11月9日才宣告独立。

广东的独立在许多省之后，至武昌起义后一个月才实现，这是有原因的。本来广东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长期经营的地区，多次武装起义都在这里发动，革命力量有较为雄厚的基础。但是，“三·二九”之役革命党人损失惨重，元气大伤，从人力、经费来说，短期内难以再举。特别是领导人的星散，赵声因意志消沉，忧郁而逝；黄兴认为同盟会难以有所作为，转而支持暗杀行动；胡汉民则以发展党务为名，远走南洋。只有朱执信留在香港，维持同盟会南方支部的联络工作。这种状态，当然无法在武昌起义以后立刻作出反映。

然而，广东毕竟是革命党人长期活动的地区，革命的影响深

远。因此，当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来，广东的革命党人也立即行动起来。朱执信致函在南洋的邓泽如，要李福林、陆领迅速回粤指挥“民军”起义，自己亦亲赴顺德、南海、三水等地策动。10月29日，胡汉民从南洋赶回香港。经过研究决定，由朱执信、胡汉民负责广州起义，陈炯明、徐维杨、姚雨平分别负责东江、北江和潮梅地区的起义。^①从10月下旬起，广东地区的武装起义迅速发展。陆领、陆兰清、张炳、周康等率领的民军，在乐从、陈村、西樵等地举义，占领了顺德、南海、三水等县的许多据点，加上了谭义起义于新会，任鹤年起义于香山，形成了一个从西南面包围广州的态势。李福林所部民军在禺东、禺南起义，何克夫在花县起义，则给清朝的广州当局以直接威胁。尤其是以陈炯明、邓铿、王和顺为领导的势力最大的民军——“循军”和“惠军”，在东江发难，迫近惠州。西江、北江、潮梅、钦廉等地区，亦在革命党人的领导下，纷纷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起义。^②到了11月上旬，广东各地已是处处烽火，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民军，已经稳稳地掌握了军事上的主动权，包围了广州城，同全国不断高涨的革命形势相呼应。

面对着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能够左右广东政局的士绅巨贾，感到广东“易帜”已经不可避免。于是，以江孔殷为代表，开始策划“和平独立”运动。10月25日，他们在文澜书院集会，29日，又在爱育善堂集会，拟出了“和平独立”、“承认共和”的方案。^③当时在广州的同盟会员，出于各种利害关系的考虑，支持他们的行动，

^① 邹鲁：《回顾录》（上），重庆独立出版社1944年版，第41页。

^② 参见李朗如、陆满：《辛亥时期的广东民军》，《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8—159页。

^③ 《广东独立记》，《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112、117页。

并通过关系去争取粤督张鸣歧接受。

起初，张鸣歧对此表示反对，他扯去市民欢呼独立的旗帜，还张贴告示，要对主张独立、共和者，“从严惩办”。^①但是，全国各省的相继“独立”，广东各地民军的蜂起，迫使掌握广东军事实权的水师提督李准和陆军统制龙济光，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前途。李准开始认识到：“民心思反，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维持”^②，于是决心“反正”。在李准的影响下，龙济光也有些动摇。至此，张鸣歧眼见大势已去，不得不于1911年11月8日，承认以江孔殷为代表的士绅巨贾的“和平独立”方案。

11月8日，广东各团体代表在咨议局集会讨论独立，众推张鸣歧为都督，龙济光为副都督。但张、龙这时都已成了惊弓之鸟。因为民军明确地将“反对张鸣歧”列为第一宗旨，^③香港报界又发布“不认张鸣歧、龙济光、李准等执行临时军权、政权之机关”的声明。^④“侨商函电交责，张知不容于众”。^⑤在此情况下，张鸣歧、龙济光都惧怕革命势大而不敢就职，张还逃匿沙面避祸。

11月9日，继续开会，决议“欢迎民党组织共和政府临时机关”，“宣布共和独立”。^⑥代表改推胡汉民为都督，未到任前由蒋尊簋代理。同一天，蒋代都督发布通电：“广东全省，本日已宣告独立，改隶中华民国军政府之下”，并“通告各国”。^⑦自此，

① 《广东独立记》，《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125页。

② 李准：《光复广东始末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七），第245页。

③ 郭孝成：《广东光复记》，《辛亥革命》（七），第232页。

④ 《广东独立记》，《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13页。

⑤ 《辛亥革命》（七），第246页。

⑥⑦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四册，1963年台湾版，第444页。

宣告了广东光复。①

二、军政府的成立及其措施

1911年11月10日，胡汉民由香港返抵广州，就任广东军政府都督。他首先通告“复黄历，剪辫发”，②并任命民政、财政等部的负责人，以维持广州治安及财政收支。

11月17日，广东各团体代表在咨议局开第二次大会，推陈炯明为副都督，黄士龙为参都督。③胡汉民还向大会提出军政府各部部长、副部长人选，正式组成军政府。

军政部长蒋尊簋	副 魏邦平
财政部长李郁堂	副 廖仲恺
民政部长黎国廉	副 伍藉槃
司法部长王宠惠	副 汪祖泽
外交部长伍廷芳	副 陈少白
交通部长梁如浩	
实业部长王宠祐	副 利 寅
教育部长丘仓海（逢甲）	
总顾问官 何启 韦玉	
枢密处 朱执信、李文范、李杞堂等17人（不设长）。	④

① 有关广东光复历史的著作，最受西方学界注视的是罗士（Edward J.M.Roads）著的《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个案研究——1895至1913》一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

②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四册，第448页。

③ 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1981年台湾版，第123页。

④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四册，第449页。该名单不完全准确，例如民政部长开始是陈景华。

从军政府的组成人员看，绝大部分是同盟会员，而且其中大部分是留学欧美或日本的青年学生，因此，他们能以蓬勃的朝气，献身于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权。

广东军政府（后改都督府）由成立到1913年8月解体，存在时间约21个月，一直是在革命党（先是同盟会，后改国民党）人的掌握之下。他们在封建专制政权的废墟中，为建立一省的民主政权摸索前进，创造了不少值得后人赞颂的业绩。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下列数端：

一、整顿广州市治安，稳定了社会秩序。光复之初，广州社会秩序混乱，烟赌林立，劫杀案频频。胡汉民说：“余受任之际，全城官吏尽空，等于无政府，余乃即日任陈景华为民政部长，先使理警察之事”。^①在胡汉民的支持下，陈景华采取严厉镇压手段，对付抢劫匪徒和阴谋推翻新政权的反革命分子。例如“百二友”、“扶正同盟会”、“救世军”等等抢劫集团和反革命组织，都被摧毁。对吸烟者采取登记办法加以控制。赌徒则处以严重罚款或拘禁。又健全了广州市各级警察机构，使广州市的治安逐步走上轨道。

二、组织北伐军，支援南京中央政权的革命斗争。东南各省光复以后，清政府仍垂死挣扎，置重兵于武汉、南京一带，威胁着新建立的革命政权，因而许多省都组织北伐军北上支援。广东于局面稍定之后，即以姚雨平为北伐军总司令，组成了一支以起义新军为骨干，加上经过挑选的民军和若干华侨学生，为数达到8000人的队伍。广东北伐军集中了当时广东军队中的精华，可算是一支兵精、装备好、粮饷足、战斗力强的队伍，是各省北伐军中

^① 《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台湾版），第三辑，第45页。

的佼佼者。广东北伐军于12月8日“由广州乘船出发”，^①经上海后转赴南京。

1912年1月上旬，广东北伐军沿津浦路进行北伐，在固镇、宿州、徐州三大战役中给清军张勋、倪嗣冲等部予沉重打击，声势大振。至2月12日清帝退位，战争停止，广东北伐军退驻固、宿一带，整编候命。直至5月，才由当时的陆军总长段祺瑞以经费困难为由下令解散。这支为捍卫革命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精锐部队，离粤北伐，后又解散，是广东革命政权的重大损失，对往后广东局势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三、建立临时省参议会。决定广东独立的广东各团体代表大会，实际上是受士绅巨贾操纵的临时议事机构，并不真正反映民意。在1911年12月5日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参督黄士龙妄图独揽兵权，竟然提出所谓统一军权的建议。受黄士龙运动的“商界代表颇为之动，亦有献议三督分权治事者”，后在胡汉民等人的驳斥下未被通过，但已暴露了代表大会严重不纯的状况。^②因此，胡汉民、陈炯明、朱执信等经商议后，决定重新组织临时省参议会，草拟了《临时省会选举法》。选举法规定了代表比例：同盟会代表20名，军团协会21名，华侨代表12名，师生代表9名，“自治团”代表1名，其余57名为各地区代表；并规定在全数120名议员中，女议员应占10名。按照这个比例建立起来的临时省议会，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反映了革命政府的民主精神，特别是女议员的产生，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在全国当时也是唯一的。因此，临时省议会由12月16日建立，至翌年2月正式

^① 姚雨平：《武昌起义后广东出师北伐的经过》，《广东辛亥革命资料》第168页。据《胡汉民先生年谱》第126页的记载，出师日期是12月10日。

^② 参见《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三辑，第49页。

省议成立结束的两个多月内，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建议，对政府的工作也起到了监督、促进的作用。

四、亟力克复财政困难。光复之初，广东财政陷入严重的危机。胡汉民说：“括全城官库，仅得万元”，所以张鸣歧逃走时就预言，“革命党即得广东，不能守三日也”。^①军政府首任财政部长李郁堂后来也这样描绘：“回思反正之初，吏役逃亡，席卷饱矣；管钥虚设，库空洗矣；殷富流离，商务凋敝；农工失业，盗贼繁滋；杼轴已空，税厘无着。加以民军据省，累万盈千，饷需逼迫，急于星火。”^②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军政府不得不把财政问题列为“第一要政”。由于当时局面尚未稳定，关税以及其他赋税的来源极少，无济于事。财政收入只能依靠借款、捐款、发行纸币等途径解决。

胡汉民就任都督之初，即从港商处借40万元应急，随即以发行公债来借款。仅由军政府成立至当年年底的一个多月中，就筹得公债借款近200万元，至1912年5月底止，共得公债借款380多万元，占同期全省财政收入的10%。

光复之初，捐款也是解决燃眉之急的一种办法。由于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海内外各界群众欢欣雀跃，掀起了募捐支援的高潮。由军政府成立至当年年底，共收捐款74万多元，相当于同期军政府所有赋税款收入的4倍。

军政府应付财政开支的主要手段是发行纸币。清末，广东库存纸币1300多万元，光复后“加盖军政府财政部印发行，而使

^① 《胡汉民自传》。据邱捷《广东军政府初期的财政状况》一文（载广州市政协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史料专辑》上）的考证，当时的库存不是1万元，而是10万元。

^② 钟荣光：《广东人之广东》，铅印本，广州中山图书馆藏。

商会承认通用之”。① 1912年四五月间，军政府又发行新纸币630万元。这样，由军政府成立至翌年5月，共发行纸币近2000万元，占这期间军政府全部支出的53%强。

由于采取了多种办法，军政府即使承担了1700多万元的巨额军费开支，又以280多万元支持北伐军经费，还拨出近40万元支援他省，到1912年5月底，仍可盈余120多万元，渡过了光复初期的难关。②

五、安置“民军”，缓解了财政和治安上的压力。广东光复，民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光复以后，广州、惠州两属的民军，纷纷涌入广州，虽经军政府三令五申，亦无法制止。到1911年12月，进入广州的民军达50多支队伍、14万人。③这就给刚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带来巨大的压力。如以当时广州市人口70万来计算，民军数目达到了广州市人口的五分之一，仅此一点，已充分暴露了问题的严重性。④

首先是给广州的社会治安带来严重的困扰。李朗如和陆满在回忆中说：民军“几乎是一支毫无纪律的便衣队伍”，“仅佩几个自制的炸弹或腰刀、长剑之类，……四处游行穿插，歹徒乘机混迹其中，因而形成兵匪难分，一般人民对之无不提心吊胆。而且遍地烟赌，民军官兵亦有因赌败而进行抢劫，甚至谋财害命者。亦有一些民军随便向天空放枪，以致流弹伤害人命，造成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惶惶”。民军领导人“大多数都沉迷于嫖、赌、饮、

① 《胡汉民自传》。胡汉民说库存纸币1200万元。

② 以上财政收支数字，均据邱捷的《广东军政府初期的财政状况》一文的附表。

③ 吕芳上：《朱执信和中国革命》，1978年台湾版，第135～138页。

④ 当时广州市尚无人口统计，但据1928年《广州年鉴》的统计是81万多人，1930年《广州年鉴》统计是85万多人，由此推算，70万左右人口不致相差太远。

吹的堕落腐化生活，对于政治、军事都置之不闻不问，每天只懂得向军需经理人取款，以供尽情挥霍享乐，买妓纳妾。……”^①

民军的饷项，也是军政府财政开支上的一个沉重的负担。即使以每人每日2角计算，每月的开支亦近百万元，^②约占当时广东军费开支的三分之一。一个月就耗去了军政府所收到的全部捐款的三分之二。

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政府和各界群众的忧虑，如何安置民军，便成了光复初期广东的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早在光复后头一两天，广州九善堂及总商会就上书胡汉民，要求军政府“妥为安置民军”。^③后来，商人又抱怨地说：“我商竭助金钱，岂愿再购乱事？”^④

胡汉民与陈炯明、朱执信商讨以后，确定采取整编和遣散两种办法来处置，除拟定由朱执信负责整编、陈炯明负责遣散外，还辅以各种措施。胡汉民就职后两天，即颁布了“军令”；接着又令民军不必再来广州，在各地者可“先暂解散，有事再行召集”；在广州者“一律静候调遣”。^⑤又成立了“军团协会”和“民团督办”

① 李朗如、陆清：《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民军》，《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160—162页。

② 朱子勉在《辛亥革命后广东政局的演变》一文中说：“每日每人2角不能拖欠。”《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478页。吕芳上在《朱执信和中国革命》一书中说，“一周间就得动支500万元以上。”钟荣光在《广东人之广东》一书中说，“月支饷银300余万”。此二说均有夸大之嫌，因当时每月军费开支均在250万至290万之间。但陈剑安在《循军与惠军冲突事件》一文（载广州市政协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史料专辑》上）中则说，由1911年11月9日到年底，发给民军的饷项59万多元，似亦不确。

③ 《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149页。

④ 广州《时报》，1912年3月5日。

⑤ 这些命令及布告，均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四册，第445—447页。

处”。前者是各路民军首领的共同协商机构，解决民军自身的一些问题，由陈炯明负责；后者是编练民军机构，先后由刘永福、黄世仲负责。但是，由于民军确实太多，且无组织纪律可言，这些命令和团体，实际上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因此，除了少数民军编入正规军队以外，大多数只能采取遣散办法。“陈炯明在代行粤督之后，即与朱执信共同商定裁散的办法，照朱执信的拟议：其愿自动解甲归农者，即发给恩饷以示奖励，其不愿遵守者，则以兵力临之”。^①按照这个方针，被遣散的民军的军械一律由政府给价收回，^②并发“功牌”以作纪念；官长还发“长粮执照”，凭照按月领取口粮。这种遣散民军的办法，“起初一般民军统领都持观望态度，直到石锦泉、王和顺部被强力解决后，……民军解散计划才算顺利完成”，至1912年“12月间，十四、五万众的民军只剩下了39600人”。^③这样，就使“广东军政府月省数百万，居民亦稍得安枕”。^④

解散民军的工作，受到广州社会舆论的普遍赞扬。《时报》对陈炯明以武力解决王和顺部的做法认为“有功于吾粤，虽三尺孺子皆当额首祝颂，谁得议其非”。^⑤1913年1月出版的《真相画报》亦在评论中说：“去年冬乃民军最盛时代，……居民多不敢出，商场因而凋敝，城市冷落。较诸今日，真有天壤之别，推其原故，未始非陈经略遣散军队之功也。”^⑥

① 吕芳上：《朱执信和中国革命》，第139—140页。

②⑤ 广州《时报》，1912年3月6日、4月22日。

③ 吕芳上：《朱执信和中国革命》，第140—141页。

④ 钟荣光：《广东人之广东》。

⑥ 广州《真相画报》，1913年1月号。

三、革命政权的严重危机

广东军政府建立伊始，即雷厉风行地采取各种手段，稳定了社会秩序，克服了财政危机，解决了棘手的民军问题，使政权建设得以逐步走上轨道，得到了革命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但是，和辛亥革命在全国胜利一样，广东的“光复”也是不彻底的。它是革命党人向地方统治集团、士绅巨贾让步的结果，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向封建势力妥协的产物。胜利以后，虽然建立了以同盟会员为主干的军政府，但并没有将反封建的斗争继续进行下去。反而，包括孙中山在内的整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都认为清朝封建专制政府已被推翻，政治革命和种族革命都已取得成功，“民族民权之二大纲已达目的”，今后的任务是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所以把主要精力转移到行政工作方面来。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的指导下，以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等为代表的、掌握了广东政权的革命党人，的确是以身作则，艰苦奋斗，企图创建一个“廉明”的政府，为全国的民主政治树立“楷模”。他们的努力，也取得了如上所述的成就。然而，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巩固资产阶级政权的战略任务——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封建势力。这就导致了新生的革命政权酝酿着严重的危机。

首先，他们没有自始至终取得作为广东资产阶级主要力量的商人的支持。光复之初，商人对新政权是热烈欢迎的。他们支持由革命党人组织军政府，商人中的头面人物李郁堂、李杞堂还担任了军政府的部长。在捐款、认购公债、支持纸币流通等方面，商人均有积极的表现。^①但这种良好关系并没有维持多久，由于

^① 参见邱捷的《广东军政府初期的财政状况》一文。

民军的骚扰和财政危机，使商人对军政府的反感与日俱增。民军问题解决以后，财政问题就成了军政府与商人矛盾的焦点。

军政府成立之初，曾宣布将清朝的苛捐杂税尽行豁免。后来为了增加收入，恢复了数值百万的酒捐，岁入近30万的三粮税和20余万的屠捐，这些增加商人负担的税捐，引起了商人的不满。^①商人踊跃认购公债，但军政府到期却无力偿还，至1912年底，未偿还的公债本息尚有550多万元。^②军政府发行纸币近2000万，开始时可以八成兑现，后来贬到不足五成。所有这些，极大地损害了商人的利益，但对于封建经济却未有丝毫的触动，商人的不满乃是理所当然。本来，加征地税，换契征税等既可以削弱封建经济基础，又可以大量增加收入，应该作为克服财政困难的重要途径，但“地税换契案”在1912年6月通过以后，^③并没用很大气力去推行。这样，纸币发行日多，不断贬值，商人拒用^④，矛盾日益加深，导致了后来商人站到了革命政权的对立面。

其次，他们没有建立一支以反对封建势力为目的的革命武装。如上所述，胡汉民、陈炯明、朱执信等人，以整编和遣散手段来处置民军，最后解决了民军的大部分，这个决策在当时来说是正确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认真贯彻这个方针，没有结合整编和遣散来建立一支革命武装，这就铸成了往后无可挽回的错误。

本来朱执信对民军的作用是有认识的，辛亥前他就在《民报》

^① 广州《民生日报》，1912年10月16日。

^② 《广东财政纪实》，第五编第一章第4页。

^③ 廖仲恺：《关于地税换契案的说明》，《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

^④ 现有的1912年下半年至1913年上半年广州出版的报纸，几乎每日均有拒用纸币的争执的报导。

中阐述过这方面的观点。光复后他参加组编的广东北伐军，在一定程度上达到革命武装的要求。他参与整编民军工作以后，是准备以精选过的民军作为建立革命武装的基本力量。当时随朱执信从事民军工作的李章达回忆说：“他根本不相信当时由巡防营、陆军等转变过来的那些队伍，他为着要把起自民间的民军健全起来，于是派出了若干有革命思想的陆军学生到各民军队伍中担任教练员，我就是其中之一。”^①对于要不要整顿和保留民军的问题，朱执信不时与陈炯明展开争执，甚至发生过持枪逼迫陈炯明撤销解散某些民军命令的事件。^②

但是，朱执信的正确意见并没有引起其他革命党人的重视，而编练民军的工作不能“立竿见影”，广州市民对民军的指责又接踵而来，朱执信自己的认识也不是很明确。因此，当胡汉民离粤以后，朱执信在处置民军方面就迁就了陈炯明的意见，以致在遣散工作中基本上是依照陈炯明的主张行事。

陈炯明^③虽然早在1909年就参加了同盟会，但他对资产阶级革命，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没有真正的认识。辛亥武昌起义后在惠州发动民军起义，在洪兆麟的配合下，接管了清朝陆路提督秦炳直的八营清军，组成了一支当时实力最为强大的民军——循军，在光复惠州以至后来在广州光复中都起过重要作用。正是这

① 李章达：《六十自述》，《广东文史资料》，第10辑，第2页。

② 参见汪希文：《朱执信先生外传》，载香港《春秋杂志》。

③ 陈炯明（1878—1933），广东海丰人，1898年（戊戌）考中秀才。1906年入广东法政学堂读书，结识了当时在该校任教的朱执信等革命党人。后回海丰倡办“自治社”、“自治报”，宣传改革。1909年被选为省咨议局议员，提出过“禁赌”等多项有益于社会的议案而博得了一定的声誉。同年参加同盟会，后参加过“三·二九”之役及暗杀活动。

样，他才被推为广东军政府的副都督。由于他对革命既无认识，而私心又重，所以在处置民军时就不能按革命原则办理，也没有贯彻与胡汉民、朱执信商定的主张。基本上是保留了他自己的队伍以及朱执信等人坚持要保留的若干支队伍，^① 其他则一律遣散。这种不公正的作法，当然引起其他民军头领的不满，部分民军不服从解散，也是由此而来。陈炯明的这个做法，就使当时革命政府失去了精选民军、加以训练、建立真正革命武装的机会。

陈炯明保留下来的、以“循军”为主体的民军，加上其他部分的清军降兵，组建了广东正规军两师一旅。部队的各级官长，多数是旧军人，况且和陈炯明个人的关系亦不深。陈炯明既不对部队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教育和严格的训练，又不多派具有先进思想的青年渗入部队掌握和传播革命思想。所以这两师一旅还是以封建思想为指导、以旧军官为领导的旧式军队，不能认为是巩固革命政权的依靠，也不能认为是陈炯明个人完全可以指挥的军事力量。

如上所述的对民军的处理过程，既暴露了陈炯明的个人野心，又表明了革命党人对于巩固革命成果和进一步发展革命毫无思想准备，以为取得了政权就万事大吉，将建立革命军队置于无足轻重的位置。但是，由于当时的革命形势仍在发展，广东的革命党人又牢牢地掌握着政权，民主空气也日益高涨。所以，一方面使广东的两师一旅军队，还是作为广东军政府的军事力量而存在；另方面，陈炯明的个人野心也不具备进一步发展的土壤，他还敢于也不能够将军队建成为一支私人所有的军队。

广东的这种状况，同其他许多独立的省份不同。在不少宣告

^① 例如李福林的福军等。

独立的省里，掌握政权的人就是原来的军队领导人，这就使他们有可能把军队培植成为私人所有，为后来地方军阀的产生创造条件。

此外，广东革命政权的危机还表现在他们没有致力于争取农民的拥护。军政府成立以后，没有作出过任何明显有利于农民的措施，连直接出自农民的厘金，也因财政困难而不取消。相反，国民军的大量解散，不少重归绿林，变兵为匪，同原来已是猖獗的土匪相结合，打家劫舍，给广大农民造成严重的威胁。尽管军政府曾设总绥靖处和各路绥靖处，作为负责肃清盗匪的机构，但“办理逾年，……强盗风仍不少息。”^①这样，农民并没有从革命政权得到什么好处，当然谈不上对军政府的拥护和支持。

正是由于这些危机的存在，就使广东革命政权在封建势力反扑时毫无招架之功，迅速走向失败。

第二节 龙济光入据广东

一、二次革命和广东的独立

1911年12月11日，孙中山由欧洲归国，路过香港，即偕同胡汉民等北上，广东都督交由陈炯明代理。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是，封建势力的总代表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反扑，孙中山不得不于4月1日辞去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继任。

① 钟荣光：《广东人之广东》

袁世凯篡夺了中华民国政权以后，就逐步建立以他自己为中心的封建专制政权。1912年6月，他推翻了任命王芝祥为直隶都督的前议，断然不经国务总理唐绍仪的副署，改任王芝祥为南方宣慰使。这就公开破坏了作为民国象征的《临时约法》，迫使唐绍仪和同盟会的几个阁员辞职。9月，袁世凯任命他的爪牙赵秉钧为国务总理，内阁成了袁世凯的御用机关，实现了独掌中央政权的野心。

接着，袁世凯以软硬兼施的手段，企图收买或迫使南方几个由同盟会掌握的省份就范，但未能得逞。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的领导人之一、力主实现政党内阁的宋教仁，被袁世凯指使的凶手刺杀于上海，两天后去世。刺杀宋教仁的枪声，惊醒了沉醉于建设“民主政权”的国民党人的迷梦。孙中山立刻于同月25日由日本赶返上海，筹划讨袁。

袁世凯并不就此罢休。4月，即同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订立善后借款2500万镑的合同，作为建立专制制度并镇压反抗者的经费。6月，先后罢免了属于国民党人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

在袁世凯的肆无忌惮、步步紧逼的进攻面前，孙中山领导国民党人坚决予以还击。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举兵讨袁，“二次革命”爆发。

早在此以前，袁世凯经已对广东的国民党人挑拨离间，分化瓦解。1912年12月，袁任命陈炯明为广东护军使，龙济光为副。说“护军使直隶于大总统，所有关于军令军政事项，须受参谋、陆军两部之区处者，随时咨部会商办理。”^①这显然是离间陈炯明

^① 《广东公报》，1913年1月7日。

和胡汉民的一项阴谋，有个人野心的陈炯明当然无法洞悉其奸，遂欣然就任。1913年1月，陈炯明另开官邸，将原陆军司令部改为护军使署，设置官员五十二人，形成与都督府分庭抗礼的另一政治中心，使“都督府徒负虚名”。^①陈炯明和胡汉民的矛盾由此加深。

随后，袁世凯更进一步挑拨陈胡关系，并竭力破坏胡汉民和都督府的声誉。袁的秘书长梁士诒，特派其爪牙李兼善在广州设立秘密机关——南园俱乐部，专事贿诱军官，使他们拥陈叛胡。他们还唆使广州的《总商会报》、《七十二行商报》、《华国报》、《羊城报》等报纸，遇事攻讦胡汉民和都督府，^②使都督府的许多政令难以推行。1913年3月，梁士诒亲自来粤，借口为其父做寿，暗中联络广东军队中的将官，使之拥袁。

6月14日，袁世凯下令免去胡汉民的广东都督，调为西藏宣抚使，由陈炯明接替广东都督。这时，孙中山领导的讨袁斗争已在密锣紧鼓地筹划，袁世凯的这一任免，无非是企图进一步拉拢陈炯明，以分化国民党的反袁力量。为此，朱执信规劝陈炯明作出讨袁的准备，并建议：“此时欲讨袁，必先简选革命之劲旅。今在粤之第一师为钟鼎基，第二师为苏慎初；第一师之中无革命党人，第二师中虽有而不多，“今若新编革命军一师，则第二师当然可互相提携，第一师亦不致有所变化，此上策也。其次则余解去一切名义上之职务，专选优秀同志在粤各军中宣传革命之理论与讨袁之大义，以坚定将士讨袁之心，此又一策也。”^③但陈炯明这时已和梁士诒有所勾搭，所以对这两策均不置可否。

① 钟德贻：《陈炯明在广东》，载《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三期。

② 《陈炯明叛国史》，《中国现代史丛刊》（二），1960年台湾版，第428页。

③ 胡汉民：《朱执信别记》，《建国月刊》一卷六期，第59页。

袁世凯的任命对陈炯明是有诱惑力的。陈炯明既想出任粤督，独揽大权，但又担心受掣于袁，受骗上当。所以陈炯明一面“力辞粤督之任”，一面向袁提出三个条件，以试探袁世凯的真意。“一、中央政府须即汇款三千万元解粤，以为收回地方纸币之用；二、不得任用政府私人为粤省护军使及民政长，从中牵制一切；三、如政府为一时权宜计，暂以炯明充粤督，则不如速去。”^①袁世凯本来就不是真心使用还是国民党人的陈炯明，当然不会对此作出答复，而陈炯明也一直不就都督职。

这时，孙中山领导的讨袁斗争已酝酿成熟，便多次催促陈炯明利用时机，立即就职讨袁，陈炯明以兵力不足等来推搪。直至听到梁士诒“如再不立即就职，中央当即任命他人督粤”的传话之后^②，陈炯明在7月4日宣布就职。待至江西、南京、安徽、上海宣布讨袁之后，陈于7月18日才宣布独立讨袁。但此时时机已失，在粤各军的将领由于受了梁士诒的重金收买和黄士龙的运动，^③不仅不服从陈炯明的调遣，还倒戈相向，广东的独立讨袁便很快以失败告终。

二、龙济光入据广东

龙济光（1867—1925），字子诚，云南省蒙自县彝族封建土

① 《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442—443页。

② 朱子勉：《辛亥革命后广东政局的演变》，《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423页。

③ 据《陈炯明叛国史》的记载，说粤中将领受梁士诒的重贿以后，相继逃匿香港。苏济川在他的回忆录中则说，袁世凯也利用黄士龙运动粤中将领倒陈，黄士龙还领了50万元的活动费；各将领并未逃港，只是苏慎初、张我权先后率部离陈独立，龙济光才得以未发一枪而进入广州（见《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438—443页）。本文从苏说。

司，由于镇压民众“造反”有功而得到清王朝的重用。1903年被任命为广西左江道，他率领几千名滇军前往赴任。1907年，因参与镇压同盟会领导的镇南关起义有功，翌年，擢升署广西提督。1911年的广州“三·二九”之役后，清政府为加强广东防务，将龙济光调任陆军第二十五镇统制兼广东陆路提督。^①“龙济光以济军九营来粤，并合桂军三营，为十二营”。^②

辛亥武昌举义以后，李准慑于广东革命党人的声势，决定“反正”，龙济光亦表示跟随李准行动。11月初，广东各界酝酿广东独立时，举龙济光为副都督，龙害怕革命势大，不敢就职。袁世凯篡夺了全国政权以后，蓄意排除国民党在广东的统治，便利用龙济光这个忠于封建王朝的人物。为了保有实力，等待时机，袁世凯大量补充济军的饷械，并令其由广东移驻广西梧州。

7月18日，陈炯明宣布广东独立讨袁。袁世凯即于7月26日任命龙济光为广东镇守使，龙观光为镇守副使，会率济军东下讨伐陈炯明。7月30日，龙济光率军由梧州出发，顺西江而下。驻肇庆的肇军统领李耀汉事先已受运动，变节附袁，与龙济光采一致行动。

陈炯明宣布独立以后，也试图组织力量，阻止济军的东下。“陈炯明之作战计划是以第一师的第一旅叶举全部，位于三水县河口至芦包一线，罗炽扬位于花县赤白泥一带，而与芦包一线的叶部互相呼应；师长钟鼎基率师直属部队布防广三铁路佛山至

^① 见高光汉：《护国运动中的龙济光》（载《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五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彭智芳、龚志豪：《龙济光三次入粤的追忆》（载《广州文史资料》第十一辑）；《龙济光》，载《民国人物小传》第五册，台湾版。

^② 《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三辑，第45页。

西南沿线，作纵深的布置为叶举的策应。”^①但由于钟鼎基、苏慎初等高级将领早就受到梁士诒、黄士龙等重金收买，不服调遣。^②因此，“陈方的防线尚未部署完毕，内部已起变化，驻省会东郊燕塘的第二师师长苏慎初已宣布离陈独立”。^③8月3日，陈炯明见大势已去，仓皇逃港。8月4日，苏慎初被部下拥为广东临时都督。只一天，8月5日各军又举独立旅旅长张我权取代苏慎初为都督，并宣布取消广东独立。至此，广东的讨袁宣告失败。

8月3日，袁世凯任命龙济光为广东都督兼民政长。这时，龙济光的济军在李耀汉的肇军配合下，继续东下，只在三水附近遭到广东陆军洪兆麟团的稍事抵抗以后，^④即长驱直抵广州，于11日开进广州市区。由于济军强占广州的各个重要据点，又迫使粤军缴械，留驻广州的粤军遂奋起还击，两军于11日下午在观音山一带展开激战。^⑤但因将领均已叛逃香港，粤军的反抗无补于事，终于全部被缴械改编。

陈炯明由宣布讨袁到失败逃跑，仅仅半个月。其失败之所以如此迅速，除了陈炯明不听从孙中山、胡汉民、朱执信等的规劝，贻误戎机，以及所属将领均受袁收买而倒叛的军事上原因以外。另一重要原因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民心的广州商人对广州革命政权的不满，以致粤军缺乏群众基础，内外受敌。

①③ 苏济川：《袁世凯利用黄士龙、王和顺策动广东陆军倒陈炯明的经过》，《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442页。

② 《国父年谱》（增订本）上册，1985年台湾版，第592页。又吕芳上在《朱执信和中国革命》一书中引用日本外务省档案说：袁世凯以100万元收买钟鼎基等师团长迫使陈炯明取消独立（见该书第155页）。

④ 见《朱执信和中国革命》一书第155页“注九”。

⑤ 见《国父年谱》，台北1985年版，第592页。

如前所述，由于财政危机而造成的混乱，军政府早就引起商人的不满。1913年，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和袁世凯向帝国主义大借款，遭到了南方各省的斥责和反对。“胡汉民反抗借款，而省港商民纷电中央表示赞成。”^①广州总商会、九善堂等团体，则发布传单，声称“宋案取决于法庭，借债亦已成事实”，公然和政府唱对台戏。还不指名地斥责不同意袁的所为的革命者为“奸暴之徒，危害治安”又说“人心倾向统一”。^②

二次革命爆发，广东宣布独立讨袁，省港商人群起反对，九八行、参茸行、锡业、海味、铜铁、绸缎、药材、茶叶等行业，都以个人或商会的名义上书袁世凯表示拥袁。有的电文甚至说：“赣乱发生，粤复独立，非诛孙黄，无以安天下。”^③广州商人都对独立表示抵制，所有商店无一悬挂独立旗帜，“天天都有商人反对独立”。^④

当陈炯明逃港，独立取消以后，商人拍手称快。《民生日报》说：“辛亥取消独立，粤人多恨独立不成；今年之取消独立，粤人多喜独立不久。”龙济光部开入广州，“粤商民停立恭候，各店铺燃炮致庆。”^⑤

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使龙济光得以顺利地入据广东，自此以后，广东开始了由封建军阀轮流割据统治时期，广东人民陷入了军阀统治的灾难之中。

① 广州《时报》，1913年7月28日。

②④ 广州《时报》，1913年7月23日、7月29日。

③ 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466页。

⑤ 广州《人权日报》，1913年8月12日。

第三节 龙济光的暴政

一、竭力维护封建统治

龙济光据有广东以后，为了巩固他在广东的统治地位，大力强化其专制统治，于是，采取了一系列反动的措施。

首先，排除异己，扩编军队。龙济光知道，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群众中有着深厚的基础，所以他对革命势力极尽残酷绞杀之能事。“凡与革命党稍有关系而逃走不及的新军官佐，或关或杀，无一幸免”。^①“对各民军统领及其以下官兵，均以乱党看待，格杀无赦”。^②在龙济光的高压政策下，革命党人无法在广州立足，纷纷往香港海外逃避。但龙济光不肯罢休，妄图彻底消灭革命力量，以绝后患。^③据当年《申报》的披露，龙济光曾悬重赏通缉革命党要人。拿获陈炯明，赏银6万元；邓铿，赏银2万元；朱执信，赏银2万元；姚雨平，赏银1万元；廖仲恺，赏银1万元；谢英伯，赏银8000元；胡毅生，赏银8000元；李济民，赏银8000元；洪兆麟，赏银1万元；杜贡石，赏银8000元。^④甚至还要求北洋政府将“此次在逃乱党姓名提出磋商各回国政府，一一引渡归案，按法惩办，以绝根株，若仅以通缉字

^① 彭智芳，龚志鑒：《龙济光三次入粤的追忆》，《广州文史资料》第十一辑，第64页。

^② 李朗如、陆满：《珠江三角洲的“绿林豪杰”和“大天二”》，《广东文史资料》第五辑，第7页。

^③ 见《革命文献》第44辑，《二次革命史料》，第291至312页。

^④ 《申报》，1914年3月28日《二次革命史料》第311页。

样照会、访拿，恐乱党卵翼深厚，消息灵通，终无就获之日。”^①可见龙济光同革命党人，达到了誓不两立的地步。

至于其他异己势力，龙济光也极力设法剪除，以便实现他称霸广东的美梦。例如黄士龙因驱逐陈炯明有功，曾被任命为广东护军使，但龙济光认为他有觊觎都督宝座的野心，深感黄存在的威胁，因而通过袁世凯，裁撤了其护军使职务，使黄“悄然引去”。甚至连一些陆军学校出身的军官，龙济光也将之撤换，一律以自己的亲信代替。

与此同时，龙济光又积极扩编部队，以增强自己的实力。他进入广州以后，立即将所部济军扩编成四个旅，以段尔源、马存发、王纯良、黄恩锡分任旅长。此辈皆骄横跋扈，不守军纪，号称“四大天王”^②并以贺文彪、潘斯凯、陆兰清、吴国雄、梁永燊、李次泉、陈福祥、李炳荣、徐连胜等为统领，袁带为护沙统领兼护商统领。此外，还派人到云南招募士兵三营，作为补充力量。扩大了以后的济军，成为龙济光统治广东的主要依靠力量。

广东陆军原有两师一旅，癸丑之役后，由于伤死、逃亡、遣散的不少，原来缺额又多，所以留存下来的兵员实不足一个师。为了控制和利用这支武装力量，龙济光对原陆军进行了整编。原第一、五、八、九、十团，较为齐全，编制一律照旧；其余第三团归并第四团，第七团归并第六团；工兵一营照旧留用；另重编炮兵一营，辎重兵二营。其余残兵，一律裁汰。由于编制缩小，原第二师司令部，归并为第一师管辖，以其兄龙观光为陆军第一

① 《申报》，1913年10月5日。

② 一说“四大天王”是段尔源、马有发、杨发贵、朱福全。参见李朗如、陆满《从龙济光入粤到粤军回师期间的广东政局》，《广东文史资料》第一辑，第16页。

师师长，便于控制。

收编了原广东陆军后，龙济光又着手整编海军。首先委派其兄龙观光任广东海军司令（后由蔡春恒继任），负责统率海军舰队。又任命一批亲信军官充任各舰艇的舰长、艇长。

经过一番苦心经营之后，龙济光终于建立了一支以济军为骨干的庞大军事武装。据1914年2月底的统计，粤省军队共达118个营和两个连之众。主要有：济军38个营，陆军19个营，宪兵2个营，都督府炮营1营，警卫军38个营，机关枪连4连，开花炮连2连等。此外，还有数量不少的警备队、游击队、护沙警察、海军舰艇等。

其次，破坏新生的革命政权，建立一套庞大的封建官僚统治机构，恢复封建统治秩序。本来广东光复后，作为代议政治主要象征的省议会，迅速组成和活动起来，曾对革命的进程和广东的军政兴革起过积极的作用。龙济光入粤后，便以“陈炯明倡乱广东省”，“省议会”，“领衔通电”，“甘心效逆”为名，将省议会解散。“其签名助逆各议员，犯有内乱罪名，应即一并确切查明，按律充办。”^①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以“国民党勾结为乱，证据确凿”，下令“一律解散。”龙济光秉承袁世凯这个解散国民党的旨意，命令各“厅县知事，即便遵照，迅将属内各议会国民党议员查照，一律开除”。^②

这样，辛亥后在广东出现的民主共和的象征，一概消失。同时，龙济光着手建立一个庞大的封建官僚机构。对于各地区的

① 《东方杂志》十卷，三号，《中国大事记》。

② 《申报》，1913年12月2日。

军事长官，均由派出他的一批亲信去担任。任命龙觐光为广惠镇守使，李耀汉为肇罗阳镇守使，吴祥达为潮梅镇守使，李嘉品为高雷镇守使，黄恩锡为琼崖镇守使，朱福全为南韶连镇守使。李福林、魏邦平、陈宏萼、叶举等，因可以利用，也得到留任。作为全省最高统治机关的都督府，被他建成一个规模十分臃肿的机构。据1913年年底府内人员清册的统计，人员总数比中央政府公布的都督府组织令所规定的多出了四分之三。^①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龙济光为了加强军事封建专政，先后建立了“军法课”、“探访局”等机构，并在广州、香港、澳门等地设机关部，作为捕杀革命人士的机关。^②

龙济光军阀政权的浓厚封建色彩，还表现在他大量起用清朝的官吏，分别担任各县知县等地方要职。例如琼崖劣绅王寿民，原为清定安县知县，早为当地人民所深恶痛绝。民国后，为当地人民赶下台。龙济光却重新任命他为知县。王寿民就任以后，“大作威福，如行香放告，则摆列头锣执事，出入燃炮”，“遇有人民诉讼，任令需索，其黑暗较前十倍。”^③ 龙济光重新起用的这些知县，大多包庇烟赌，贿卖警缺，滥用私刑，欺压百姓，“种种怪状，难以缕指。”^④ 正如伍子余在《甲寅》杂志所说：“默察地方吏治，见州县之官，十之九焉，为前清声名狼藉之污吏，”“吏治之坏，达于极点。”^⑤

① 《申报》，1914年2月17日。

② 《龙济光致北京政府支电》，和力辑：《赣宁战后付表资料》，《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第180页。

③ 《人权日报》，1915年5月26日。

④ 《申报》，1914年10月20日。

⑤ 《甲寅》，一卷七号，1915年7月。

龙济光竭力镇压革命力量，强化军事封建专政。深得袁世凯的赏识，说他“戡乱迅速，深堪嘉奖”，^①还一再鼓励他“忠勇诚朴，夙所倚重。务望榰柱艰危，悉心规画，以纾中央南顾之忧”。^②1914年6月，龙济光被第一批授予上将军衔，1915年又获得头等爵位一等公。1916年1月还被封为郡王。龙济光为巩固封建政权卖力，得到了袁世凯的最高奖赏。

二、施行横征暴敛

龙济光在广东拥兵割据，实行封建军事专政，需要维持一支庞大的军事武装，其军费开支十分惊人，“全省岁入，供养兵者计而七八”。^③

据后来广东财政厅对历年收支统计，龙济光据粤期间的军费支出情况如下：

	军费支出	占总支出
民国二年七月至三年六月	19,461,000元	70.1%
民国三年七月至四年六月	12,504,000元	54.4%
民国四年七月至五年六月	11,377,000元	46.9% ^④

又据《民国财政史》一书开列的民国三年度和民国五年度各省预算分类表的统计，广东仅是陆军的军费开支就先后高达7,538,683元和7,614,864元。数目之巨，居全国30个省区之

① 《政府公报》，1914年3月26日。

②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二册，第一页。

③ 《政府公报》1915年4月11日。

④ 《广东财政厅十七年来收支统计图表》，广东财政厅主计局统计科编，1938年该局出版。

首。①

高额的军费开支，再加上庞杂的行政费用，成了龙济光军阀政权的巨大包袱。因此，他通过了一系列经济上的措施，把这一负担转嫁到广大人民身上。设置并加重名目繁多的捐税是龙济光统治广东时期的一大特点。“吾粤屋有捐，地有捐，米有捐，柴有捐。屠牛也，市肉也，售卖鸡犬也，亦莫不有捐。细至于品茗，微至于拜神，几无一能免者。”②而且，这些名目繁多的捐税许多都是直接与军事目的相联系的。以清远县为例，民国三年，为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暴斗争，县政府组建了游击队和水上警察队。因此，增设丁口捐、牛捐、粮米附加捐、水警捐，以充军资。③繁重的苛捐杂税，成了压在广大人民群众身上的沉重枷锁。

包庇烟赌，则是民国以后龙济光所首创。早在1906年，由于举国上下纷纷要求禁止输入和种植鸦片，清政府也不得不颁令禁烟。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广东禁烟曾经取得显著成效。但是，龙济光的军阀政权却把鸦片毒品视为“绝大利源”，于是，亲自组织“包庇贩运”④使得“私土运入颇多”。⑤1914年4月，中央以烟毒日甚泛滥，便任命蔡乃煌为江苏、江西、广东禁烟特派员。蔡乃煌到广东后，不但不严厉禁烟，反而与龙济光狼狈为奸，实行烟膏专卖，使吸烟者合法化。他们还美其名曰“减轻烟

① 贾士毅：《民国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上册，第90—92页，98—101页。

② 熊理：《策广东》，泗水《泗滨日报》社1916年版，第72页。

③ 朱汝珍：《清远县志》，民国二十六年广州亚东印务局出版，十二卷53—54页。

④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20页。

⑤ 《政府公报》、《命令》，1915年4月30日。

害，藉促禁令，”^① 实际上是借此而牟取暴利。直至龙济光临败退海南之前，还私藏价值1000万元的鸦片600箱。

赌博是广东社会长期得不到根治的痼疾。辛亥革命后，广东军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厉行禁赌，使收饷开赌几近于绝迹。1913年，龙济光的军阀政府为了开辟财源，竟不顾广大群众的反对，擅开赌禁，企图以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来维持其政权的稳定。1914年10月，广东发生了水灾，龙济光勾结巡按使李国筠，以救灾为名，设立“水灾善后有奖义会”，以高价招股承办“山票”、“铺票”。开始时，私人承股者寥寥无几，遂又改为官办，分派义会总理到各属开办，以抽捐（赌税）筹饷。不久，全省的“山票”、“铺票”等赌博，又全部改由烟赌巨商霍芝庭私人承办。赌禁一开，山票、铺票、牌捐、字花、牌九、骰子档等各种名目的赌博，都死灰复燃。当时广州西关的赌场，“男男女女，如蚁附膻，一时有‘小澳门之称’，^② 军队中赌风更甚，“全省军界无一不以开赌庇赌为生涯”。^③ 龙济光靠开赌，又榨取了大量钱财。据统计：1914年，广东的赌饷收入是1,850,000元；1915年增至2,064,000元；1916年为1,911,000元。^④

龙济光的横征暴敛，搜括了广东大量的民膏民脂，解决了庞大的军费开支，还中饱了大小头目的私囊。仅龙济光个人在撤走时所带私财就以千万计。

在龙济光军阀政权的统治之下，广东的社会经济遭受极大的

① 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2月7日。

② 卫恭：《八十年来广东的“禁赌”和开赌》，《广东文史资料》第十六辑，第107页。

③ 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7月29日。

④ 《禁赌概览》，广东省禁赌委员会编，奇文印务公司1936年版，第239页。

摧残。城镇的中小工商业者大量破产。农业生产力更是遭到严重的破坏，呈现出一片萧条的景象。据《广东经济概况》一书的统计，龙济光统治广东的三年内，洋米的输入数量一直在直线地上升（见下表）：

	洋米输入担数
民国三年	5,410,440担
民国四年	7,036,165担
民国五年	9,783,403担①

洋米输入的激增，正是广东农村经济日益趋向崩溃的一个缩影。与此有关的一个重要因素则是当年广东所遭受的特大洪水灾害。

1915年，广东发生了一次罕见的洪水灾害。5月下旬，由于特大洪水的冲击，东、西、北江江水急剧上涨。南海、三水两县，各崩决堤围数万丈，两县境内，一片汪洋，尽成泽国，塌屋死人无法统计。新会县内的堤围也被冲决多处，饥民依山露宿。清远、花县、顺德、东莞、增城、从化等县的堤围，也先后崩决。②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乃是龙济光政权只顾搜括民脂中饱私囊，各地堤围年久失修所造成。更加令人气愤的是洪水警报发出以后，当局置若罔闻。据当年的《华字日报》记载，从5月底到6月初，西、北江各属县频频报警。其中6月初二，一日之间各县水情警耗，即达38则之多。③但当局毫不采取对策，水灾的迅猛发展，立即波及广州。从6月1日起，长堤，西濠口，泮

① 熊理：《广东经济概况》，西南印书局，1935年版，第4页。

② 《广东自然灾害史料》，广东文史馆，1963年版。第59页。

③ 香江一叟：《一篇往事助观今》，载香港《大公报》1959年6月27日。

塘一带，均被水淹没。6月初二，十三行商民因避水灾而失火，当局救火不力，以致受火灾的街道达25条之多。据龙济光致北京的报灾电称，焚毁店户达2000家以上。

水患未已，火灾继之，嗷嗷待哺的灾民达百万以上，企望当局予以赈济。可是，龙济光及当时任巡按使的张鸣岐之流，“惟酒宴应酬，对救灾则冷淡如无睹。”^①“当夕阳西下，广州东堤一带，仍然游人如鲫，笙歌弦管，遐迩闻声，”^②竟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

这次水灾，仅西江高要一县，“死者数千人，满海浮尸，惨不忍睹。现在饥民十余万，若不急行赈济，恐皆为饿殍也。此次水灾，高要县属基围，无一幸免。”^③北江清远一县，“塌屋四万六千余间，灾民‘十四万一千余’。^④实属‘千古未有之巨灾’。^⑤英国领事馆在向其本国政府所提出的报告中指出。“龙济光治下的广东省情势是革命以来最坏的”。^⑥这实在是一个客观的评价。

三、钳制思想文化

和所有封建军阀一样，龙济光在广东也是以封建文化来钳制人们的思想，实行文化上的专制统治。他所表现的第一个特点也就是“尊孔”。当1913年9月9日，黎元洪通电请参众两院速定孔教为国教，“藉范人心，以息邪说”的时候，^⑦龙济光立即于11日发出通电，表示响应，并命令各县知事提倡孔学，恢复丁祭。9月

①② 香江一叟：《一篇往事助观今》，载香港《大公报》1959年6月27日。

③⑤ 香江一叟：《一篇往事助观今》。

④ 朱汝珍撰：《清远县志》。

⑥ 《广东军阀史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

⑦ 郭廷以编：《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一册，台北1979年版，第114页。

底，在孔子诞辰的典礼上，龙济光大肆铺张，“礼节之盛，为多年所未有。”① 地方一级也组织孔教宣讲所，大肆进行封建传统思想的宣传。

龙济光极力鼓吹孔教的目的，十分明显，完全是以此禁锢人们的思想，从而强化他在广东的军阀统治。

在推崇孔学的同时，龙济光又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封建思想文化专制统制的措施，把不同政治倾向的报刊、社团目为异端，视若猛兽，而加以禁止。

早在“二次革命”爆发的时候，袁世凯政府就发布了第255号训令：“现因赣宁乱事发生，政府为维持秩序安宁起见，所有足以扰乱治安，淆惑人心之报纸及各项印刷稿，应一律停止寄递送达”。② 1914年4月2日，袁世凯又颁布了“报纸条例”，对新闻自由横加干涉。根据此条例，袁世凯的警察机关便可以用“妨害治安”等理由，任意查封报社，禁止报纸发行，以至逮捕编辑、记者，判处徒刑。

袁世凯曾通电龙济光，声称：“前此胡陈两逆倡乱，粤中即系以报纸为武器，藉以抵抗中央、煽惑人心”，“现在乱事甫平，民心未定，而乱党野心不死，难免不藉此等报纸，遂其狡谋”，“望即严加取缔，实行干涉”。③

龙济光秉承袁世凯的旨意，对那些稍为有些民主言论或正义、进步报刊，肆加蹂躏和摧残。仅就《申报》1913年9月至1914年年底的报导中，可见一斑。

① 《申报》，1913年9月29日。

② 张克明：《民国初年新闻战线上的反袁斗争》，《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第118页。

③ 《申报》，1913年12月8日。

1913年9月3日，香港侦缉部，以《实报》主笔陈仲山在报馆内“印发煽乱新闻，煽惑中国内地居民作乱”将陈仲山逮捕入狱。^①

“汕头《掞华报》自八月初五以后，言论益肆狂悖，”“任意鼓吹，意图煽乱，实属无可姑容，应即勒令永远停版。”^②

《震旦报》发行兼编辑康仲萃“系陈炯明死党，造谣惑众，图谋不轨”，“应即立予枪毙。”^③

“广东省取消独立，而后中央威令雷厉风行，如汕头之《大风报》，琼州之《琼崖报》，嘉应州之《墙风报》等均经勒令停版，东莞《公报》言论最横，停版亦在意中。”^④

“省长李开侁今日令国民党机关报六家（《中国日报》、《震旦日报》、《国民报》、《粤东公报》、《民国报》、《民生报》），一律停版。”^⑤

“汕报载潮梅兵变详情，被政界谓为附合乱党，拘捕严办，真日各报一律暂行停版。”^⑥

广州《党魂日报》因转载王国柱檄文及陈炯明文告，编辑等被拘捕。^⑦

“汕头《新华日报》因登载王国柱、陈炯明之讨龙檄，于六号被政府封禁，并拿去……十七人，已经枪毙者九人，后此间之《竞业报》、《大东报》、《公言报》亦被封禁。”^⑧

“香港《真报》主笔毛仲莹，龙将军以其有意诋毁中央，提倡讨袁讨龙等论调，饬侦探设法诱至香山，擒获枪毙。”^⑨“查有香港《共和报》、《大光报》、《人报》，连日登载佛山乱事及省城发现炸

^{①②③④⑤} 《申报》，1913年9月15日、9月21日、10月8日、10月21日、11月11日。

^{⑥⑦⑧⑨} 《申报》，1914年5月13日、5月15日、5月16日、12月6日。

弹，拿获乱党各新闻”，“显系乱党机关报纸”，着令封禁。①

上述情况，表明了龙济光对新闻事业的摧残，确是达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不仅这样，到了1915年冬，为配合袁世凯帝制运动的进行，龙济光又组织了所谓“集思广益社”，由该社派员组织“新闻检查员”，审查发印前的报纸清样。凡有碍于帝制进行的消息，一律抽去，以致报纸经常“开天窗”。1916年初，《申报》发表的《粤省报界之近状》曾披露：近日粤省“报局复受非常之束缚，大抵言论不能自由，莫如粤省今日之甚。凡登载之事，须经三度检查，邮局有检查，电局有检查，而报馆内复有特别之检查。自分派检查员查报，而后每晚检查员必到馆监视，检查后始能发行。”“每日各报无论其为撰著，为电报，为本省及外省新闻，或全抽去，或中间抽去一句，割去一节。事实既不完全，文字亦不通顺，百孔千疮，亦所弗恤。”②

在龙济光的这种高压手段的干预下，广州新闻事业遭到极大的摧残，“广州报纸原有二十七家，前因逐日检查，有稍及战事者，即取去，以至每日能出报者，不过半数，且多空白。近日以来，继续封禁者，二十三家，其经理及主笔，或饮枪弹，或系囹圄。”③

对于人民群众的集会结社，龙济光也不容许。早在1912年5月，刘师复等无政府主义者便在广州成立了“晦鸣学社”。次年，又出版了刊物《晦鸣录》。对于无政府主义这种带有政治性的团体，龙济光当然不会放过。在他完全占据广东以后，立即查封了晦鸣学社，禁止《晦鸣录》发行。当刘师复等将《晦鸣录》转移到澳门出

① 《申报》，1914年12月25日。

② 《申报》，1916年3月14日。

③ 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3月29日。

版时，龙济光又勾结澳门当局，加以查封。

龙济光在文化思想方面的暴政，经辛亥后广东正在兴起的有资本主义民主气息的文化事业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实质上是封建势力对民主革命的反攻倒算和肆意摧残。

第四节 广东人民的“讨龙”及龙济光的挣扎

一、中华革命党领导的反龙斗争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先后颁布了《治安警察条例》、《乱党自首条例》、《报刊条例》、《惩办国贼条例》，并在北京设立军政执法处，作为中央特务组织，疯狂地推行特务恐怖统治，镇压人民的反抗。龙济光在广东与袁世凯遥相呼应，大肆捕杀革命党人，镇压广东地区的革命运动。龙济光的倒行逆施，早就引起了广东人民的同仇敌忾。二次革命失败后，广东的革命党人并没受到严重的损失，他们分别撤退到四乡和香港、澳门，并且很快地又在朱执信和邓铿的领导下，投入讨龙的斗争。

还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不久，龙济光进入广州之初，即1913年9月上旬，撤退到香港的革命党人苏鑫、张洪、张文、张矩、李云龙、陆照、陆林、朱基，奉邓铿之命，潜入省城，在东堤一带设立机关部，准备运动省城军队，进行起义。但不幸为济军破获，起义遂告流产。龙济光下令将苏鑫、张洪等八人，一律枪毙，并致电袁世凯，表示“惟有竭尽心力，随时加意防犯，不敢一刻稍有松动，以副大总统绥靖地方之意”。①

① 《龙济光致北京政府电》，见和力辑：《赣宁战后讨袁资料》，《近代史资料》1962年1期，第180—181页。

为了加强讨袁斗争的领导，1914年3月，孙中山正式委派邓铿回粤主持广东的讨龙军事。3月10日，在邓铿的策动下，广东黄冈驻军营长吴文华率军独立。称“三次革命”。革命党人洪兆麟等也乘机在惠州组织武装，准备起义响应。但由于准备匆促，起义都没有成功。

接着，1914年4月28日，邓铿又策动驻梅县的陆军邓承旸团发动起义。该团营长王国柱自称“广东讨龙军潮梅总司令”，并以“革命军大都督陈炯明”名义，发布讨龙檄文。随即率部对海阳（今潮安）发起进攻，当晚抵达海阳北关，次日早晨攻入城内，占据警卫军所驻之考棚及陆军所驻之旧镇署。旋即进攻县署，但遭到驻军、商团及游击队的拼命阻击。起义军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当天终于攻占了海阳城。龙济光闻讯急忙从汕头抽调部队，向海阳反扑。起义军几经激战，力渐不支，退守狮亭、金山等处。傍晚，起义军终于溃散，王国柱阵亡。邓承旸逃离广东后，在江西被捕，英勇就义。

1914年7月，孙中山为了加强讨袁斗争而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在日本正式成立，有效地领导和促进了各地讨袁斗争的开展。9月，邓铿在香港成立了广东“讨龙”的统一领导机构以后，革命党人很快便聚集起来。^①罗翼群、龙侠夫、洪兆麟、刘震寰、陈可钰、李雄伟、谢崧生、邓文辉等都参加指挥机构的工作，全力策划统一的行动。但由于经费短缺，军事活动无法开展。于是派出朱执信、叶夏声分赴南洋筹款。朱执信从南洋返回香港后，立即和邓铿共同谋划讨龙的行动。他们把广东的讨龙军事，分为东北和西南两方面。东北方面包括惠州、潮州、韶州、增城

^① 邓铿：《讨龙之役报告书》，《革命文献》第四十七辑，第356页。

和龙门四路，加上江门、香山，由邓铿负责；西南方面，分为南海、顺德，番禺、花县、清远，高州，新会，恩平，开平，阳江、阳春五路，由朱执信负责。邓铿以运动军队倒戈为主，朱执信则主要策动绿林暴动。①早在朱执信、邓铿确定起义计划以前，洪兆麟就奉邓铿之命，潜入惠州地区驻军之中，策动军队倒戈。经过深入的发动，驻军统领胡汉卿及其所部杜某等两名营长，答应率部内应，驻淡水的李卓一营，也表示愿意相助。于是，洪兆麟便调集惠州附近各地的绿林武装，准备发难。因考虑到若旷持日久，会生变故，况且攻占惠州以后，还需若干时间，才能进军省城（广州）。所以，确定比南海、顺德一路提前起事。12月27日，洪兆麟率部攻入惠州。但淡水李卓部背约不应，胡汉卿又在城外，联络不便。洪兆麟只好率领起义部队撤到平山，准备会合杜某等两营。不料，抵达平山时，却遭到背信弃义的杜某两营部队的伏击，双方展开激战。起义军由于缺少弹械，加以龙济光增援部队经已赶到，腹背受敌，遂告溃散。洪兆麟退往香港。活动于增城、龙门的邓国平部，得知惠州起事，也率部响应，准备和已约定的驻增城、龙门、东莞及石城的军队，里应外合。然而，这些军队都背弃前约，按兵不动。于是，起义军首先向驻增城的徐连胜部进攻。龙济光闻讯，急调陆军二营，配合徐连胜部，夹击起义军。为保存实力，邓国平率部转攻东莞、石龙，亦遭到敌军的猖狂阻击。寡不敌众，终于失败。

11月10日，南海、顺德的绿林，在朱执信、陆领的领导下，响应惠州起义，发起武装暴动。起义队伍分成三路，向佛山进逼。乐从一带数百人，莲塘约千人，组成第一支队；大都一带

① 朱执信：《讨龙之役报告书》，《朱执信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39页。

千余人，组成第二支队；沙坑一带约千人，为第三支队。第一支队在材地沙击败抵抗的敌军，迅速进入市区，占据昇平街、筷子街一带。第二支队也攻下了彩阳、堂讯一带。第三支队进攻火车站。在起义军的猛烈攻击之下，驻佛山的敌兵钟子材和李嘉品部2000余人，倾巢而出，顽强抵抗。12日，龙济光的援兵3000余人，抵达佛山。起义军集中精锐兵力，在火车站一带给敌军以迎头痛击，毙敌300余。朱执信考虑到救援兵陆续抵达佛山，双方力量悬殊，遂于12日下午下令撤出佛山，经张槎，转移至沙坑。13日，朱执信获悉惠州等地起义已经失败，遂下令全军退出战斗。

11月16日，在李海云、林拯民的领导下，高州民军响应佛山起义，次日即攻占电白县城。据城4天，至11月20日深夜，因粮饷告匮，被迫撤退，准备会合两阳义军向广州进攻。但两阳驻军因事先泄露风声，未能暴动，以致高州民军孤立无援，终于溃散。

与此同时，朱执信和邓铿还策动驻广州的部分陆军和济军倒戈，不幸为龙济光所查获，连长数人、士兵数十人惨遭捕杀。其余虎门、香山、新会、江门、东莞、潮州、番禺、花县、清远、恩平、开平、阳江、阳春等路，也因准备不足，而未能发动起义。这样，这次大规模的讨龙武装起义，遂以失败而告结束。^①

这次失败，使中华革命党在广东地区的力量，遭到严重的削弱。由于中华革命党没有一个明确的革命纲领，起义队伍脱离群众，分散作战，加上经费缺绌，配合不周，约定反正的军队许多又临阵反水，导致了起义的最后失败。

但是，邓铿和朱执信并不气馁，为振奋民心士气，他们决定

^① 见朱执信：《讨龙报告书》，《朱执信集》第240—249页。

对龙济光采取狙击暗杀。12月25日，中华革命党人在广州组织的敢死队、屠龙党、锄龙团等秘密团体，也纷纷出现。1915年1月，南洋华侨钟明光，担负了刺杀龙济光的重任，潜入广州，化装成小贩，耐心侦察了5个月之久。7月17日，当龙济光前往龙观光住宅，行经积厚坊时，钟明光从容地向其抛掷炸弹，炸伤了龙济光的腿部，炸死卫队17人。钟明光走避不及被捕，惨遭杀害。

至此，广东地区的讨龙运动暂时消沉。中华革命党领导的讨龙斗争，虽然屡遭失败，但是，它给了龙济光的军阀政权以沉重的打击，使得龙济光成了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整天龟缩在观音山的“龙王宫”，^①亦无法安宁，最后也不能逃脱革命势力对他的惩罚！

二、护国战争的兴起

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后，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推行军事封建专政，加紧帝制复辟的步伐。他解散民党，破坏国会，卖国媚外，接受“二十一条”；捏造民意，策划“筹安会”、“请愿团”。经过一番处心积虑的准备，1915年1月12日，袁世凯迫不及待地发表了“接受帝位”的申令。随后，袁便在居仁堂接受百官的朝贺，钦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并赐封了一批狐群狗党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龙济光名列一等公之榜首。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孙中山在袁称帝后，即发表了《讨袁檄文》，痛斥袁“暴行帝制”，号召“爱

^① 龙济光在观音山所建的“龙王宫”，有天桥直通军署，上下山置有升降机，由山下到山上有二十八个岗哨。山上有炮垒八十三座，配备大炮十多尊。山上还筑有水泥钢骨防空壕，建有高射炮楼台两座，军火库六处。

国之豪杰共图之”。①

1915年12月25日，在进步党人梁启超的策动下，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通电讨袁，爆发了护国战争。

云南独立后，唐继尧即致电广东都督龙济光，指出“袁氏不除，国亡无日，此讨袁为义所当为也”“惟冀同心戮力，相与有成，国家之补，桑梓之光也”②但是，却遭到龙济光的拒绝。

出于奴才对主子的忠诚。12月29日，龙济光即致电北京，称：“唐逆等甘心构乱，破坏大局，普天同愤，敝处已通电各省，请各声罪致讨”，表示“敝处顷已奉令擘画，出师声讨，振旅待发，仰秉庙算，自不难指日荡平”。③12月30日，龙济光又致电政事堂，胡说“决定国体，本诸民公意，全国一致推戴，出自至诚，已无讨论余地，唐继尧阴险反覆，久蓄逆谋”，“该党等不顾大局，为虎作伥，实为国民公敌，一经声罪致讨，不难克日荡平”，“伏祈我皇上宸衷独断，于新历元旦，诞登大位，以慰人心”④一副帝制帮凶的狰狞面目，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为配合全国的反袁斗争，云集广东的各派反袁力量，在护国的旗帜下，掀起了讨龙斗争的新浪潮。

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十分关注广东的反袁讨龙斗争。12月2日，孙中山委任朱执信为中华革命军广东司令长官，邓铿副之。12月中旬，朱、邓退回广东，在澳门设立了指挥机关，重新部署了广东的讨龙斗争。朱执信委任了陆领为广肇区司令、邓

① 《孙中山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0—91页。

② 《护国军纪事》第一期，《对内文告》，台北1970年重版，第16—17页。

③ 《政府公报》《公电》，1916年1月10日。

④ 《政府公报》《公电》，1916年1月8日。

子瑜为惠阳区司令、罗翼群为潮梅区司令，李海云为高雷区司令。中华革命军各部纷纷在增城、新会、香山、宝安、台山、清远、顺德、花县、开平、鹤山、新兴、高明、恩平、惠阳、博罗、曲江、英德、电白等地“或沟通军队、或联络土人，此扑彼继，再接再厉”。①

1916年1月，云南护国军分兵两路出师：一路由蔡锷率领攻四川；一路由李烈钧率领攻广东。龙济光闻讯，急调精锐部队，赴粤西防御。朱执信利用广州防守空虚之际，积极筹划三路进攻广州的起义计划。决定“一路由绿林首领谢细牛率领，从番禺县的石湖村出发袭击兵工厂，一路由澳门潜入内地，沿增城、罗岗洞、龙眼洞一带前进，攻击省城小北门；一路由广九路一带，乔装藏械，沿途上车，直扑省城东关，牵制敌兵，使不能兼顾。等到袭击兵工厂得手，夺得枪械更招集绿林，分为两路，夹攻省城的西关和大北门，以为东、北两军的援应。”②并预定2月9日总攻广州。

2月5日，朱执信带领数十人潜入石湖村，与谢细牛所部绿林数百人，民军千余人取得联系。而清远、花县、东莞各方面尚有绿林数千人，也约定8日前来会合。由于起义消息泄漏，龙济光立即派出炮兵团长田春发、营长梁永金、吴仲明率精锐部队两营，进攻石湖村。6日傍晚，由田春发攻左，梁永金攻右，吴仲明居中，分三路向起义军进逼。起义军严阵以待，同敌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剧战数小时，击毙敌营长吴仲明，团长田春发也受重伤，在溃退途中丧命。

次日午刻，龙济光加派援军。起义军寡不敌众，被迫撤退，

① 高劳：《帝制运动始末记》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34页。

② 《革命文献》47辑，台北1969年版，第353—354页。

转攻石井兵工厂，遭到守军的拼命顽抗。起义军不得不向塘塘转移。战斗相持至9日清晨，起义军因孤立无援而告失败。

3月，广东中华革命军又利用肇和舰从上海派驻广州黄埔之机，准备武装劫舰。6日晚，党人80余人，夺取了澳门开往广州的“永固”号客轮，作为袭击“肇和”兵舰的跳板。次日凌晨4时，“永固”轮驶近“肇和”舰侧，“肇和”舰以为“永固”轮误驶航线，忙鸣钟警告。党人乘机向“肇和”舰甲板抛掷炸弹。顿时，枪声大作，双方展开激战。由于当时退潮水急，“永固”轮舵不灵，始终无法逼近敌舰，加上党人伤亡过众，武装劫舰遂告流产。

3月9日，埋伏于顺德北滘、简岸等处的中华革命军1200余人，按原先预定响应武装劫夺“肇和”舰的计划，毅然分兵三路，举行暴动：一路经由乐从；一路经由扶间；一路经由三洪奇。迅速潜入黄麻涌，出其不意地攻占了驻顺德的清乡行营。驻扎黄麻涌、大霸头的“江巩”兵舰，急忙前往救援，起义军埋伏两岸，夹击敌舰。在起义军猛烈炮火的轰击下，“江巩”舰不敢恋战，急忙逃跑。龙济光闻讯，立即派出“江汉”、“江固”两舰速运大批济军，前来助战。起义军士气高昂，歼灭了大批增援的敌军。直到10日晚，起义军力暂不支，被迫撤退，起义又告失败。

与中华革命党起义的同时，陈炯明也组织队伍，加入反袁斗争的行列。1916年1月，陈炯明从香港潜回广东内地，利用洪兆麟的关系，动员原湘军罗绍雄、金国治部反正，联络林干材驻海丰的两营，再与旧部叶柏质、严德明等统率的民军汇合，组成一支反袁武装队伍。陈炯明自任对逆共和军总司令。他在讨袁檄文中，谴责“袁贼叛国，普天同讨”，^①号召“各省将吏，举国同

^① 《护国军》第一期，《对内文告》，第30页。

胞，修尔戈予，同我袍泽，诛除祸首，永奠邦基”。①

陈炯明率领的共和军，“全省计分四路，省内及广府属为中路，计24支队；惠潮梅为东路，计22支队；肇罗高钦为西路，计14支队；南韶连及清远为北路计分10支队。”② 1月6日，陈炯明利用中华革命军与济军激战于东江一带之机，率部发动了惠州起义。起义军开始时声势颇大，攻占了惠州周围的各处据点，但由于龙济光不断增派援军，起义军激战至8日，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龙济光在镇压惠州起义后，便向袁世凯邀功请赏。1月28日，袁世凯电称龙济光“布置周密调度有方”，“忠勇奋发，深堪嘉许，”③ 并授龙以郡王衔。

护国战争兴起后，进步党人徐勤，也以香港，澳门为基地，树起“讨龙”旗号，组织“广东护国军”，自任总司令。1916年3月27日，徐勤联合王和顺，关仁甫等部民军，图攻省城。由于内奸告密，潜进广州的敢死队员十余人，不幸被捕。图城之举遂告失败。

首次攻城失败后，徐勤并不罢休，仍然再接再励。一面转移主力至各属起事，以牵制省城；一面则运动水师，策划倒戈。3月份，“宝璧”、“江固”兵舰，首先反正。徐勤遂任命魏邦平为攻城司令，统率舰队，进逼珠江。

到了这时，反袁讨龙的怒火，已在南粤大地熊熊燃烧起来。据《护国军纪事》记载，到4月份前后，各路讨龙武装已遍及新会，香山、新宁、高州等21个府县。其中41个反袁据点中，中华

① 《护国军纪事》第一期，《对内文告》，第7页。

② 《护国军纪事》第一期，《义声纪事》，第143页。

③ 《政府公报》《命令》，1916年1月29日。

革命军占据31个，陈炯明的护国军占据7个，徐勤的护国军占据1个，莫擎宇、隆世储部各占1个；攻占的5艘舰中，中华革命军和徐勤的护国军各占2艘，陈炯明部占1艘；各方投入兵力（不包括海军）：中华革命军达26000人（另有14营3连人），陈炯明部为2600人（另有2营人），徐勤部为300人，莫擎宇两部共6营。^①又据上海《民国日报》的调查，1916年四五月间，在广东全省总共94个县中，完全不受龙济光管辖而属于革命军控制的有54个县，达一半以上。其余的县也大多有民军的活动。^②

风起云涌的反袁浪潮，惊破了袁世凯的帝制春梦，也威胁着龙济光在粤的军阀统治。惠州、石湖诸役之后，龙济光虽获得了郡王之衔，但却已元气大伤。而袁给龙晋封郡王，“实因龙迭电索发欠饷，词多愤激，而财部已悉国库储供曹锟、张敬尧入川两师之需，更无力可发粤饷，袁恐龙觖望，故以虚爵饵之。”^③而龙济光对袁世凯的窘境，也十分清楚。他曾对其亲信说：“今日之事，吾非不知，即一般前清大吏，亦谁肯甘心者。不过革命党人，亦实可恶，不能容人，假令彼等得志，将使吾无立足之地。”^④经过一番权衡，最后，龙济光还是把其赌注押在袁世凯身上。

1916年2月8日，袁世凯为了打击护国军，特任命龙觐光为云南查办使，率军征滇。龙济光竭力支持，即抽调4000人组织讨滇军，由其兄龙觐光率领。随后又遣龙觐光之子龙体乾等秘密回滇，策动地方团队暴动，“以为摇撼护国军根据之计。”^⑤龙觐光出发时，龙济光对他说：“现在大错已铸，响应民军，则民军以我杀人太多，未必肯饶；力打民军，则广州兵力自守不暇，前思后

① 《护国军纪事》，第四期《军情纪事》。

②③④ 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7月1日、1月30、2月22日。

⑤ 由云龙：《护国史稿》《近代史资料》1957年4期，第56页。

想，总是进退两难，以后一切全靠弟（应为“兄”）此行。”^① 3月9日，龙军占领滇西南的剥隘。接着又陷个旧、邱北等地。不料，陆荣廷派遣随讨滇军之后的马济、陆裕光等部，突然向龙军发动进攻，在滇桂军的夹击下，龙观光全军被缴械。

3月15日，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并多次电促龙济光响应，宣布广东独立，明确表示，如龙拒绝，桂军当进入广东。3月23日，陆荣廷率军20营，由南宁向浔江移动，其前锋由莫荣新率领，抵达梧州，威逼肇庆。

在各方面反袁武装的强大攻势面前，龙济光统治集团内部，也开始分化瓦解。3月26日，驻潮阳济军团长莫擎宇，率部独立，迅速攻占潮州及汕头、澄海、饶平。驻汕头的潮梅镇守使马存发，逃往香港。潮汕遂告统一。3月28日，驻钦州道尹冯相荣、驻廉州镇守使隆世储，分别率部起义，响应潮汕独立。4月4日，停泊珠江上的“宝璧”、“江大”、“江固”等军舰起义独立。5日，徐勤所部攻城司令魏邦平乘舰驰抵虎门，向龙济光发出通牒，限广东于24小时内独立，否则，进攻广州。

4月6日，龙济光在得到袁世凯“独立拥护中央”的电文后，宣布广东“独立”。龙济光在独立文告中，只说：“现据广东绅商学各界全体公呈”，“为保持全省人民生命财产起见，集众公议，联请龙上将军为广东都督，以原有职权，保卫地方，维持秩序。”还公然宣称：“如有不逞之徒，假托民军，藉端捣乱，扰害安法，即为人民公敌，本都督定为严拿重办，以尽除莠安良之责。”^② 这个文告，不但无一语指斥袁世凯，反而对反袁武装力量发出咄咄逼

① 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2月29日。

② 《护国军纪事》第四期，《对内文告》，第56页。

人的威胁。龙济光的独立，乃是认为“独立”二字可以抵民军之进攻，而保持其禄位耳。”^①

广东的独立，是各派反袁力量共同促成的结果。它虽然对护国战争本身的进程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壮大了护国运动的声势。据上海《民国日报》4月8日记载，袁世凯获悉广东独立的消息，“一惊几绝，旋开军事会议，诸人面面相觑，无善策”。12日的报纸又披露袁世凯“接广东警电，阅未及半，即斜倚桌上。垂头不语约20余分钟”。广东的独立，也给袁世凯以一定的打击。

三、变换手法，负隅顽抗

龙济光的假独立，当然瞒骗不了革命人民。4月10日孙中山在复邓泽如书中即揭露龙济光的“伪布独立”，号召革命党人继续斗争。^②稍后，孙中山在复广东国民党部、《民国日报》和阅书报社的信中，又说明他已“策划粤军”行动起来，讨伐龙济光。^③“高要、高明、鹤山、河源、新会等县，皆不信龙济光之独立，迭有警报。北江各地，仍有民军起义”，^④各派反龙力量，均要求龙济光必须下台。

面对这种形势，龙济光为了保住广东的地盘，只得求助于正在率领护国军准备进入广东的陆荣廷和梁启超，企图通过他们疏通民军的关系。于是，他邀请护国军派出代表到广州谈判。

4月12日，两广护国军的代表汤觉顿、徐勤和龙济光的代表贺文彪、颜伯汉，广东警察厅长王广龄，陆军少将谭学夔等在广州海珠参加以善后会议名义进行的谈判，会谈中，龙的代表借故争

^① 丁文江、赵平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73页。

^{②③} 《国父全集》第三册，1981年台北版，第380—381页、第389页。

^④ 《广东独立记》，见《革命文献》（台湾版）第四十七辑，第420页。

吵，并开枪打死汤、王、谭等，制造了震动一时的“海珠枪杀案”。①

惨案发生后，龙济光知道事态严重，立即采取补救对策。他先是派张鸣歧，后自己亲自出马，到梧州和肇庆，向护国军方面进行解释和谈判。陆荣廷和梁启超对龙的这种作为本来极为不满，起初拟用武力对付，但考虑到保持龙济光在粤的地位，对抵制中华革命军，也会有好处。因此，也改取妥协求全的方针。② 陆、梁和龙经过谈判后，于4月20日，达成保留龙的广东都督，并在肇庆成立了两广都司令部，以岑春煊为都司令，从速实行北伐等五项协议。③

由于护国军与龙济光的妥协，使龙在广东的统治得以稳定，而护国军两广都司令部及军务院亦得以先后于5月1日及8日在肇庆成立。以朱执信为首的中华革命军及各地民军，对于龙济光的“伪独立”及制造“海珠惨案”，十分愤慨。但为了顾全大局，尽可能避免广东再遭战祸，并拟将所部改编为广东北伐军，准备共同北伐讨袁。

但是，龙济光的妥协只不过是“缓兵计”目的在于争取时间，巩固自己在广东的统治。龙济光的这个阴谋，集中表现在他破坏北伐进军。

龙济光不愿意自己的军队离开广东参加北伐。因此，他曾召

① “海珠惨案”的时间，据《护国军纪事》的记载是4月12日。高荫祖编的《中华民国大事记》（台湾版）为4月14日。吕芳上著的《朱执信与中国革命》则称是4月8日。供参考。

② 邹鲁《回顾录》（上）第78页。

③ 《广东独立记》、《革命文献》第四十七辑第426页；吕芳上书记载为4月19日达成协议。待考。

集亲信部属，商讨对策，决定：一，编造民军不肯受其节制之谎言；二，要求巨额开拔费，使岑春煊不能应付；三，密令军队假称民军，四出劫掠，托辞地方未靖，不便出师。^①可见，龙济光与护国军达成的“迅速实行北伐”的协议不是真心实意的。

不仅如此，龙济光还千方百计，破坏护国军的北伐。当时，护国军的北伐计划分三路进军：“一由雄韶假道于赣以出武汉，以李烈钧、林虎两军为主力，肇军李耀汉，桂军莫荣新为后援；一路由潮汕假道于闽以出长江下游，以方声涛军及潮军莫擎宇分任之；桂督陆公率师援湘……”^②按上述这个计划，李烈钧率领护国军第二军，于5月12日由广西抵达肇庆，立即派员与龙济光碰商会同北伐事宜，并说明护国军拟由肇庆经广州，假道入赣，请龙协助。龙济光出于对袁世凯的忠诚而力阻护国军北上，且担心北伐军经过广州，对龙的统治造成威胁。因此，假借广州九善堂、七十二行等团体的名义，拒绝李烈钧的护国军途经广州。后经岑春煊的干预及李烈钧的多次解释仍然无效。最终只达成三项协议：一、李军征赣行程，由肇出发，直赴三水，转北江上琶江口，然后乘车，以抵韶州，一切船只由龙济光备办；二、龙派部分济军，会同李军北进；三、李军饷械，由龙济光接济。^③至此，龙济光阻止李军经广州的目的已达，便支援李军少量饷械，以作应付。

但是，龙济光并不以此为满足，为了延缓北伐军的进军，又制造了种种事端。当李烈钧部遵照协议，准备由肇庆向三水移动之时，龙济光立即派济军9个营驻扎三水，又派10个营沿三水至

^① 《广东军阀史大事记》，见《广东文史资料》第43辑，第60页。

^② 李根源《护国军始末谈》、《李印泉陈梓畅君关于护国军的谈话》，见《中华新报》1917年刊本。

^③ 《护国军纪事》第五期、《革命文献》第四十七辑，第449页。

佛山的铁路线布防，由他的得力干将马存发负责指挥。稍后，又以三水一带土匪特多为借口，规定了护国军的行军路线，说什么“如有冒称滇桂两军，水路越过西南以下，陆路越过三水以下数里外，应由该管将军立即迎头痛击，不必究问真假。”^① 非常明显，龙济光这种敌视护国军的行径，无非是给北伐军制造行军的困难，以达到他破坏北伐的目的。

北伐军讨袁的坚强意志，非龙济光的阴谋诡计可以阻挠，李烈钧部还是于6月3日北上，但进军行程，已大大慢于原来的北伐计划。6月6日，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举国声讨之中突然死去。6月9日，龙济光擅自宣布取消广东独立，迫不及待地向段祺瑞政权表明忠心，企图依靠北洋军阀的力量以驱走驻在广东的滇桂护国军，以保持他在广东的统治地位。故此，他指使韶关镇守使朱福存拒绝李烈钧的护国军进入韶关。6月17日夜，济军拆毁铁桥，企图切断护国军的运输线。18日，济军无端枪杀了入城采购货物的护国军数人，并于城楼发炮轰击护国军，护国军忍无可忍，被迫还击，济军不敌，护国军遂于19日晨进入韶关。

正在这时，继袁世凯任大总统的黎元洪，竟于6月21日特派龙济光兼任广东巡按使，承认龙济光在广东的统治地位。黎元洪和段祺瑞政权的这一作法，完全无视护国军及各派讨袁力量的存在。因此，遭到南方各省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孙中山于9月26日即致电黎元洪，要求罢斥并严惩广东巡按使龙济光，指出龙“在粤三年，无恶不作。”^②

龙济光虽然继续取得统治广东的合法地位，但这只能是暂时的现象，由于他作恶多端，最终逃不出失败的命运。

① 《护国军纪事》第五期，《革命文献》第四十七辑，第449页。

② 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6月29日。

第三章 旧桂系据粤与祸粤

第一节 桂系军阀进驻广东

一、广西独立和军务院的成立

桂系军阀是西南军阀中的一支主要力量。它兴起于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直到1950年广西全境解放，才被彻底消灭。

桂系军阀从它的发展历史来看，可以分为旧桂系和新桂系。旧桂系是以陆荣廷、陈炳焜等为首。新桂系是继旧桂系以后，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为首。

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发迹于广西，其活动主要是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期间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期间。他们虽盘踞广西，但主要的活动地区却在广东。

辛亥武昌起义以后，11月7日，广西宣布独立。广西省咨议局选举沈秉堃（原广西巡抚）为都督，王芝祥（原广西藩台），陆荣廷（原广西提督）为副都督。辛亥革命后，所谓本省人担任本省都督，逐渐形成一种趋势。沈、王均系在广西的外籍人士，迫于形势，只得自行引退，借口率军离开了广西。以赵恒惕为代表的新军势力，均已出师北伐。这样，陆荣廷所属的省防军，就成为广西最大的军事力量，由于广西各种势力的附和，陆荣廷便

统兵进驻南宁，成为广西都督。他起用了大批亲信，很快掌握了广西省的军政大权，桂系军阀集团开始形成。

1913年，当国民党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的时候，陆荣廷还死心塌地站在袁世凯一边。他不仅拒绝了孙中山要他起兵讨袁的规劝，还一再向袁表示忠诚，说什么要“与中央共安危”^①，并陈兵粤桂边境，向革命党人施加军事压力。他还赠枪械支持被袁任命为广东督军的龙济光进击广州，“削平祸乱”。革命党人蒋翊武在湖南策动讨袁失败后，被袁下令通缉，当他途经广西赴香港时，遭陆捕杀。为此，袁世凯特别授给陆“勋二位”的荣衔，以表彰他的“殊绩”^②。这样一个忠实于袁世凯的陆荣廷，后来之所以参加护国讨袁，实有其深刻的原因。

第一，袁世凯后来的一些作为对陆荣廷不利，引起陆的不满。

袁世凯重龙轻陆，使陆荣廷极为反感。龙济光和陆荣廷一样，在反“二次革命”中，同样充当袁的鹰犬，为维护袁的独裁统治，出了不少力。陆和龙两人在清末同是一省的提督，地位相当，但袁对陆只着眼于利用，并不信任。正因为如此，1914年6月，袁下令撤销各省都督，改为将军时，龙被袁任命为振武上将军，龙的两个兄长龙觐光和龙裕光，也先后被授予上将军的衔头。龙的权威之盛，为“西南群督之冠”。而陆却只被任命为宁武将军，地位显然在龙之下。虽然第二年袁世凯又晋升陆为耀武上将军，但在洪宪封爵时，龙济光被封为公爵，随后被晋封为郡王，陆则被封为侯爵，地位又明显在龙之下。陆对被封为侯爵，不仅不视为“光荣”，反而感到是一种“耻辱”，常在部属面前发泄

① 《广西公报》，第六十五期（1913年8月31日），“公电”第27页。

② 《广西公报》，第六十七期（1913年9月14日），“中央命令”第3页，转引自《护国运动史》第263页。

不满，说袁把他视为“猴子”，不把他当人看待，表露出不愿面北“事伪帝”的思想。

陆荣廷对袁的不满情绪和离心离德的思想，很快被袁察觉，使袁感到陆虽是自己手下的封疆大吏，却并非自己的亲信党徒。于是便于1915年派遣清末曾任广西巡抚的张鸣岐来广西主持民政，加以控制。张鸣岐因故他调之后，袁又派心腹僚属王祖同来广西担任巡按使兼会办广西军务，暗中对陆进行监视。这无疑是陆荣廷军权的一种剥夺。对此，陆更是无法忍受，对袁怨恨日深。陆的爱子陆裕勋之死尤其使陆愤懑填胸。原来袁世凯为了控制各省军事头目，1913年以后，效仿古代帝王以子为人质的故伎，要各地首领送一子往北京“学习军事”，实际上是作为人质。陆荣廷被迫将爱子陆裕勋送往北京，在袁氏手下的“模范团”供职。后来，陆感到袁对自己的猜忌日深，欲有所为，将对子不利。于是，他宣称患病，隐居老家武鸣“养病”。接着便致电袁政府，请令其子回桂“侍父疾”。阴险的袁世凯见难以拒绝，便令人伴送其子南归，但行至武汉，陆裕勋突然死亡。当时便有传说说是袁派人毒死的。

以上这些，成为促使陆荣廷由忠于袁世凯而走向反对袁世凯的重要因素。

第二，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以及各派反袁人士对陆晓以大义，是促成他把反袁军事付诸实行的直接原因。

1915年12月，孙中山发表了第一次《讨袁宣言》，在孙中山的讨袁号召下，各省革命党人纷纷参加反袁武装起义，全国呈现出一片反袁的大好形势。

在云南宣布护国讨袁之前，孙中山曾和陆有过秘密联系，当陆受到袁的压力时，还致电孙中山征求意见。1915年12月23日，

蔡锷和李烈钧、唐继尧等人在昆明开会商讨兴师护国时，事前曾对陆有所规劝，陆也派有代表列席会议。与此同时，黄兴从美国也写信给陆荣廷，进行种种劝说。信中除揭露袁世凯的“不忠不信，不仁不义，人民痛恨，外邦非议，内援外助，俱已断绝”之外，还特别指出：“弟知足下素富爱国之热忱，且智勇冠绝一时。临兹事变，必有宏谋伟略，百倍于弟之所期。”“望足下节丧明之痛（按：指陆的爱子在武汉被袁派人毒死一事），兴讨贼之师，发扬奋迅，激励国民之气，无使时机坐失，贼势日张，则国家之福，亦足下之所赐也。国之存亡，系于今日，救民保国，端赖贤哲，海天西望，企盼捷音。”^①

还在早一些时候，在香港的革命党人李根源、方声涛、钮永建、林虎等人商定，由钮永建、林虎两人先到广西，推动陆荣廷武装反袁。于是，钮、林两人到达南宁，分别会见了陆荣廷的代表陈炳焜和马济。陈、马两人代表陆荣廷答应在适当时机起兵讨袁。当时，马济转达了陆荣廷的意见说：“为慎密计，拟请你们两人先行回港，尽管进行其他工作，所有海外同志要求广西应负的责任，绝对尽力做到，请大家放心。并派曾其衡、雷殷二君随同到港，任两地奔走通讯。”^②在广西独立前，陆荣廷曾对众将表示：“林虎和钮永建去冬来商谈策动云南起义讨袁，要我们广西响应做条件。当时我已答应，并提出保证。现在云南已经起义讨袁，如果我们广西不起来响应，那就是不讲信义，出卖朋友。”^③他还进一步表示：“我与袁贼誓不两立，主意已定。”希望众将“同

① 《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15—416页。

② 林虎：《往事片断》，《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02页。

③ 陈树勋：《广西讨袁纪略》，载《辛亥革命在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心戮力，反袁到底。”^①

以上事实说明，孙中山的影响和革命党人的策动，对陆荣廷下决心起兵讨袁，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岑春煊和梁启超对陆荣廷的起兵反袁，则起到更大的作用。当时陆的老上司岑春煊也经常派人来劝说陆举兵讨袁。由于陆在清末曾受到岑的多次提拔，因此对于岑是很为感恩，也颇为信服。岑春煊的竭力规劝，陆荣廷当然会听从。梁启超则是陆荣廷极为仰慕的人物。护国战争在云南发动以后，梁启超写了一封长信，劝说陆立即举兵讨袁。梁在信中说：“自滇军之兴，万国拭目，饷械借助，殊非甚难。但有海岸，自能接济。若桂军一起，粤能景从最善也。即不然，而首以偏师各定钦、廉，运输之孔道一通，则桂军何至以乏饷乏械为虑者。此又此间极秘之消息，不能不为将军告者也。”^②梁的这一建议，正说到陆荣廷的心坎上。多年来，陆荣廷就因为“久蟠广西”得不到扩展而感到苦恼，若不趁此机会进据广东，则上受制于袁世凯，下受制于龙济光。因此，当他得知梁启超支持他向广东发展，便下决心起兵反袁。于是马上派专使秘密往上海，欢迎梁来广西，协助独立。并且对梁表示，只要梁一到广西，他就宣布独立，“早上到，他晚上发表；晚上到，他早上发表”。^③所以，与其说陆荣廷真心拥护共和，毋宁说，他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真心想取得广东。

1916年3月4日，梁启超一行7人，乘日本邮船离开上海，7日到达香港。梁启超见当时情况复杂，不敢上岸，决定让同行的汤觉顿5人，携带着他为广西独立所草拟好的通电，先行由香

① 阜锦湖：《陆荣廷讨袁内幕》，载《辛亥革命在广西》。

② 梁启超：《致陆子卿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24页。

③ 梁启超：《护国之役嘱咐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93页。

港进入广西。由于途中辗转，梁启超于4月4日才抵达南宁，没有料到在他还未进入广西前，广西已于3月15日宣布独立。

广西独立的过程，也是极为秘密的。早在1916年2月间，①陆荣廷在南宁秘密召集桂军的高级军事会议，陈炳焜、谭浩明、莫荣新、沈鸿英、韦荣昌、马济等亲信都参加。陆在会上说：“袁氏欺幼逼寡，用诡计得做大总统，又自为皇帝，是道德丧尽的人。辛亥革命不知牺牲了多少性命，才建立民国，现在我若同意他做皇帝，不但对不住良心，而且对不住烈士。非把他推翻不可，你们的意见怎样？”②陆见无人提出异议，即要大家焚香宣誓：“同心戮力，反袁到底。”通过这次动员，统一了广西军界的思想，接着，便暗中派人前往云南联系，赞同讨袁。

但是陆荣廷在表面上却还表示拥袁。当袁世凯任命陆担任贵州宣抚使的时候，他并不推辞，并借机向袁要求拨发枪枝5000和军饷100万。袁世凯命令龙觐光父子率军经过广西进攻云南护国军，陆也表示赞成，但暗中却布置桂军马济部尾随龙军之后，与滇军夹击龙军。接着，又故弄玄虚，宣称要前往贵州接任宣抚使，便亲率桂军12营，离开南宁，前往柳州，装着要去“征剿”云南护国军的样子。及至龙觐光部被缴械，袁世凯拨给的5000枝枪和100万军饷到手，立即改变态度，公开参加护国反袁的行列。

1916年3月上旬，陆荣廷到达柳州后，便按兵不动。3月13日，他以自己和梁启超以及广西军方将领的名义，通电劝袁世凯辞职，并限袁世凯在24小时以内答复。袁世凯不予理睬，于是陆便于3月15日在柳州行营，正式通电宣布广西独立，并任命梁启

① 韦瑞霖：《桂系军阀陆荣廷传记》，《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一辑，第286页。韦文还认为，会议地点是在陆的老家武鸣县宁武庄。

② 《辛亥革命在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超为总参谋。又通电各省，揭露袁世凯的罪行，表示要把反袁斗争进行到底。

广西宣布独立，坚定了四川方面正在艰苦作战的护国军的讨袁信心。滇黔桂连成一片，使护国战争的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向东发展可以进图粤闽，向北出击可以占领湘赣。从此，整个政治、军事形势都发生了有利于护国军的变化，因而成为迫使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的关键性的一步。

在到处讨袁的声浪中，做了83天短命皇帝的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正式发表撤销帝制的申令。尽管帝制撤销，但打倒袁世凯、恢复民国的目的并未完全达到。所以，护国军的斗争仍继续进行，直至袁世凯退位，方能停止。在这种形势下，龙济光被迫于4月6日宣布广东独立。这段期间，梁启超在广西同各方面联系，建议组织护国军中央统一机构，以代行国务院的职权。在陆荣廷的支持下，准备请岑春煊来主持这个中央机构。中央机构未成立前，先成立护国军两广都司令部，推岑为都司令，以便驾驭龙济光而统一两广的军权。

按《都司令部组织令》规定：两广护国军都司令统辖广东、广西两省军队，管理一切军务，兼筹政务、财务。根据当时参加此事的吴贯因在《丙辰从军日记》中回忆“都司令之职权，两广军队均归其节制，首持此议者为广西军界，而广东各独立地之司令和之。龙氏见桂军及广东独立军皆推戴岑、梁，不敢立异，并赞成此议，故龙与南方护国军虽貌合神离，然以名义论，亦在都司令节制下焉。”^①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协商后，5月1日，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

^①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79页。

在广东肇庆正式成立。岑春煊被推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李根源为副都参谋。在都司令之下，设有参谋部、秘书厅、外交局、财政厅、盐务局、饷械局、参议厅等机关。由莫荣新任卫戍司令，林虎任桂军军长，李烈钧任滇军军长，李耀汉为肇军军长，魏邦平任江防司令。

稍后，经过西南各省协商同意，作为护国军中央机构的军务院（初时称为护国军政府，后改称军务院）便于5月8日在肇庆成立。^①由于唐继尧是反袁首义省的都督，因此，在推举领导成员时，唐继尧被推为军务院的抚军长，岑春煊被推为副抚军长，代行抚军长的职务（由于唐一直没有来过广东，所以只挂个虚名，始终都由岑代行抚军长职），梁启超被推为军务院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又推举陆荣廷、刘显世、梁启超、蔡锷、李烈钧、陈炳焜、龙济光为抚军。在抚军中，后来还增加了戴戡、罗佩金、吕公望、刘存厚、李鼎新等人。李烈钧、莫荣新、谭浩明、李耀汉、林虎分别任滇、桂、肇、粤各军总司令。

军务院成立后所发表的宣言：否认袁世凯的总统资格；主张依照旧约法由副总统黎元洪任总统；在国务院经法定手续正式成立前，其对外交涉、对内命令和指挥军政之权，暂由军务院行使，待国务院正式成立，军务院即当裁撤。

都司令部和军务院的成立，不仅表明了护国军和袁世凯斗争到底的决心，不承认北京政府的合法性，而且壮大了护国军的声威，鼓舞了全国人民反袁的斗志，推动了护国运动的发展，加速了袁世凯的灭亡。但是，都司令部和军务院的成立却使桂军进入广东成为合法，为桂系军阀统治广东创造了条件。

^①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台湾版，第45页。

二、桂军入粤和龙济光败退

陆荣廷在护国战争发展的关键时刻，参加讨袁护国，后来又和梁启超等一起，积极组织军务院，与北京的袁氏政府相抗衡，坚持要袁世凯退位的主张。这些表现，不管他当时的主观动机是什么，客观上对反袁护国战争的进程有着积极的影响。因此，他宣布广西独立和坚持反袁斗争的行动，不仅得到护国将士的热烈欢迎，而且也获得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赞赏。梁启超后来还把这说成是“再造民国之功勋”，似太过份，但陆荣廷在护国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是应予肯定。但到了护国战争后期，陆荣廷的军阀野心日益暴露，他所关心的，并不是民国的前途，而是自己如何扩充实力，扩大地盘，积极图谋向广东发展。

早在两广都司令部成立前，陆荣廷的桂军已进入广东。军务院成立时，滇桂军已控制广东西部的部分地区。那时，无论是两广都司令部或护国军务院，名义上虽然都不是以陆荣廷为首，陆荣廷本人也未进入肇庆，但实际上大权都为陆所掌握，他是一个手握重兵的实权人物。

当时的龙济光，虽被推为军务院的抚军，但和岑春煊、陆荣廷、李烈钧等人始终格格不入。初时，他坚决拥护袁世凯，后来又转而投向黎元洪和段祺瑞，所以，竭力阻止滇桂军的北伐。由于龙济光的阻挠，李烈钧的滇军被迫分兵三路，进攻韶关、清远、新街。^① 6月19日，护国军才从龙军手中夺取了韶关，李烈钧的滇军得以驻扎韶关、清远一带。而准备跟进的桂军莫荣新部则还在肇庆附近。这时，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又任命龙济光兼

^① 蒋纬国总编著《国民革命战史》第一部，台湾1981年版，第134页及附图。

署广东巡按使，“龙氏愈有所恃，乃益简练军队，以驱除滇军自任”。①

龙济光的军队为祸地方，遭到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除孙中山致电北京斥责外，唐绍仪、梁启超等著名人士，广肇公所等团体，粤桂两省的将领，均先后致电北京，要求罢斥龙济光。驱逐龙济光，已成了各界人士的一致要求。因此，在陆荣廷的授意之下，护国军军务院决定发动讨龙战争。

1916年7月3日，护国军分三路进攻广州。李烈钧率领的张开儒、方声涛部，由韶关沿粤汉路南下；莫荣新部桂军和李耀汉部肇军从肇庆东下，沿广三线挺进；还令朱执信部和陈炯明部由东江一带进攻广州东部。各线进展颇为顺利，滇军很快占领清远，抵达源潭，桂军则占领佛山。龙济光只得集中兵力，死守广州。

正当龙济光面临败局之际，段祺瑞政府于7月6日，改任陆荣廷为广东督军，陈炳焜为广西督军，龙济光调往海南岛当两广矿务督办。在同一任命中，还令陆荣廷暂署湖南督军（新任湘督陈宦未到），在陆未到广东前仍由龙济光署理广东督军，李烈钧则调京听候任用。这一任命，既是安抚陆荣廷，又是偏袒龙济光，阻止护国军向广州进攻。以岑春煊为首的军务院，认为黎元洪已宣布恢复“约法”和准备召开国会，护国使命已经完成，驱龙的目的亦已达到，在领取了段祺瑞拨给的一笔“结束费”后②，便于7月14日通电宣告军务院撤销，龙济光亦借此取得喘息之机。

但陆荣廷对此并不满意。他除派主力进入广东外，早在5月

① 《护国军纪事》第五期，《革命文献》第四十七辑，第45页。

② 据周善培的回忆，“结束费”是80万元，是他向段祺瑞索取的。广州市政协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史料专集》（下），第80页。

中旬，就以湘粤桂联军总司令的名义，派广西护国军谭浩明等部进入湖南“援湘”，并占领长沙。6月初，陆本人亦亲到衡阳，企图通过护国战争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广东、湖南。而今，段祺瑞政府竟趁此将他固定在极不易稳定的湖南，而将富庶的广东留给龙济光，当然心有不甘。于是，他从湖南撤回部分桂军，改作进粤部队，并于8月中旬亲抵肇庆，以武力压迫龙济光交出粤督权力。起初，龙济光仍欲抗拒，但在桂军已进至市郊石围塘的强大压力之下，加以北京政府又派出萨镇冰为闽粤巡阅使，前来调解广东争端，并令龙迅即交代。龙才不得不在索取了50万元开拔费后，于10月初撤往虎门，再从虎门乘船撤往海南岛。讨龙战争至此正式结束。

1916年10月2日，陆荣廷正式就任广东督军，^①开始了桂系对广东的统治。陆由湖南返桂转入广东后，谭浩明部桂军亦随着入粤，桂军在粤势力大增，控制了除粤北（后由滇军张开儒部驻扎）以外的几乎整个广东。陆荣廷随即以莫荣新兼广惠镇守使，林虎兼高雷镇守使，沈鸿英兼钦廉镇守使，表示愿归陆荣廷统辖的李耀汉，仍任肇罗镇守使。至此，陆荣廷已将广东完全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第二节 桂系在粤统治的加强

一、借“护法”之名，图割据之实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集团，以

^① 韦瑞霖：《桂系军阀陆荣廷传记》《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一辑，第228页。据吕芳真的《朱执信与中国革命》一书记载，陆就任广东督军是9月14日，待考。

冯国璋为首的直系集团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集团。此外，以唐继尧、陆荣廷为首的滇、桂军阀，以阎锡山为首的晋系军阀，以及张勋军阀集团等等，都千方百计，激烈争夺中央和地方的权力，使政局动荡不安。当时，“府院之争”的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

1916年6月7日，黎元洪依法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和各派反袁力量的敦促下，他于6月29日下令恢复《临时约法》，准备召开国会。8月1日，国会在北京重新召开，补选冯国璋为副总统，批准了黎元洪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内阁。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凭借皖系武力，独揽北京政府的权力，把黎元洪置于傀儡的地位。而黎元洪虽名为大总统，但是没有军事势力，只能靠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利用段祺瑞与冯国璋之间的矛盾，来抵制段系势力的扩张。这就是以黎元洪为首的总统府和以段祺瑞为首的国务院之间所谓的“府院之争”的实质。这种矛盾和斗争，首先表现在是否对德宣战的问题上。

段祺瑞为了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在日本的支持下，坚决主张参战。而黎元洪、冯国璋在英、美的支持下，反对参战。段便于1917年4月25日，纠集附合皖系的10余省督军，在北京召开所谓“督军团会议”，妄图强制国会通过对德宣战案，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黎元洪趁机于5月23日下令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之职。段更进一步唆使各省督军，呈请解散国会，并赶走黎元洪。于是，安徽、奉天、山东、山西、陕西等10余省督军相继宣布独立。黎元洪面对这种形势，毫无办法，便又想利用各督军间的矛盾，电请张勋入京，“共商国事”。张勋于6月7日通电“挈队入京”，进行“调停”。当他率领5000军队从徐州到达

天津后，即通电要求黎元洪解散国会。黎被迫不得已接受了这一无理要求。6月14日，张勋带领3000“辫子军”进入北京后，便与康有为等策划了一幕复辟丑剧，于7月1日宣布拥戴溥仪复辟，改中华民国为“大清帝国”。他们的倒行逆施，受到全国各界人民的共同声讨。段祺瑞见解散国会和赶走黎元洪的目的已经达到，便在天津宣布“誓师讨逆”，7月11日，统率讨逆军，进逼北京，打败了张勋。段祺瑞再当国务总理，并自命为“再造共和”的元勋，掌握着北京政府的实际权力。

段祺瑞于8月14日正式对德宣战，与日本缔结《中日共同防敌（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军事协定》，允许日本军队进驻东北与外蒙，并以建立“参战军”为名，扩编军队，准备以武力统一中国；同时又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旧国会，而用自己炮制的“临时参议院”去取代国会。他的这些专制独裁行径，不仅受到孙中山等革命民主派的强烈反对，也使西南的滇桂军阀感到是一种巨大的威胁，因而滇桂军阀也站到了段祺瑞对立面去。

《临时约法》和国会，是中华民国的标志和象征，段祺瑞废弃它，实际上即是废弃了“中华民国”。于是，孙中山便毅然高举“护法”的大旗，发动了护法运动。

1917年6月上旬，孙中山两次致电西南各省都督、省长，号召护法，指出：“今日法律已失制裁之力，非以武力声罪致讨，歼灭群逆，不足以清乱源，定大局。”^①接着派胡汉民南下广东，联络南方各省护法力量。孙中山又在上海同海军总长程璧光进行会谈，争取了海军对护法的支持。

6月14日，胡汉民到达广州。广东省长朱庆澜及驻粤滇军将

^① 《国父全集》第三册，第451—452页。

领张开儒等，均已赞成护法^①，并拟组织滇粤联军出师讨逆。由朱庆澜为联军总司令，李烈钧为总参谋，张开儒、方声涛为前锋司令，胡汉民为总秘书。^②胡汉民同粤督陈炳焜会晤，促其支持护法，但不得要领。胡汉民随即赴广西南宁拟邀陆荣廷来粤共商护法讨逆大计。陆荣廷回避，借故拒绝赴粤。

后来，孙中山和一大批国会议员到达广州后，又派王正廷、马君武、吴宗慈等为代表到南宁邀陆荣廷来粤参与主持护法。陆荣廷表示国会应“暂缓开会”，“候军事得手后，集会于武昌为当”，“至来粤事，则以病躯未愈”推搪。^③这表明陆荣廷对护法运动是不支持的。

陆荣廷拒绝支持护法运动并不是偶然的。陆自借护国战争之机，据有广东以后，便以巩固在两广的统治，进而据有湖南为主要目的。正如段祺瑞的密探马凤池所说：陆“握两粤全部之实力”，“只求目前得一湘粤桂巡阅使，将来并兼领副总统，于愿即足。其他西南问题，国会问题，若皆不足措意”。^④为了这个目的，陆曾于1917年3月间专程赴京，晋见了黎元洪和段祺瑞，取得了他们的谅解，于4月10日任命陆荣廷为两广巡阅使，陈炳焜为广东督军，谭浩明为广西督军。陆在两广的统治得到进一步巩固。后来，在黎、段的府院之争中，陆拥黎拒段。与他有深交的冯国璋继任总统后，更加深了他和段的对立。6月20日，陆授意陈炳焜、谭浩明通电两广自主，只是脱离段祺瑞的国务院，而仍然支

^① 张开儒响应孙中山护法号召，曾发表通电，要求“速兴义师，大张天讨，以全力拥护国会”。见《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四辑，第28页。

^② 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210页。

^③ 吴宗慈：《护法计程》，见《革命文献》第四十九辑，第417—418页。

^④ 《马凤池密报》，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一期，第73页。

持冯国璋总统。其“目的在利用时机，把持两粤军民财政并开放烟赌禁，以为搜刮”。^①但两广的自主也为孙中山南下以广东为“护法”基地提供了便利条件。

由于得到海军和驻粤滇军以及广东省长朱庆澜的支持，孙中山便与朱执信等离沪，于7月17日抵达广州。21日，程璧光在上海发表宣言，拥护“护法”，并率领舰队离沪南下。在上海的国会议员，也先后南来广州，决定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护法”声势，顿时高涨。

在这种情况下，桂系军阀眼看“护法”运动势所必行，于是态度也稍有转变。他们一方面利用孙中山的威望以及护法运动在全国的影响，以参加者的姿态来笼络民心，并借此作为他们同北洋军阀讨价还价的筹码；另一方面又担心护法运动的发展会动摇他们在广东的统治地位，所以又千方百计把运动局限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之内。据此，当孙中山抵达广州时，陈炳焜亦亲赴黄埔迎接，表示支持护法军政府在广州开府。

8月25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开幕，出席的国会议员达120余人。30日，会议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9月1日，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翌日，又选举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9月10日，军政府宣告成立，孙中山就任海陆军大元帅。但唐、陆始终不就元帅职。陆荣廷等桂军头目还多次声称“自无另组政府之必要”，“以后广东无论发生何种局面，概不负责。”^②对“非常国会之决议，不敢附和雷同”。^③

与此同时，段祺瑞为了对付南方的“护法”，特派北洋军王汝

① 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211页。

②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四册，第28页。

③ 《广东军阀史大事记》，《广东文史资料》第四十三辑，第83页。

贤、范国璋等部进入湖南，以图控制湖南，逼迫广东。程潜等湘军无法对敌，请求军政府支援。于是，陆荣廷于10月初任命谭浩明为护法联军总司令（后改为湘粤桂联军总司令），率桂军援湘。桂湘两军在护法声势的影响下，进展迅速，于11月中即进入长沙。11月22日，湖南各界代表举行会议，公举陆荣廷为湘粤桂巡阅使，谭浩明为湖南督军，程潜为湖南省长兼军务会办。但陆、谭都“谦辞不就”，^①并且，陆、谭既不乘胜进击北洋军，还通电停战。要求直、鄂、苏、赣四省督军：“通饬前敌军一律停战，并将驻岳各军完全退出湘境，以表和平决心。”^②他们的意见立即得到苏督李纯的响应：“接陆荣廷电，略谓如中央明令停战，则彼亦必饬所部停止进攻。”^③由此可见，陆荣廷完全是利用护法的名义，以达到他巩固两广统治的目的。至于北伐、讨逆，则完全拒绝进行；甚至对湖南的地盘，也不作永久占据的打算，只是让它作为两广的屏障而存在，以保障他割据两广的长治久安。

二、剪除异己，扩充实力

出于对护法军政府既利用又抵制的方针以及巩固两广割据的目的，桂系军阀对于在广东的异己力量采取能兼并收买则兼并收买，否则便以排除的办法对待。

首先被他们敌视的是广东省长朱庆澜。在朱庆澜接任省长以后，将原来的广东防军40个营改为省长直辖的警卫军。由于朱不听命于桂系，40营警卫军也随之不完全受桂系督军的指挥，因而招忌于陆荣廷。1917年6月，朱庆澜又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号召，欢

^① 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11月27日，见《广东军阀史大事记》，第93页。

^② 《广东军阀史大事记》，第94页。

^③ 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11月30日。

迎孙中山以广东为护法基地，更使陆荣廷忍无可忍。在陆的运动策划之下，北京政府便于7月25日，将朱庆澜调任广西省长，以能听命于桂系的刘承恩任广东省长。但是，朱庆澜在军政府的支持下，拒不赴桂，并按照孙中山的要求，委陈炯明为省长兼军司令，拨警卫军20营归陈指挥。桂系军阀更为不满，陈炳焜早就借口军权统一，企图全部接管40营警卫军。于是，陆等又操纵桂籍国会议员以及部分粤籍国会议员和广东省议会议员，大造省长民选、本省人任本省省长的舆论，以迫朱庆澜去职。8月20日，陆荣廷公开对孙中山派赴南宁邀陆来粤的代表王正廷、马君武说：朱庆澜未去职，则粤事始终无法解决。^①在这种情况下，朱庆澜被迫于8月27日提出辞职，但声明“卸任之后，决不赴桂任，用符自主之旨。”^②28日，广东省议会选举胡汉民为广东省长，但陈炳焜不愿胡担任而属意于李耀汉。经朱执信从中斡旋，为了争取李耀汉倒向军政府，孙中山同意由军政府任命李为省长，后北京政府亦在8月28日正式任命李耀汉为广东省长。

李耀汉任省长以后，陈炳焜更为专横，竟将40营警卫军全部划归督署管辖，加以贪污劣迹日益昭著，引起了广东人民及军界人士的愤怒，群起而攻，纷纷要求陆荣廷撤换陈炳焜。陆为平息民愤，被迫将陈调回广西。并提升广惠镇守使莫荣新代理粤督，同意将警卫军20个营拨归陈炯明指挥，令其攻闽。

11月21日，莫荣新就任广东督军，确定派兵援闽，以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24日，李耀汉突然通电辞广东省长职，返回肇庆。广东省议会正拟选胡汉民为省长，但陆荣廷立即多方挽留

^① 吴宗慈：《护法计程》，《革命文献》第四十九辑，第418页。

^② 《广东军阀史大事记》，《广东文史资料》第四十三辑，第82—83页。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8月31日。

李耀汉。于是在桂系头目的规劝下，李于12月1日复任广东省长。^①可见桂系军阀不将广东省长置于自己的统辖之下，决不罢休。^②

跟随孙中山南下，成为孙中山主要依靠的军事力量的护法舰队，也被桂系视为异己力量。以原北京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和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为首的海军，经孙中山在上海做了争取工作以后，对护法运动积极支持。孙中山南下所乘舰只，亦由他们所派出。

7月21日，他们联名发出海军“护法”通电，提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惩办祸首三条宗旨。^③并随即率领舰队南下，于8月5日抵达广州。8月6日，他们在广州受到数万人集会热烈欢迎。程璧光在会上表示：“巩固真共和，倘不达目地，决以一身殉之而不惜也。”^④事实表明，他们对孙中山的护法运动是真心实意拥护的。

但是，桂系从抵制护法军政府出发，认为这支海军力量是对他们的一大威胁。桂系本身没有海军，缺乏江海武装力量。因此，对护法舰队采取收买、兼并政策。由于当时各派护法力量很不一致，军政府一时无所作为，加以财政十分困难，军队的饷械难以按时发给。所以，桂系对海军“乃厚利饵之，并允月任饷项，海军遂骎骎倾向桂系”，桂系分化海军的政策“相当成功”。^⑤以林葆怿为首的一批军官很快就倒向桂系，使很多艘军舰不服从军政府指挥。程璧光原来的积极态度也有明显的动摇，他一直不就军政府海军总

① 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214页。

② 李耀汉被撤除省长职后，即以李的部属翟汪代理，翟于1919年6月辞职，又以张锦芳代理，张以后是杨永泰任省长，均受桂系指挥的人物。

③ 《申报》，1917年7月23日。

④ 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革命文献》第四十七辑，第376页。

⑤ 邵元冲：《总理护法实录》，《革命文献》第七辑，第21页。

长职。① 10月15日，孙中山拟用军舰炮轰督军署以惩戒莫荣新时，他又拒不服从。后来又积极支持组织“护法各省联合会议”及改组军政府。但是，由于他对桂系并不是言听计从，他上述的消极行动，多少有从协调护法各派力量出发，因此，桂系对他还是有所疑虑。

海军南下护法，得到广东人民的热烈欢迎，程璧光在广东人民中享有相当高的威望。朱庆澜辞省长之后，粤人拟拥程继任省长。“程知招桂系之忌，力辞。是时适程有南宁之行，晤陆，即以粤省长之任相劝驾，程仍辞。陆貌为诚恳，劝之再三，程有允意，陆即密电莫新荣，设法对付。”② 1918年2月26日，程璧光在广州海珠被凶手刺杀。程被害后，桂系对海军的收买就更加没有障碍，结果海军就倒向了桂系一边。林葆怿成了改组后完全受桂系控制的傀儡，他所率领的舰队后来也以讨伐“安福系”为名，同北洋军合流。

由李烈钧所率领的驻粤滇军，其中尤其是张开儒的第三师，一直为桂系所仇视。张开儒是最早响应“护法”，后来成为军政府主要依靠的陆军力量。军政府成立后由于桂系的压力，无一总长敢于就职的情况下，张开儒鉴于“大局日趋纷扰，若再有徘徊观望之心，势必贻不可收拾之患。”③ 毅然于1918年1月就陆军总长

① 据吴宗慈《护法计程》中说，军政府元帅原拟选三人，其中一人“预定者为程璧光氏，因程派代表向人表示有不愿就意，故从后议。”见《革命文献》第四十九辑，第420页。

② 李培之：《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革命文献》第51辑，第67页。另据《程璧光殉国记》说，陆与程谈的是广东督军，不是广东省长，且程直坚辞，并无允意。

③ 《国会非常会议纪要·公函》，第17—18页。

职务。因此，桂系把张开儒视为眼中钉，必须除之而后快。为了夺取张开儒的兵权，削除军政府的陆军大权，陆荣廷、莫荣新勾结唐继尧，于1918年三四月间，以“张开儒已任军政府要职”为借口^①，派李根源接管驻粤全部滇军，但遭到滇军官兵的强烈反对；^②陆、莫等又诬陷张开儒在北洋军攻粤时不战而逃，“命令所部向韶（州）撤退”，^③因此，由李根源以驻粤滇军军长和粤赣湘边防督办名义，强行接管了张开儒的第三师兵权。5月12日，当张开儒从韶关返抵广州时，在车站就遭莫荣新派出的官兵逮捕，并枪杀了张的助手、军政府陆军部次长崔文藻。^④

后来，李根源在桂系的支持下，在广东招兵买马，大肆扩充滇军，培植自己的亲信，逐渐脱离唐继尧的领导，这就引起了唐继尧的不满。1920年2月10日，唐继尧下令解除了李根源的驻粤滇军军长职务，改任云南督军驻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代表。两师滇军改由唐继尧总司令直辖，而委托李烈钧就近指挥，^⑤滇军广大官兵对此表示热烈拥护，但李根源在桂系的支持下，拒不交出兵权。而且，为了阻止李烈钧接管滇军，莫荣新按照李根源的要求，悍然发布改编滇军命令，遭到了驻粤北滇军广大官兵的拒绝，他们纷纷自行脱离李根源的编制。莫荣新又对军政府参谋部长李烈钧加以迫害。李烈钧不得不于1920年2月24日率领赣军一团，从广州“出巡”（实际是出走）粤北。经过李烈钧的努力

^① 《唐继尧令杨晋暂代第三师师长电》，见云南省档案资料。《论驻粤滇军》，《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五辑，第172页。

^② 《驻粤滇军旅长李天保等致唐继尧电》，见“云南省档案资料”。

^{③④} 《莫荣新致唐继尧密电》，见“云南省档案资料”。转引自孙代兴：《论驻粤滇军》，见《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五辑。

^⑤ 《李烈钧出巡记》，《革命文献》第51辑，第152—156页。

力，争取了粤北滇军过半数以上重归唐继尧领导，并转入湖南，其仍属李根源指挥的滇军，则由桂系于稍后改编为“海疆军”，移驻海南岛，成为抗击粤军回粤的主力，但终于被粤军消灭。

此外，桂系还利用一切机会扩充实力。例如对李耀汉的“肇军”，本来已是听命于桂系的军事力量，李亦曾深得桂系的支持而出任了广东省长。后来由于朱执信等人对李的规劝，李稍有向正义转变之心，即被桂系免去省长之职。1919年6月，还撤除了李的肇罗阳镇守使，并下令通缉，旋即派林虎改编了肇军。肇军遂为桂系所兼并。1918年春的讨龙之役，亦是如此。龙济光自1916年10月退至海南岛以后，时刻准备卷土重来。1917年11月8日，北京政府为了对付护法军政府，任命龙济光为两广巡阅使。12月22日，龙济光率所部渡海向高、雷、阳等地进攻。由于当时滇桂军主力集中于粤东准备征闽，攻击北洋军，龙军乃得长驱直入，连陷南路、两阳，进逼恩、开，广州震动。军政府遂任命李烈钧为讨龙军总指挥，以李根源、林虎、魏邦平、刘志陆分任讨龙军军长。^①并由海军配合，向龙济光反击。2月下旬，讨龙军陆续出发。3月，讨龙军海陆两路夹击，在电白附近一举击溃了龙济光的主力李嘉品所部。李部主要将领黄任寰、黄兴业、王定华率部一万余人向林虎投降。余部退回海南岛。不久，亦为琼崖镇守使的沈鸿英所收编。龙济光所部残兵千余人，于5月14日退入法租界广州湾，全部被缴械。至此，长期危害广东的罪大恶极

^① 李烈钧：《参加护法时期诸战役》，《革命文献》第7辑，第115页。但据《广东军阀史大事记》记载，讨龙军为五个军，司令是：马济、林虎、沈鸿英、刘志陆、魏邦平。胡铭槃在《粤军魏邦平部始末概况》（载《广州文史资料》第四辑）中则说，五个讨龙军司令是为马济、林虎、刘志陆、魏邦平、刘达庆。以上何说属实，待考。

的“南海龙王”龙济光，终于被彻底消灭。龙济光及少数亲信，北上投靠了段祺瑞。后来在山东、安徽等地招募土匪，组织“振武新军”，拟率领回粤重图霸业，均未成功。1925年3月死去。^①

讨龙战争，固然对巩固广州护法基地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桂系亦通过此役，使自己的力量得到很大的发展，一时扩编至第七军。^②

三、排斥孙中山，改组军政府

如前所述，桂系从一开始就拒绝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军政府，所以军政府成立以后，桂系一直对军政府采取抵制政策。

桂系头子陆荣廷，不仅自己不就军政府元帅职，长期不莅广州而深居武鸣，常常发布一些抵制军政府的命令或谈话，还用各种胁迫利诱手段，致使军政府的各部总长多数不敢就职。莫荣新曾骄横地说：“孙某之政府，空头之政府也！彼无兵无饷，吾辈但取不理态度，彼至不能支持之时，自然解散而去。”^③

于是桂系军阀在财政问题上竭力扼制军政府。据当时的财政部次长（署总长职）廖仲恺的报告，护法军政府由1916年6月初起（包括运动各派参加护法运动时期）至1918年6月底止（军政府改组），在一共收入139.27万元中，税捐收入只占22.14万元，其余均“由孙中山先生以个人名义负担，经仲恺手借入现款供护法用”。^④所有收入均全部支完。这就是说，由孙中山自筹的护法

① 参见台湾版《民国人物小传》第五册，第469页。

②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

③ 邵元冲：《总理护法实录》，《革命文献》第七辑，第19页。

④ 廖仲恺：《为结算革命经费数目致唐总代表绍仪文》，《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页。

经费，占全部经费开支的84%强。而陆荣廷控制的广东督军署，仅1917年财政年度的军费开支，就达1370多万元，^①相当于拨给军政府的税款的62倍，军政府的财政困难可想而知。正因为如此，“军政府内各职员，自部长、秘书、参军各长，以及书记、事务员，每人均一律月领零用20元。”^②

在使孙中山“无兵”方面，桂系除了如上所述的剪除支持军政府的军事力量——护法海军和驻粤滇军以外，甚至对军政府的一兵一卒，也不肯放过。孙中山为了培育一支能够由军政府指挥的军队，一面争取朱庆澜的省府警卫军，一面派出招兵人员赴各地招募民军。但莫荣新却命令各县驻军，诬指招兵人员成土匪而加以驱逐、拘捕甚至枪杀。1917年12月下旬，孙中山的两个招兵人员，在广州市被莫荣新以扰乱治安罪名逮捕，孙中山曾写信要求莫荣新释放，莫置之不理，并将他们枪毙。^③募兵人员先后被拘禁枪杀的有数十人。^④“军政府新招卫队数十人，又给桂军任意枪杀。”^⑤讨伐叛将莫擎宇的潮梅军前敌司令金治国，英勇善战，但因为忠于军政府，并为孙中山所信任，便被莫荣新指使沈鸿英于1917年11月28日将金枪毙。莫荣新甚至还用金钱收买孙中山卫士连的士兵，企图暗杀孙中山。^⑥桂系的这些所作所为，迫

① 据李培生《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一书的统计。

② 邵元冲：《总理护法实录》。

③ 上海《民国日报》，1918年1月17日。

④ 陆丹林：《莫荣新破坏军政府募兵》，《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页。

⑤ 陆丹林：《总理炮教莫荣新》，《革命文献》第四十九辑，第136页。

⑥ 参见马湘：《跟随孙中山先生护法南下的回忆》，《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第80页。

得孙中山忍无可忍，遂于1918年1月3日，以军舰炮轰莫荣新督军署，借以教训莫荣新。莫荣新自知理亏，又不明白当时整个形势真相，不敢还击。

桂系军阀排斥孙中山的集中表现，乃是改组军政府。

以孙中山为首的军政府在广州成立伊始，即遭西南各省军阀的不同程度的反对。为了协调各省力量，使能对内对外一致，唐继尧、李烈钧等建议组织西南各省联合会，得到程璧光的大力支持。孙中山为了团结各派力量，而且认为联合会是一种军事机构，可以同意。伍廷芳、唐绍仪亦赞成组织联合会，并和程璧光一起，于1917年11月4日在广州海珠开会议论。但是，陆荣廷从讨好北洋军阀出发，担心成立联合会会造成南北公开分裂，便持反对态度。后来，经过贵州刘显世的建议，修改了原来联合会的条例，使联合会俨然具有与军政府对峙的性质，^①陆荣廷又表示赞成。于是，1918年1月15日在广州召开联合会成立大会，确定岑春煊为议和总代表，伍廷芳为外交总代表，唐绍仪为财政总代表，唐继尧、程璧光、陆荣廷为军事总代表。

该项修改条例公布以后，孙中山立即表示极力反对。因为按照新条例，联合会不仅是军政府以外的一个对立机构，而且完全束缚了军政府的手脚。很显然，联合会的产生是桂系排斥孙中山的一个圈套。程璧光、伍廷芳、唐绍仪等从调和、团结的愿望出发，堕进了桂系的圈套而不察。当时远在重庆的军政府秘书长章太炎亦来电表示反对，认为联合会的目的不外是“推倒黎总统，拥

^① 修改后的条例规定：“护法各省及各地方之护法各军，非得联合会议之许可，不得募集外债”，“非有联合会议之议决，不得为停战之宣告，或和平条件之提出”。见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以下关于联合会史料，多参照该书，不一一注明。

护冯国璋”。

由于孙中山、章太炎等的反对，加以军政府是由非常国会产生的，是合法的，而联合会并不是由非常国会通过，是非法的，所以，程、伍、唐等也就改变了原来支持联合会的立场。组织与军政府对立的联合会，以排除孙中山的阴谋遂中途夭折。

但桂系并不甘心，又策动某些国会议员，提出改组军政府之建议。程璧光、伍廷芳、唐绍仪等还是从调和、团结愿望出发，支持改组军政府的意见。1918年2月2日，有程、伍、唐和孙中山、莫荣新等参加的讨论改组军政府办法的会议于广州海珠召开。讨论结果，即将元帅改为政务总裁，设总裁若干人，组成联合会议，隶属于合议政府之下，且只限于军事范围。当时孙中山对此亦无异议。但是，这个方案，仍然未能满足桂系要完全控制军政府、排斥孙中山的要求，所以，又遭到桂系其他头目的反对。后来由于伍、唐的斡旋，加以桂系的压力，拟出的改组条例又朝有利于桂系的方向发展，孙中山当然不会同意。

到了4月上旬，一些国会议员在桂系的操纵下，悍然提出将改组军政府方案交国会审议。虽然孙中山两次向国会提出反对该方案之意见，并且非常坚决地表示：“余始终反对，以法律上万难通融也。苟不论法律而论事实，则余无可委曲求全者。若国会必以联陆为有利者，则余虽亲至南宁、梧州晤之，或以大元帅让之，皆无不可，足可见余非争一己地位者矣。”^①但议长吴景濂在桂系和政学系首领岑春煊的软硬兼施之下，仍然将该案提交议会讨论。5月4日非常议会开会讨论这天，桂系调动大队宪兵闯入议场，监视议员。^②即使这样，在80余名出席议员中，亦仅以4

① 邵元冲：《总理护法实录》，《革命文献》第七辑，第23页。

② 《陈炯明叛国史》。

票之多数，使改组军政府案获得通过。当天，孙中山愤而发表通电，辞去大元帅一职，指出：“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① 5月20日，非常国会选举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陆荣廷、孙中山、林葆怿、岑春煊七人为军政府总裁。6月5日，军政府政务会议推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孙中山于5月21日离开广州赴上海。

至此，桂系排斥孙中山、改组军政府的目的完全达到。6月1日，陆荣廷便在南宁通电就总裁职。

通过这一系列的反动活动，桂系在广东的统治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第三节 桂系军阀祸粤

一、强化封建军事专政

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在广东拥兵割据，建立一支庞大的军阀部队，控制广东和广州军政府的实际军事政治权力，为祸全粤。^②

为了巩固桂系在广东的统治地位，他们实行封建军事专政。几乎所有广东各级的行政负责人，均由桂系委派其亲信充任。如

^① 孙中山：《辞大元帅职通电》，《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471页。中华书局出版。

^② 有关桂系陆荣廷的历史，见拉瑞（Diana Larry）：《地区和国家：桂系在中国的政治活动，1925—1927》，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英文本，第27—33页。

前所述，广东省长就是以桂系所认可的人来担任。各县县长，亦多由当地驻军头子兼任或委派。广东全省的行政大权，全操在桂系手中。驻军方面，经过他们的排斥和兼并，使广东境内，除了李福林、魏邦平两部分广东军队外，就是清一色的桂系军队。

莫荣新接任广东督军以后，把在广东境内的部队，编为五个军。第一军总司令马济，有兵三统（每统相当于一个团）；第二军总司令林虎（兼肇罗阳镇守使），有兵六统；第三军总司令沈鸿英（原为琼崖镇守使，后调兼南韶连镇守使），有兵一旅另两统；第四军总司令刘志陆（兼潮梅镇守使），有兵四统；第五军总司令魏邦平，有兵三统。还有：属于全国陆军统一编制的广东陆军第一师，师长陈焜培，下辖卢炎山、唐绍慧两个旅；从驻粤滇军分化出来调驻琼崖、由李根源统率的“海疆军”，下辖两个旅另一个团；不属于军师编制的两路游击队，第一路游击队司令（兼江防司令）申葆藩；第二路司令邓文辉，各辖军队十个营；广惠镇守使李福林，有兵四统；高雷镇守使陈树春，有兵两统；钦廉镇守使林俊廷，有兵四统；琼崖镇守使黄柱，有兵两统。除李福林、魏邦平两支广东军队外，莫荣新统率的桂军共40个团，约4万人。^①

桂系军阀依恃其掌握着一支强大部队和控制着广东政权，便对广东人民实行封建军事专政，其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对广东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采取各种破坏手段，实行残酷镇压。

桂系在统治广东的期间，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作为统治广东的桂系军阀，出自封建军事专政的本能和需要，与

^① 《莫荣新在广东的失败》，《广东文史资料》第10辑，第38—39页。

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遥相呼应，采取了同样的罪恶手段来对付广州的爱国群众运动。那些依附于桂系军阀而登上了反动政治舞台的省长翟汪、高等审判厅检察长梁炎芳、财政厅长杨永泰、两广

血心以十共之

海道尹张锦芳（后为护理省长）、警察厅长魏邦平，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当“五四”所掀起的反帝爱国运动的烈火在广州燃烧正旺时，莫荣新就反复对魏邦平交待任务，魏满口应允认真地实行镇压。魏接受了捕杀、镇压革命群众的大权，充当了桂系军阀镇压爱国运动的刽子手。

五四爱国运动在全国的蓬勃发展，使一切反动势力极为恐惧。广东督军莫荣新、省长翟汪、警察厅厅长魏邦平联合于5月31日发布了镇压运动的四个报告的通电，即：《督军、省长布告》、《省长公署布告》、《警察厅长布告》、《督军莫、省长翟致各镇守使、道尹、督办、总办电》^①。这四份镇压爱国运动的布告、通电的主要内容是：首先，歪曲了学生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的性质。诬蔑爱国群众运动为“聚有多数匪徒，借端滋扰，实属妨害社会康宁”；是“乱民扰乱秩序”，是“结队连群，为法外之举动”。还造谣说革命群众是“不法棍徒竟至借端纠众夺掠毁物，扰害商民。”“损害他人身体及物件。”^②其次，他们把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爱国运动看作是“妨碍邦交”的“轻举妄动”。他们表现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奴颜婢膝，正是要和他们所投靠的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搞所谓“邦交”。再次，他们诱骗和威吓学生不要关心政治，不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要求“学生当修业时期，自当专心学业”，公然提出“校中如有排日问题发生及一切轻举妄动，应由各校长

^{①②} 《广东文史资料》第24辑，第63—65页。

严行遏止，以免酿成事故，牵涉邦交”。①在四个布告、通电中，还提出了他们破坏、镇压的措施，这就是：“由各地文武预为防范”，严行“禁止”，认真“弹压”、“查禁”，“严拿尽法惩办”。②整个五四运动期间，他们完全是按照这些布告、通电令行执法的，充分说明了桂系军阀在广东实行封建军事专政的本质。

桂系军阀在广州地区的破坏、镇压活动中，有两次暴行特别严重。一次是1919年7月间。五四运动爆发后，广州地区群情激愤，纷纷起来响应、支援，学生表现得尤为激烈。广州各界曾多次向军政府、督军署、省署请愿，一再要求下令声讨卖国贼、坚决废除一切卖国的中日密约。为桂系所控制的军政府，或者不作明确答复，或者置之不理。这就更加激起了群众的义愤，7月11日，广州全城罢市。当天，广州警察厅立即发出禁止罢市的布告，声称“如敢有意违抗，因此乱及治安，……惟有查明首从，分别拘拿，依法严惩”，③对群众进行恫吓。但群众并没有被吓倒。13日，还有广九、广三、粤汉三铁路的工人、电灯局和各机器厂的工人相继举行罢工。工商学界数千人前往省议会请愿，提出要北京政府下令严惩卖国贼等正义要求。督军莫荣新竟派军警数百人前往镇压，强迫解散请愿的群众。当群众拒绝解散时，军警即开枪扫射，伤数十人，并拘捕学生50余人。

15日，各界数千人在东园召开国民大会，表示抗议，又遭到军警的殴打，并被捕去多人。16日，群众纷纷上街讲演，又被拘拿300多人。在讲演时，所发售的广东学生联合会发行的刊物《雪耻报仇》，被军警全部收缴和销毁。

①② 《广东文史资料》第24辑，第63—65页。

③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5辑，第98页。

这样的野蛮行为，使群众的情绪更为高涨，纷纷发表通电，向全国揭露桂系军阀的严重罪行。广东国民大会发出的通电指出：“不意护法省份，所有段祺瑞不敢为、不忍为者，一一出以桂系军人而不顾。粤民今日，惟有痛心疾首，以待全国人民之公断。”^①孙中山发出急电给广东军政府，指出：“闻警厅因国民大会拘捕工、学界代表，将加以殊刑。……我粤为护法政府所在之地，岂宜有此等举动？”“不惟为粤人之所共愤，亦即全国之所不容也”，^②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群众。广州国会议员几十人提出书面质问，要求迅速制止镇压活动和释放被捕群众。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和群众的坚决斗争下，桂系军阀才被迫释放了所有被捕群众。

另一次是1919年11月间。五四运动中，广州中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所组织的检查日货、抵制日货的群众运动，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地向前发展着。黄复颜、范曾养、古太一、程万镒四个广州学生，在全市学生抵制日货大游行中，因同军警搏斗，伤重而死。

11月8日，广州市各校学生在东园为死难学生举行追悼会，会场气氛极为悲壮，一致控诉反动军警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罪行。会后，一万多学生高举黄复颜等四人遗像，冒雨游行。高呼“为死难同学复仇”等口号。当游行队伍行至长堤先施公司门前，群众对该公司多次不听劝阻、继续销售日货的行为，表示无比义愤，骂它是“先施亡国公司”，高呼“打倒亡国公司”、“抵制日货”等口号。公司方面与魏邦平指使的警察结合起来，向游行队伍挥

^①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五辑，第99页。

^② 《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4页。

舞刀枪，向手无寸铁的学生乱撞乱刺，甚至开枪射击。并先后禁闭学生200多人，打伤学生数十人，逮捕学生领袖张殿邦等11人。接着，魏邦平竟然将殴伤学生的凶徒马旋德、欧耀释放，并发布文告，反诬爱国学生擅取公司食品，抢劫马、欧二人财物。旋将被捕的张殿邦等11人，秘密押解往南石头“惩戒场”监禁。

殴打学生的暴行发生后，各界的抗议活动，风起云涌。从11月9日起，广州国会粤籍议员、广东学生联合会、广东省议会议员25人公开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广州各校学生数千人和各校校长、教职员代表，分途前往军政府、督军署、省署请愿，提出惩凶等正义要求。广州国会议院召开会议，200余名议员以压倒多数通过查办魏邦平案。广州中等以上各校学生举行罢课，发表宣言，声明“学生罢课，以依法惩办魏邦平为目的。魏邦平一日不办，学生一日不息”。罢课期间，学生多次举行游行示威及讲演宣传，向当局进行了十多次请愿。最后，护理省长张锦芳出面作出保证，“愿以文书表明依法办理”。各学校才于12月15日复课。在这样坚决斗争的情况下，魏邦平才被迫释放了张殿邦等被捕群众。

为了加强封建军事专政，桂系军阀还竭力压制舆论，肆意践踏民主。当广州警察殴打被捕学生的暴行发生后，广州的10多家报纸都据实进行了报道。这就触怒了桂系头目和魏邦平。12日，警察厅派出警察搜查了《国民报》和《大同报》两个报馆，并拘捕了《国民报》的主笔等5人。18日，广东报界公会致函广州军政府、督军和省长，要求他们下令警察厅释放被捕人员；同时公会还急电全国各有关方面，请给予声援。魏邦平在桂系军阀的指使下，反而强加《国民报》以“造谣惑众”的罪名，不仅封闭该报，还将该报主笔解往督军署审讯。更为严重的是，当晚再次出动警察，搜

查《羊城报》、《天游报》、《国华报》、《总商会报》、《岭海报》、《天趣报》、《共和报》、《中原报》、《快报》、《粤报》等10家报馆。连夜又拘捕主笔、记者25人，甚至还拘捕了《粤报》20多名印刷工人。

魏邦平的这一暴行，引起了各界群众的极大愤怒。为此，广州国会的粤籍议员、省议会的议员、总商会的董事和各校教职员，准备15日于东园国会议员俱乐部召开大会，商议解决办法。魏邦平却变本加厉，竟然出动警察，断绝交通，禁止开会。桂系的倒行逆施，引起全国的公愤。全国各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报界联合会、以及各地的群众团体，纷纷发出通电，一致声讨魏邦平拘辱学生，围攻报馆，捕押记者，摧残舆论等种种罪行。一致要求释放报社被捕人员并惩办魏邦平。最后，桂系军阀当局被迫释放了被捕记者。桂系军阀抑制舆论的行径，不只是发生在五四运动期间，而是一种经常现象。1918年，借口军事问题，封禁《南越报》、《国报》。1919年“因省长问题”，各报据实直书，主持公论，结果《国民报》被封禁，《羊城报》、《共和报》、《粤报》、《国华报》、《商会报》主笔、员役、访事共数十人被逮捕。^①1920年8月，粤军回粤，克复潮汕，各报据实直报，桂系当局竟派员赴各报检查，并封禁了《新报》。10月23日，粤军攻下惠州，各报如实报道，桂系恼羞成怒，竟将全市报纸封禁，“一律停止出版”。

桂系的封建军事专政，确是暴露无遗。

二、加紧豪取掠夺

桂系军阀实行封建军事专政，就需要大量的军费和行政费

^① 李培生：《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1921年，艺苑印刷所出版。

用，于是加紧对广东人民进行经济掠夺。

桂系军阀据粤期间军费支出的增加，比“南海龙王”龙济光统治广东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龙济光在督理广东军务时，1915年度的预算是：主管陆军费按月应支出毫银459,520元，警卫军费每月支出429,480元，共计每月88.9万元；另每月兵工厂支出3万元，总计每年支出1102.8万元。桂系军阀进驻广东以后，费用逐年增加。1916、1917年度，主管陆军费每月支出64.5万元，警卫军费每月支出448,284元，另兵工厂费每月支出5万元，共计每月支出1,143,284元，总计每年支出1371.9万余元。1918、1919年度，各项军费每月支出2,271,551元，每年总计支出2725.8万余元。1920年度，各项军费支出每月约2,144,664元，全年总计支出约2573.6万元。^①从以上数字的对比，说明桂系军阀的军费开支大大超过龙济光统治时期。如此庞大而又不断增加的军费和其他浩大的政府支出从何而来？主要是靠两条重要渠道：一条是靠借内外债，一条是靠对人民的巧取豪夺。

桂系军阀在城市中设置名目繁多的捐税。在农村中，农民负担着沉重的田赋和盐税，还有各种苛捐杂税。总之是敲榨勒索，无所不用其极。举一例就可看出其苛捐杂税的严重性。桂系军阀在粤军的迅猛进攻和广东人民的强烈反抗下，被迫退出广东，离境时还提出要所谓“开拔费”500万元。广州各团体代表商量后同意筹款50万元，作为对桂军的“送行费”。莫荣新对此不满，一再讨价还价，并进行各种威吓和欺骗。最后同意以所谓“让城费”150万元了结此事。这笔巨款的筹措办法是由省城商店、居民各抽租捐一月，主客各半，赌馆捐三月，约40万元，其余由银行垫

^① 李培生：《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1921年，艺苑印刷所出版。

支，待以后设法筹还。桂系军阀在其他方面的敲榨勒索，可想而知。

桂系军阀给广东人民带来的祸害，集中表现在弛赌贩毒。

广东地区的赌风，历来兴盛，特别是番摊为害最大。每年因此而丧命、破产的赌徒不计其数。辛亥前后，由于人民的坚决反对，部分士绅和官员的义愤，赌风一度有所收敛。龙济光入据广东，曾经借口所谓救济水灾、有奖义会、复开山票铺票及其他赌博，但龙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番摊。龙济光退出广州之后，北京政府曾命令广东禁止有奖义会及各种赌博。陆荣廷入据广州，首先将已有禁令停止的有奖义会，克日招商承办，遭到各方面的严厉责难。陆荣廷等利用他们掌握的权力，当时就由省库提出12万元，运动省议员通过照办有奖义会以对抗各方面的责难。他们又打算设立“公民筹饷局”，作为公开番摊的场所。各方又群起指责，尤以北京的禁赌会反对最力，所以一时他们的劣行难以实现。

后来，陆荣廷担任了两广巡阅使，陈炳焜继任广东督军，宣布两广自主。他们又向省议会提出了开赌案。由一些军官共同组织“源源公司”承包，认饷600万元，公礼（黑钱）200万元。由于给了省议会运动费36万元，这一提案在省议会得以通过。这时“源源公司”还没有正式成立，陈炳焜、李耀汉召集各部军官，组织“集成公司”来承接^①。这样，由于桂系的倡导，议员的附和，广东的赌祸连续五年，愈演愈烈，造成不少人倾家荡产，而桂系军阀则趁赌发财，大饱私囊。

种植和吸食鸦片亦是桂系军阀极大的饷源。鸦片从种植、运

① 李培生：《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

输到吸食，有多如牛毛的各种捐税，如：烟苗税、印花税、起运税、落地税、过境税、出售税、内销税、红灯税（指烟灯）、护运税等。于是，桂系军阀明目张胆地包庇贩运，抽取烟税，甚至于强迫农民种烟，借此收取亩捐，以充饷糈。章士钊曾揭露说：“陕西及苏、赣、粤三省之鸦片，四省人之所共以为苦者也。政府日否，尔乐焉，‘乱党’禁之绝，吾令陆建章遣员游说，听尔种植，吾令蔡乃煌粘印花，任尔购食。”^① 汕头市的一个传教士这样写道：“我在中国住了三十多年，从未见过像今年这样广泛的鸦片种植。农民不仅受到免费供给鸦片种籽来种鸦片，而且如果他们拒绝种鸦片，还要被科以罚金。原因就是打内仗需要钱。”^② 云、贵、川所产的鸦片，亦经广西远销广东，这样桂系军阀与滇、黔军阀相勾结，贩运鸦片到广东销售，靠此肮脏交易，大捞厚利。

因此，在桂系统治下的广东，出现了“烟苗遍地，赌馆满街”的奇特现象。魏邦平担任省会警察厅长和省警务处长期间，警务经费短缺，采取征收特别警费来解决。广州烟赌馆林立，竟成了“特别警费”的一个重要来源，这笔收入使得警察经费绰绰有余。^③ 根据当时报纸披露，桂系军阀在广东的赌捐收入，每年竟达数百万元之多。^④

除烟赌以外，桂系军阀还通过私运粮食出口，大发其财。当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而导致世界粮食价格上涨。本来过去广东禁止粮食出口，但桂系进驻广东后，就以贩运粮食出口作为个人营私发财的门路。桂系的官方轮船或军舰，黑夜运米出口的，旬日之间，就有60多艘。每出口大米一担，可获利2元以

①②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23页。

③ 《广州文史资料》第一辑，第108页。

④ 《申报》1920年6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7月22日。

上，每船可装载600—700担，每日，即可得七八千元的不义之财。这些桂系兵轮出口，都可以免予检查，大开方便之门。有时还上半夜运米出口，下半夜又运盐进口。据说当时一艘兵轮，每月可以获利20余万元，桂系从事此项走私勾当的轮船多达十余艘，每月可获利200余万元以上。“莫荣新之骄子莫正聪，及桂军某统领某营长等，已坐巨富。”^①

桂系军阀还运用他们的统治权力，使用种种伎俩，肆意扰乱金融。有的银行因为遭受不了这种金融动荡的打击，以至破产倒闭。人民群众则由于金融物价波动，私人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日常生活越来越艰难。当时，桂系陆续到广东中国银行提取现款任意挥霍浪费、贪污中饱，致使兑现停顿，纸币价值一落千丈，商人蒙受巨大损失。莫荣新等还制定所谓《限制兑现法》，利用机会，搜刮更多的民财。

桂系军阀统治广东期间，经过几年的强抢豪夺，大肆搜刮，不仅得以维持桂军庞大的军费开支，而且各级军官大都发了横财。就是驻粤桂军的小小连排长，也有发财至数十万元的，上级军官就更不用说。据梧州粤商1920年的调查，陆荣廷当时“寄储于外国银行之黄白现金，约1200万元之多”^②，陆荣廷的这笔横财，其中大部分是从广东掠夺的。桂系军阀被驱赶出广东后，清理财政时揭露，莫荣新在督粤期间，共约扒走2000万元。^③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沙面各银行之桂吏赃款在3000万元以上。”“莫荣新1,150万元，沈鸿英350万元，龚政300万元，杨永泰320万元，林虎200万元，申保藩130万元，邓文辉100万元，马济60万元，傅吉

① 李培生：《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

② 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1月22日。

③ 《广东文史资料》，第10辑，第45页。

士80万元，魏继昌50万元，郭椿森30万元，卓桂廷32万元，谢卓英30万元，陈坤培18万元，梁士模75万元，程修鲁25万元，徐但霖10万元，莫正聪175万元。其他10万元以上者，尚指不胜屈。”^①

粤军回粤时发表的《粤军全体将士宣言》，对桂系军阀在广东的掠夺作了最集中最生动的揭露：“我粤自莫荣新等窃据以来，残害吾民，无所不至”，“番摊义会，流毒最烈，年中因丧命倾家卖妻鬻子者，以数万计。鸦片烟勒种遍地，乡人求免，反遭其祸。”“兵工厂所出枪械子弹，悉数发给桂军，或运回广西。粤人军队，丝毫不与。近复妙想天开，将机器大部，运去南宁。”“造币厂所出毫洋，概运回桂，以至吾粤银根短绌，毫币低落，粤人损失，年逾千万。”“吾粤连年兵燹水旱，民不聊生，莫荣新不但不设法救济，反巧立名目，大肆敲剥。一县委员，有至二十人者。虽前清豁免之粮，亦勒令缴纳，否则拿人酷酢。至于妇女，凄楚万状，不忍目睹。”^②

三、出卖主权、大借外债

大肆举借内外债，乃是桂系军阀解决庞大的军事支出和行政费用的另一重要途径。他们还可以从大借外债中贪污中饱，聚积个人财产，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桂系据粤期间，借入内外债款总额为16,656,620元，其中日金为4,740,000元，港币1,024,259元，大员纸1,520,000元，毫银4,956,681元，省行券143,000元，毫票4,272,679元。特别是以出卖主权来大借外债，祸国殃民更

① 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0月13日。

② 李培生：《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第8—9页。

为厉害。

从徐义生所编外债表，①以及有关资料中，就可以看出几个问题：

第一，从借款者或经手人来看，多是桂系军阀的广东督军陆荣廷，代理督军谭浩明，广东督军、省长莫荣新，省财政厅长杨永泰、龚政等。他们不惜以高达1%的月息来借款，其目的不外是使借款由他们控制、使用，完全是为桂系军阀统治服务。

第二，从借款名称来看，有所谓：“军务院台湾银行借款”、“广东省台湾银行借款”、“广东士敏土厂借款”、“广东高师台银借款”、“广三路局生银借款”、“广东中国银行借款”、“广东留日学费借款”。②等等。名目繁多，有政府向台银借款；有企业向台银借款，有文化借款。贷款最多的是日本台湾银行。这样日本帝国主义者就利用各项借款来加强对广东省财政金融的控制和对广东省行政机构的影响，对广东文教事业的渗透，以及对广东省铁路、工业等方面的掠夺。

第三，从借款所提供的担保来看，例如：军务院台湾银行借款的担保是：“旧广州府衙门、布政使衙门官地建筑物”；广东士敏土厂借款的担保是：“全部士敏土厂财产、大沙头土地、旧藩署广州府衙门及海关土地”；广三路局台银借款的担保是：“广三铁路局收入”、“广东全省烟酒税”；“广东中国银行台银借款”的担保是：“电话局全部财产，全省烟酒税收及纸币564,084.33元”；广东怡和借款的担保是：“广东全省矿产物专利”。仅从这几项借款的担保说明：广东省会所办的水泥厂、电话局的财产、广三铁路局收入、广东全省的烟酒税、广东全省矿产物专利、几处官地及其建

①② 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6—229页。

筑物等都变成了借款抵押品；广东的烟酒税、厘金、牛皮捐、屠宰捐、花筵捐等，改由台湾银行的买办会同包商征收。这样，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广东军政文大权的控制，例如：“广东高师合银借款”，日本帝国主义者公然提出：“校长应镇压学生反日运动”，这完全是侵夺中国主权的所为；另一方面桂系军阀大肆拍卖广东的各项主权，包括军政财文大权，加深了广东地区的殖民地化。

第四，从借款用途来看，例如：1916年10月借款200万元日金，先收垫款50万元，充龙济光军队开拔费，余充滇军、粤军军饷；12月，借入20万元日金，用作省行政经费；1917年5月借到150万元日金，用作“纸币整理和移充政费”；1919年1月借款76万元日金，是用作“维持广东中国银行所发纸币”；6月，借款10万英镑，是用作“军政费用”；其他名义如铁路借款等，也不少是移作军政费。这说明桂系军阀的借款，是为其封建军事专政服务的。

内债情况不必一一列举，仅从上述所列到的如此庞大的外债借款，其详细使用情况从来不明，除用于军阀混战和军阀政府开支外，大小官吏从中贪污中饱，这是毫无疑问的。

再次，是私卖矿产资源，以断送国家主权来增加他们军阀的收入。1918年10月25日，莫荣新、杨永泰与英商烈察臣订立合约，出卖陆丰、海丰、惠阳、香山四处矿产，取得借款10万元，1919年6月，粤督莫荣新与英商怡和洋行签订10万英镑的借款合同，以广东全省矿产专利权为担保。1920年4月23日，莫荣新、张锦芳（省长）与英商事业公司委托人路易加士、岑伯铭签订合约，广东政府允许该公司钻穴探查及测量南海、番禺等几十个县的煤炭等矿藏。签订合同后，其他人不得参与。成交后，莫、张

的广东政府将得到收入100万元。^①加上其他一些拍卖活动，广东地区的煤炭等矿产资源几被卖尽。

粤军回粤以后担任财政厅长的廖仲恺还揭露说：“如广三路局收入、及烟酒税、南番两县田赋、文明门外公地、财政厅某某衙署等各项公产，均已向台湾、华南、汇丰等银行押借巨款，每隔二三日即有银行前来索债。”^②可见桂系所借外债的繁重。

四、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桂系军阀统治广东期间，城市经济进一步殖民地化、各行业萧条冷落，中小工商业者不断破产；农村经济也遭到极大的破坏，整个发展趋势是处于停滞、下降的状态。加以天灾的不断发生，更加重了农村经济的破产。桂系在广东的统治，使广东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黄绍竑在他所写的回忆录中有过这样一段记载：“黄绍竑初到肇庆的时候，去林虎军看俞作柏、伍廷飏。他们由新兴打完李耀汉回来，邀黄绍竑去参观战利品。那些战利品不是武器弹药，而是耕牛和家私什物，用条子标明是某连某排某人的，有些还标出价钱拍卖。他们还问黄要不要。肇庆城满街都摆满这些东西。伍廷飏曾说，以前作战有护法、护国的政治口号作为口号，骗士兵去卖死，现在只有用发洋财来引诱士兵卖命了。黄绍竑当时听了不以为然。林虎军在东江有一句流行的话：‘有鸡剖鸡，有鸡刁黑’（按：这是句广东土话，意思是说抢到鸡时就杀鸡吃，没有鸡就在晚上去侮辱妇女。）所以，东江人民处处都起来与桂军为敌了。”^③这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桂系军阀给广东人民带来的

① 李培生：《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第14—22页。

② 《双清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0页。

③ 黄绍竑：《旧桂系的兴灭》，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196页。

深重灾难。

桂系军阀政府的财政收入，直接和间接是从占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农民身上搜刮而来。当时的正税主要是田赋、盐税和厘金，其征收额不只逐年有所增加，田赋还实行预征，厘金的征收则城乡间关卡林立，甚至一猪一鸡均需缴纳多次厘金。

正税以外的苛捐杂税，更是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凡物凡人都有所谓捐税。汕头市郊有猪只捐、女子出阁捐、牛只捐、鹅母捐、番薯捐、青菜捐、丁口捐之类；香山有游联队费、联团费、民团费、保卫费、自卫费、捕费、附看费、沙骨费、沙天费、果木费、鸭部费、疯人口粮费、旧式农会费、中小学附加费之类；惠阳有牛捐、屠牛捐、屠猪捐、花生捐、生油捐、谷捐、米薯捐、盐斤捐、梅菜捐、豆麸捐、米麦捐、糖出口捐、杉木排捐、房捐、蚕茧捐、驳艇捐、黄豆捐之类；番禺沙田区一带，有过路捐之类；宝安有人头税之类。真是无奇不有，人畜难逃。这类苛捐杂税，或由县署征收，或由警区署征收，或由民团局征收，或由驻防军队征收。这类捐税经常美其名说是为了维持地方行政，或谓保护人民治安，实际上是运用种种名目来搜刮民财、民物，以供军阀们的任意挥霍享用，或充作军费，用以发动内战，相互厮杀。^①

桂系军阀为了割据广东，剪除异己，频繁地发动征战。一发动战争，他们就无止境地向地方要钱要物，拉夫抓兵，更是对农民骚扰不堪。兵差除人夫以外，还有车辆、船只、牲口等运输工具，偶尔还要征用柴草。由于桂系军阀政府不给地方军队发给或发足军饷，这样，这类军队的衣食住行等一切用品，都要靠地方

^① 章友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584—585页。

供应，而地方供应主要又是靠农民供应。广大农民被压榨得喘不过气来，生活极为艰难。整个农业经济的发展趋势处于停滞不前，广大农民破产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除兵灾人祸外，还不时发生天灾。如1918年广东发生水灾，2月，粤、闽、苏、浙有地震。^①而且桂系军阀还强迫农民种植鸦片，“他们——番鬼佬（帝国主义）……还运来无数量的鸦片烟苗，叫他们帮助下的带兵老爷（军阀）强迫我们（广东农民）去种。结果，致我们正当生产完全停止，发生粮食的恐慌。”^②

桂军在广东目无法纪，为所欲为，更加深了农村的灾难。桂军“行军所至，淫掠焚烧。”^③一月间，在广东农村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广东桂军在三水芦包某乡强奸全村妇女，四十以下莫能免。”^④五月间，桂军在新兴县的天堂、河头等处，“任意抢掠财物，焚杀居民，该灾区百余村乡之财物，被其抢掠一空。”^⑤桂军退出广州，向西江方向逃窜，对广东西江地区大肆骚扰。“西江沿岸的圩镇，都被溃退的桂军骚扰抢劫，凄凉满目。”^⑥“在雷州方面，因此竟饿死二十多万农民，而未饿死之兄弟，一十万到南洋、安南各处卖身为奴（猪仔），未死之姐妹，一百一千到广州湾、香港、澳门各处卖身为娼。”^⑦

当时的报刊记载，虽然还不能全面地反映广东人民的苦难，但已足以表明广东人民在桂系军阀统治下的悲惨处境。

①② 章友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18页、第628—629页。

③ 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6月4日。

④ 《申报》，1920年1月15日。

⑤ 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5月13日。

⑥ 《广东文史资料》第16辑，第198页。

⑦ 章友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28—629页。

第四节 桂系军阀的败退

一、援闽粤军的组成和发展

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以后，即积极筹组一支受军政府直接指挥的队伍，以免始终受制于桂系军阀。当时广东省长朱庆澜支持孙中山的这一意见，拟将由省长统辖的40营警卫军拨出20营，交陈炯明以省长亲军司令率领，作为军政府的直属部队。但遭到桂系广东督军陈炳焜的百般反对，未能成功。后来，朱庆澜去职，陈炳焜亦因民愤太大而被调回广西，由莫荣新继任广东督军。在胡汉民、汪精卫等多方面向陆荣廷争取之下，陆荣廷为了平息民愤，加上当时福建北军南侵，广东告急，必须派军援闽，便于11月中旬，同意拨出警卫军20营给陈炯明指挥援闽。这便是援闽粤军的由来。

1917年12月27日，军政府在海珠召开了有程璧光、李烈钧、陈炯明、胡汉民等参加的军事会议，讨论了援闽问题，决定组成征闽海陆联合军，以程璧光为总司令官，陈炯明以征闽粤军总司令的名义兼任惠潮梅军务督办。^①12月2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任命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12月3日，陈炯明就总司令职，援闽粤军正式组成，于广州越秀南路的惠州会馆（即今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纪念馆）设立总司令部。

12月12日，在广州东郊举行援闽誓师大会，发表了《援闽誓师宣言》。宣言号召发扬广东军民在辛亥革命中的光荣传统，这就

^① 见《程璧光殉国记》。

是“驱逐清吏，奠定岭南，乃分兵北上，转战淮徐间”的革命精神；宣言表示决心：“要回复法治”，“援闽讨逆，振旅出发，……以破犬羊凶逆之众”，使“昔日粤军之荣誉，再振于中夏，以奠我民国之丕基”。①

誓师后，陈炯明统率粤军立即开赴和驻屯粤东地区，进行整编和援闽准备工作。粤军只有原20个营的基本部队，人枪5000左右，编成5个支队、一个预备队、一个游击队。第一支队司令李炳荣，辖3个营；第二支队司令许崇智，副司令关国雄，辖4个营；第三支队司令罗绍雄，辖3个营；第四支队司令邓本殷，辖3个营；第五支队司令洪兆麟，辖3个营；预备队司令熊略，辖两个营；游击队司令徐连胜，辖两个营。②孙中山认为陈炯明非军人出身，不长于战事，为了加强部队领导，特派原中华革命党军务部副部长邓仲元为总司令部参谋长，以原军务部部长许崇智屈就支队司令，因为许曾担任闽省师长和讨袁军总司令，在闽有不少是他的旧部。粤军到潮梅地区集中整训的同时，对部队进行了初步扩充。驻潮属地区警卫军第五营营长杨坤如自动请求参加，准其加入，编为第二十一营担任营长。为了争取地方人士的支持，粤军制定了招募、借枪和筹饷等种种办法，得以编募人枪约10个营。

援闽粤军经过整训扩充，实力有所加强。孙中山于1918年4月5日和8日两次电陈炯明，命令他迅速向福建进军。恰在这时，桂系军阀与政学系非法策划改组护法军政府为总裁制，孙中山被迫于5月4日辞去大元帅职，21日离穗赴沪。孙中山于赴沪途中，特地到三河坝粤军总司令部会晤陈炯明及诸将领，对陈等

① 《有关陈炯明资料》，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33页。

② 《广东文史资料》第31辑，第10页。

指示军略，力促粤军早日对闽进军。同时视察了粤军的攻闽部署和粤军将士阵容，极大地鼓舞了驻军士气。孙中山到达上海以后，又致函陈炯明，告知北洋军阀部队已源源南下，准备向广东进攻，粤军处于三面包围之中，“后援难恃，强敌在前，所部又饷械俱乏；处此局势万难操全胜之际，若审慎求全，……势必陷于重围。”指出：“此时粤军冒险进攻则生，不冒险必致坐困。”因此，粤军惟有奋力前进，“冒险求胜，规取闽中而已。”^①关于援闽粤军所需经费，孙中山决定以当地盐矿税和海外筹募接济。

在孙中山的多次敦促和倾全党人力物力支持下，陈炯明开始决心攻闽。他和邓仲元、许崇智等商定了作战计划，准备分三路进军：左翼，以许崇智支队所属4个营集中蕉岭，向武平、上杭进攻，以长汀、连城为攻略目标；中路分两部，以李炳荣支队及熊略支队共5个营，从大埔方向进攻永定，进窥龙岩；以邓本殷支队和罗绍雄支队共6个营，由叶举指挥，从饶平方向进攻松柏关，以窥和平；右翼，由参谋长邓仲元指挥洪兆麟支队3个营和其他两营集中于澄海、黄岗，以监视诏安、云霄之敌（在饶平方面驻有滇军方声涛一个旅）。^②总司令部设行营于三河坝，由陈炯明负责，潮汕方面由邓仲元负责，并指挥右翼部队。

1918年6月，援闽战争开始。左翼许部在三天内就占领了武平、上杭。中路攻永定数日不下，许部派兵支援，永定之敌败走。在饶平方向进攻松柏关顺利得手。向澄海来犯之敌，为右翼部队击溃。这就取得了初战的胜利。

这时，闽督李厚基向北京政府请求支援，力图反攻。援闽粤

① 《国父全集》第3册，第313页。

② 罗翼群：《记孙中山南下护法后十年间粤局的演变》，载《广州文史资料》第4辑。

军几经苦战，上杭、永定、大埔才失而复得，乘胜直趋龙岩。接着右翼粤军部队连克诏安、云霄、东山、漳浦、澄海，会师漳州。左翼在占领龙岩会师漳州后，又分兵出永定、建宁等福建西北各县。同时，闽南的长泰、同安、安溪等县也为粤军占领。这样，经过10个月的英勇战斗，揭举着孙中山革命旗帜的援闽粤军，以少胜多，以弱克强，占领了闽西南的20多县，总司令部移师漳州，建立了一个根据地，称为“闽南护法区”，粤军在福建打下了初步基础。

这时，南北双方在上海举行所谓“和议”谈判。而北洋军阀内部直、皖两系的矛盾日益尖锐，斗争激烈。直、桂联成一气，主张“和平统一”，倒孙中山的台；皖系则主战。这就迫使段祺瑞与孙中山合作，促成了福建南北两军的休战议和。1919年6月，达成划界协议，在闽西沙县的三元地方及闽南的江东桥附近，两军各后撤10公里，划界而守。

援闽粤军利用划界而守的停战时机，开始进行扩编整训。粤军在攻闽战斗中，在战地收容招募敌兵数千人，沿途又吸收了相当数量的人枪，使兵力发展至2万余人，扩编为两个军，仍以支队为编组单位。陈炯明以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辖李炳荣、洪兆麟、熊略、罗绍雄、邓本殷等五个支队，以及梁鸿楷、黄凤纶、丘耀西、陈炯光、罗翼群等五个统领（相当于团长），驻扎在漳州、龙岩等地。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辖吴忠信、关国雄、蒋国斌、谢文炳等4个支队，以及孙本兴率领的卢兴邦民军，驻扎在汀州等地。①

① 参见罗翼群：《记孙中山南下广东建立政权》，《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

为回粤创造条件，在孙中山的积极支持下，在朱执信、廖仲恺、邓仲元等具体帮助下，陈炯明在漳州进行了整军经武，“刷新政治”，经过一段时间的整训，身处异地、实力单薄的粤军顶住了各种困难，得以生存并有所发展，就为回粤灭桂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粤军回粤

孙中山建立援闽粤军，力促向闽南进攻，以实现培育一支革命武装的宿愿。当援闽粤军达到了目的并积聚了一定的力量，他便力主粤军回粤，以彻底消灭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

1920年7月11日，爆发了直皖战争。在此之前，直系军阀和桂系军阀的勾结日益紧密，相约北倒段（祺瑞），南倒孙（中山）。桂系军阀公然调集兵力，企图进窥驻闽西南的粤军，为直系张目。驻闽南地区的浙军陈肇英师和张贞、杨子明所部地方军队共9000人，与岑春煊、莫荣新暗中勾结，蠢蠢欲动。处于此种非常危急情势下的粤军，如不兴师回粤，必将难以自存。针对当时客观形势的要求，孙中山决定粤军尽早回粤，驱逐桂系。

孙中山作出粤军回粤的战略决策之后，随即饬令陈炯明、许崇智、邓仲元等作好回粤的一切军事准备。但是，陈炯明等一直犹豫不决，强调客观困难，不肯立即举师回粤。所以，1920年6月29日，孙中山特从上海派朱执信、廖仲恺赴漳州，力促陈炯明立即回粤驱桂，并声明经济上可由上海国民党本部负责支援。恰在这时，直皖战争中皖系大败，桂系认为在南方消灭援闽粤军的时机已到，8月11日，桂系通过军政府下达了进攻闽南粤军的动员令，分三路进军，以沈鸿英为总司令。这样，陈炯明才最后下

定决心回师广东。

为了使回粤能顺利进行，在出师之前，粤军着重解决三个重大问题。第一，扫荡与桂系相勾结的陈肇英、张贞、杨子明各部，解除后顾之忧。粤军总司令部决定调集第一、二军中战斗力较强的约五六千人，由许崇智指挥，对陈、张、杨三部实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双方在泉州溪尾、官桥等地激战，三部被击败，退入山区。接着许崇智约陈、张、杨三人当面言和，劝他们服从孙中山领导，并允许把较为富裕的永春等地作为他们的防地，使他们不再干扰粤军的行动。第二，解决枪弹的补给。粤军派邓仲元、吴忠信到福州与闽督李厚基协商，表明粤军回粤后，将闽西南交还闽督，以此换得李厚基支援粤军军费50万元和子弹600万发。第三，争取驻粤部队，以孤立桂系。为此，孙中山一方面致电唐继尧等，促使他们抽调在湘的滇、赣军从一个方面攻击桂军。又致电李绮庵、邓子渝，指示他们“与各路同时并起，以牵制敌之后路”。^①另派朱执信回广东，联络各地国民党旧部和各路民军，配合粤军回粤伐桂。

当粤军回粤伐桂的各种准备工作就绪之后，8月12日，陈炯明率领粤军在漳州公园举行粤军回粤讨桂誓师大会。23日，发表《声讨莫荣新电》，揭露桂系军阀在广东的种种罪行，号召“誓死杀敌，救我粤人”。^②

8月16日，粤军开始发动对桂军的全面进攻。全军分为三路：以许崇智为右翼军总指挥，率领第二军全部，由上杭以攻蕉岭、永定、大埔而趋梅县、兴宁；以参谋长邓仲元为左翼军总指

① 黄季陆编：《总理全集》下册“文电”第180页。

② 《有关陈炯明资料》，第49—50页。

挥，率领洪兆麟、梁鸿楷等部，由云霄、诏安以攻潮安、澄海、汕头；以参谋处长叶举为中路总指挥，率领李炳荣、邓本殷、罗绍雄、熊略等部，从和平进攻饶平，突破丰顺、紫金，并策应左右翼。以张醣村为兵站总监，担任后方勤务，留守漳州。^①

第一期战斗开始，粤桂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桂军占有优势。但是，桂系军阀统治广东四年，作恶多端，民愤极大，政治上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粤军则举着孙中山国民革命的鲜明旗帜，陈炯明又以“粤人治粤”和“实行民主政治”相号召，进行一场反军阀压迫的正义战争，受到广东人民和各界的拥护。所以，左翼向黄岗、澄海进击，节节胜利，不到一周，就击溃桂军军长兼潮梅镇守使刘志陆所部，于20日占领汕头，并向揭阳、潮阳追击敌人。右翼由上杭入蕉岭，在梅县近郊战斗一天，击破桂军军长兼惠州督办刘达庆所部的吕贵统领。19日，克复梅县。20日，下兴宁，直趋五华、龙川，进展亦甚顺利。中路在克复饶平、潮安后，至高坡、丰顺一带，遇桂军卓贵廷所部六七千人的抵抗，激战数日不下。后因粤军左翼已攻下汕头，右翼又攻占东江上游，卓感到退路有切断的危险，才步步后退，至河源所属石公神附近，又为杨坤如截击而全部溃败。第一期战斗，以全线胜利而告结束。陈炯明进驻老隆，设立总司令行营，委姚雨平为汕头卫戍司令，张醣村的兵站总监部由漳州移至汕头。

紧接着，粤军开始了第二期战斗，除第一军拨出部分兵力增加到右翼外，其余各部队的作战部署仍和前期一样，分兵三路前进。桂军莫荣新惊闻粤军攻占潮梅全区和东江上游，急电陆荣廷

^① 罗翼群：《记孙中山南下护法后十年间粤局的演变》，《广州文史资料》，第4辑。

从广西派兵增援，并抽调原驻海南的李根源海疆军、肇庆的林虎部至东江前线，置重兵于河源、博罗、惠阳一带，企图固守。林虎率其所部及马济一部，水陆并进，企图抗拒粤军的中路与左翼；以李根源率领海疆军，协同沈鸿英所部，企图抗拒粤军在河源一带的右翼。双方以右翼之河源、回龙和左翼的平山、马鞍的战斗最为激烈，相持达一月之久。双方经过反复争夺以后，粤军于10月16日克复河源，此后战局急转直下，22日攻克惠州。在战斗的紧急关头，孙中山早就组织的在广东各地的反桂力量，纷纷进行策应，尤其是在广州的魏邦平和李福林宣布独立，使桂系被迫撤离广州，开始向西江、粤北撤退。粤军则沿东江南北两岸前进，连克石龙、龙门、增城等地。28日，粤军攻克广州。粤军回粤取得了重大胜利。

三、席卷全省的反桂斗争

桂系在割据广东的几年中，作恶多端，弄得全省城乡鸡犬不宁，民不聊生，给广东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粤军回粤讨伐桂系军阀的战斗打响之后，立即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从军到民、从正规部队到民军、从东到西、从前方到后方的一个席卷全省城乡的反桂斗争。

除了粤军两个军兴师回粤讨桂外，民军和起义部队都直接参加了打击桂军的战斗。

国民党人徐绍桢、李绮庵军受孙中山的派遣，回到广东主持讨伐桂系事宜。徐绍桢为广东讨贼军总司令，李绮庵为海陆军总指挥，早在粤军誓师出发之前，7月15日，徐绍桢、李绮庵等在江门率领海军“江大”等舰发动起义，并组织陆军响应。准备由江门进攻广州。后因指挥舰江大号搁浅，未能成功。但已经是揭开

了讨桂战争的序幕。

广东地方派领袖、原肇军统帅李耀汉，虽然已经下了台，还是策动肇庆、钦廉一带的旧部起来，响应粤军回粤的号召，攻击桂军。

9月16日，正当粤军在东江一线遭到桂军援兵的顽强抵抗的时候，朱执信等人大力策动虎门炮台的驻军，在要塞司令丘渭南的领导下宣布独立，脱离桂系。这是在桂军的后方给予桂系第一个沉重打击。

接着，9月下旬，原桂系旗号下的粤籍将领魏邦平（广东省警察厅厅长）、李福林（福军司令，广惠镇守使），秘密地将其部队的一部分由香山、佛山等地移师广州对岸的河南。26日，在广州河南宣布独立，表示要与陈炯明一致行动。27日，魏邦平致电孙中山，表示要率所部陆军和舰队，“陈师珠江，集中鹅潭，占领中流砥柱及车歪炮台各要隘，与福军一致行动。”^①孙中山立即复电表示嘉勉，同时指出：“莫贼尚有要求，缓兵待救，我宜急击勿失。盖为我粤安全及大局计，俱不能容此丑类，以遗后患”。^②同一天，魏邦平、李福林致函莫荣新，敦促他“解除兵权，以粤省治权还之粤人，率师回桂，俾息兵祸”。^③稍后，魏、李所部进军三水，全部控制了广三路沿线，切断了桂军由西江经三水至广州的补给线。这是在桂军后方给予桂系的第二个、也是最沉重的一个打击，陆荣廷、莫荣新都顿时惊惶万状。在此前后，黄明堂在雷州、黄志桓在钦廉发动起义，使桂系后方严重不稳。在民军起义的影响下，驻阳江、阳春的桂军又倒戈，整个南路几乎都非

① 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9月30日。

② 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0月9日。

③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6辑，第93页。

桂系所有。

9月30日，驻粤滇军蔡炳寰等在琼州宣布独立，发出通电，表示要和粤军一致行动，讨伐桂系。10月1日，驻琼滇军何福昌，琼崖卫戍司令蒋超青等也宣布独立，定名为“联军援粤滇军”。

9月间，广东十六路民军司令部发布了讨伐桂系头领莫荣新的檄文：“概自桂军入粤，五载于兹，苛政暴民，擢发难数。”因而“用举义师，收回粤人自治之权，贯彻联省护法之旨。”^①与此同时，粤军义勇军总司令邹鲁，亦发布檄文，声讨桂系。^②

实在不堪桂系的压榨和统治的广东人民，当粤军提出“粤人自救”、“粤人治粤”等口号时，立即表示广泛同情和坚决支持。除了各地民军揭竿而起直接参战外，各地人民在前线和后方，普遍奋起支援粤军，打击桂军。“广东人不要打广东人，也不要替别人打自家人”，成为各地时有所闻的响亮口号。这个口号虽然有其片面性，但确是起了动员人民打击桂军的作用，也启发桂军中的粤籍官兵发生动摇，以致倒戈起义。

9月6日，广东主要社团召开秘密会议，经讨论决定：“（一）对于粤军，暗派代表前往接洽，并致粤人全体欢迎之意；（二）对于桂派，拟上书劝告，履行陆荣廷以广东还诸广东人之宣言。（三）对于粤籍官长，请从速表示态度，勿再猜疑，并责成保护粤中治安。”^③

9月28日，广东学生联合会发出通电，欢迎陈炯明回粤，提出八项政治主张：“（一）惩办岑、陆、温、杨诸祸首；（二）没收各祸首及其他关系人之财产，拨充西南大学及省教育实验经费；（三）民选

^{① ②} 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0月1日、9月29日。

^③ 《广东文史资料》第43辑，第133页。

省长；（四）取消第二届伪省议会；（五）恢复民意机关，实行地方自治；（六）废督裁兵；（七）禁绝烟赌，灭除苛捐；（八）军权由陈总司令统率，维护粤省治安。”^① 10月7日，广东学联致电广州领事团，请勿容留桂系军政人员逃匿领事馆，提出：“凡有现任军官政客投请贵领事保护者，均请拒绝。”^②

此外，旅外的广东人民也用各种形式，揭露桂系罪恶，支持讨伐桂军。

9月2日，旅沪广东同乡会、广东善后公会致电湖南谭延闿，敦促湘军进粤讨桂。4日，旅沪广东公民大会李远才等5842人致电陆荣廷、莫荣新，历数两人祸粤罪行。要求陆、莫“举粤省军权政权财权还之粤人。”^③ 8日，旅沪广东公民大会致电给广州各团体，提出共同驱桂。

9月15日，旅京广东公会召开紧急会议，议决三事：一、请中央勿助桂压粤；二、声明岑春煊、陆荣廷不能代表广东省；三、声明不承认陆荣廷为两广巡阅使。^④ 10月5日，旅京广东公会致电陈炯明，反对与桂系妥协。

工人、农民、学生等各界群众也运用各种形式反对桂系军阀，配合粤军回粤的斗争。

10月19日，粤汉铁路广韶段机车工人全体罢工，不愿为桂系运输军队，并且声明“如有违抗众议，仍然行车者，誓以炸弹手枪对待。”^⑤

10月25日，广州30余校，为驱逐莫荣新离粤，集会商定举行

①②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6辑，第93、98页。

③ 《申报》1920年9月10日。

④ 《广东文史资料》，第43辑，第134页。

⑤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6辑，第103页、第105—106页。

罢课，声明“莫氏一日未去粤，则各校一日不开课”。^① 各校校长表示支持这一正义行动。

同日，广九铁路司机和所有机器工人举行罢工，与粤汉铁路工人采取一致行动。并且表示，如果桂军不离粤，两路不行车。

8月上旬，美洲的华侨致电孙中山，支援讨伐桂系和北洋军阀，并表示“愿竭全力，为公后盾”。^②

由于广东各界群众纷纷参与反桂斗争，使桂系军阀陷入了人民群众的包围之中。

四、桂系军阀退出广东

在粤军回粤的打击下，桂军全线溃退。进入10月下旬以后，桂系头目就纷纷撤离广州。到了这时，桂系还为粤军和孙中山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制造种种困难。

10月24日，桂系以岑春煊、陆荣廷、林葆怿、温宗尧四总裁的名义，宣布撤销护法军政府。26日，莫荣新又以广东督军名义，宣布取消广东独立。31日，北京政府宣布南北和平统一。所有这些，目的是制造舆论，混淆视听，使人们以为粤军回粤后建立的政权是非法的。

对此，孙中山立即予以驳斥。10月31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四总裁联名通电，根本否认北京政府的所谓“南北和平统一”，声明“军政府依然存在”，希望国民和友好国家“勿为所欺”。^③ 11月9日，孙中山又与唐绍仪、伍廷芳联名通电，号召西南各省各军坚持护法救国主张，“联合一致，以树全国之模

①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6辑，第103页、第105—106页。

②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6辑，第83页。

③ 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1月2日。

范”。①为了继续行使军政府职权，11月10日，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废除广东督军职位。11月25日，孙中山偕唐绍仪、伍廷芳等离沪返粤。29日，在广州举行重组军政府后的第一次政务会议，推定各部人选。孙中山自兼内务部长，唐绍仪兼财政部长，伍廷芳兼外交部长，唐继尧兼交通部长，陈炯明兼陆军部长，汤廷光为海军部长，李烈钧为参谋部长，徐谦为司法部长。12月1日，四总裁再次联名宣言，宣布军政府继续执行政务，并提出施政方针。这一系列的措施，表明了在广东重新建立了与北洋军阀对立的革命政权，粉碎了桂系和北洋军阀所设置的重重障碍。

桂系在军事上仍作垂死挣扎。他们沿西江和北江撤退，步步设防，阻止粤军的前进。为了将桂军彻底驱赶出广东，粤军于10月底、11月初陆续进驻广州及其附近地区以后，即进行整编。整编后的粤军编制及主要负责人为：

粤军总司令：陈炯明

参谋长：邓仲元

参谋处长：叶举

总参议：黄强（兼）

副官处长：翁式亮

军务处长：张蔚村

军需处长：吴小铭

前方兵站站长：钟秀南

秘书长：张国华

第一军军长：陈炯明（兼），辖两个师、六个独立旅和五个

① 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1月10日。

路。

参谋长：邓仲元（兼）

第一师师长：邓仲元（兼）

第二师师长：洪兆麟

独立旅旅长：邓本殷、翁式亮、杨坤如、熊略、陈炯光、李炳荣

路司令：李福林、钟景棠、黄大伟、罗绍雄、黄明堂

第二军军长：许崇智，辖四个旅

参谋长：蒋介石

旅长：吴忠信、蒋国斌、谢文炳、关国雄①

粤军在广州稍事休息以后，即分两路追击桂军。由于魏邦平、李福林两部起义后控制了广三沿线，桂军只能集中从粤汉路撤退。他们在清远一带作了重点设防，但在粤军的强大兵力攻击下，迅速崩溃。于是，分兵两路：一路由马济、沈鸿英率领，继续沿粤汉路北撤，粤军乘胜追击，桂军无心恋战，溃不成军。“沈鸿英取道乳源、星子，逃回广西八步。”②另一路由林虎、韩彩凤率领，由清远转四会退至肇庆。由三水向肇庆挺进的粤军，分水陆两路追击。水路是利用海军沿西江截阻桂军的退路；陆路则从桂军后面尾追。桂军退到肇庆峡以东广利附近的莲塘峡，遭到粤军截击，韩彩凤部被击溃。林虎在任肇罗阳镇守使期间，曾在肇庆附近筑有永久性的工事。桂军以为可以利用这些强固工事，固守肇庆。但是由于桂军在北江清远、四会失利，粤军在占领四会之后，即将粤军一部由四会所属石狗向西江转移，而粤军

① 《广东文史资料》第31辑，第26—27页。

② 《沈鸿英传略》，《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1辑，第317—318页。

海军又在肇庆峡外游弋，对桂军形成了前后夹击的形势。11月15日，粤军占领肇庆。

桂军退到肇庆上游30公里的绿步圩时，后军尚有1万余人没有通过。而他们的退路又被粤军切断。这时，空中有粤军飞机一架助战，江面又有粤海军监视，对1万多桂军构成了海陆空包围的形势。桂军第一次见到飞机，十分害怕，顿时陷于极大的混乱。桂军由司令韩彩凤和统领黄业兴指挥，用“发洋财”来鼓励士兵卖命，始终无法击退粤军突出包围。后来，由于黄绍竑、李宗仁等部的支援，才冲开粤军的包围圈，撤往梧州。^①

11月17日，在南路起义的粤军占领廉州。21日，陆荣廷发出通电，表示桂军要全部退出广东。他无可奈何地说：“荣廷顾念邻交，不忍地方糜烂，当通电莫督，主张退让，交还督印，退出省区。”“所有驻粤各军，现在已经一律调出粤境，此后粤省地方治安，即由粤人负责。桂省自收回军队，以后自当酌量改编，极力收束。……嗣后，一切政争党系，概不与闻。”^②以陆荣廷为首旧桂系在广东的统治，从此结束。^③

① 黄绍竑：《旧桂系的兴灭》，《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197—198页。

②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6辑，第121页。

③ 陆荣廷退回广西之后，不甘心失败，又与北洋军阀勾结，企图卷土重来。1920年12月29日，北京政府任命陆荣廷为粤桂边防督办（高祖荫主编的《中华民国大事记》说是督办粤边防务），促陆进犯广东。陆荣廷以林虎、沈鸿英、马济、韦荣昌分四路攻粤。1921年5月，陈炯明、许崇智率领粤军入桂讨伐陆荣廷，打败桂军，陆荣廷被迫于7月17日在南宁通电辞职，退往龙州。10月经越南转赴上海。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陆又在旧部的拥戴下，于1922年9月潜返龙州就广西边防督办。1923年11月，陆又在南宁就北京政府任命的广西全省善后总办。后在沈鸿英、李宗仁、黄绍竑等部的进击下，溃不成军，于1924年9月13日通电下野。陆依靠搜括的民脂民膏，在上海、苏州过着寓公生活，于1928年11月病死于上海。

第四章 陈炯明的叛变和割据粤东

第一节 陈炯明的蜕变

一、革命政权的支柱

1920年8月，陈炯明率领的粤军，奉孙中山的命令，由福建回师广东驱赶桂系军阀，在广东各地的各派反桂力量的配合之下，进展神速，10月28日，粤军克复广州。

11月10日，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1月29日，在广州举行的重组军政府后的第一次政务会议上，推陈炯明为陆军部长。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又任命陈炯明为陆军部长兼内政部长。在这个时期的广州革命政府中，陈炯明担任了四个以上的军政重要职务，①成了革命政权的重要支柱。

孙中山这么倚重陈炯明，把陈炯明当作革命政权的支柱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在此以前，陈炯明在孙中山领导的历次革命斗争中，均建立过大小不同的功绩；在这个时期，他又是稳定广东政局、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人物。

① 统一广西以后，孙中山又任命陈炯明为广西善后督办。

陈炯明在参加同盟会以前，在广东咨议局提出禁赌等对社会有益的议案，在广东社会上已颇负盛名。加入同盟会之后，参加了“三·二九”之役，后又在惠州组织民军起义，对“广东光复”起过积极的作用。因此，广东军政府组成后，被推为副都督（后曾任代理都督），他与胡汉民一起，推行各种革命措施，为稳定光复后的广东政局尽了大力，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①民国初年（1912—1913）广东政权建设成绩斐然，革命、民主风气较好，陈炯明应该占有一份功劳。在讨袁护国中，陈炯明率领的民军同朱执信为首的中华革命军一起，成为广东讨龙战争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把龙济光赶出广州的这场斗争中，由于他们的存在和发挥威力，使进步党和护国军不能独占优势。

在护法运动中，由于孙中山的积极争取，从朱庆澜、莫荣新手中接过广东警卫军20营，组成援闽粤军。陈炯明被任命为援闽粤军总司令。由于孙中山的全力支持，邓铿、许崇智的大力协助，援闽粤军在陈炯明的领导下于粤东和闽南取得了很大的发展。部队由5000人扩展到2万多人，特别是经过相当时间的训练和教育，部队的素质也有很大的提高，成为一支颇具战斗力的队伍。

粤军在闽南驻扎期间，建立了以漳州为中心的“闽南护法区”，也获得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好评。美国驻华公使馆在1919年11月23日给美国政府的一份报告中说：“漳州到处可见建设的显象，城中修建一大公园，公共菜场及屠宰场也均已修建。城墙拆除改成道路，成立妓女户特区，道路拓宽、新屋不少、街道清

^① 有关陈炯明在辛亥革命以前的事迹，参见谢文孙(Win stontisie!)：《一个军阀的思想和理想：陈炯明(1878—1933)》，载于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的《中国论文集》，第十六期，1962年出版，第200—210页。

洁、治安良好。美国侨民对陈之施政也均引以为荣。”漳州“建设确系突飞猛进，政府支出来自税收，人民虽负重税，但看见施政成果，也感满意，显然相信南方政府有改革政治的决心。”^① 美国驻华使馆这个报告，应该看成是符合事实的。

漳州的建设值得注意的是文化方面。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在朱执信等人的协助和推动下，陈炯明为了促进军队和文化的建设，对于各种新思想，都采取提倡的态度。于是《闽星》半周刊和《闽星日刊》分别于1919年12月1日及1920年元旦面世。这两个报刊，都发表了一些宣传各派社会主义学说（包括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等），介绍俄国革命，介绍“五四”以后文化运动的发展等文章，在当时的知识界中享有一定的声誉。1920年4月，苏俄路博将军由孙中山介绍到漳州访问，可能也与漳州在新文化运动方面所发挥的影响有关^②。

应当指出，漳州建设的成就，主要应归功于当时奉孙中山命到漳州协助陈炯明的朱执信、廖仲恺、戴季陶、胡汉民等人^③。当然，作为粤军及“闽南护法区”领导人的陈炯明，其功也不可没。正因为如此，陈炯明在粤军和国民党中央均享有相当的威望，

① 美国国家档案局《美国公使馆报告》(2255 War Department)。此处转引自康白石：《陈炯明传》，香港文艺书局1978年9月版，第15—16页。关于康著《陈炯明传》一书，无论从观点到材料，错误比比皆是，我们将在另文中进行评论。

② 据蒋永敬的《胡汉民先生年谱》认为，到漳州访问的不一定是“路博将军”，而是当时到上海晤过孙中山的两个苏俄军人之一，即普特波夫将军和普卜夫上校。此说可供参考。

③ 关于对漳州建设的情况的评价，可参考吕芳上：《朱执信和中国革命》，第299—302页。

奠定了他后来成为仅次于孙中山的实权人物的基础。①

粤军回粤之役，由于孙中山的正确领导，由于全军官兵“打回广东去”的思想明确，英勇奋战，还由于广东各地反桂力量在敌后的配合，使粤军能够在短短的两个多月中，战胜了强大于自己一倍以上的桂军。当然，作为全军统帅的陈炯明，在这场战斗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亦应该予以肯定。正如孙中山所说：“竞存此番回粤，实举全身气力，以为党为国，……我望竞兄为民国元年前之克强，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我即以当年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②

根据以上的简略事实，孙中山对陈炯明的器重，把他看作革命政权的重要支柱之一，完全是顺理成章的。至于孙中山回粤重建军政府以后，也确是百废待举。广东被桂系军阀蹂躏了多年，社会治安和各种建设，均亟宜展开。桂系退回广西，但仍对广东虎视眈眈，必须统一两广，才能有巩固的革命基地；特别重要的是还需进行北伐，以便统一全国。要完成这些任务，孙中山认为陈炯明应该是他的主要助手之一，因此，对陈炯明又寄以极大的期望，所以任命他担当起如此众多的要职。

事实上，陈炯明在回粤以后，也曾在一定程度上起过孙中山助手的作用。

在政权建设方面，陈炯明以广东省长的身份，做了不少工作，其中有些也取得了成绩。

陈炯明被任命为广东省长以后不久，即下令于1920年12月1

① 以廖仲恺为例，对陈炯明的好感看来主要是产生于漳州时期。廖在漳州以及后来粤军回粤时在香港发给孙中山的函电，均给陈炯明以颇高的评价，多次建议孙中山委任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参见《双清文集》上卷，第376—379页）。

②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97页。

日起，禁绝一切赌博，这项措施，受到广州市人民的热烈欢迎。还在11月23日，当市民得悉这项禁令以后，立即举行了有3万多人参加的盛大游行示威，高举“赌博不禁，广东终无安宁”等旗帜，并推出代表会见了陈炯明。^①为了使禁赌有效地施行，陈炯明还制定了《广东赌博治罪暂行章程》公布执行。

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继续受到陈炯明的重视。他回粤后，很快就支持被桂系迫令停刊的报纸复版，还从经济上大力支持宣传社会主义和新文化运动的《广东群报》。《广东群报》后来成为广东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报，为共产主义运动在广东发展作出过贡献。1920年底，陈炯明又聘请陈独秀来粤任教育委员长，培养了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人才。

对广州市市政建设，陈炯明也给予注意，他首先建议制定《广州市暂行条例》，并审定公布。随即委任孙科为市长，组织市政厅。在孙科的领导下和陈炯明的支持下，广州市市政建设在1921年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绩。例如：制定了各机关、部门的暂行条例，使各项工作的开展有章可循；完成和即将完成的马路，相当于原有马路的两倍；建成了第一公园并开始建筑第二、第三公园及东较场体育场；充实了原有的图书馆及新设立了图书馆、市民大学、教育博物展览会，加强了社会教育，等等。^②

实行地方自治，是陈炯明在广东省长任内最为重视的问题。他回粤以后，即组织人员制定“广东自治条例”、“广东暂行县自治条例”、“广东暂行县长选举条例”、“广东暂行县议会议员选举条例”等，并于1921年4月公布推行。首先实行县长“民选”，每

^① 原载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1月22日六周年纪念增刊，此处转引自《革命文献》第五十一辑，第503—508页。

^② 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1月22日增刊，参见《革命文献》第四十九辑。

县选出三名，由省长确定一人为县长；至同年11月，经陈炯明审定公布后就任的有84县的县长。①

在军事方面，陈炯明继续率领粤军，在进军广西的战斗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对统一广西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所有这些，都是陈炯明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所作出的或大或小的功绩，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但也应该强调指出：陈炯明这些成就大都是和他的割据野心一致，或者是在与革命利益没有根本冲突的情况下取得的，其中有些是违背他的主观愿望被迫做成的。陈炯明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做了很多对革命事业不利或消极影响的事情，因此，对陈炯明的这些贡献，不可作过高的估计。

二、割据野心的膨胀

陈炯明是一个自私心很重的人，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开始，就不是一个好的革命者。因此，当他取得相当权势的时候，他的割据野心便开始形成并发展起来。

早在1912年辅助胡汉民在广东政权建设中取得成绩的同时，陈炯明就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并同袁世凯勾勾搭搭，企图去胡以自代。1913年6月，陈炯明就任袁世凯委任的广东都督。时孙中山决定“讨袁”，曾多次函电请陈炯明予以支持，陈炯明对此持消极态度。始以“内部不一致，兵力还薄弱”为借口，拒绝参与，继以“广东兵力单薄，不能首先发难”应付。②当江西、江苏、安徽等

① 《革命文献》第五十一辑，第499—501页，有关陈炯明在任时对广东之贡献，还可参阅谢文孙：《一个军阀的思想和理想》，第214—219页。

② 朱子勉：《辛亥革命后广东政局的演变》，《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378页。

省相继宣布独立讨袁以后，陈炯明才不得不于7月18日宣布广东独立。但在行动上又没有作出相应的积极部署，对邓仲元、朱执信等关于全力防御龙济光东下的正确意见不予采纳，以致不出半月，广东的讨袁便宣告失败。“二次革命”的失败，表明了陈炯明的军事封建割据思想——即军阀思想，开始形成。正如孙中山后来在评述陈炯明时所说：“虽元二三际，阴谋左计，显露端倪”^①。

在陈炯明看来，当时首要的关键是巩固其在广东的统治地位，以便和国内各派争一日之短长；至于什么“革命”、“民国”等等，统统都是“空谈”。所以，到了1920、1921年，陈炯明仍然对癸丑失败表示十分痛惜。说什么“癸丑之败，……我广东人民遂丧失自治之权利。”^②“癸丑之役，我不欲轻于一掷，徒以党议关系，不得不尔，至今思之，犹有余痛。”^③由此可见，陈炯明后悔讨袁，对于“地盘”、“实力”的重视，已置于“革命”之上了。

“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炯明逃到南洋。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继续讨袁。孙中山曾再三去信劝陈炯明入党，他都加以拒绝。稍后，他又联合一批对讨袁丧失勇气的国民党人，在新加坡组织了所谓“水利促成社”，同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唱对台戏。当袁世凯丧心病狂地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时，陈炯明竟致电袁世凯，表示愿意返粤招募义勇兵当外交后盾。^④所以，当时孙

① 孙中山《致国民党员书》（1922年9月18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49页。

② 《有关陈炯明资料》，广东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第65页。

③ 同上书，第85页；又根据胡汉民在《六月十六之回顾》一文中说：陈炯明1921年曾说：“民国二年，展堂一定要出兵反对袁世凯，实在害了我，如果那时不反袁，广东由我干到现在，岂不是什么都好了吗？”

④ 鲁直之等：《陈炯明叛国史》。

中山愤怒地谴责：“陈竞存于本党所为，多所抨击，此人险诈，难与共事，所谓通融者，直逛语耳。”^①

“护国战争”爆发后，1916年1月6日，陈炯明在惠州发动起义讨袁，组成了“讨逆共和军”，自任总司令。在朱执信领导的中华革命军的配合下，曾一度攻占惠州，声势颇大。鉴于过去陈炯明对“地盘”和“实力”的过分看重，朱执信特地赠诗一首给陈炯明，表现自己只是为“讨袁”大业，绝无与他争广东“地盘”之意。^②朱执信当时“赠诗”虽属“小事”，但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陈炯明的割据思想有所发展。

援闽粤军组成，陈炯明当了总司令以后，他的“地盘”和“实力”思想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了行动指南。陈炯明在粤东驻扎了几个月，经孙中山多次催促，迟迟不向福建进军。进驻闽南以后，粤军得到进一步的扩充，编成两个军。陈自己的第一军实力强，驻地富裕，部属多是陈的亲信。许崇智的第二军则实力较弱，驻地近于前线。在“闽南护法区”的建设中，除了如上所述的好的一面外，军阀统治割据的痕迹亦随处可见。在粤军的一些驻地，为了筹措军费，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甚至种烟贩毒。例如：“仙游为南军管辖，仙游农田前栽种甘蔗、小麦、烟草，现多改种罂粟。”^③有些报纸甚至揭露说：“被粤军或土匪占据各县”，“所有田亩均已遍种烟苗。”^④由于陈炯明的苛政，也曾引起当

① 孙中山：《复叶独醒论外侮不足虑袁氏即失败函》（1915年11月23日），《国父全书》，第598页。

② 参见吕芳上：《朱执信和中国革命》，第194页。朱执信的七律诗的后四句是：“复说屠羊王返国，逢君跨马我担簦，暂同鮆涸相濡沫，莫学狐疑屡听冰。”

③ 《申报》，1919年4月19日。

④ 《晨报》，1919年1月21日。

地群众的反抗。1919年6月18日，符仔会首领蔡振声领导的农民暴动，以“驱逐陈炯明回粤”为号召，出示“除暴安良，公平交易”的文告，攻入漳州，“杀毙龙溪县粮差五、六人”。由于寡不敌众，暴动很快就被镇压，“当场被击毙者二十余人”，其余被捕者“一律枪毙”^①。

1920年粤军回粤之役，因为同陈炯明扩充“地盘”、“实力”的指导思想没有矛盾，他还能积极对待，并对革命事业有所建树。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陈炯明还是把“地盘”、“实力”摆在第一位，以致行动迟缓，临事犹疑不决，在战争遇到挫折时垂头丧气，使粤军的进攻多次贻误戎机。

1920年冬，孙中山回粤以后，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孙中山认为，要“根本解决”中国问题，就必须以革命手段，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仅仅是“护法”还不能达此目的，因为“护法不过矫正北京政府之非法行为”，“况护法乃国内一部分问题，对内仍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对外亦不发生国际上地位的效力。”所以，“广东此时实有建立正式政府之必要。”^②孙中山关于建立正式政府的意见，得到了海外华侨和国内爱国人士的拥护。1921年4月7日，非常国会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广州市群众十数万人热烈庆祝，并结彩游行。

陈炯明回到广东以后，“地盘”、“实力”都扩充了，割据广东（甚至是两广）的野心开始膨胀。因而，对于组织正式政府和选举总统，他从一开始就竭力反对。他先是散布必须“先巩固广东基

① 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7月8日。

② 《国父全集》，第三册，第185页。

础，选举总统，非常危险”的论调。^①然后又指使属下军官，向非常议会提出要求答复的质询：“一、南方选举总统，无异自树目标，一旦北方来攻，何以御之；二、广东现时军实，是否充实，饷项是否丰饶，果有战事发生，究竟能支持几时。”^②2月14日，孙中山在军政府政务会议讨论收回关余问题时，提出组织正式政府，以利对外交涉。陈炯明当场即表示反对，说什么“但要自己内力充实，外人之承认与不承认，不必过问，亦不成问题。”^③稍后，又公开发表谈话，假意说：“不忍见孙先生失败，故不赞成速选总统。”^④更加恶劣的是，一些粤军军官，在陈炯明的纵容下，竟然使用“劝阻”、威胁、恐吓等等手段，以阻挠总统选举及就职的进行，以致孙中山的就职典礼，也延迟了近一个月才举行。

十分明显，建立正式政府的整个进程，表明陈炯明的割据野心同孙中山要求继续革命的矛盾已经尖锐化，廖仲恺被囚期间所写的诗句“隐忧已肇初开府”，正是指此。^⑤不过，由于陈炯明在两广的地盘仍未巩固，又因为孙中山对陈炯明的信任依然如故，正式政府成立后陈还增加了内政部长的兼职；孙中山在稍后又向陈炯明表示，将来北伐成功与否，他都会离开广东，广东交由陈炯明主持。这样，陈炯明同孙中山的矛盾才不致于公开破裂的地步。

^① 《有关陈炯明资料》，第184页；参见陈福霖《孙中山和国民党改组的起源》，载于陈福霖与艾素（Thomas H·Etzold）合编：《二十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和革命》，纽约：新观点出版社，1976年出版，第21—22页。

^② 《有关陈炯明资料》，第184页。

^③ 同上书，第76页。

^④ 《有关陈炯明资料》，第81页。

^⑤ 《双清文集》上卷，第396页。

然而，孙中山建立正式政府的主要目的，在于出师北伐，统一全国。这个目标，同陈炯明当时以“联省自治”来巩固广东的主张，显然是不可调和的。^①因此，他竭全力反对孙中山北伐。还在进军广西以前，陈炯明在一封通电中就谴责继续使用武力，借以影射孙中山以武力统一全国的北伐不得民心：“窃思民国十年，变乱迭起，穷兵黩武者，其败尤速。虽以袁段之势力，且不能以力征经营天下，而自取覆亡。……今日无论南北，决无袁段之财力兵力，苟非至愚，更无有愿师承其故智者”^②。1921年7月，广西全省统一，孙中山先后派胡汉民、蒋介石赴南宁同陈炯明商讨北伐大计，陈“借故敷衍”。^③10月，孙中山决定亲自率师由桂林出发北伐，在赴桂林前，亲到南宁劝说陈炯明支持北伐，又遭陈炯明拒绝。11月中旬，陈炯明竟然在广州公开发表反对北伐的谈话：“余之所见，以为北伐者云，尚非其时机也”；“虽属传报孙中山部下众皆从事北伐之计划，唯余并无所知。”^④至此，陈炯明已将他反对孙中山北伐的主张在社会上公开了。

其实，陈炯明这时已同南北军阀加紧勾结，以实现其割据广东(或两广)的野心。早在回粤之初，陈炯明就同湖南督军赵恒惕、江西督军陈光远、浙江督军卢永祥、云南督军唐继尧等往来，共同叫嚷要推行“联省自治”。如上所述的陈炯明在广东施行的省自治、粤自治计划，实际上是他的“联省自治”的组成部分。他认为

^① 陈福霖强调孙中山和陈炯明两人政见之差别，认为孙中山力主统一中国，而陈炯明则提倡广东自治。见陈福霖：《孙中山和国民党改组的起源》，第20—26页。又参见谢文孙：《一个军阀的思想和理想》，第219—239页。

^② 《有关陈炯明资料》，第92页。

^③ 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258页。

^④ 广州《七十二行商报》，1921年11月16日。

只有“首先巩固广东的省自治，进而再图联治。”^① 1921年6月5日，陈炯明在同吴宗慈的谈话中就明确表示：“中央政府之组织，足以扰乱地方，今惟有联省自治，各省办各省的事。”^② 平定广西后，陈炯明策划“联省自治”的活动更加积极，同南北军阀的往来更加频繁。10月31日，广州政府参谋部“据特别报告，靳翼青（云鹏）派梁士诒、屈映光等与陈竞存、吴佩孚二人接洽，图政治上结合，以解决中国南北分峙之局，竞存将派陈觉民为全权代表赴鄂，接洽一切。”^③ 又据11月16日唐继尧致张伯群电中透露：“竞存派其亲信要人来港，密商实行助我办法。如我军移动有阻，决以全力援助，并确实担任饷项。其内情：一惧孙、李（烈钧）得势，彼位不安；二欲滇军离桂，事权统一。虽亦自身利害使然，而此时则与我以莫大之利。已派要员，星夜密赴南宁，与陈接洽，接收款项。”^④ 粤海关的情报也证实：“陈炯明派其私人代表朱兆熊前往北京与北洋政府频频接触。^⑤ 凡此种种，充分表明陈炯明野心的膨胀，到1921年冬，同孙中山的矛盾已达到了尖锐冲突的地步。公开破裂——即叛变倒孙，只是时间问题。

三、武装叛变

1921年11月上旬，陈炯明由南宁返回广州，实际上是开始作

①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567页。

② 吴宗慈：《护法计程》，《革命文献》第五十一辑，第517—518页。

③ 同上书，第564页。

④ 云南档案资料。此处转引自孙代兴：《孙中山护法运动和滇系军阀唐继尧》一文。

⑤ 《粤海关情报档案资料》（1922年2月6日条），此处转引自朱荣基、王美喜：《陈炯明叛变前半年的活动》，西南军阀史第四届学术讨论会论文，油印稿。

武装叛变的筹划：加强同各有关方面的联络；觅寻有利时机。

与此同时，孙中山统帅的北伐军亦由梧州移师桂林，12月4日，在桂林组织大本营，准备取道湖南，大举北伐。当时参加北伐部队的有：粤军第二军许崇智部、福军李福林部、滇军朱培德部、赣军彭程万部、黔军谷正伦部，共约3万人。而陈炯明率领的粤军第一军，除邓仲元在他自己的第一师抽出三个营组成大本营警卫团外，全不参加。相反，陈还采取各种手段，破坏北伐的进行。

12月底，由陈炯明署名发起，拟于1月中旬，在桂林开一次西南各省全权代表的会议，讨论“会师计划，及饷项接济之各种办法”，孙中山对此极表支持。不料各省全权代表云集广西，而广东则始终不遣代表前往，致令各省代表甚为不满，谓广东为此次通电发起人，今竟不派人与会，既表现陈对北伐无诚意，又表现政府无能为力，孙亦莫能自辩。^① 陈炯明的这一动作，实际上是他破坏北伐，并败坏孙中山名誉的一个步骤。

1922年2月3日，孙中山下令北伐出师，由李烈钧率部攻江西，许崇智率部出湖南。中旬，由桂林出发之北伐军经过全州，进入湖南边境。这时，与陈炯明勾结的湘督赵恒惕，表面上作出欢迎之意，暗中却假造地方团体名义拦阻北伐军，唆使部属将领联名反对北伐军入境。^② 陈炯明破坏北伐最为恶毒的手段是断绝军饷。孙中山决定北伐之初，曾同陈商讨饷项问题，陈答应负后方供应之责。后孙中山至南宁同陈会谈，提出“大军出动，子弹

^① 上海《民信日刊》，1922年5月26日，此处转引自《革命文献》第五十二辑，第97页。

^② 参见胡汉民：《六月十六之回顾》，另据《民信日刊》（1922年5月16日）的报导说：“陈乃盗用粤军中湘籍将士名义，密电湘中将士，嘱其反对假道北伐，继见效力甚微，乃径用己名电赵，嘱其中立，赵于是有来电阻止之事。”

供给、米粮之济助，每月须请协济。陈允至少一月拨50万元”^①。但是，北伐大军数万人在桂林驻屯近半年之久，仅靠入桂时由廖仲恺从广东省银行提取的200万元纸币来支持。而陈炯明只拨给北伐军20万元（实际上仅7万元辅币）^②。陈炯明控制了广东全部财政收入供自己部队大量开支，还如上文所说秘密协助滇系军阀唐继尧以军费，唯独对孙中山的北伐军饷拒绝供给。其破坏北伐的用意，昭然若揭！他说什么“广东之钱，只能办广东事”，^③“北伐军饷，不能全由广东负担，滇桂军饷，由滇桂两省负责一部分，粤军军饷，由广东负责”^④等等，统统是掩盖阴谋破坏的遁词。

3月21日，坚定拥护孙中山、支持北伐，负责安定后方和担任供应项的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仲元，在广州被暗杀。凶手是陈炯明的亲信部将所派。至此，孙中山所率领的北伐军，在广州后方就完全失去可靠的支持。

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孙中山遂于3月26日在桂林大本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先行回师广东，改道江西出师北伐。^⑤本拟秘密行军，以避开陈炯明的阻挠。但被粤军第二军旅长谢文炳密电告陈，谓孙回师将对陈不利。陈大为惊恐，欲以武力阻止北伐军回粤，但其主力还远在南宁、桂平一带，而北伐军主力已于4月12日抵达梧州。陈遂急电胡汉民探询班师用意，并假派廖仲恺到

^{①②} 上海《民信日刊》1922年5月26日。此处转引自《革命文献》第五十二辑，第97页、第98页。

^③ 1921年6月对吴宗慈语。见吴宗慈：《护法计程》。

^④ 见胡汉民：《悼念邓仲元先生》。

^⑤ 据《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2年1月30日，蒋介石、胡汉民与孙中山就曾商讨过将大本营自桂林移韶关问题。

梧州迎接。廖仲恺到梧州后复电陈炯明，说明此次北伐军回粤，“意旨在添调军队图赣，并谋饷弹补充之确实”，“此外无他希冀”，并申明“桂林调归各军，经三水、潖江口，集中韶、雄，宜于一星期内予以通过，俾勿别生枝节。”^①

4月16日，孙中山返抵梧州，电召陈炯明赴梧磋商改道北伐的有关事宜，陈拒不前往。

4月20日，孙中山返抵肇庆，确定免去陈炯明的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职，保留陆军部长一职，节制两广军队，同时委任伍廷芳为广东省长。还在命令公布以前，廖仲恺从肇庆赶赴广州，力劝陈炯明即赴肇庆向孙中山解释，并嘱罗翼群速电胡汉民转请孙中山考虑“收回免职成命，以免发生变故。”^②但陈炯明仍然拒绝前往肇庆同孙中山会面。

与此同时，陈炯明于4月21日离开广州，返回惠州，其亲信部队也一律撤出广州，布防于石龙、虎门一带。并密令在南宁的粤军前敌总指挥叶举，迅速率主力回师广州，以对抗孙中山。于是，叶举等粤军将领于21日在南宁发表通电，决定还师广州。

22日，孙中山抵达广州。^③这时，双方火拼已达到一触即发的地步。拥护孙中山的一些将领，主张先消灭陈炯明的叛逆军队，安定后方，再行北伐。孙中山一则以北伐为重，要北伐军不必进入广州，径由三水、清远开赴韶关，尽快出师北伐；二则仍

① 《双清文集》上卷，第389页。

② 罗翼群：《记孙中山南下护法后十年间粤局之演变》，《广州文史资料》第四辑，第25页。据李睡仙《陈炯明叛国史》的记载是，廖仲恺携带孙中山的免职命令返回广州。

③ 《粤海关情报档案》记载，孙中山返抵广州的日期是4月23日上午11时，可供参考。

希望陈炯明回心转意，支持北伐，就可避免互相残杀，以伤元气。因此，对先消灭陈部的意见并不接纳，只派人收回海军舰艇，由温树德率领，坐镇广州，便于5月6日离穗去韶关誓师北伐。孙中山的这个措施，使广州后防空虚，给陈炯明的叛变予以可乘之机。

5月上旬，叶举等率陈军主力陆续开回西江及广州一带，实际上已完成了对广州的军事控制。8日，叶举等陈部将领联名要求孙中山复任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及粤军总司令，还要求免胡汉民的职。还煽动部队到财政厅索饷闹事，后又到广东省银行“闹兑现”，造成了挤兑风潮，使广州社会秩序大乱。事实表明，陈炯明实行武装叛乱已是不可避免。

但是，孙中山依然采取忍让态度。此时，北伐军已从韶关出师江西，节节胜利，连克龙南、南安、信丰等数城。孙中山在韶关任命陈炯明以督办两广军务职，节制调遣两广军队，陈炯明拒不就职。孙中山不得不于6月1日由韶关仅仅带领警卫团的一个营回到广州，以便用自己的威望对陈炯明部进行安抚。孙中山这时还表示：“我以至诚待人，陈炯明是不会害我的。”^①直至6月12日，孙中山在记者招待会上还希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日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若陈家军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②孙中山的主要助手之一，代理财政部长廖仲恺，当时是孙中山在广州后方的总负责人，亦站在孙中山同一立场上，极力调和孙陈矛盾。直至5月底6月初，陈炯明的部队已完成了控制广州的态势时，他还认为陈部只是要求恢复陈炯明的职

① 马湘：《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577页。

② 《有关陈炯明资料》，第170页。

务，“尚无其他举动”^①。至叛乱的风声略有闻之际，廖仲恺依然毫不在意地说：“省城有海军与三师，宵小必不敢妄作。”^②总之，孙中山和廖仲恺一直对争取陈炯明抱有幻想，因此，当陈炯明一旦发动叛乱，他们就陷于毫无抵御的境地。

6月上、中旬，孙中山还多次派代表前往惠州陈炯明处及白云山总指挥部叶举处劝导，力图制止事态的发展，汪兆铭、马君武等要人也都出面规劝。但陈炯明这时已布置妥当，遂一意孤行。13日，陈在惠州秘密下达攻击孙中山的命令。14日，诱廖仲恺至石龙拘押，随即解回广州石井兵工厂囚禁，至8月18日才释放。同时，陈在石龙召开了高级将领会议，具体部署叛乱的行动。15日，陈的部将叶举等发出通电，要孙中山与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同时下台。与此同时，叶举、洪兆麟、杨坤如等在白云山总指挥部，部署凌晨三时围攻孙中山住地观音山粤秀楼及山下总统府的行动。他们竟然提出以20万元的重赏准备奖给杀害孙中山的官兵，并许诺叛变成功后可以在广州大掠三天。

15日下午起，已接二连三地有人向孙中山报告陈军今晚会有“不轨行动”，请孙中山避开。孙中山一直以为是谣传，泰然处之。卫戍司令魏邦平也以电话报告，谓“情形严重，陈逆确已动员，此间屡得确实消息，坚请离开粤秀”，而孙中山仍不相信。直至深夜12时多，参军林树巍、林直勉、陆志云三人“联袂而来，再三请行”。^③孙中山还说：“竞存恶劣，当不至此，即使其本人果有此不轨之心，而其所部，皆与我久共患难，素有感情，且不乏明理之人，未必助桀为虐，受其欺弄，请诸君不必猜疑，

^{①②} 《双清文集》上卷，第393页、第392页。

^③ 黄惠龙：《中山先生亲征录》，《革命文献》第五十二辑，第10页。

以免惊扰。”^① 苦劝至凌晨二时左右，孙中山才由林树魏等三人护送，离开总统府。他们机智地避开沿途“陈家军”的严密岗哨，通过永汉路，转长堤，到达海珠的海军司令部，与海军司令温树德等会合，登上楚豫舰，天明转至永丰舰，驶往黄埔。

深夜3时许，叛军4000余人扑向总统府和粤秀楼，以大炮进行轰击，还焚烧了山上粤秀楼通向山下总统府的天桥，妄图致孙中山及总统府人员于死地。总统府警卫队对叛军的围攻，进行了英勇抵抗。至16日下午，叛军才得以攻入总统府。这时，为掩护孙中山的安全转移而留守总统府的宋庆龄，亦已在警卫人员的保护下突围脱险。这样，陈炯明等妄图杀害孙中山的罪恶阴谋终于落空。

陈炯明公开叛变以后，以粤军总指挥叶举的名义，在广州街头张贴布告，胡说什么“国会恢复，护法告终，粤军将士，一致赞同；请孙下野，以示大公，商民人等，幸勿惊恐。”^② 妄图以此来掩盖和推卸他们的叛乱罪责。事实上这些叛军炮轰总统府以后，即在广州大肆洗劫，奸淫掳掠，杀人放火，使广州顿时陷入了一片恐怖和混乱之中。完全暴露了他们的反动军阀的面目。

孙中山对陈炯明的叛变，十分愤慨。17日下午，他亲率永丰、永翔、楚豫、豫章、同安、广玉、宝璧各舰出动，由黄埔过车陂炮台，驶至鹅潭，乃命各舰对大沙头、白云山、沙河、观音山、五层楼等处之叛军发炮射击，并令广州卫戍司令、粤军第三师师长魏邦平以陆军相策应，削平叛军。但魏见叛军势大，不敢动作，却以“中立”、“调停”自居，使孙中山这一平叛计划无法

① 蒋中正：《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革命文献》第五十二辑，第131页。

② 蒋中正：《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革命文献》第五十二辑，第133页。

实现。孙中山只好驻扎于军舰上，并即令北伐军迅速回师靖乱。

陈炯明对孙中山脱险，并坚持率领海陆军平叛，心有不甘，而又十分不安，便使用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多次派人到孙中山的座舰求和，陈炯明甚至还写了亲笔信致孙中山，说对事变“万难辞咎”，“恳请开示一途俾得行进”，等等。^①孙中山坚持真理和正义，亦洞察这是陈炯明的“缓兵”阴谋，遂坚决予以拒绝。另一方面，陈炯明又对海军舰队采取收买、分化和攻击手段，再次妄图置孙中山于死地。他先是多次派人以重金贿赂海军背叛孙中山。海军部长汤廷光就是在陈派出莫纪彭运动以后变成拥陈的^②。海军司令温树德后亦被收买，率舰队中最大的海圻、海深、肇和三舰驶离黄埔；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亦率部叛变。这就构成了对孙中山所率舰队的巨大威胁。但绝大多数海军官兵不为所动，坚决拥护孙中山，斗争到底。陈的奸计未能完全成功。旋又利用叛军控制的鱼珠炮台，以大炮轰击海军的舰队基地长洲，迫使孙中山所率领的永丰等舰先是退往新造，后又冒险冲过叛军控制的车陂炮台，驶进白鹅潭。之后，叛军又多次用水雷、鱼雷攻击永丰舰，还以飞机凌驾舰队上空恐吓。总之，陈炯明为了消灭海军舰队和孙中山本人，确是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加以北伐军回师又受到了陈炯明大部队的阻击，而无法进入广东。因此孙中山便决定撤离广州，另谋对策。

8月9日，孙中山乘英舰摩汉号到香港，然后转搭俄国皇后号邮轮赴上海。孙中山在永丰舰上坚持同陈炯明斗争了55天，历尽艰险，表现了革命者的勇敢、坚定、临危不惧、不屈不挠的大

^① 蒋中正：《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革命文献》第五十二辑，第138页。

^② 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7月3日。该报报道汤廷光接受了陈炯明30万元。

无畏精神。

陈炯明的叛变，对孙中山是一次极为沉重的打击。孙中山于9月18日在上海发表的《致国民党员书》中，详尽地历述了陈炯明叛变的始末，沉痛地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盖历次失败，虽原因不一，而究其竟，则为失败于敌人。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且其阴毒凶狠，凡敌人所不忍为者，皆为之无恤……。”并检讨自己“任用非人”，致“变生肘腋”。但这一事变却教育了孙中山，“疾风然后知劲草，盘根错节然后辨利器。”^①孙中山总结了经验教训，从此走上新的革命阶段。

四、独霸广东

1922年8月上旬，孙中山离穗赴沪。北伐军许崇智部退向江西，后转入福建，李烈钧部退往桂林。至此，广东全境基本上被陈炯明所控制。

8月15日，陈炯明自惠州来到广州，自封为粤军总司令，并重新组织统治广东的班子。28日，由陈炯明操纵的广东省议会选举陈席儒为广东省长^②，陈炯明的亲信、兄弟钟秀南、马育航、陈达生、陈演生、陈宗岳、黄强、钟声等，分别担任财政厅长、省银行监督、公路处长、官产处长、教育委员长、粤海关监督、省议会临时议长等职务，掌握着关键部门及“肥缺”。^③原粤军司令部及

①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18页。

② 陈席儒，香港买办。当时报刊揭露他以200万元买省长之职。

③ 以上列举各人，除黄强外，均海丰人。各人职务时有变动，所开列各职不完全是同时担任，特此说明。

第一军系统的陈炯明部属叶举等，仍然控制着部队，他们分驻全省各个地区，成了各地的“土皇帝”。陈炯明在广东建立了他的“家天下”，实行封建军事专政。

自从确定叛变之日起，陈炯明所部即以迫害、枪杀革命者为己任。除了以上所述袭击孙中山等革命领导者以外，对其他革命人士也不放过。6月19日，枪杀了支持孙中山、拒与叛军合作的广三铁路局局长夏重民。21日，又枪毙谢八尧、邓曜伯等五名支持孙中山的华侨^①。国民党员许应骙家被洗劫时，竟然枪杀许的家属二人。据记载：“凡属国民党员，被抢而复被杀者亦多”。^②甚至对只是主持正义的在广州的国会议员，也加以迫害，搜查、洗劫国会议员招待所；禁止议员出入并强令议员离粤；侮辱议员女眷；掠夺议员身上衣物，连老弱妇孺也不放过；动辄以枪勒迫议员，威胁议员认身安全。^③国会议员愤怒地指出：“以此盗贼行为，袁世凯之叛国，张勋之复辟，莫荣新之祸粤，不忍为不敢为之事，陈炯明之粤军，公然为之。”^④

和所有军阀一样，他们反对革命，必然摧残新闻自由。1921年，广州新闻业兴旺，有报馆约40家，通讯社10多家。陈炯明叛军占领广州后，立即向新闻界开刀。他们首先封闭了国民党的机关报《广州晨报》，以及“号称新闻丰实、消息灵通的”民治通讯社。所有新闻，改由陈家御用的“黎明通讯社”发布。^⑤又派员长驻报业公会，审查各报每日所发之新闻稿，“计每夕捡去新闻稿件

① 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

② 《陈炯明叛国史》，《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二册，台湾1960年版，第480页。

③ 见《陈炯明叛国史》，第九章第六节。

④ 《国会议员告国人书》，《革命文献》第五十二辑，第207页。

⑤ 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6月30日。

不下50则，故各报馆往往因稿件被检、无别项稿件补选，以致空白；又各报馆向用四号字排印，或以缺乏新闻稿件，则改用二号字排印。”^①有些报纸偶有疏忽，登出的新闻不合某些叛军头目的口味，一声令下，处以五天、十天的停版。原接受陈炯明经济支持，被称作为陈捧场的《广东群报》，也被迫停刊，由陈派人改组改版后才复办。其他各报，也都朝不保夕。甚至稍有公正立场，在广州销量极大的《香江晨报》，也禁止入粤。在这样的高压之下，广州报业处于完全窒息的状态。

叛军还在广州及北江、西江等地大肆掠夺人民群众财物，奸淫妇女，无所不为，仅据广州市东南关被抢劫的店户所发的通电揭露，东南关一带被抢劫者共128家之多，被抢财物共值24.5万余元，上海《民国日报》报道说：叛军“由小市街起，至东关止，共劫七条街，所有各金铺及住户，都被抢尽。最惨者，各匪一遇妇女，即行强奸，不分老幼，皆遭淫辱，有岑某一家妇女八人，皆遭轮奸”^②。叛军由广州开向粤北，所经新街、源潭、英德、韶关等城镇，无不遭受蹂躏。韶关难民向大总统的呼吁电指出：叛军“入城后，即大肆抢劫，商店住家被搜无遗，甚至德国教堂亦被蹂躏”。^③叛军进驻香山，所过各地，“辄炮击县军防地，”居民房屋，“十居八九被叛军所焚烧，乡民挟老携幼，纷纷登山逃避。”^④总之，凡是叛军所到之处，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受到严重威胁。广东人民又一次陷于军阀的浩劫之中！

陈炯明实现了割据广东的野心以后，日子并不好过，困难重重，穷于应付。首先，庞大的军费和各项开支，就使叛军集团头

① 据《陈炯明叛国史》。

②③④ 均见《陈炯明叛国史》。

目焦头烂额。他们先是以大量发行纸币应付，但由于不能兑现，遭到市面商人的拒绝使用，转而采取拍卖官产以收回纸币。据当时报载，财政厅长钟秀南，“将广州内价值最巨之官产，尽行划出，编列号数，统交总商会代为开投，闻预算此项产价，约值300万毫银。”^①官产拍卖仍不足以应付，更无法回收纸币，只有到处勒借。一是通过盐运史“向盐商勒借预饷200万”，一是限令各县知事，立即征足1923年预粮。甚至向粤汉路勒借10万、向广州九善堂勒借30万，当押行勒借30万，向南海、番禺富商各勒借4万等等，不一而足。^②即使这样，还是无济于事，便向广州英国领事交涉，妄图骗取关余，又遭到英领拒绝。在走投无路之际，省政府拟将全省烟酒税捐改由总商承办，以免各地军队截留，并拟局部开放赌禁……等等。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所有这些，实际都是剥夺人民财富的所为，当然不断遭到群众的反对。新会县就曾因纸币不能兑现而引起许多行业实行罢市；拍卖校址事公布后，广州宣讲所及育才学校等师生、校友竭力反抗；拍卖惠州石矿又遭当地农民反对；甚至各项征借，各级官吏也无法依期依量完成。^③所以，直到1922年12月，钟秀南还一再命令各县上交预征的1923年粮款。^④这种状况，使陈炯明在财政问题上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地步。

随之而来的是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矛盾加剧。首先陈炯明与省长陈席儒的矛盾不断加深。陈炯明之所以将省长一席予以

^{①②} 上海《民信日刊》1923年1月12—26日，转引自《革命文献》第五十二辑，第246页、第245—246页。

^③ 以上材料参见上海《民信日刊》1923年1月12—28日，《革命文献》第五十二辑，第243—290页。

^④ 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12月15日。

陈席儒，乃是利用陈席儒的实力身份，以为可以依靠他解决财政难题。其实陈席儒亦已向陈炯明集团报效了150万元，并同英国银行团代表拔兰打谈判借款，初步达成协议，后因英方以广东局面不稳定而取消，这已尽了一定的力量。但由于统治集团始终无法解决财政危机，遂又提出要陈席儒筹款200万元，遭陈拒绝。于是，由钟声控制的省议会便多次提出要改选省长，陈席儒也萌生退志。其次，由于叶举对陈炯明的不满，逐渐发展成为统治集团内所谓海丰系与惠州系的矛盾。叶举原是陈炯明手下的最得力大将，此次叛变全由他指挥及领衔。在陈炯明建立广东统治的斗争中实占首功。但陈炯明在分赃中，把几乎所有要害部门及“肥缺”，都分给了陈的海丰亲信。叶举仅得一个肇庆善后处长及练兵总监的官衔，早就心怀不满。因此，叶以养病为辞，潜回惠州老家，不问政事，陈亦不予挽留。惠州籍的官兵，对此事亦多有嘆言。这就使陈炯明更形反感，甚至在招募宪兵中，亦坚持清一色的海丰人，拒绝惠州人参与。此外，洪兆麟对陈的所作所为，亦不敢苟同，有貌合神离的趋势。^①其余附陈的梁鸿楷等部，亦同陈炯明保持一定的距离。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下属官兵及行政官吏之间，彼此排斥，甚至枪战、火并，亦时有所闻。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由于时间短暂，还不致于立即公开爆发，但已表明陈炯明统治的不稳，预伏着失败的征兆。

^① 上海《民信日刊》1923年1月12日—28日，《革命文献》第五十二辑，第243—290页。

第二节 割据粤东和最后败亡

一、退据粤东

1922年8月14日，孙中山撤离广州后抵达上海。鉴于陈炯明叛变的沉痛教训，孙中山在上海一面致力于改进国民党党务，借以健全党的领导机能，一面组织力量讨伐陈炯明。

8月25日，孙中山会见了苏俄政府代表越飞的随行人员，对改造国民党的方向愈益明确。9月6日，指定了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开始了改进国民党的工作。

陈炯明叛变后，曾回师广东。后遭败绩的北伐军各部，这时仍留驻湘赣各地。李烈钧率领的滇军、赣军，驻在湖南一带，许崇智、黄大伟、李福林等部粤军，驻扎赣东一带。为了与奉、皖联合对付直系，并建立讨伐陈炯明的军事基地，孙中山命令许崇智和李烈钧等部分别向福建、广西进军。

从9月下旬起，许崇智等率领的粤军，进入福建建瓯以后，于10月6日攻克古田，复分三路向福州挺进。虽然受到闽督李厚基部的抵抗，但经过战斗后，于10月12日攻克福州。18日，孙中山命令将入闽部队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黄大伟为第一军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军长。自此，东路讨贼军以福建为基地，整训部队，准备随时开返广东讨伐陈炯明。向广西进军的李烈钧所率领的朱培德部，于10月1日攻克桂林，并陈师粤桂边境待命。

10月中下旬，孙中山先后委派邓泽如、邹鲁到香港，加强同各方面的联络，共同商讨有关讨伐陈炯明的事宜，并筹措军费。

11月8日，孙中山致函驻广西的滇军将领张开儒、杨希闵，希他们早日出兵广东。28日杨希闵派代表到香港，同邹鲁商洽讨陈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联系与准备，滇军杨希闵、杨如轩、杨池生、范石生、蒋光亮等部，桂军刘震寰、沈鸿英等部，粤军陈济棠、莫雄、吕春荣、卓仁玑等部，均一致同意联合讨伐陈炯明。

12月26日，滇、桂各军将领在广西白马召开军事会议。^①拟定联合作战计划。孙中山委任杨希闵为代理滇军总司令，刘震寰为桂军总司令，组成西路讨贼军。滇、桂军分三路沿西江向广东挺进。在驻梧州粤军的配合下，28日即进入梧州。1923年1月9日攻克肇庆。

在西路讨贼军迅速进军的打击下，陈炯明的西江防线土崩瓦解。1923年1月25日，陈炯明不得不通电下野，16日仓皇撤离广州，逃往惠州。陈炯明割据全省的美梦，仅仅7个月，便宣告终结。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由上海返抵广州，决定续行大元帅职权。3月2日，成立大元帅大本营，以谭延闿为内务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程潜为军政部长，伍朝枢为外交部长，邓泽如为建设部长，徐绍桢为广东省长（后改胡汉民），着手进行安定粤局，组织北伐，改组国民党等各项工作。

陈炯明撤出广州以后，实力并没有受到很大的损失。据当时胡汉民的报告“洪兆麟二十营在潮汕，钟景棠十二营在梅县，陈炯光十四营在五华、兴宁，林虎五千人在兴宁，黄凤纶三营在蕉岭，翁式亮九营由揭阳开往梅县，杨坤如千五百人在老隆”，^②

^① 关于“白马会盟”时间，邹鲁的记载为12月6日，不确，详见本书下一章。

^② 《胡汉民致孙中山电》，此处转引自《国父年谱》，第954页。

还有邓本殷在南路的若干营。陈炯明后来凭借这支相当庞大的部队同革命军对抗，割据粤东达三年之久。

陈炯明为了巩固在粤东的军事封建专政，并妄图再次统治全省，于是采取许多办法扩充他的军阀队伍。1923年5月间，桂军沈鸿英的叛乱完全为滇桂军讨平，沈部主力李易标等桂军受陈炯明的收抚，加入陈部。与此同时，原东路讨贼军第一军军长黄大伟又率所部投陈。这样，陈炯明的部队得到很大的发展，总数达到6万多人。于是，陈炯明重新组编了他在粤东的主力部队：

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总指挥林虎，副总指挥洪兆麟，各部总指挥叶举。

第一军军长林虎（约1.5万人），辖黄任寰的第一师，林子云的第二师，黄兴业的第三师以及罗献祥、王定华等四个独立旅及两个独立团。

第二军军长刘志陆（约七八千人），辖黎生的第五师及蔡振中等两个独立旅。

第三军军长尹骥（约1.3万人），辖贺瑞廷的第一师，李云复的第二师，邓桂生的第三师，谢文炳的第十师以及刘志远的独立旅等。

第四军军长李易标（约六七千人），辖第一师的李腾芳，第二师的胡汉卿，第三师的洪兆麟，第四师的纪泽波，第十二师的黄福芝以及独立旅李少如。

第五军军长熊略（约1.1万人），辖第一师师长林烈，第十一师师长陈修震以及林国光的独立旅和翁腾辉等支队，还有练演雄的游击司令等。

第六军军长杨坤如（约七八千人），辖骆凤翔的第三旅、钟子廷的第四旅及李祥、李克成、叶伯质、叶子光的五、六、

七、八旅。

第七军军长黄大伟（约2000余人），辖陈炯光的独立二师及翁式亮的独立师等①。

陈炯明在整编部队的过程中，即陆续向以孙中山为领导的广州革命政府进行反扑。

早在1923年2月间，林虎、洪兆麟本均有悔改之意，愿率部北伐，由李烈钧前往接管潮汕。李烈钧亲赴潮汕，并由许崇智率所部由福建移驻潮汕。林、洪所部转移至闽粤赣边时，陈炯明派员并飞驰函电，竭力挑拨拉拢争取。林、洪遂又改变主意，回归于陈炯明②。

5月，陈炯明趁沈鸿英叛乱之机，向革命政府全面展开进攻。在东线，林虎部重陷潮汕，许崇智被迫退至揭阳一带。在西线，熊略、杨坤如、练演雄等部分别进抵增城、博罗、宝安一线。北线，谢文炳部于6月18日攻陷英德。

大元帅大本营立即集中滇、桂、粤联军主力于东线，对付由惠州西犯之敌。6月上旬起，孙中山多次亲临石龙、博罗前线指挥。联军击退来犯之敌，并进兵包围惠州城。北线亦克复英德、韶关。陈炯明的第一次对革命政府的进攻，到7月便被击退。此后，战事在惠州、博罗、增城一线呈胶着状态，双方互有胜负，战线犬牙交错。

至9月间，陈炯明向前线增派援兵，调整部署，又大举向广州革命政府进犯。以林虎统率所部进攻河源，并向龙门、增城挺

① 据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其中有些师旅长的归属同其他一些资料的记载略有出入，但文书的记载较为完整，故取文说。

② 参见李烈钧：《孙大元帅戡乱记》，《革命文献》第五十二辑，第502—503页。

进，以洪兆麟所部由惠阳坪山攻宝安，沿广九路进取石龙；惠州守军杨坤如部沿东江向博罗进攻。南路邓本殷等部向高州进军作牵制。

由于滇桂各军无心恋战，纷纷退却，使革命政府军全线动摇。10月13日，南路申保藩部占化州，22日又陷高州。与此同时，林虎攻占河源，洪兆麟占领惠阳坪山及宝安平湖。31日，桂军撤出惠州的据点飞鹅岭，使全线败退。11月上旬，龙门、增城、博罗相继失守，广州震动。^①

陈炯明倾其全力进攻广州，企图一举消灭政府军，重新登上统治广东全省的宝座。他以第一军林虎部、第二军刘志陆部、第四军李易标部共约1.4万余人为右路军，沿增广路，向联和、龙眼洞前进，攻击白云山、瘦狗岭一带，由刘志陆指挥。以第三军尹骥、第五军熊略、第六军杨坤如部共约1万人为左路军，沿广九路向南岗、乌涌前进，攻击车陂、石牌一带，由洪兆麟指挥。林虎率领王定华等部驻福田策应全军。

政府军对敌人的进攻意图及兵力配置均有所了解，亦下达了与之针锋相对的作战计划。以许崇智指挥的粤桂军为右翼，沿广九路前进，迎击洪兆麟部。以朱培德指挥滇军居中，迎击由龙眼洞来犯之敌。以滇军一部由广增路北之摩星岭等地向增城迂回，侧攻敌林虎部主力。但由于部队自增城、石龙一带溃退回广州后，还来不及收容整顿，陈炯明叛军已纷纷进抵广州东郊。18日上午九时，政府军刚集中拟开赴前线，林虎部则已越过龙眼洞，向沙河前进。于是双方在下元岗一带展开激战。各不相让，伤亡惨

^① 参见古应芬：《孙大元帅东征日记》，10月下旬及11月上旬各条。李烈钧：《孙大元帅戡乱记》第二节。

重。右翼军于是时刚在石牌一带布防，洪兆麟部已至，许军阵脚未稳，被迫退至燕塘一带。是时，广州十分危急。幸而豫军樊钟秀从韶关奉命抵广州增援，连续行军未经休息，即开赴前线。他们沿广九路东进，在海军永丰等舰的配合下，击退洪部主力。19日，樊部乘胜直插联和附近，威胁林虎的归路。这时，谭延闿指挥的湘军一部，开抵粤北以后，亦移师向东，从新丰江威胁林虎部的侧背。林虎担心背腹受敌，被迫撤退，在沙河以东与敌周旋了一整天的朱培德等部，乘势反击，敌军不支，全军大乱。后在攻克石龙、增城之战中又大挫敌军。26日以后，敌军只得退守惠州。

经过广州东郊一仗，陈炯明叛军的主力遭到极大的损失，一时不易恢复。自此以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叛军都未能再向政府军发动较大的攻势。时刻都与革命为敌的陈炯明，也只好割据粤东一隅，在那里实行他的军阀统治。

陈炯明在割据粤东的三年间，除了大大地加重各种苛捐杂税以增加收入，来维持他的庞大军费开支以外，还残酷地镇压粤东地区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

1922年5月，彭湃自日本留学归来，即在家乡海丰县组织“社会主义研究社”、“劳动者同情会”以及“赤心社”等进步组织，并创办《赤心周刊》，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和罪恶，鼓吹工农革命，并与当地反动的《陆安日报》开展论战。引起了军阀、官僚、豪绅等反动势力的恐惧和仇视。陈炯明见彭湃有群众拥护，又有才能，想拉拢他为己所用，遂指使当时海丰县县长翁桂清任命彭湃为县教育局长。1922年5月4日，海丰县学生在彭湃的领导下，在县城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他们高举着红旗游行，以“赤化”两字大旗为前导，高呼“劳动神圣”、“反对地主资本家压迫剥削工农”等口号，海丰一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

新气象。地主豪绅则大为震惊，便向陈炯明诬告彭湃要在海丰实行“共产共妻”。陈炯明站在反动势力一边，将彭湃撤职，全县思想进步的校长、教员亦因之被撤职。

彭湃离开海丰县教育局后，专门从事农民运动，组织农会。1923年元旦，成立海丰县总农会，会员达10万人，还成立了陆丰县总农会。5月1日，海丰、陆丰、惠阳等县农民和青年学生1万多人在海丰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和示威游行，显示了农民的觉醒和威力。影响所及，东江和潮汕各县农民运动都有了发展。以陈炯明的叔父陈开庭和海丰县长王作新为代表的官僚豪绅反动势力马上进行反扑。

7月26日，海丰发生了大风灾和水灾，农作物损失达90%，农民生活处于极度困难之中。农会在组织救灾中决定向地主要求减租，提出“至多三成交租”的口号。这个合情合理的要求，却遭到反动县长王作新的反对，他贴出布告，不准农民减租，并声言“违者严加拿办”。遂激起了农民的愤怒，农会决定召开减租大会。王作新电告陈炯明说：“彭湃统率‘农匪’10万在海城暴动”，请求派兵镇压。8月16日（农历七月初五），盘据海丰的陈炯明叛军师长钟景棠，奉陈的指示，派兵镇压了农会，逮捕了25名农会领导干部。在此次“七五农潮”中彭湃幸得逃脱。事后，彭湃等人亲赴老隆、香港，会见陈炯明，向陈提出释放被捕农民，恢复农会等要求，陈口头上表示答应，但当彭湃等准备于1924年春节恢复农会时，陈炯明又命令王作新严加禁止，并拟逮捕彭湃等人。彭湃被迫逃到广州。“七五农潮”这一事件，进一步暴露了陈炯明的反动军阀面目。①

① 见彭湃：《海丰农民运动》。但陈演生的《陈竞存先生年谱》以及康白石的《陈炯明传》，均硬说陈炯明支持彭湃的农民运动。这完全是无视当年的历史事实。

陈炯明的军阀统治，在他自己的家乡海丰县表现得尤其突出。在陈炯明的支持和影响下，以陈炯明的家庭“将军府”（他曾被黎元洪授以“定威将军”的封号，故建了将军府）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封建官僚家族，它是海丰县的太上皇政府。“凡行政、司法、教育、苛捐杂税，派勒军饷以及商场买卖……，都要经过他的将军府的一道衙门”。^①“将军府”对广大农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剥削，掠夺土地，放高利贷，甚至拘捕刑罚。搜刮了大量土地和财产。还大搞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不许佃户退佃，以便将农民紧紧地束缚在他的土地上，任其剥削欺压。

陈炯明的叛军，拉夫筹饷，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例如：一次再次摊派军需费用，军队过境必到处拉夫，每派一个筹饷专员到达，必封屋抓人，搞得鸡飞狗走，直至这个专员腰包装满金银，变成小富翁才离去。甚至有用‘缴枪’的名堂，诬陷某人有枪，派他十支八支，叫其依枪缴钱，无则抓人‘讲水’（讲价钱）。被派枪的多是富户商家，所以商人也很痛恨他。陈炯明用的人，都是亲信，不管有无才能，这些人仗陈炯明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人民不胜其苦。”^②“陈炯明为增加税收，纵容种植鸦片，按亩收烟税，美其名曰：‘特别田亩捐’，为数当在二三百万元以上。”^③还卖官鬻爵，“出卖潮梅各属知事（县长）职分三等，最肥缺4万元，次者3万元，最少2万元，人民怨声载道。”^④更有甚者，“陈炯明军饷短缺，罗掘俱穷，特设神庙坟墓捐。其办法分甲、乙、丙三级，神庙捐甲

① 章友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22页。

② 林务农：《澎湃与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几件事》，《广东文史资料》第30辑，第47—48页。

③④ 《广东文史资料》第43辑，《广东军阀史大事记》，第190—196页。

级100元，乙级60元，丙级40元。坟墓捐分两等，一等每坟一元，二等每坟六角。潮梅十五属可征收700余万元。”“陈炯明、马育航等将汕头市郊各义塚变卖，命死者后人迁枯骨另外安葬。迁出的塚地丈量定价，印彩票数万张，编列号码，以塚地为彩品，每张彩票售5元。挨户勒销。仅汕头商会即被勒索2万元。”^①这些搜刮手段，集中反映其贪婪、残酷和无孔不入的军阀本性。

二、最后败亡

在滚滚向前的革命车轮面前，陈炯明终于被碾得粉碎。1925年2月和10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军举行了两次东征，终于彻底打垮了陈炯明叛军。

1925年1月，陈炯明趁孙中山北上卧病北京之机，勾结江西的北洋军阀方本仁部，图谋分兵三路进犯广州。1月7日，陈炯明下达进攻广州的总动员令^②，各路叛军纷纷出动，盘踞惠州、坪山、淡水之叶举、熊略等部，向宝安、东莞、石龙进攻；盘据潮汕之洪兆麟部，经海陆丰出淡水进窥广州；盘踞河源、五华之林虎部，则向增城方向进扰。与此同时，陈炯明还与他的盟友湖南军阀赵恒惕，约定南北夹攻广州。

为了彻底摧毁陈炯明在粤东的封建军事割据，2月15日，以胡汉民为代帅的广州大本营决定讨伐陈炯明，颁布东征动员令，组成东征联军。由杨希闵任联军总司令，决定分三路进兵：以杨希闵之滇军为左翼，出河源、老隆向兴宁、五华攻击前进，攻占林虎的防地；以许崇智之粤军为右翼，沿广九线向淡水、平山、

① 《广东文史资料》第43辑，《广东军阀史大事记》，第190—196页。

② 据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记载，陈炯明这时自称“粤军总司令”。

海陆丰攻击前进，直趋潮汕，力克洪兆麟；以刘震寰之桂军为中路，围攻惠州之敌。但是，杨希闵和刘震寰均阳奉阴违，按兵不动，所以东征联军实际上仅以右翼许崇智之粤军向叛军进攻。

东征军右翼以许崇智为总指挥，蒋介石为参谋长，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下辖张民达的第二师，许济的第四师，余鹰扬的独立旅和警卫军，以及黄埔军校第一、第二教导团学生军等，共约2万人左右。

东征军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革命军，一大批优秀的国共两党党员作为骨干，并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所以部队具有高昂的革命精神和顽强的战斗力，全军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口号鼓舞下前进，又提出了“不扰民，不拉夫，不筹饷，不强占民房，买卖公平”等口号，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2月3日，东征军旗开得胜，攻克石龙、东莞，陈炯明叛军沿广九线节节败退。2月15日，东征军一举攻克城坚壕深的淡水城，歼灭和俘敌1500余人，并击退了敌军增援。接着东征军攻克平山、三多祝，向海陆丰前进。

3月13日棉湖战役，教导第二团以千余之众抗击林虎万余精锐之敌，奋勇冲杀，激战经日，牺牲惨重，在后续部队支援下，终将敌人打垮，获得以少胜多的光辉战绩。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称赞这次战役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少有的。同时，东江及潮梅一带的工农运动在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蓬勃发展，纷纷起来支持东征军，故只一个多月，就把叛军打得落花流水，其残部由林虎、洪兆麟率领退到闽、赣边境，陈炯明亦再度逃到香港。

当时孙中山卧病北京，在病榻上获悉东征军大捷的消息，十分欣慰，特嘱汪精卫代致电勉励各将士“努力杀贼，以期三民主

义之实行。”^①随后，8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隐藏在革命政府内部的滇桂军杨希闵、刘震寰，阴谋叛变革命。广州革命政府获悉后，立即命令东征军迅速回师靖乱。5月21日，东征军自潮梅回师，6月11日，击溃了盘据广州的滇桂军主力，杨刘叛变被平定。但陈炯明的残部却乘东征军回师之际，重新占领了潮梅、东江等地，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和段祺瑞以80万元巨额军饷及枪械的援助下，实力得到一定的恢复，并伙同盘踞琼崖的邓本殷和高雷、钦廉的申保藩部，两面夹攻广州。

这时，广州大本营已于7月1日改组为国民政府，并设立军事委员会，所有军队一律改称国民革命军。

9月11日，林虎、洪兆麟、叶举三部叛军，由刘志陆指挥，向普宁、惠来、揭阳、潮阳四县进攻，许崇智部纷纷退却。次日叛军进入汕头。潮汕地区遂重新为叛军所占领。15日刘志陆指挥叛军分三路向东江进攻：左路指挥谢文炳率部指向海陆丰；右路指挥林烈率部出发老隆、河源；中路指挥黎生和前敌总指挥李易标由五华、紫金攻三多祝。并下达各路动员令和总攻击令，气势汹汹，卷土重来。

9月20日，潮梅旅省各团体通电全国，揭露陈炯明叛军罪状，略谓：“杨刘叛乱，省军回戈，洪兆麟、林虎、叶举等趁虚复入，分驻梅、埔、顺、揭、潮、澄各属，驱万余叛军，散布村市，占驻民房，强占粮饷，掠货财，奸淫妇女，横行无忌。”并指出：“林、洪、叶等近且不惜勾结帝国主义，接济香港粮食，以此获得枪械，重祸广东，卖国殃民。”通电要求国民政府进行讨伐^②。

① 《国父年谱》，第1290页。

② 《广东军阀史大事记》，第226—227页。

9月27日，国民政府决定出师东征，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由周恩来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东征军分三路纵军讨伐陈炯明叛军：以第一纵队为中路，兵力约1.5万人，由博罗、惠州前进，纵队长何应钦；第二纵队为右翼，兵力约1万人，由坪山、淡水向海陆丰前进，纵队长李济深；第三纵队为左翼，兵力约6000人，由龙门、河源前进，纵队长程潜。三路纵队兵力合共3万多人。

这次东征由于指挥统一，政治宣传工作做得好，纪律严明，将士用命，军民合作，故士气高昂，所向披靡，连摧顽敌，只一个多月，就彻底打垮了盘踞东江、潮梅达三年之久的陈炯明叛军。

11月11日，东征军中路先行扫荡惠州城外之敌，攻占飞鹅岭，包围了惠州城。

惠州守敌杨坤如，土匪出身，是陈炯明叛军的一员骁将，一贯反复无常，曾两次向革命军假投诚，这次他以两千兵力固守待援，密布强大火力。被围之日，仍在城内敲锣打鼓唱戏，气焰十分嚣张。

东征军以第一师为总预备队，第二师第四团为攻城部队。确定北门为主攻点，西门为助攻点。13日上午9时，东征军先以大炮射击惠州北门城垣，击毁城楼及城墙多处。午后2时，由营连长及党代表率领十几队先锋队进行冲锋，遭到敌军机关枪的猛烈扫射，死伤过半。随后，刘尧宸团长再次调整队伍指挥部队前进，大声喊杀，与先锋队疾驰抵达城下，亲扶竹梯，不幸中数弹牺牲。部队亦因伤亡过大而停止攻城。

14日午后2时，东征军先以猛烈炮火轰击北门，摧毁城门及城上火力点。3时50分，第四团战士抬着竹梯前仆后继，英勇冲锋，连长陈明仁率该连最先登上城墙，后备总队随即涌进，4时

50分，革命旗帜已飘扬在惠州城上。叛军守将杨坤如负伤率残部遁去。这一役东征军官兵死伤400多人，第四团自团长刘尧宸至营长以下干部几乎全部牺牲。这些烈士大多数是国共两党的优秀党员，他们战斗在一起，鲜血共洒神州大地。16日入城官兵在惠州第一公园举行追悼阵亡将士大会。

惠州攻克以后，东征军乘胜追击。第一纵队于10月26日占领海丰，在陆丰、普宁间的华阳遇敌受挫，幸援军赶到，于双头将叛军主力林虎部一万多人包围歼灭。30日进占普宁、揭阳；第二纵队于26日占领紫金后，即向华阳、梅村进击，30日于汤坑与第一纵队联合击溃叛军刘志陆部；第三纵队于26日占领老隆后，即向五华前进，31日攻克兴宁，击溃熊略部，11月3日攻克梅县，肃清了兴梅一带叛军。经此数役，叛军已遭毁灭性打击，失去抵抗能力。11月5日，东征军进驻汕头，9日进驻大埔。至此，东江及潮梅境内叛军全部扫平。叛军残部七八千人逃窜至赣南、闽西，以后由刘志陆带领到山东投靠北洋军阀张宗昌，编为直鲁联军第三路军，至1928年被北伐军彻底消灭。

与此同时，10月31日，国民革命军又分兵进行南征，以朱培德为南征总指挥，分四路进军，彻底打垮了配合陈炯明叛军夹攻广州的南路军阀申保藩和盘踞琼崖的军阀邓本殷部。^①至此，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为往后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奠定了基础。

陈炯明在军事割据彻底失败后，蛰居香港，进行政治投机活动，狂热鼓吹反共反革命。1933年9月23日病死于香港。

^① 邓本殷，广东钦县人，行伍出身，后升至粤军旅长。粤军回粤后任南路善后处长，陈炯明叛变后追随陈炯明，称霸南路和琼崖。邓部被消灭后，邓本人逃往越南。于同年3月应北方段祺瑞之召，拟北上投奔段，途中病死于上海。

第五章 滇桂军入粤及其叛乱

第一节 白马会盟，滇桂军入粤

一、杨、刘、沈的崛起

杨希闵统率的滇军与刘震寰、沈鸿英等分别统率的桂军，于1923年1月，以拥护孙中山、驱逐陈炯明的名义，同时进入广东，时人称之为“滇桂军”。他们进入广东，虽然为革命立过战功，但是，他们拥兵割据，蹂躏地方，并先后发动叛乱，终于溃不成军，只身逃跑。他们在广东两年半时间，又写下了军阀祸粤史的另一页。

杨希闵，字绍基，亦作肇基，云南省宾川县人。1886年生于农民家庭，幼入私塾读书。1907年考入云南讲武堂肄业。1911年，他与多数讲武堂师生一起，参加了昆明的“重九”起义^①，接着被分派到云南第一梯团进行援川战斗。不久，请假赴赣，入江西讲武堂继续学习。^②1913年毕业，被分派在江西步兵第三旅任上尉

^① 云南于1911年10月30日响应武昌起义，是日为农历九月初九日，故称“重九起义”。

^② 据《杨希闵自传》。原件藏民革云南省委，许多书刊均称杨毕业于云南讲武堂（例如陈锡璋：《广州帅府史话》台湾版），不确。

参谋，并经吴安伯、刘广勋介绍加入国民党。同年7月，孙中山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杨参加了李烈钧领导的江西湖口起义，不久事败，杨回到昆明，担任云南步兵一团连长。1915年12月护国军兴，杨随蔡锷第一军出征四川，在棉花坡战役因军功晋升营长，继而任团长，至1920年已递升为第一梯团长。护国战争结束后，云南督军唐继尧仍连年出兵川黔，引起社会不满。1920年，爆发了川滇之战，在“川人治川，驱逐滇军”声中，滇军处于不利地位，乃由军长顾品珍率军回滇。顾在回师中，驱逐了唐继尧，并以滇军总司令名义，控制云南军政大权。其时部属皆有晋升。杨希闵当上了旅长。1922年春，唐继尧率军回滇争夺地盘。顾品珍乃将省政交给金汉鼎代理，亲率部队至宜良天生关迎战唐军。不意于3月25日，遭到唐雇佣的土匪武装突然袭击，顾品珍及其总部官佐20余人均被击毙。余部无心恋战，由杨希闵、蒋光亮、范石生等分别率领，退往曲靖、宣威，后至贵州盘县集中。顾的副司令张开儒亦来到军中。当时孙中山正在桂林准备北伐，张开儒电孙表示“愿为北伐前驱”，同时整编现有队伍，共编为五旅，每旅两团，各旅、团长官为：

第一旅旅长杨池生，	团长赵成梁、曾万钟；
第三旅旅长杨希闵，	团长艾立墀、杨山民；
第四旅旅长杨如轩，	团长廖行超、杜兴和；
第八旅旅长范石生，	团长杨复光、杨廷培；
第九旅旅长蒋光亮，	团长朱世贵、朱润苍。

张开儒计划率部经过黔南向桂林进发，以便和孙中山统率的北伐军会合。但是，在这支部队尚未到达桂林时，孙中山已因陈炯明异动而离桂返粤，并电令张开儒率部赶赴广州效力。因给养和交通关系，决定分兵两路：张开儒率“三杨”部队经荔波、镇远

而到柳州；另一路是范、蒋部队顺榕江而下，经长安、柳城到柳州。由于滇军是客军过境，给养困难，并经多次与广西地方武装遭遇作战，直至1922年6月26日才到达柳州会师^①。这时，陈炯明已公开发动叛乱，孙中山移驻珠江军舰上指挥部队与叛军作战，一时电讯难通，滇军进退维谷。

此时，适有前黔军总司令卢焘（广西人），来到柳州，要求滇军协助收拾桂局。征得诸将领同意后，打出滇桂联军旗号，并举卢焘为总司令。张开儒不愿受卢的节制而离军他去。^② 滇军在卢焘指使下，在来宾县击溃与卢焘对立之广西自治军，为卢夺取了地盘。但卢只想利用滇军之力，夺取广西权力，引起滇军不满，且滇军多数官兵，不愿驻屯广西，第一团团副那其仁（博夫）与团长赵成梁邀集全体团长开会，议论一致认为：“广西贫瘠，难以养活客军。”“不如前赴广东，协助孙中山先生革命，不特题目正大，地亦富饶，对国家对滇军两有裨益。”^③ 后全体旅长对此亦均表赞同。

在确定进军广东的计划后，随即着手解决统帅问题。当时五位旅长中，以范石生、蒋光亮资历较深，而杨希闵则作战能力较强。经过一番逐鹿，大家不相上下。于是杨希闵乃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主动向范、蒋表示：无论谁任指挥，俱愿服从。而蒋

① 据亲身参加此次行动的那博夫回忆，会师日期是端午节前三日。按1922年岁次壬戌，阴历闰五月，故有两个端午节，头一个端午节为阳历5月31日，后一个端午节为阳历6月29日，滇军柳州会师应是后一个端午节前三日。

② 一说张开儒因人事处理不当，如提升艾某为旅长，引起诸将领不满，杨池生指使他人杀艾并夺其部属，逼使张开儒离开部队，转赴香港。

③ 那博夫：《一九二二年滇军入粤讨伐陈炯明始末》，载《云南文史资料》第一辑。

自感实力比范弱，难以跟他争，又忌范之猜狠，不愿范当指挥，两害相权取其轻，乃率先表态，提议杨希闵为帅；范则恐蒋、杨联成一气，对己不利，也就不得不表示推举杨希闵。^①这样，这支拥有五旅之众的滇军指挥权，就落在杨希闵手中。这就是入粤前杨部滇军的由来。^②

刘震寰，字显丞，原名瑞廷，从戎后改名震寰。广西柳州人，1890年出生于大地主家庭。从小在家延师教读，后入马邑小学堂，1905年赴桂林，考入广西优级师范学堂肄业。他的堂叔刘古香，清末中过举人，又在广东将弁学堂毕业，是中国同盟会会员，在广州、柳州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刘震寰受其影响，辍学赴广州，加入同盟会，被派回柳州从事革命活动，曾策动会党、绿林起事。武昌起义成功后，刘即调动原已策动好的沈鸿英、陶四、兰八等部，集中柳州郊区，组成民军，冲入柳州官府，夺取印信，宣布独立，被举为民军支队司令。1912年元旦，刘古香从广东回到柳州担任右江军政分府总长兼统领。刘震寰被委为邦统，将所辖民军整编为八个队，推荐沈鸿英等为督带，兰八等为管带，严兆丰为总教练。

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后，刘震寰仍于9月12日召集官兵宣布讨袁，并遣沈鸿英等率军进攻南宁。当时广西都督陆荣廷效忠袁氏，派兵前来镇压起义，沈鸿英见形势不利而叛变。9月15日，刘震寰化装逃往香港，奉命去南洋继续进行反袁活动。

1916年3月15日，陆荣廷、陈炳焜等转而响应“讨袁护国”，

^① 那博夫：《一九二二年滇军入粤讨伐陈炯明始末》，载《云南文史资料》第一辑。

^② 赛顿：《地区性的武力主义和中国的共和：滇军，1905—1925》第265—289页。

并出兵湖南、广东。陈炳焜与刘震寰是柳州小同乡，故函邀刘回广西任事，开始只充高级随员，无实职。10月，陈炳焜继陆荣廷出任广西都督，为扩充实力，乃派刘震寰招抚民军、绿林，组织队伍。刘在柳江、柳城、罗城等地招抚得500多人，被委为游击副司令兼营长。先后在全州、桂林、柳州等地进行训练，并到广东南路参加讨伐龙济光的战争。

1921年5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于6月命全粤军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当时陆是北洋军阀政府任命的广西巡阅使，他对1920年孙中山命粤军将桂系势力逐出广东，耿耿于怀，并指使陈炳焜屯兵梧州，伺机攻粤。刘震寰与陆荣廷向有宿怨，又与孙中山素有联系，故暗中与粤军通款，引粤军从他的驻防地袭击梧州陈炳焜军侧背，使陈炳焜措手不及，不得不放弃梧州，向抚河、浔江败退。刘震寰所部因得占领梧州，并通电历数陆荣廷、陈炳焜的种种罪行。为此，粤军总司令、陆军部部长陈炯明奖赏刘震寰反正有功，委派他为广西陆军第一师师长。在追击陈炳焜军过程中，刘又收编了陆军残部，在柳州扩编为两个旅4个团共9000多人。派韦冠英、严兆丰为第一、二旅旅长，王达材、曾玉珠、熊镐、张健为第一、二、三、四团团长。

陈炯明率领的讨陆援桂军，经过浔江、邕江而至桂西南各地，到处拉仗，强买强夺，甚至奸淫掳掠，焚烧房屋。使受害者既痛恨粤军，也迁怒于刘震寰，骂他是“引狼入室”的“吴三桂第二”。陆荣廷的余部林俊廷等组织“自治军”，提出“桂人治桂”的口号，与粤军继续作战。陈炯明进军南宁后，曾召见刘震寰，委派他任广西绥靖督办，责令收拾隆山、都安、河池一带的“自治军”。经过剧战，林部自治军被逐至桂黔边境，刘则屯兵河池。1922年初，孙中山决定从桂林出师北伐，驻桂林滇军旅长龙云、胡若愚、李

友勋等暗中接受唐继尧指令，拉队伍回滇讨顾，为唐争夺云南地盘。龙云等便脱离北伐序列，擅自行动。孙中山即电令刘震寰在河池阻击滇军回滇，勒令其回桂参加北伐。在此关键时刻，刘震寰竟与从香港秘密来河池的唐继尧私相会晤，违背孙中山命令，放纵龙云等所率滇军越过河池回滇。并给唐继尧赠送30万元作为返滇路费。这是刘震寰违抗孙中山命令而造成的一大错误。

稍后，孙中山回师广东，改道江西北伐，陈炯明亦急调驻桂平、南宁、龙州一带的粤军回粤，并电令驻军河池的刘震寰率部开赴南宁接防。刘派韦冠英旅驻宜山、柳州，并亲率直属部队和严兆丰旅开赴南宁。在粤桂军移防过程中，自治军林俊廷乘机反攻，韦旅不敌，连续放弃宜山、柳州而退至梧州。刘震寰所部至于5月初到达南宁。时粤军主力已撤离，孙中山委任的省长马君武亦已将省府撤往梧州。刘震寰见此情势，自度无力守住南宁，乃渡过邕江，经合浦、化州转向信宜与藤县一带地方驻扎，与韦冠英旅会合。也便于和粤军相呼应。这年9月，桂系军阀头目陆荣廷经过越南返回龙州，就任北洋政府所委任“广西边防督办”，使得刘震寰受到很大的威胁。这是入粤前刘震寰所率桂军的态势^①。

沈鸿英，本名亚英，号冠南，原籍广东恩平，先世迁居广西雒容县城（今属鹿寨县）。其家境贫寒，在青年时代即加入匪帮，在柳州府、平乐府所辖各县出没，犯案累累，均以其剽悍狡黠，未被官兵抓获。光绪末年，沈鸿英与其子荣光两人，在山间崎岖小道上抢劫官署饷银十担，发了横财，因而更加贪婪凶残，成了骇人听闻的惯匪。

辛亥革命爆发后，柳州响应。革命机关为了组织武装，派人

① 拉理：《地区与国家》，第43—63页。

招抚绿林改编民军，这时沈鸿英出来就抚，在邦统刘震寰统辖下，受委为管带。是年11月，刘古香来柳州就任右江军分府总长兼统领。善于逢迎的沈鸿英，取得了刘氏叔侄的信任，加拨人枪给他，提升他为督带。

1913年8月12日，刘震寰响应“二次革命”，沈鸿英认为拥袁的陆荣廷、陈炳焜比刘震寰、刘古香等反袁势力要强大得多。于是，他就秘密串连受抚的各邦头目，反对刘氏。刘震寰得悉大势不妙，便于15日率领旧部潜回老家暂避，讨袁军就此瓦解。沈鸿英又作伪善姿态，诱骗刘古香至其营中，名为保护，实为软禁。然后密向陆荣廷、陈炳焜发电报，谓“已生俘刘氏”。至9月底，陆荣廷巡视柳州时，沈把刘古香作为战俘献给陆。刘古香遭陆杀害，沈鸿英则获陆之赏识，被提升为邦统。他收容了刘震寰等的人枪，实力有所加强。当时贺县八步设有官办锡矿局，每年获利可观，但土匪横行，严重影响生产。陆荣廷派沈到此剿匪。由于这里是沈的老巢，匪徒多与他相识，他采取剿抚相济的办法，颇为得手。在一年左右时间，匪患基本平息。这就更得陆荣廷的赏识，提升他为统领，视为心腹爪牙。

1916年陆荣廷接任广东督军，进入广州。沈鸿英也得陆之推荐，出任钦廉镇守使。虽然主管军事，但也插手民政，变相出卖钦廉各属县知事（县长），搜刮民脂民膏，大发其财。讨伐龙济光卷土重来之役，沈鸿英在安铺、廉江两仗打得出色，使龙军缩回海南。沈又乘胜渡海作战，逼使龙济光撤出海南。因此，沈鸿英又调任琼崖镇守使，所辖部队改编为广东护国军第三军，沈得任总司令。

1919年，沈调充南韶连镇守使兼粤、赣、湘边防督办，沈军驻扎粤北后，野心更大。他结纳莫荣新、李根源，反对马济（马

是督军陆荣廷的亲信，广东护国军第一军军长，驻防广州）。次年秋，陈炯明部粤军回粤伐桂，驻潮汕的桂军刘志陆部被逼撤退，于是沈鸿英、李根源所部赶赴东江增援。但因魏邦平、李福林的响应伐桂，东江战事急转直下，沈军败退，由于人马拥塞，自相践踏，加上军纪败坏，到处抢掠，遭到当地民众袭击，损失很大。受沈牵连的李根源所率海疆军和林虎所率第二军，也狼狈不堪地撤退。粤军乘胜收复了广州，沈鸿英于11月率部取道乳源、连州，退回广西贺县八步老巢。

陆荣廷被迫退回广西后，并不死心，他重整军力，将沈鸿英部改编为广西边防军第三军，沈仍任总司令，下辖三旅，驻防贺县、平乐一带，待机而动。

1921年春，粤军进入广西，由于刘震寰倒戈迎粤，陆荣廷部弃梧州西逃，这时善于见风使舵的沈鸿英于5月间在八步发出通电，逼陆荣廷下野，并将所部改称“救桂军”，自任总司令。粤军不理会沈的“反陆”姿态，乘胜直捣八步，沈无奈只得撤向桂林。稍后，粤军从梧州沿西江进逼桂林，沈鸿英便乘湘鄂战争正酣，湖南后方空虚之际，窜入湘西。沈军到湘，曾派兵接应被伤兵困扰的赵恒惕回长沙，但在吴佩孚“不应招引南军（指沈鸿英）入湘”的指责下，赵不得不让沈离开长沙、株州，转移到新化。途中遭到湘军围攻，被迫再转移到江西莲花。江西督军陈光远拒绝沈军留驻，并派兵监督沈军转移至湘北浏阳。但在浏阳不几天，又遭到湘军叶开鑫部追击，沈军虽取得小胜，但也不敢在浏阳久留，乃纵兵抢掠一番之后进入平江。在平江逗留了半年，这期间，吴佩孚计划实现其武力统一的迷梦，想要利用这支军队。于是在1922年6月，下令改编沈军为北洋政府陆军第十七师，沈任师长，并授以“协威将军”头衔。从此沈鸿英做了吴佩孚南进的

先头部队，7月初离开平江，进入江西省境。7月末到达赣南大庾，企图凭借吴佩孚做后台再度入粤。这时，陈炯明已背叛孙中山，在粤北驻防的陈家军比沈鸿英的8000人马更强，沈自感难以攻粤。又悉粤军多已退出广西，平乐、桂林一带空虚。于是沈决定回桂。于10月离开大庾，取道湘南，回到广西贺县老巢。同时又派遣第一师师长邓瑞征率部进驻桂林，在桂林东北一带待机而动，依然是广西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势力。

二、“白马会盟”

陈炯明叛变以后，既霸占广东，又控制广西。陈为防范孙中山的讨伐，把注意力集中于拥孙的援闽粤军许崇智部，布置重兵镇守粤东。对于广西方面的防务，则利用旧桂军将领林虎，让他全权处理，并将驻梧州的粤军第四师（关国雄旧部）和驻粤桂边的桂军第一师（师长刘震寰），均交林虎节制。

陈炯明如此部署，使刘震寰甚为不满，他久欲得到广西总司令地位，当然不愿意屈居林虎之下而受其节制。为此，刘蓄意反陈，借口到广州接洽军火，秘密赴香港，与孙中山驻港代表邹鲁见面。当时，孙中山为讨伐陈炯明，于10月19日将驻闽粤军许崇智部，组成东路讨贼军，又于10月25日派邹鲁为特派员，驻香港，其任务为“密纠滇桂各军，由梧州东下讨陈。”^① 邹鲁与刘震寰会谈之后，即按孙密令：委派刘震寰为西路讨贼军桂军总司令。这就为白马会盟争得的第一个与盟者。

当时，驻在广西的滇军推举杨希闵为总指挥后，便决定东下讨陈。他们派遣那博夫为代表，赴上海向孙中山请示机宜。孙中山

^①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6篇，第168页。

对那博夫“晓以大势，谓陈炯明犯上作乱，士众尚未归附，绝大多数不愿附逆，滇军可乘其军心、民心未固之时，疾趋东下，不难一鼓荡平。”^①并派孙科先到澳门筹款15万元，作为滇军开拔费用。11月8日，孙中山致函杨希闵，正式委任杨希闵为西路讨贼军滇军总司令，促其“把握时机，宜速图广东”^②。于是杨希闵成为白马会盟的又一个与盟者。

此外，桂军沈鸿英部转战湘赣回桂以后，甚感贫乏，他们力图重临富饶的广东，再“捞世界”。通过岑春煊与孙中山的关系，沈鸿英也被拉进讨陈的行列，被孙中山委为讨贼军中央直辖桂军第一路总司令。与此同时，沈鸿英又把广西自治军首领刘达庆也拉入讨陈行列，被委任为讨贼军中央直辖桂军第七军军长。于是白马会盟又增加两个与盟者。

与白马会盟有关系的，还有驻在梧州和肇庆等地的粤军军官。

粤军第四师第二团第一营中校营长兼梧州卫戍司令莫雄，虽属陈炯明部下，但对陈炯明之叛孙，甚感不满，是年7月，曾向其师长关国雄提出“立即统率海陆大军，从梧州东下讨伐陈炯明”的条陈^③，被关推却。莫又“诡称许总司令（崇智）正率领讨伐大军从江西进攻驻守韶关之陈家军”，并建议“俟许部攻克韶关，打到英德之后，我们立即从梧州响应。”^④但再次遭到关的拒绝。之后，孙中山派秘书林直勉、参军林树巍、廖湘芸、营长薛

①③④ 莫雄《白马会盟与滇桂粤联军讨伐陈炯明的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第243页。

② 那博夫《一九二二年滇军入粤讨伐陈炯明始末》，《云南文史资料》第1辑，第50页。参见《国父年谱》下册，第1107页。

岳、邓刚、副营长张国森（张猛）等6人到梧州活动，促使关国雄有所转变。“正在共同密商宣布独立后之部署，及动员作战各种计划之际”^①，忽然收到韶关密电，惊悉进攻韶关之北伐军已败退，孙中山已于8月9日离开永丰舰，绕道去沪。这不利的消息，使关国雄等有如冷水浇背，反陈计划又遭搁浅。接着，关国雄于8月中旬应召赴广州，在参加陈炯明召开的军事会议时，酒后暴卒。消息传到梧州，莫雄等便乘机扩大宣传，说关是死于陈的暗害，以激发该师官兵反陈复仇情绪。随后，陈炯明派熊略来梧州接任第四师师长兼驻防梧州陆海军总指挥。熊对驻梧军官虽多方笼络，但莫雄等仍暗中与滇、桂军联系，常在莫之营部与孙中山派来的代表廖湘芸、何民魂、张鲁藩等开秘密会议，筹划反陈军事。不久，孙中山密令委任莫雄为中央直辖第一独立旅旅长，杨胜广为中央直辖第二独立旅旅长，郑润琦为中央直辖第三师师长。莫、杨、郑等粤军军官便成为白马会盟的间接与盟者。

驻在肇庆一带的粤军第一师，虽是“属于中间状态的部队^②”，但该师参谋长李济深，团长陈济棠，营长邓演达等可谓有识之士，“既痛恨陈派之暗杀邓仲元（原第一师师长）又愤陈炯明背叛孙先生后弄到广东乌烟瘴气，于是经常密谋反陈运动”^③。他们曾在当年10月间，共推邓演达为代表，秘密前往上海，向孙中山请示机宜。孙中山指示说：“首先发动现在广西徘徊的张开儒滇军，刘震寰和沈鸿英的桂军，联合可靠的粤军，讨伐陈炯明，夺

① 见莫雄：《白马会盟与滇桂粤联军讨伐陈炯明的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

② 郭翹然、李洁之：《粤军史实纪要》，《广东文史资料》第31辑，第59页。

③ 李洁之：《国民革命运动中的粤军第一师》，《广东文史资料》第4辑，第26页。

回广东革命根据地，再作第二步的计划”^①。邓演达回来后与有关人士作了传达，并进行了相应的工作，相约与滇桂军在反陈军事上进行配合。他们虽未参加白马会盟，但是对拥孙反陈还是相当自觉和坚定的。因此可以说他们是白马会外的联盟者。

“白马会盟”是上述参加讨陈的滇桂军将领们所开的军事会议。^②由于是在广西藤县大湟江的白马庙举行，史称“白马会盟”。会议由杨希闵主持，刘震寰以视察蒙江防务的名义亲自到会，沈鸿英派黄应山为代表，刘达庆也是派代表参加的。会议于1922年12月26日召开^③。会期仅两天，所议内容主要是接受孙中山的使命，会商讨伐陈炯明的战略。决定会后滇桂各军立即行动，分别由西江两岸进攻梧州，然后集中誓师东下讨陈。各军即日易帜，改称“西路讨贼军”。以便和从闽攻粤的“东路讨贼军”相呼应。滇、桂军并与驻西江沿岸、梧州、肇庆等地的粤军莫雄、陈济棠、邓演达等部约定，“以诈败退至相当地点即起而倒戈。”^④

① 李洁之：《“国民革命”运动中之粤军第一师》，《广东文史资料》第四辑，第26页。

② 关于白马会盟参加人员，各说不一。据郭超然、李洁之《粤军史实纪要》中说“粤军亦有代表参加”。梅乔林在《孙大元帅返粤纪》中说：“……白马会议，是时魏邦平亦来参加。”（《革命文献》52辑）莫雄《白马会盟与滇、桂、粤联军讨伐陈炯明的回忆》一文中则说他本人有参加；毛思诚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则说：“杨希闵、范石生、张开儒、朱培德、刘震寰、沈鸿英等均参加”，廖行超在《第二次滇军入粤始末》一文中说：滇军奉孙先生令联合桂军刘震寰、刘达庆两部入粤讨陈。由此看来，粤军是否参加白马会盟尚属疑问。

③ 白马会盟时间，据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和邹鲁：《白马会议》的记载都作12月6日。莫雄记述是12月25、26日，毛思诚之《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则将此事列在12月底。据上海《民信日刊》1923年1月10日所载《本报专访函》中说是“旧历本月初九日”，按即阳历12月26日，本书取此说。

④ 魏继昌：《林虎所处时代和他在当时的活动》，《广西文史资料》第3辑，第139页。

白马会盟结束后，杨希闵、刘震寰、沈鸿英、刘达庆等各自通电，宣告就任孙中山所委新职，并分头进行军事部署，发动反陈军事行动。

三、入据广东

还在“白马会盟”以前，陈炯明对滇桂军的东下已有所戒备。受陈炯明委派“全权处理广西军务”的林虎，11月中旬赴湖南与赵恒惕商议“联省自治”问题。林在湘连续接到陈炯明发来急电，最后一电暗谓：“顷接梧州急讯，滇桂各军联合侵粤，不日发动，刻已调集各部，听候指挥，请速回粤为我臂助，幸勿稍迟。”^①于是林虎即经沪回粤，并即调集旧部号称“三黄散”的黄任寰、黄业兴两师及王定华一旅，赶来广州，以便驰赴梧州增援。但“三黄散”部队尚未到齐，而梧州已告失守。

原来讨贼军是不战而占梧州的。当讨贼军正准备行动，指向梧州时，驻梧州的粤军第四师团长吕春荣首先率部起义。粤军第四师师长兼梧州海陆军总指挥的熊略也无心恋战，于12月27日率该师杨锦龙团及第一师徐汉兴、陈修爵两团，撤退至肇庆。28日，莫雄率第四师第二团及杨胜广之补充团也在梧州宣布起义。30日，杨希闵、刘震寰、沈鸿英各部讨贼军陆续进抵梧州会师。杨沈两总司令即委莫雄为滇桂粤联军前敌指挥官。31日，滇桂粤联军在梧州誓师东下讨陈。联军的部署是：

滇军杨希闵部（不含范石生部）沿西江左岸，指向江口、封川、德庆方向进军；

^① 魏继昌：《林虎所处时代和他在当时的活动》，《广西文史资料》第3辑，第138页。

桂军沈鸿英部及粤军莫雄部，沿西江右岸指向虎头沙、鹿步方向进军；

桂军刘震寰部在滇军范石生部先头，沿西江左岸东下，指向封川，包抄肇庆之敌；

另派南路司令黄明堂率二十营起义军攻灵山向廉州进军。

在滇桂粤联军进攻梧州的战报传出后，陈炯明即委派叶举为西江前敌总指挥，率领梁鸿楷之第一师、陈章甫之第二师，前往封川、江口增援设防；同时派刘志陆、林虎进据肇庆，以协助叶举。陈炯明还散布“客军入境，亡省可虞”的论调，企图鼓动粤军加强团结，抵制滇桂军，但陈炯明的妄想未能实现。滇桂粤联军四万余众，势如破竹，只在鹿步、虎头沙打了两日较激烈的战斗，各路联军都进军迅速。在进军途中，粤军各部纷纷倒戈起义，大大增强了联军的声势。

桂军刘震寰部首先在梧州接受粤军第四师吕春荣团的起义，随即委任吕春荣为粤军第四师师长，归刘直接指挥。^①接着在都城附近之豆腐坑，又接受了原粤军第一师第四团陈济棠部起义，陈部亦归刘指挥，随同东进。^②于是刘震寰被推为粤桂联军总司令，粤军第一师工兵营营长邓演达亦在阵前起义，与莫雄部会合。

在讨贼军的进击下，陈家军兵败如山倒，西江沿线战略要地连接失守。陈炯明无奈，虽曾向湖南赵恒惕、云南唐继尧求救。但“远水救不了近火”，陈乃下令撤回“援闽军”以作后援，但也为时已晚。1923年1月8日，滇桂粤联军长驱攻入肇庆，陈炯明在广州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如果河口失守，即放弃广州，退

^①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6册，第194页。

^② 卜汉池：《桂军刘震寰的兴起与灭亡》，《广东文史资料》第15辑，第45页。

往惠州。

讨贼军乘胜追击，莫雄等部粤军一举占领三水，并沿广三铁路直扑广州；刘震寰部桂军，在包抄肇庆之后，飞速渡过北江，向花县新街迂回。1月13日，驻守三水之陈军陆兰青部，顺应形势，通电讨陈，加入讨贼军行列，接着粤军第一师师长梁鸿楷与第三师师长陈章甫发表通电：拥戴魏邦平主持粤局，亦即逼促陈炯明下台。在四面楚歌众叛亲离和无险可据的情况下，陈炯明乃于1月15日通电下野。率其残部撤出广州，退至惠州。

滇、桂、粤各部讨贼军，于1923年1月中、下旬，陆续开进广州城。

滇桂军响应孙中山号召，讨伐陈炯明而进入广东，本属正义之举，对于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和创建广东革命根据地，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滇桂军将领，出于野心和贪欲，入据广东，为的是抢占地盘、扩充实力。

孙中山为预防外来军队扰乱省城，本与滇桂军将领约定：“到达三水后，即转道北江出韶关，只让粤军进驻广州。”^①滇桂军将领对此置若罔闻。沈鸿英部由北面来，占了白云山、观音山（今越秀山）、瘦狗岭等制高点，还抢占了广州西村、石井及花县至韶关一带要地；刘震寰部则进驻广州东堤、大东门以东市区；杨希闵部占驻广州市中心至西关工商业繁盛地区，以及佛山、三水一带。滇桂军在所驻扎的地区，分防管辖，各霸一方。

为了争夺权利，他们都大力扩充武装力量。

沈鸿英部桂军，从贺县八步出发时，不过五六千人马，经

^① 此为叶挺所言，转引自罗梓材：《粤军第一师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54页。

过行军途中招降纳叛，强拉壮丁，骤然已扩展为 5 个军编制，共约 2 万余人。除沈鸿英自兼一军长外，其子沈荣光及部将李根深、李易标、吉日光皆提升为军长。

刘震寰部桂军，从梧州开拔时，仅一个师及一个支队，总共不过 7000 余人。进驻广州后的一两个月内，就扩为 3 个师，韦冠英、严兆丰、黎鼎鉴分别为第一、二、三师师长。各师之下仍辖两旅，共 6 个旅，以王达材、曾玉珠、冯启明、胡迪、万毅、叶楚藩分任旅长。还设一个警卫团，以刘震华为团长。之后又建立第四师，由参谋长伍毓瑞兼任师长，还成立第一军，由第一师师长韦冠英兼任军长。至此，刘震寰部共有官兵 15000 人。

杨希闵部在藤县集中时，原编制为 5 个旅。进入广东后，扩充为 3 个军、下辖 5 个师。杨希闵以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辖第一师，杨池生为师长；第二师杨如轩为师长。范石生任第二军军长，辖第三师，杨廷培为师长；另一补充团。蒋光亮为第三军军长，辖第四师，朱世贵为师长；第五师，胡思舜为师长。

滇桂军入粤后，既扩充武力，又割据地方，原来的讨贼军很快向军阀部队转化，使广东人民面临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的艰危局面。

第二节 滇桂军的叛乱及其被平定

一、江防事变与新街叛乱

1923 年 1 月中、下旬，各路讨贼军先后进入广州。当时陈炯明所设的行政机构，多因官兵逃离而相应垮台，新的政府尚未建立，社会秩序纷乱，一时陷于无政府状态。进城各军非自找驻

地、自筹饷粮不可。在此各自为政的时候，各军司令部霸占机关、委派官吏的有数十处之多。滇桂军占民房为营，开烟赌筹饷者，比比皆是。桂军李易标，自称“广东第一军”^①，用武力改派自己部属人员为地方机关官吏；并会同滇军收缴粤系讨贼军的枪械，连实力较强的粤军梁若谷部炮兵阵地营房，也被桂军攻下并缴了枪械；甚至党政要员邹鲁的卫兵所持枪械也被夺去。在“缴械风”蔓延下，粤军各部纷纷撤离广州，如陈济棠团便向新会、台山转移。这样，就更方便了滇桂军霸占广州。

由于争地盘、夺税收、抢枪械，造成各军特别是滇桂军与粤军之间矛盾重重。当时孙中山在上海得到讨贼军进入广州的捷报后，即电召在香港与留沪的国民党要员，速赴广州，商议大计。并以大元帅名义委任古应芬、程潜、陈德春、胡毅生、陈铭宽等五人为大元帅行营主任，时称“行营五主任”。起初，他们在广州就任，随后迁往江门，由古应芬负责。孙中山还“委许崇智为广东总司令，未到任之前，由魏邦平代理；邓泽如为广东省长，邓不就，由胡汉民担任；此外对刘震寰、陈策、温树德等都各有所委，这班人中以魏邦平为中坚，组织了一个“联合海陆军维持广州治安办事处。”^②该处时常集合讨论广州局势和存在问题，并对滇桂军之无法无天行为有所处置。于是主客军矛盾更为尖锐，滇桂军之矛头集中指向魏邦平、胡汉民等，从而爆发了“江防事变”。

1923年1月26日，由沈鸿英、杨希闵发起的“时局善后会议。”^③在江防司令部（滇军杨如轩之师部）召开，邀请广州军政

① 李易标自称其祖先是广东人，故入粤后将其所辖桂军，改称“广东第一军”。

② 朔一：《粤事变幻》，载《东方杂志》20卷2号。

③ 一称“海珠会议”，是因会址所在地名而来。

要人：省长胡汉民，粤军代总司令兼治安办事处负责人魏邦平①，以及邹鲁、叶夏声、李福林、刘震寰、刘达庆、温树德等共同商议。不料被邀请的人到会时，发起人沈鸿英和杨希闵却未出席。沈派军长李易标、杨派参谋长周自得为代表到会。会议开始时，大家推刘震寰主持。刘宣布开会理由后，魏邦平即提议各军应在防地禁赌，并将所占机关、商店、民房腾让出来。言犹未了，沈鸿英之悍将李易标②即拍案而起，对魏邦平严加责问，并指责魏有排斥客军的情事，声称要将魏统辖的粤军第三师缴械。魏当然不答应，李易标即拔出手枪向魏开火。魏见状即卧倒避弹，随即被李的卫兵捆绑，拘禁于别室。胡汉民、邹鲁等人在纷乱中，由刘震寰护卫离开会场，徒步逃往沙面日本领事署，转往香港暂避。刘震寰因不同意沈鸿英等如此胡来，③也为避免所部被沈军缴械，除留一部驻扎东堤和广九车站外，其余各部都从广州撤出，开往石龙、东莞城和虎门一带驻防。在江防会议上受命发难的刘达庆（中央直辖军桂军军长）与黄鸿猷（桂军第四军军长），为及时将事变情况向沈鸿英汇报，驱车行经东堤广西会馆对面李易标军驻地时，被自家人误认作胡汉民而被击毙于汽车之中。事变发生后，李易标收缴了警察枪械，沈鸿英擅自委派其第二军军长古日光兼任广州公安局局长。

“江防事变”发生后，孙中山返粤行期因而中止，并致函杨希

① 一说魏邦平兼任广州卫戍司令，后又受粤军一、三两师推举为广东讨贼联军总司令。见《沈鸿英传略》载《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一辑，320页。

② 一说是刘达庆、陈天太首先发难，沈鸿英亦出席。见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

③ 一说刘震寰也是沈打击对象，江防事变刘是漏网的。见廖行超：《回忆第二次滇军入粤始末》（未刊稿）。

闵，力劝“不宜轻听金壬^①，或稍自疑”，“当不忍以一朝之忿，而小忽百年大计”。^②至此，杨希闵亦有所悟，表示不能同意沈鸿英之所作所为，并拒绝沈部解走魏邦平的要求。仍软禁于农事试验场之滇军总部。拘魏问题引起社会强烈反映，知名人士唐绍仪等致电杨希闵、沈鸿英，指出：“前因粤局纠纷，各界请魏邦平君应以公等协力维持，乃闻暂被扣留，务乞俯准各界所请，即将魏君释放。”^③又经日本领事出面调停，粤军方面情愿缴出第三师部分枪械，^④以保全魏氏生命。于是延至二月六日，魏得以释放。

在社会舆论压力下，沈鸿英也在二月初发表宣言说：“援粤任务告终，应请孙、岑二老迅速回粤主持。”并派邓士瞻赴上海，迎接孙中山返粤；还让出市内防区，沈本人改驻市郊石井兵工厂，所部驻扎北江一带。

纵观拘魏逐胡的“江防事变”，是当时主客军矛盾的突出反映。发动者虽说是滇桂军将领，而罪魁祸首乃是贪婪成性、野心极大、手段凶残的沈鸿英。对比之下，杨希闵、刘震寰还是有所克制，加上粤军将领为免桑梓涂炭，较能委曲求全，以及社会舆论压力，终使这次事变未发展到极其严重地步。^⑤

江防事变平息后，孙中山于2月21日返抵广州，重建政权。宣布现为讨贼时期，不再称大总统，改称大元帅，在农事试验场

① 金壬：指巧言谄媚，引为卑鄙的人。

② 孙中山：《致杨希闵函》，（1923年1月31日），引自《孙中山先生遗札》，上海图书馆编印，1986年版。

③ 香港《华字日报》，1923年2月6日。

④ 《东方杂志》大事记1923年1月28日。

⑤ 参阅陈福霖：《一个中国革命家——廖仲恺的一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第285—288页。

设立大元帅府，以节制主客各部军队；同时，还保留了设在江门的大本营，委任程潜、杨庶堪、谭延闿等主其事；改任徐绍桢为广东省长；并令沈鸿英为桂军总司令、杨希闵为滇军总司令、刘震寰为卫戍总司令。使省城社会秩序得以逐步恢复。

孙中山为实现调和各派维持大局的宗旨，对于军事方面，提出改编、移防、裁遣三种处置办法：将在粤所有军队，编制为国防军与地方军两大类。以在粤的外省军队滇、桂、湘、赣各军为国防军，由大元帅直接指挥；以粤省各军为地方军，归省长指挥。又以主客各军防地未经指定，易致误会，发生冲突，特下令指派沈鸿英桂军开驻西江；朱培德滇军开驻北江；刘震寰桂军开驻东江；李烈钧收编各军仍驻潮汕；杨希闵所部滇军与粤军各师则令驻省拱卫。孙中山并在2月24日发出通电，表示“断然回粤，决裁粤兵之半，以昭示天下”；还特别指出：如果滇、桂、湘、赣各军有不愿裁遣的，则任令各回原省。

在粤各军将领，对于孙大元帅提出的军事处置办法，所采取的态度很不一致。其中滇军杨希闵表示“绝对服从”，颇得孙中山之赏识。大元帅府设在农事试验场，便是由杨部滇军负责警卫的。各部粤军也都表示服从，而且都要求大元帅要对沈鸿英桂军有所处置。孙中山当时最担心的也是沈鸿英，因他虽然表示听从大元帅命令，就任桂军总司令之职。但对于移防西江的命令，则置若罔闻。且不时以索饷来要挟帅府。声言“移防”，要求开拔费30万，只先撤退市内桂军；又任李易标为广东第五军军长，使驻守白云山及西村一带，作高屋建瓴之势，隐然威临广州东北隅；且石井兵工厂还在他掌握之中。后虽一度撤退观音山驻军，但复于4月3日再往回驻，真有退一步进两步的势头。滇军诸将及孙科等先后促其撤兵，沈皆以“西南护法宜和平统一为词表示绝对

服从帅座之意”。^①然而他实际上是脚踩两只船。表面上信誓旦旦地“拥孙”，实则与直系军阀吴佩孚暗通情款。当此事被人发觉而加以查询时，沈则辩解说：“与吴信使往还，不过私人情感，无与于军事。”^② 3月中旬，吴佩孚从江西密输步枪千支，弹药50万发，经韶关进入沈鸿英之司令部，还有北军人员易服潜入沈军等情。3月21日，北京政府下令特派沈鸿英“督理广东军务”（即“广东督军”），杨希闵为“军务帮办”。沈本有勾结杨希闵一起行动之意，北京政府也与沈默契，作出配合。以收买沈杨，联合叛孙。但由于孙中山对杨希闵的争取，杨亦不愿与沈合作，而使沈的计划落空。杨希闵公开声明，拒绝北京政府的“任命”。沈虽也与杨联名表此态，但实暧昧可疑。帅府洞见沈之情伪，乃由孙中山出面邀约沈鸿英到永翔军舰晤谈，观其诚否？沈心怀鬼胎，终不敢来。沈为了表示无异志，扬言移驻西江，索取开拔费10万，并为缓和局势，将李易标部自观音山移于石井；还佯令古日光部移驻西江，但又要求接管广三铁路。如此种种，其得陇望蜀之野心，更加暴露无遗。帅府洞识其奸，亦有所布置。命令朱培德部移驻广州，加强防卫力量；大本营移驻广州河南；并密令滇、粤、桂各军，注视事态之发展，作战斗之准备。

4月上旬，吴佩孚派遣密使至香港与沈鸿英暗通信息，沈约密使至花县新街晤谈，来使力促沈就职发难。沈答应从命。4月10日，沈召集其子沈荣光及亲信李易标、李根深、古日光等军长，开秘密军事会议。会议中，又得到桂系巨头岑春煊密电及汇款。沈等忘乎所以，以为时机已到，决定称兵起事。沈的兵力部署是：在前线之李易标部，分布于白云山至西村一带，沈荣光部

①② 李烈钧：《孙大元帅戡乱记》，《革命文献》第25辑，第485页。

增强第一线；后方部队则逐次增加于石井兵工厂至新街一带；征集粤汉铁路局机车六辆，货车、客车80辆以备军用。①

在进行军事部署的同时，沈鸿英于4月14日发表就北京政府所委广东督军伪职的宣言，“举就职事与帅府商榷，妄言和平统一，求帅座下野。”② 15日，李易标部开始运动，其左翼沈荣光部则横断白云山脉，以便李易标部接近观音山及农事试验场一带。当时农事试验场为滇军杨希闵总司令部，由于杨拒绝同沈合作，仍为保卫大元帅府的一支主力军。因此，沈把杨部滇军视为夺取广州、推倒大元帅的重要障碍，必先去之而后快。16日拂晓，沈乘是日为滇军公祭墓地之期，发动突然袭击。沈鸿英的“新街叛乱”就这样爆发了。

当叛军对滇军发动突然袭击时，滇军虽有所警戒，但未及周备，仓猝应战。滇军总司令部受到叛军三面围攻，观音山中间地区复被隔断，几次出现艰危局面。杨希闵亲率卫队与敌搏斗，军长蒋光亮、范石生等也亲自督战，躬冒矢石，士兵亦肯用命。特别是孙中山亲自来到滇军总部督战，与杨希闵一起视察阵地，激励士气，众益奋勉，大有灭此朝食之概。为对付沈军叛乱，帅府作出如下部署③：

1. 令滇军防御广州，伺机转攻；
2. 令李福林军之全部、朱培德军之一部实行增援；
3. 令在江门粤军作如下移动：（此令由飞机传达）

第一师开拔进省；

周之贞部开拔进省；

① 李烈钧：《孙大元帅戡乱记》，载《革命文献》第52辑，第486页。

② 陈福霖：《一个中国革命家——廖仲恺的一生》，第301—302页。

③ 李烈钧：《孙大元帅戡乱记》，《革命文献》第52辑，第487—488页。

海防舰队开三水，协助朱培德、蒋光亮部队作战；

第三师开赴肇庆，遮断西江桂军之增援部队。

4. 令刘震寰部以全力进出粤汉铁路，威胁沈军之侧背。

当时帅府军与叛军兵力比较可列表如下：①

帅 府 平 叛 军		沈 鸿 英 叛 军	
右翼地区	李福林军 1000人	白云山东北地区	沈荣光部 5000人
	中央直辖桂军 1000人		李根瀛部
	刘震寰军 4000人		
中央地区	滇军总司令部	白云山正面	
	滇军第一师 2000人		
	滇军第二师 2000人		李易标部 5000人
	中央直辖第三军 1000人		
左翼地区	滇军第三师 2000人	粤汉线方面	古日光部 2000人
	滇军第二师一旅 1500人		石井
	巩卫军一旅 1000人		新街
	桂军第一师 1500人		同总预备队6000人
合 计 17000人		合 计 18000人	

平叛战斗开始后几天战况激烈。

17日平明即开战，双方炮火猛烈，沙河、观音山方面之叛军被逼迫退守白云山南麓，午后滇军乘胜追击，叛军据白云山腹部一带高地顽抗；右翼方面刘震寰军与李福林军协同驱逐广九铁路石牌车站一带之叛军，向龙眼洞方向推进；刘、李两军并合击瘦狗岭叛军，苦战不下；韦冠英部桂军驰援滇军，决定合击西村北

① 《革命文献》第52辑，第490页。

侧高地之叛军。

18日午前刘震寰军攻下瘦狗岭，李福林军迂回向白云山转进，滇军第一、二、三师合力攻占白云山。由于白云山各阵地向来多筑有工事，攻击不易，旅长杨廷培亲冒弹雨，率兵猛攻，经过三次反复，终于到达山巅，夺得制高点。其他在东面的李福林、卢师谛、刘玉山等部，以刘震寰为总指挥，在南面作战的各军，以杨希闵为总指挥，协同攻战，并力同心，三面围击，使叛军支持不住。而在粤汉铁路之联军，又以优势夺取三元里、西村。帅府复派飞机侦察敌情，投放炸弹，使叛军首尾不顾，军心惶恐。

19日叛军士气已经低落，军无斗志，白云山阵地被攻破，石井兵工厂也守不住，纷纷向北江溃退。至此广州近郊已无叛军踪迹，战事转移到北江。

沈鸿英原拟于新街附近，选择阵地，开辟第二作战线，但因叛军抢劫城乡，遭到商团围攻，20日被迫撤出新街。改以源潭为第一道防线，黎洞为第二道防线，韶关为第三道防线，于粤汉铁路沿线设防，继续挣扎。

大元帅府命令平叛各军，组成滇、桂、粤联军，由杨希闵为追击总指挥。联军在军田集中，23日，各军大部到达新街附近，并进入战场。此时东江陈炯明军杨坤如部，乘机出兵扰乱石龙，刘震寰部桂军伍毓瑞师受命前往驱逐，杨希闵滇军杨廷培旅协同巩卫军担任省城警备。

当战事在新街一带相持时，叛军于25日由南雄搬来北军增援部队数千人，利用有利地势，装备机关车，向联军发动冲锋，势颇猛烈。刘震寰、刘玉山等部猝不及防，几至冲散；滇军一部增援，亦陷于不利地位。于是，滇桂军主力部队乃转移至流溪河南

岸，与叛军隔河对峙。由于北岸叛军士气未复，地形复杂，既不能有所动作，亦不得不再行后退到新街、军田之间。帅府令联军准备攻击，由范石生部首先发动。

30日，拂晓开始总攻击，双方火力均甚猛烈，滇军胡思舜部与粤军卓仁玑旅等部均来增援，叛军力不能支，遂弃军田阵地，向银盏坳溃退。是役杨希闵、蒋光亮、范石生等将领，均亲临前方督战，各军分地而守，人自为战，蒋光亮等勇迈将领多负伤。当时外报评论：“南方近役以此为最激烈”^①。5月2日，联军攻占银盏坳，3日进驻潖江口，4日击破黎洞，6日夺取英德，7日中午联军到达河头车站。真如破竹之势，叛军一败涂地，三道防线全被联军攻破，虽有后台吴佩孚来电令，死守韶关待援，沈也无力遵行。9日，沈率叛军仓皇退出韶关，兵分两路逃窜：一路是江西来的援军两旅，向南雄、始兴撤回江西；一路是沈鸿英自家的部曲，转道湖南向广西贺县老巢而去。至此，沈鸿英叛军在北江的势力已全部肃清。

此外，沈鸿英所属桂军，原在西江肇庆驻扎有三旅之众，其中刘玉山、陈天太两旅在4月10日已向帅府投诚，并参加了讨沈作战；剩下张希栻旅，战事一开始即被围困。由于帅府重视肇庆所处的战略地位，夺得肇庆，既可隔断沈军来自广西的后援，又可断绝沈军由西江回桂的退路。故帅府派遣程潜率领陈策、周之贞、梁鸿楷等水陆大军，在4月下旬已夺取要隘，击退梧州来的增援桂军，并将张希栻团团围困在肇庆城中。围城半月，至5月10日张希栻在弹尽粮绝情况下兵败城破。从此，沈鸿英叛军势力在广东已全部被歼灭。

① 《革命文献》第52辑，第496页。

沈鸿英是个惯匪出身的军阀，他贪婪成性、反复无常，根本不知名节、羞耻为何物。他一向奉行“有奶便是娘”、唯利是图的信条。他加入“白马会盟”，名义是为了“拥护孙中山、驱逐陈炯明”，但骨子里他只是为了“捞世界”。在这之前他曾追随旧桂系首领陆荣廷、莫荣新进入广东，抢夺掳掠，发了大批横财，后随着旧桂系的倒台而被逐出广东。沈鸿英贼心不死，念念不忘重到富饶的广东，再捞一把。这次他乘驱陈之机，再度入粤，其野心、残暴、贪婪，显得特别突出。进入广州刚10天，他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江防事变”，再过3个月，他又在新街发动武装叛乱。在这两次事件中，沈鸿英都曾企图拉拢滇军统帅杨希闵和桂军统帅刘震寰与之合作，但事与愿违，杨、刘在江防事件中，不敢奉陪；而在新街叛乱中，更与之兵戎相见。这就说明沈鸿英的所作所为，是多么不得人心，连杨、刘之辈也不甘为伍。

本来杨、刘与沈，同属入粤之客军，沈动之以“主军排外”的挑拨之词，未尝不起作用。但杨、刘亦非等闲之辈，拥兵自雄、唯我独尊之野心亦不弱于沈。且当时孙中山的改编国防军与地方军之措置，暂时对杨、刘有安抚作用；孙中山在政治上军事上，声威正盛。故杨、刘的权利之欲，不得不有所克制，宁愿做大元帅倚重的将领，不愿做沈鸿英叛军之部曲。且刘震寰叔侄两代，早已领受过沈鸿英背信弃义的苦果，殷鉴不远。所以他们不仅不与沈为伍，而且还接受孙中山之调遣，在平定沈军叛乱中出力建功。杨刘此时的作用是应该肯定的，他们对于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是有汗马之功的。

二、杨、刘在广东的倒行逆施

滇桂军驱逐陈炯明，受到广东人民的欢迎，但他们进入广州

以后的所作所为，却使人们深恶痛绝。他们在广州既抢夺战略要地，又霸占繁荣市区，把广州及其附近地区弄得乌烟瘴气，社会极不安宁。

他们的倒行逆施，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开放烟赌，毒害社会。

赌博与吸食鸦片，是广东地方的两大毒害，一直遭到正直人士的谴责与禁止。辛亥以后，窃踞广东的外省军阀，却又都大加提倡，为的是包揽烟赌税收以图利。滇桂军将领更是变本加厉，居然公开地在所霸占地方，“大开烟赌、番摊、牌九、色宝、花会等，无奇不有，鸦片烟馆林立”，^①并派武装人员加以保护。据统计：“从1923年4月起，至其失败时止，约莫两年时间，刘震寰、杨希闵在广州所分得的烟赌税，每月以8万元计，总共190多万元（硬币）。”^②

开放烟赌，不仅毒害社会，对于滇桂军本身，也是腐化之源。虽然滇桂军形式上曾有禁止官兵吸食鸦片之命令，但实际上，上至总司令，下至伙夫，莫不是“瘾君子”，故有“双枪军”（步枪加烟枪）的称号。有的官兵中毒甚深，公然横陈共吸，禁令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有了鸦片嗜好，就如恶魔缠身，经济上也是不胜负担的。加之赌场遍地，酒楼林立，妓馆淫所比比皆是。这般醉生梦死的军人，就有战时出生入死，平时大吃、大喝、大嫖、大赌的习性。因此在在需钱，无法应付。于是违法乱纪，强买抢劫之事就多如牛毛了。

第二，吞并友军、扩充实力。

凡抱有野心的军人皆以“有兵即有权，兵多权就大”为信条。

^{①②} 卜汉池前引文，《广东文史资料》第15辑，第45、65页。

滇桂军进入广东后，便千方百计扩充武力。他们要枪，就去收缴、抢夺别人的枪械；他们要兵，就去掳掠，截夺别人的兵丁。可谓不择手段、不顾影响，什么事都干得出来。1924年11月初，黄埔军校从上海运来新兵97名。途经滇军胡思舜部驻地，全数被其截留。虽经在场接兵人员及黄埔军校派出代表据理交涉，但均置之不理。是月13日，蒋介石以校长身份亲自出面，致电杨希闵总司令。电文先述胡思舜部截留军校新兵的经过，继而郑重指出：“敝校与贵军，一体相关，素敦袍谊。尤佩慕耕（胡思舜的字）军长，义气高深，治军严肃，当不致有意为难，敌视至此。”并要求杨希闵以总司令名义下令放还新兵，“以重纪律”。“否则随便扣夺，相习成风，信义纪律，等于弁髦。何以立党？何以治兵？”^① 经过蒋介石的抗议后，杨觉得与蒋还不能撕破面子，乃下令胡思舜放还。5日后，胡只送回32名^② 作为敷衍蒋的面子而已。

商团事件中，滇军将领范石生和廖行超曾以武装调停为名，与商团勾搭图利。受到孙中山指责是“阳拥政府，阴护商团的行动”，声明“绝对否认允许调解条件”令范等罢手。^③ 范石生还要趁火打劫，向黄埔军校讹诈长短枪2000余支，以装备自己的军队，达到目的后，才答应不支持商团的行动。^④

除夺人抢枪外，吞并友军的事也常有发生。其中突出的如滇军第一师师长赵成梁，1924年底驻军韶关。当时建国军第三师也驻韶关。该师师长卢师谛随孙中山北上，其部队交由参谋长成超北带领。赵成梁勾结成超北，发起突然行动，将卢师谛师缴械。为了掩人耳目，在布告上胡说：“卢部因易将风潮发生，不守纪

^{①②}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七编，第334—335页。

^③ 引自魏宏运：《孙中山年谱》。

^④ 《向导》周刊，第79期，1924年8月20日出版。

律，扰乱地方，由本部予以缴械”。^①就这样赵成梁把卢师谛部加以吞并。

第三，委官设卡，争夺税收。

滇桂军每驻一地，都首先抓行政和财政权力，滇军第一师驻防北江地区，即由该师保委曲江、南雄等县的县长；第二师驻花县，即保委花县县长；第四师驻清远，即保委清远县长。若地方官非其所保委的人，就会百般刁难，非弄走不可。滇桂军驻到哪里，哪里就是他们的天下。师部公开在各驻地征收各种捐税，其名目之繁多，不胜枚举。而师以下的旅、团甚至营长，也都在所驻地方征收捐税，往往一种捐，可以由师、旅、团、营长多次征收。由于驻军所在地区经济情况有差异，捐税收入也就有等差，丰啬肥瘦，各不相同。因而部队与部队之间，为争富地肥缺而发生磨擦。上级见到下级税收多，也不免眼红，就利用职权向下级压榨，明争暗斗之事，层出不穷。

滇军第二军第三师师长杨廷培，因在驻地包烟包赌，赚得数十万巨款，为军长范石生所嫉视。1923年冬，杨廷培携该军公款35万多元，前往上海采办军用品。他先以个人名义将此款分别存入上海商业银行20万元、广东实业银行15万元，以备办货支付。旋因事中途返粤，突被范石生以计扣留，随即以携款潜逃罪名而将杨处死，^②并夺其财物归入范之私囊。^③但未顾及杨携往上海办货之公款的处理问题，杨廷培之兄杨廷英遂钻此空子，到上海

^{①②} 张适南：《滇桂军杨希闵、刘震寰两部入粤之经过》，《广东文史资料》第42辑，第236页。

^③ 那博夫：《一九二二年滇军入粤讨伐陈炯明始末》，《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55页。

延聘律师，具状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声称“存款为杨廷培遗产，请求给谕为遗产受理人。”会审公廨令其登报声明，再行核发。范石生得此消息，立即派二军参谋长田钟谷赶赴上海，也延聘律师具状呈廨，提出“杨廷培在该两银行存款，系二军公款，非杨氏个人私有”，不得作杨氏遗产处理。双方经过一番诉讼，结果，会审公廨以“上海只承认北京政府”为理由，将田钟谷的“声请驳回”，并“给谕杨廷英管理杨廷培之遗产。”^①仅从这件事，足可窥见滇军将领争夺税款之激烈程度。

滇军第三军军长蒋光亮，曾驻防广三铁路沿线富庶地区，大肆搜括民脂民膏，甚至骑劫缉私舰艇，在南海县九江镇设卡抽税。桂军刘震寰部私自扣押运盐船只，使商旅裹足。孙中山为此非常气愤，命令全部放还，今后不得再留难船只，以维交通。^②不仅如此，凡是滇桂军霸占的地区或部门，都成了他们的独立王国。如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控制广东兵工厂，对该厂生产的枪械，他用作交易，随意分配，甚至在出厂的枪支上烙上一个“范”字，把兵工厂的产品，视为他的私有财产。^③他们不仅垄断税收，还在金融方面进行掠夺。滇桂军入粤时，市面上通用二角毫洋辅币，二角以下则是铜板，各省通用的大洋，广东一律不用。滇桂军乃私自铸造毫洋硬币以牟利^④。这些毫洋硬币成色不足，最高者不过八成，最低的只有二、三成，因此毫洋信用不高，以致港英当局就利用这个机会，大量向广东流通其上海香港汇丰银行钞票（通称港纸），以吸取广东人民的血汗，而滇桂军通过私

① 《二军存款竟判归杨氏》，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月20日。

② 《广东军阀史大事记》，第176页。

③④ 刘少伯：《滇军杨希闵部入粤见闻》，《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94、95页。

铸成色不足的硬币，也大捞了一把。

由于滇桂军把持税收，使大元帅府财源枯竭，作为财政部长的廖仲恺，也不得不向滇桂军将领手中去求款。例如为支付黄埔军校的经费，“往往夜里到杨希闵吸食鸦片的烟床旁边，去等杨希闵签字，然后才能领到款送黄埔军校。”^①由此可见，滇桂军将领把持财政税收是达到何等严重的程度。

滇桂军把持税收，化公为私，将领们均大发横财，腰缠万贯，一掷千金。师长赵成梁驻军韶关时结婚，却到广州第一公园大摆筵席，仅搭宴会彩棚工料费即用7000余元，平日生活奢侈可知。军长范石生长期在豪华的亚洲酒店六楼包有专房，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军长蒋光亮，在贪得巨额赃款后，擅自脱离部队，携款数百万，溜到上海滩，托庇于租界，过其豪华的寓公生活。^②但好景不常，其款被上海财阀、地痞骗光。因蒋告到法院，人们才得悉其所得赃款数目，引起舆论哗然，蒋光亮终因此潦倒而死。^③

第四，克扣薪饷、纵兵抢劫。

滇桂军将领把部队视为私产，看作自己争权争利的资本。他们垄断地方税收，又贪得无厌地向大元帅府索饷。每次出师，他们先要敲一笔巨饷，以饱私囊；然后仍是按兵不动，或踏步不前，或作战不力，以求保存实力。对于滇桂军的种种所为，孙中山甚为不满，曾严厉地训斥他们：“……你们只知向我要钱，要饷，却不愿东出消灭敌人，你们叫我孙某一个人怎么办呢？我回广东是为了革命，而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来的。你们如果不愿意跟我

① 何香凝：《回忆孙中山和廖仲恺》，1978年三联书店版，第38页。

② 刘少伯：《滇军杨希闵部入粤见闻》，《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94页。

③ 张适南前引文；《广东文史资料》第42辑，第235页。

革命的话，随你们造反我也不怕。”^① 尽管孙中山作出如此沉痛的警告，但他们还是无动于衷。

滇桂军将领领到薪饷，往往任意克扣。如刘震寰部“全官兵，从藤县集中时起，每日只发伙食，官佐四角，士兵二角和各部的办公费。官兵的薪饷均未清发过，逼得各级带兵官，层层都吃空额。”^② 士兵衣食不足，更易滋生事端。军纪败坏，至于极点。拦路抢劫，时有发生。甚至出现“三几个军官，胆敢收缴别军军官自佩手枪”的怪事。粤军旅长莫雄，在财厅前（今北京路北端）就曾被滇军官兵数人包围，收缴去一支三号左轮手枪。^③ “当时维持治安的巡警队，就常有与滇桂军横行霸道的官兵武装冲突之事。”^④ 滇桂军坐车、上馆子，不付钱是常事，警察负有维持治安责任，出面干涉，必致动武，有时甚至将警察当作活靶击毙。因之警察除管理交通外，对军队任何行动都不敢过问。滇桂军横行无忌，对有枪的军警尚且如此，而对手无寸铁的市民百姓，则更不在话下。故百姓对滇桂军是畏之如虎，恨之如蛇。一到晚上，家家关门闭窗，并与亲友约定暗号，不对暗号绝不开门，以防滇桂军前来骚扰。

孙中山对滇桂军的所作所为，亦感深恶痛绝。1924年元旦，孙中山在各军将领集会上，对滇桂军将领说：“你们于民国十二年春间，替我出力赶走陈炯明，我是很感激你们……你们派人到上海请我回来，说要服从我的命令，实行我的主义，我更是感激你们。所以我便回来了。谁知你们却是戴着我的帽子来蹂躏我的家

^① 莫雄：《白马会盟与滇桂粤联军讨伐陈炯明的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第245页。

^② 卜汉池前引文，《广东文史资料》第15辑，第46页。

^{③④} 莫雄前引文，《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第246页。

乡。”^①孙曾下决心对骄兵悍将进行“严厉整饬，以肃纪纲”。初拟任命罗翼群为大本营军法处长，“责令执法以绳”。当时罗翼群认为军纪败坏已极，而大本营实力有限，对滇桂军实无法加以克制，故坚辞不就军法处长之职。罗在辞呈中有“假令一一执法以相绳，将使人人伏法而后可”的警句^②，以说明不能奉命的苦衷。孙中山后来又拟派粤军将领张民达兼任广州公安局局长，当廖仲恺为此事向张征求意见时，张回答说：“滇桂军挟东江残寇以自重，在广州市无恶不作，市民侧目。如我任公安局长，不给他们以制裁，将无以副市民之望，有尸位素餐之耻；若加以制裁，则枝枝节节不解决问题，彻底解决尚未闻有整个计划。因此，市公安局长一职难以兼任，愿专心治军，枕戈待命。”张民达这番话说得通情达理，廖仲恺表示同意。“允向孙中山说清楚”^③。于是，孙中山也只能暂且忍耐，乃命令滇桂军大部分开赴东江，既以警戒陈炯明叛军，也可以减少其对省城的祸害。在当时情势下，只能作出这样的不彻底的解决办法。

三、杨、刘的叛乱及其被平定

如前所述，滇桂军进入广东，并不是真正拥护孙中山，支持国民革命，而是为了霸占广东地盘，为了“发横财”，因此他们离开革命队伍，背叛革命政府，是势所必然的，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1925年初，孙中山北上病重逝世，广东革命军东征陈炯明，

^① 转引自汪精卫：《在黄埔军校就任党代表时的讲话》，《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六编第二章，第7页。

^② 罗翼群：《记孙中山南下护法后十年间粤局的演变》，《广东文史资料》第23辑，第39页。

^③ 张慕融：《张民达传略》，《广东文史资料》第23辑，第39页。

给杨刘提供了叛乱的时机。

当年2月1日，东征军出发，兵分三路：杨希闵统率滇军作为左翼，由河源、老隆以趋兴宁、五华；许崇智、蒋介石统率的粤军、黄埔校军为右翼，由海陆丰直趋汕头；刘震寰统率的桂军为中路，负责围攻惠州城。①

东征出师以后，很快出现两个截然不同的战场：

右翼的黄埔校军和粤军，2月初出发，“由虎门而东莞、而石龙、而樟木头、而塘头厦、而平湖、而龙岗、而淡水、而白芒花、而平山，为时半月，驰驱数百里。”②真可谓势如破竹。“从出发到攻取平山，其中的经过，很可表示一点，就是：革命军自有革命军本色。”③自占领平山后，陈炯明军多无斗志，一路溃逃，海陆丰皆入革命军之手。乘胜东进，经河田、河婆、棉湖、普宁、揭阳，于3月6日直抵汕头。

与上述情形相反的是左翼滇军和中路桂军。

起初，在右翼军胜利进军的声势和民众的支援下，滇军也攻克了博罗，桂军也兵临惠州城下。但他们却不愿乘胜进击，而是松松垮垮，将不用命，士无斗志。尤其令人惊奇的是，当粤军、黄埔校军与陈炯明叛军苦战之际，他们仍按兵不动，对孙大元帅3月3日从北京病榻发来的电报：“卧病兼旬，得闻捷报，胜于良药。右翼深入，击破洪兆麟、叶举；须中、左两路并进，乘胜击林虎，潮梅可定”，杨刘也置若罔闻。以致陈炯明叛军林虎部主力得以从容集中，反过来袭击东征军右翼，企图一举扑灭黄埔校军于揭阳、汕头之间。他们想不到黄埔校军回师棉湖而能战胜林

①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五篇，军事工作，第三章，第10—11页。

②③ 蒋先云：《由前敌归来》，载《中国军人》第二号，1925年3月2日出版。

虎军五师，并根本剿灭林虎总部于兴宁。从而“搜获杨希闵等与敌军来往密电，始悉其勾结奸谋。”^① 杨刘等滇桂将领不仅是拥兵自重，保存实力的问题，而且是通敌有据、危害友军的问题了。

杨刘的这种叛卖行动，绝不是偶然的。一是他们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孙中山北上病重，广州革命政府群龙无首，是他们霸占广东的大好时机；二是滇系首脑唐继尧对他们的诱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唐继尧一向以东大陆主人自命，不以云南省长为满足，他趁孙中山病重的机会，积极活动控制广东革命政府。1925年2月，刘震寰秘密赴滇，与唐继尧商定“关于滇、粤、桂合作计划”。^② 其概要如下：

一、滇、桂、粤实行合作；

二、团结西南，进窥武汉，奠定大局；

三、对桂以大部滇军，联合沈军，解决李、黄；

四、李黄解决后，进向梧州入粤；

五、桂局由刘震寰完全主持；

六、对粤分甲、乙两种办法：

甲、如大元帅无恙，对内对外一切事宜，均以大、副元帅名义行之（政治、外交由大元帅主办，军事由副元帅主办）

乙、如大元帅不幸，办法分列于下：

1. 应以新派出之滇军合同在粤滇桂军肃清粤局；

2. 公请副元帅赴粤主持一切，继续北伐。

这份合作计划表明了唐欲利用在粤滇桂军势力，向珠江流域

① 胡汉民：《处分杨刘叛军通电》，《革命文献》第11辑，第285页。

② 引自陶任之：《一九二五年春，滇桂军南宁之战》，西南军阀史第五次学术讨论会论文。

发展，而刘则依靠唐之“奥援”，控制广西。计划订立之后，唐即以“建国联军总司令”名义，派出四万人马，由龙云、唐继虞、胡若愚分别率领进犯广西。唐军出发之前，曾派代表对李宗仁、黄绍竑进行拉拢，引诱李、黄“合作”，但为李、黄所拒绝。^①于是，龙云军便于2月25日侵占南宁。李宗仁、黄绍竑率桂军在南宁以东一带予以坚决的抵抗。

唐继尧为了实现其计划，还必须争取杨希闵的支持。对于驻粤滇军，唐继尧早就施行拉拢分化之策。如若不能收为己用，必使消灭而后快。杨部初到广东时，唐派了张时初来粤，以同学关系拉拢周自得和杨廷培，事被范石生侦悉，即将张时初沉溺于珠江，^②以示与唐决绝。但唐仍不死心，继而陆续派出詹秉忠、李云鹤、杨镜涵等人，常驻香港，就近与驻粤滇军将领联络、拉关系。当1925年2月唐继尧与刘震寰密订合作计划，并企图派兵经桂入粤，范石生高唱回滇讨唐报仇时，唐对驻粤滇军工作，就更加抓紧进行。由于范曾约廖行超一起回滇，唐更为恐慌。唐之代表詹秉忠等就极力拉廖，劝廖不可与范合作，希望廖在外省发展。廖对他们说：“我不回滇可以，但我有两点要求：第一，我在外发展，要有新兵补充，将来我派人回滇招兵，请地方政府予以帮助；第二，我二师现有伤残官兵300余人，我要陆续筹款，分批资送回乡，亦请云南政府加以保护，并协助他们藉资遣费谋生。”^③唐继尧一概允诺，不到一个月，就招得新兵300余人，3个月共招得八九百人，护送到粤；伤残官兵亦资送完毕，使廖行超非常满意。对于杨希闵的争取，唐更为慷慨，“筹集多金饵杨，得

① 《黄绍竑五十回忆》，1970年香港版，第94—95页。

② 廖行超：《回忆第二次滇军入粤始末》（未刊稿第45页，原件藏云南省政协）。

③ 廖行超：《回忆第二次滇军入粤始末》第45—46页。

其允诺，即可实现。”①

大元帅府侦悉刘杨与滇唐勾结图霸两粤，特允桂军李宗仁、黄绍竑的要求，调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部赴广西。以协同桂军阻止唐军由南宁东下。范石生部与李、黄桂军合组“援桂联军”。②范石生为第一路司令，李宗仁为第二路司令，黄绍竑为第三路司令，李济深为第四路司令。

范石生率领的援桂联军，于1925年3月1日从广州出发，3月9日抵广西贵县，同李、黄部会合，共同发表讨唐通电。接着在南宁附近展开苦战，击溃唐军，逼得龙云向唐继尧急电求援：“失利退守（南宁）城中，被敌重围，坐陷绝境，范逆势优，势难小视。回滇恐成事实……前途难云。”③唐继尧即令胡若愚、唐继虞等“督师火速入桂兜击，一面设法与各路军队联络互助，务期一举而歼灭之，勿使蔓延。”④同时，积极布置刘、杨在粤抓紧时机，予以配合。电促“显丞（刘震寰）速回布置，蹑范后尾，乘机夹击。”⑤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唐继尧乘机于3月18日在昆明宣布就副元帅职。这理所当然地遭到大元帅府的反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3月27日召开第七十次会议，议决反对唐继尧就副元帅职，并发表通电，号召讨唐。4月初刘震寰心怀鬼胎，以所部桂军名义发出宣言，指责国民党中央通电讨唐之不当。4月4日刘震寰伙同杨希闵，从香港向唐继尧拍发密电，文

① 唐继尧：《致胡若愚、龙云电》，1925年5月22日，原件藏云南省档案馆。

② 《时事报》，1925年3月13日。

③ 龙云：《致唐继尧电》，原件藏云南省档案馆。

④⑤ 唐继尧：《致胡、唐、张、总司令电》，1925年3月16日，原件藏云南省档案馆。

曰：“刘震寰、杨希闵宣言独立，推戴唐公为副元帅。”^①唐接此电，欣喜欲狂。即以“军、特、十万火急”电告龙云等部将，转述刘、杨拥戴电文，给部下打气。刘震寰也积极准备拉队伍去广西，以实现其与滇唐夹击范、李、黄联军，夺取广西地盘的迷梦。4月8日，刘部第三师师长黎鼎鉴，接受唐继尧以“副元帅”名义委任的“援桂军前敌指挥官”职务，并赴桂林就职。但刘震寰本人则鉴于时机尚未成熟，又受到代理大元帅胡汉民等劝阻，遂暂缓回桂。

这时，刘震寰、杨希闵虽未公开叛变，但已密锣紧鼓地进行备战。先是抢占战略要地，为桂军韦冠英部突抵花县新街驻防，抢占李福林粤军防地，经开战，桂军后退至军田，并将奉帅府令由韶关返抵花县新街之谭延闿部湘军与程潜部攻鄂军2000余人，逼迫折回。杨希闵以卫戍司令名义，于3月18日致函许崇智粤军驻省司令部，声称：“现值军事时期，本部有卫戍之责，所有各军后方留守部队，均应由本部检查，贵军亦应援案检查。”^②又通令前线各军，不许回广州，否则缴械。并令其第一师师长赵成梁率所部在白云山架大炮，控制北郊；又在近郊要隘，均派滇军把守。杨、刘这种作法，显然是在广州发动叛乱而作的部署。

大元帅府有鉴于此，乃电促杨希闵进兵河源、老隆，肃清东江残敌；并令桂军韦冠英部速攻惠州，借以防止杨抽兵回穗。

滇桂军的调兵遣将，引起社会不安。为缓和舆情，麻痹人民，驻防广州的滇军第一军第一师长赵成梁，在4月18日，设宴招待新闻界人士，表示拥护国民党中央第七十次会议之决议；反

① 原件为英文，藏云南省档案馆。

② 《广东军阀史大事记》，第214页。

对唐继尧就副元帅职，并宣布三事：一、对革命政府誓死保护；二、对广州治安完全负责；三、请勿轻信谣言。杨希闵以大元帅府允委他所保荐的夏声为兵工厂委员长的交换条件，于5月3日在谭延闿、许崇智、程潜联名讨唐通电上列名。但当唐继尧的代表“面询给基（杨希闵）则又否认”。^①可见杨列名讨唐通电，只不过是虚与委蛇。次日，杨又在广州谢庐，遍宴在穗各军军政长官，商讨所谓“巩固粤局，团结西南的方法”，也是故作姿态罢了。

杨希闵在施放了上述烟幕弹以后，于5月6日乘夜轮潜赴香港，会见了段祺瑞密使张星浦，共谋颠覆广州革命政府。“杨准备接受广东督理的位置。”^②

刘震寰在4月30日参加胡汉民代理大元帅在广州颐养园召集的各军总司令会议后，亦潜赴香港，与杨等同寓英皇大酒店，进行秘密活动。

5月中、下旬之间，反对广州革命政权的各派人物，齐集香港英皇大酒店六十号房开会。唐继尧^③、杨希闵、刘震寰、马素（国民党右派头目，已被开除出党）、陈廉伯（反动商团头目）均亲自出席。段祺瑞、陈炯明、林虎、邓本殷以及港英当局则派代表到会。共同决议：由港英当局负责供给军火，合谋进攻广州。^④以实现其颠覆广州革命政权的阴谋。

会后港报透露，“杨（希闵）赴港乃与陈炯明派就广州情况交

① 唐继尧：《致胡、龙总司令电》，1925年5月22日，原件藏云南省档案馆。

②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1辑，第65页。

③ 说唐继尧是派代表与会的。现据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26日所载“确息”：谓唐继尧于5月20日抵港，寓英皇大酒店48号房，段祺瑞代表张星浦亦在此下榻。

④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83页。

换意见，据说杨为巩固其地位，与陈相约，使本省将由国民党中非布尔什维克所控制。”^① 马素也在港报上发表文章，声称：“目前广州政权是在苏俄代理人所支配。目前政治的症结，就是布尔什维克与反布尔什维克的两党斗争”。并煽动说：“广州当局现在想方设法，用粤人治粤的口号来催眠人民，如此制造空气，使外省军队发生混乱，而鼓舞了要把广东变为红色政府支配下的共产党人。”^② 从上述言论来看，他们企图把反对广州革命政权的叛乱说成是“反赤化”运动，而他们之所以发动叛乱，则是由于“粤人治粤”的口号，是排外的结果，显而易见，这不过是为即将发动的反革命叛乱所作的辩护词。

由于滇桂军已陆续从东江撤回广州附近，杨刘又在港逗留，迟迟不归。大元帅府和国民党领导集团，日益感到局势的严重。必须采取对策。但在采取对策问题上出现分歧：一些人主张“调和”，反对以武力解决，如邹鲁等，邹鲁还亲自到香港去做“争取”、“说服”杨刘的工作；一些人则主张镇压杨希闵，而不同意打倒刘震寰，如胡汉民等；还有一些人则同意攻打桂军，对镇压滇军则有保留，如谭延闿、朱培德等。^③ 只有廖仲恺等左派决心平定杨刘叛乱。为此，廖仲恺向各有关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为了说服谭延闿下定决心，廖仲恺和总顾问（指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一起，几经登门拜访，向他反复描绘北上打到长江之后，将会出现

^{①②} 《粤海关档案》，1925年5月9日、5月29日情报。

^③ 据陈公博《苦笑录》（香港大学1979年版）记载：镇压杨刘时，邹鲁跑到香港，对陈公博说：“这次军事，我真不愿意过问，他们既然主张打，让他们打便了，我是不愿意参加的。”陈公博还说：“面对刘震寰，至少胡先生、邹先生不赞成用武。”胡汉民对镇压杨刘妥协动摇，还可参见《向导》第128期《形势严重下之广州政府》一文。

的前景”。①在取得多数人支持以后，在国民党的有关会议上，胡汉民“拗不过多数的意见，只好服从决议。”②经过廖仲恺等的努力，镇压杨刘叛乱终于成为国民党领导集团的共同意见。

5月13日，廖仲恺和朱培德、加伦总顾问一起赴汕头与许崇智、蒋介石商讨镇压杨刘的军事行动计划。当晚即在粤军总司令部行营召开军事会议。会上作出决议：“放弃潮梅，全部回省，铲除革命障碍之杨刘，以巩固革命根据地。”③并决定作战计划，任命蒋介石为总指挥。5月21日，蒋介石率党军（由黄埔校军改编）第一旅何应钦部、粤军第一师第一旅陈铭枢部、粤军第四师许济部、警卫军吴铁城部，由潮梅回师广州；另调谭延闿之湘军、程潜的攻鄂军，由韶关开抵花县新街，以拱卫省城。

杨、刘两人，先后于5月23、25日返回广州，他们察看广州的情势，作出了自己的动作。

他们一方面发表拥护政府的宣言。5月27日，杨希闵与胡思舜、赵成梁、廖行超、朱世贵等滇军将领，联名通电表示“拥护”革命政府，并谓：“去年（一九二四）大元帅领政时，希闵等曾以统一财政、移军郊外为清，不图军兴以后，帅议未行，值兹东江肃清，正宜重申前议，究竟饷源如何筹划，部队如何整顿，应急起直追，从长计议，早图向外发展。”④刘震寰也不后人，同样发表了通电，诡称“始终服从三民主义”，“竭诚拥护吾党政府。”⑤他们的用意，无非是借以迷惑政府与人民。另外，又散布“粤军排斥客军”、“广东政府实行共产”等谣言，作为他们推翻政府的口

① 《加伦在中国》，第186页。

② 《苦笑录》，第125页。

③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五篇第三章第19页。

④⑤ 《广东军阀史大事记》，第219、220页。

实。对此，广州革命政府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廖仲恺在5月27日商民会议上，以及29日大本营记者招待会上，均就“广州共产”谣传进行辟谣。^① 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在此后也作了澄清：“广东是革命政府所在地，所有能服从政府为三民主义奋斗之军队，皆为革命政府军队，无所谓主客，粤军有外省人，党军不尽是广东人，而谭延闿所部是湘军，朱培德所部为滇军，况且滇军与桂军干部学校学生亦有声讨杨刘者，故驱逐杨刘并非排斥客军之举……”^②

另方面，他们在制造舆论的同时，加紧了军事叛乱的部署。

滇军除已密令曾万钟师及四个旅，赵成梁师先后从惠州韶关撤来广州，并令赵成梁师驻广九车站（今东站）一带；胡思清师移防白云山；廖行超师由市区扩展到东北郊；杨希闵的六个警卫团则驻在市中心永汉路（今北京路）至广九车站的交通要道沿线；胡思舜军部主力则在龙眼洞至瘦狗岭一带；杨希闵之总司令部设在永汉南路之八旗会馆。前敌指挥部则设在广九车站，由赵成梁担任前敌总指挥，滇军的阵势，乃从龙眼洞、白云山、瘦狗岭，石牌、洗村、东山、大沙头、长堤直至黄沙，是从东向西构成一道大弧形的防线。

桂军则令韦冠英和严兆丰两师布防于石井以北之大塱至龙归一带；伍毓瑞师布防于龙归以东15公里地带；独立旅和警卫团则在龙归南面；黎鼎鉴师布防于加禾一带，刘震寰总司令部设在石井兵工厂附近，备有电船相随，以便能在水上运转。

纵观滇桂两军阵势，桂军重心在广州北郊，滇军重心在广州东郊，互相联成犄角之势，企图继续占据广州。

① 参见《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

② 《许崇智谈话》，原载广州《民国日报》。转引自王思华：《广州时期的国民政府》，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1981年硕士论文。

大元帅府在军事部署基本就绪后，立即限令杨刘对革命政府表态。6月1日，杨希闵以建国滇军总部暨个人名义发表宣言。除虚伪地表示“拥护真正之国民革命政府，以实行本党主义为归宿外”，却含沙射影攻击“少数激烈党人，阳假国民党之名义，阴施共产之运动，劫制政府，任意冥行。”声称：“本军为尊重党义、保卫治安计，不得不声罪致讨，斯绝纠纷，所有不得已而用兵之苦衷，敢为我父老兄弟，剀切宣布……”云云。^①接着杨希闵和刘震寰又分别发表通电，再次叫嚷要对“企图扰乱社会秩序或推翻国民党的派别，将与他们较量。”^②这些宣言和通电，是杨刘公开叛乱的信号。

6月2日，杨希闵部滇军对拥护政府的朱培德部滇军驻大沙头部队动武，缴去步枪数十支，企图完全控制珠江北岸，胡思舜部从佛山调兵千余人入驻广州，在广州河南架设大炮及机关炮，对准大元帅府。

6月3日，代理大元帅胡汉民给杨希闵、刘震寰以最后通牒：一、服从政府；二、所占防地一律交出、由政府另行安排；三、交还所占财政机关，并须立即执行，不得延误。^③当晚桂军将领在谢庐开讨论会，对二、三项拒绝接受。滇军将领则再次通电，略谓：“粤政混乱，咎岂在滇军？欲整顿，滇军罔不乐从。政府方面应将军事行动停止。倘我滇军于此度宣言而后，政府犹不停止军事行动，则是别有用意。我滇军虽弱，岂能甘受？彼时衅端一开，咎将谁属。”^④

① 《粤海关档案》，1925年6月2日情报附件（原件为汉文铅印传单）。

② 《粤海关档案》，1925年6月4日情报。

③ 参见：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6月4日；上海《时报》，1925年6月5—6日。

④ 《广东军阀史大事记》，第220—221页。

正在这关键时刻，杨希闵却又“有要事赴港。”^① 刘震寰亦相随去港。原来是急于与唐继尧驻港代表詹秉忠等会商。遵照唐继尧的指示，决定：“以胡慕耕（胡思舜）部守石龙，阻许军；刘显丞（刘震寰）部守军田，阻北伐各军，以廖品卓（廖行超）或赵济民（赵成梁）部西上，击退肇庆粤军后，夹击范（石生）部，与我军（唐继尧军）联络接引来粤，其余留省，策应各方……。”^② 从这份唐继尧致胡若愚、龙云的“特、军、万急电”，可以看出杨刘与唐继尧勾结发动军事叛乱，是再明白不过的了。杨刘在港领得滇唐密旨后，立即返穗执行。

6月5日，滇桂军公开了反广州革命政府的军事行动，于是日上午占领省长公署及粤军总司令部，下午占领财政部、公安局及市内各重要机关。并发出伪令：派滇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赵成梁为广东“省长”，滇军总参谋长周自得为广州“卫戍司令”。同一天大元帅府发出命令：着免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等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并特任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③ 此时，杨希闵等再次发表通电，声称“共产主义，无论我国人民智德生计程度不足语此。”“今蒋中正、廖仲恺、谭平山等利用俄人，互相勾结，代为宣传、以少数党人专制国家，直视革命为彼辈包办事业，……希闵等断不容彼辈播共产流毒于社会，我军因此喋血疆场，亦所不恤。”^④ 同时还以“滇桂军全体国民党员”名义，印发传单，并乘汽车到处散发七八次。这些传单，更是凶相毕露地叫嚣：“反赤

① 《粤海关档案》，1925年6月3日情报。

② 此段文字是根据唐继尧《致胡若愚、龙云等电》，1925年6月6日发，原件藏云南省档案馆。

③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74页。

④ 《中华民国史料丛稿·大事记》，第11辑，第97页。

化呀！杀呀！杀呀！群众们，我们国民党的同志们！起来！起来！有刀的拿刀，有枪的拿枪，有笔的拿笔，大家联合起反赤化的滇桂军，加入一条战线上来！打倒共产党呀！打倒包办抵押我国民党于苏俄的共产党呀！打倒好乱喜兵，不惜糜烂我广东的共产党呀！……”^①这种赤裸裸的叫嚣，是企图把他们的反革命叛乱，披上“反赤化”的外衣，以混淆视听，但当时广东人民对滇桂军早已恨之入骨，根本无人响应。

6月7日，大元帅府发出揭露杨希闵、刘震寰通敌、勾结唐、段密谋颠覆革命政府，发动武装叛乱等罪状的通电，以及各军总司令许崇智、谭延闿、朱培德等也联衔发表声讨杨刘的通电，不仅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而且还得到桂军第四师师长林树巍、滇军第五师师长朱世贵的响应，他们率部脱离刘杨，投向政府军。

为了进一步瓦解滇桂叛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告滇桂军士兵书》，针对“广东人排斥外省军队”的谣言，指出：“广东人不是你们的仇敌，国民党政府不是你们的仇敌。你们的仇敌是你们的长官。你们的长官既剥削了人民，又剥削了你们；你们连年战争，你们得到的是什么？什么也没有。现在你们又预备去死，试问为谁的？并不是为你们自己，又不是为你们的家族，又不是为你们贵省的人民。你们是为你们的长官去死。”这封信还揭露了杨刘到香港干的勾当，指出士兵的出路。“你们的长官知道他们要打败仗，所以他们的家眷到香港去了，因为那里存好许多银钱，他们可以过安乐的日子。但你们怎样呢？你们没有钱，国民党政府可以照顾你们，你们要回家的可以送你们回去，有要编入革命军队的，无任欢迎。”这封信还号召：“士兵们，打走你们的长

① 《粤海关档案》，1925年6月初，附件，原件为铅印传单。

官，顺从国民党政府，你们一个人来，全营人来，全团人来，国民党政府一定欢迎你们，照顾你们。”^① 这封公开信，对于揭穿杨刘对其士兵的蒙蔽，启发滇桂军士兵觉悟，是有一定作用的。

当形势紧张时，大元帅府已迁到广州河南士敏土厂办公。由粤军李福林部及海军护卫。与叛军隔江对峙。6月6日下午四时战斗打响后，珠江两岸，交通断绝。叛军不断在东郊猎德村和西濠口强行渡河，还用木筏在各处偷渡，企图袭击大元帅府驻地，均被政府军击退，战争在市区呈胶着状态。

鉴于叛军中以滇军为最凶悍，其主力在东郊，因此，政府军把战略重点放在东线，在石滩附近搜索敌之主力而击破之；并令西、北两江之军队，同时包围，以达完全歼灭之目的。^② 政府军制定的作战要领是：

（一）我军处于外线，敌处内线。按内线作战之要领，在各个击破；外线作战要领则在协同动作，迅速包围，使其顾此失彼，以收歼灭之效。

（二）我军须俟各方面可到达包围之希望地时，遂同时行猛烈之攻击，而以能侧击或背击为最有利。^③

按此作战计划，政府军加强东线兵力，力图在东郊歼敌主力，以减少在市区的战斗。

6月9日，总指挥蒋介石率领从潮梅班师回穗平叛的党军、粤军赶抵石龙。立即向石滩之叛军发动猛烈之攻势，叛军抵挡不住，退向白云山。10日，总指挥命令粤军第一、三师及第六旅为左翼，沿广九铁路向市区推进；警卫军任中路，进攻瘦狗岭；党

^① 《广州大本营公报》，1925年第14号。

^{②③}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五篇第19、20页。

军为右翼，向龙眼洞推进。此外，谭延闿部解决了驻韶关的滇军后，在鲁涤平、朱培德率领下，沿铁路飞速南下；西江之粤军一部则沿广三铁路东进，以攻广州；魏邦平受命担任渡河军总指挥，由河南向市区进攻。于是政府军很快对叛军形成包围圈，有如瓮中捉鳖，稳操胜券。

6月12日凌晨零时，政府军各路部队，对杨刘叛军发起总攻击。蒋介石率领党军、粤军各部，进攻龙眼洞，当日即占领之，继而进攻瘦狗岭，守军为敌之主力，据强固之阵地顽抗；时魏邦平率渡河军由猎德强渡，与蒋介石指挥之党军粤军合攻石牌，经过数小时激战，政府军占领石牌。次日拂晓，政府军各部向退至白云山、观音山（越秀山）以及瘦狗岭一带之滇军再次发起总攻。时黄埔军校入伍生总队副总队长张治中率领留校的第三期入伍生，在苏联顾问帮助下，修复破旧停航的舰艇，掩护渡河，以攻广九铁路之敌。在激战中，一发炮弹击中设在广九路总站附近之滇军敌指挥部，总指挥赵成梁被炸成重伤，稍后不治而死。在现场的杨希闵见此惊慌失措，即驱车向市区逃命，士兵亦纷纷溃退。当时守瘦狗岭的是滇军一师左翼部队，既闻师长伤亡，右翼阵地已破，于是军心动摇，亦被击溃。布防瘦狗岭至白云山的第二师廖行超部，见大势已去，乃传命在火线上的官兵“停止战斗，在原地固守待命。”^①又派人送信给朱培德，“托他收编滇籍官兵，勿使流离”。^②廖自己悄然离队。杨希闵逃回八旗会馆之总司令部，立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但电话已不通，派人去找第二师长廖行超和总参谋长周自得，均已不知去向。杨希闵感到末日来临，也就匆忙逃到沙面租界避难。

^{①②} 廖行超：《回忆第二次滇军入粤始末》（未刊稿第51页）。

桂军的命运也和滇军一样，当政府军总攻发动后，粤军第一师第二旅陈济棠部及谭延闿部湘军、徐汉臣旅粤军渡过流溪河，于12日上午8时左右，向刘震寰部叛军实行猛烈攻击。刘军仓皇应战，不到两小时，全线崩溃，纷纷向后退却，一直退到石井附近。刘震寰无心恋战，慌忙与携款之军需官登上电船，也逃往沙面。稍后，败退到石井的第一军军长韦冠英，适向报贩买到一份《国华报》，看到头版大字标题：“大元帅府命令：通缉叛乱头目杨希闵、刘震寰、韦冠英等归案惩办”，就面如土色，对其亲信说：“悔不听胡汉民劝告，致有今日下场。”^①也就化装逃到市内民家暂避，之后也搭船逃往香港。是日黄昏前后，所有桂军士兵都缴械投降。

退到市内之滇军，官长多逃到沙面，继而转赴香港。士兵则纷纷放下武器投降。败退至增城之胡思舜部滇军，15日反攻到广州北郊，时党军第一、二团驻北较场一带，急出迎击，不到两个小时，即将这5000敌兵缴械。

至此，号称四五万人，在广东横行两年多之滇桂军，乃全部肃清。滇唐方面不禁哀叹：“在粤滇军3万余人，全数缴械收编，竟无一兵退出广州，保全实力。”^②

在平定杨刘叛乱中，政府军除军事打击外，还进行政治分化，优待起义、投诚人员。早在杨刘叛变之前，以黄埔军校革命师生为骨干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就在滇桂军的干部学校、军官学校进行革命教育，发展滇桂军校中的军官、学员参加该会。

^① 转引自卜汉池：《桂军刘震寰的兴起及其复灭》，《广东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第63页。

^② 滇唐驻香港人员刘沛泉《致唐继尧密电》（1925年6月22日），原件藏云南省档案馆。

当“形势最紧急的一天（6月5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即通知滇桂军中的会员，全体脱离滇桂军，6月6日上午，滇军干部学校脱离者20多人；桂军军官学校脱离者60多人、见习官24人。”^①连桂军军官学校监督（相当于校长）吴安伯、中队长伍中帆、陈奇涵、张鼎家，军事教官李尚庸、钟舟庭，学生覃异知（后改名覃异之）、袁炎烈、傅林桦等数十人，都先后投到黄埔军校。黄埔军校亦不歧视他们，量才录用。例如原桂军军官学校监督吴安伯，被安排为黄埔军校高教班副主任，几位中队长也曾担任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的中队长，教官李尚庸、钟舟庭等也都在黄埔军校任教官，学生则都转入黄埔军校继续学习。^②滇桂军士兵放下武器后，都由朱培德部收容，给予生活出路。

平定杨刘叛乱，不仅是政府军将士用命，英勇奋战的结果；也是与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当政府调遣军队平叛之初，廖仲恺即派工人部干部刘尔崧等，“与铁路、电船工人联络，及时乘机弃职避匿。”^③总工会也作了动员，当时广九、广三、粤汉三条铁路和电船、民船工人，都对杨刘宣告罢工。使滇桂军之调遣、运输一筹莫展。无论杨刘用什么威胁利诱的办法，工人均不为所动，更有海员在各河道及海口截留杨刘的军官及援兵；其他工人也给政府军多方帮助。“竟使杨刘坐困一隅，他虽有十万兵卒，不能自由调度，以致败逃。”^④当时广东省农民协会，号召全

① 周逸群：《总理逝世后的中国青年军人运动》，载《中国军人》，1925年第9期，第25—26页。

② 参见覃异之：《回忆黄埔》，《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全国政协文史会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274—275页。

③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五篇第三章第三节第二十一页。

④ 蒋介石《关于工农兵大联合的报告》，《海外周刊》，1925年第七期。

省农民并组织各地农会和农民自卫军，协助政府镇压叛乱，各地农会组成3000多人的运输队，帮助东征军迅速回师平叛，番禺及广州市郊农民自卫军，帮助侦察及入城参加战斗，并在广九、广三铁路一带袭击叛军。

滇桂军鱼肉人民，不得人心，其失败是必然的。滇桂军据粤两年多，最后以覆灭告终。

第六章 新军阀的形成和混战

第一节 蒋介石的篡权阴谋

一、孙中山、廖仲恺去世后的粤局

1924年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广东革命形势日益高涨，但由于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和廖仲恺的相继去世，又出现了一种极其复杂的局面。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给全国带来巨大的震动，是中国国民党和革命人民不可弥补的损失。孙中山北上之前对广东的军政领导虽然作了一些安排：由大元帅府秘书长胡汉民代行大元帅职权；以谭延闿为北伐联军总司令驻守韶关，所有入赣、入湘各军归其节制；东江军事责成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共同负责；民政由胡汉民留守负责；财政总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为古应芬；外交由伍朝枢负责；公安局长兼全省警察处长为吴铁城。但这只是一个临时的措施，不管是人员或机构都不足以担负起广东革命军政的重责。胡汉民虽是国民党的元老，对辛亥革命和辛亥后的历次斗争都作出了一定贡献，但早在1924年10月广州商团叛乱时就显得十分软弱和动摇。谭延闿也算国民党元老，在湘难于立足，后南来追随孙中山还算诚心，但一

向有圆滑玲珑之称。至于杨希闵、刘震寰更是心怀不轨，占地自肥的军阀，暂时依附于革命名下而已。

所以，孙中山的逝世，使国民党和广州革命政府顿时失去重心。首先起来反对广州革命政府，实行军事叛乱的乃是当时实力最强并与内外反革命势力勾结的杨希闵和刘震寰的滇桂军。由于廖仲恺和蒋介石等国民党人的努力，黄埔学生与其他革命军队的英勇作战，以及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支持，杨、刘叛乱很快被平定，去除了广州革命政府的心腹大患。但是如何稳定广州的政局，弥补孙中山逝世后的损失，仍是广州革命政府的中心问题。根据孙中山病重时在京召集的政治委员会议作出的将广州的大元帅大本营改为合议制的决定，胡汉民即表示不愿再代行大元帅职权，主张正式组织国民政府。此议得到廖仲恺等人的支持。因此，平定杨刘叛乱以后，便于1925年7月1日将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实行委员制。推选了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廖仲恺、孙科、伍朝枢、张继、谭延闿、戴季陶、林森、张静江、程潜、古应芬、朱培德、于右任等16人为委员。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谭延闿、林森等五人为常务委员。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为外交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7月3日，国民政府成立军事委员会，汪精卫、胡汉民、蒋中正、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等八人为委员，汪精卫为主席。7月26日，将国民政府所属各军一律改称国民革命军。当时编成的有第一军，军长蒋中正；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五军，军长李福林。在军政统一的同时，还实行了财政的统一，规定在国民政府范围内的财政税收，由财政部统管，军队粮饷统一由财政部拨给，不得截留地方税收。

国民政府的成立，军、政、财权的统一，是革命形势向前发展的重大标志，也是解决孙中山逝世后广州革命政权失去重心的重大措施，但它只是解决体制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孙中山亲自主持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中心的政策继承问题。特别是没有解决孙中山在世时能够指挥自如的领导核心问题。

孙中山逝世后，廖仲恺被认为是当时广州革命政权中“最红人物”，本来他和代帅胡汉民都有充当孙中山继承者的条件。但由于廖仲恺本人没有担任领袖的欲望，加上国民党右派的反对。而胡汉民则因对“三大政策”有保留态度，又不能取得军队方面的支持。因此，在苏联顾问及廖仲恺的支持下，才由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主席^①，这就增加了尔后政局发展的复杂性。

廖仲恺即使不是革命政权的军政首脑，但他在党、政、军及人民群众中都有很高的威望，是对政局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力风云人物。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威望，主要是由于他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坚定态度。国民党改组后，他首任国民党中央的工人部长，积极支持工人运动，在广东先后爆发了著名的沙面洋务工人反对“新警律”的罢工和震动中外的省港大罢工。他继后兼任农民部部长，积极支持农民运动，使广东成为

①汪精卫出任国民党政府主席一事，台湾的有关出版物都认为是汪精卫有野心，而又得鲍罗廷支持的结果。有些书刊甚至说成是鲍罗廷和共产党的阴谋。胡汉民后来在立法院的报告中说：鲍罗廷、加拉罕拟定三人，即胡、汪、戴季陶。对三人的考语是：胡“难相与”，戴“拿不定”，汪“有野心，可利用。”于是选中了汪（见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这些说法不完全确切，因为汪精卫当选主席，是得到全体出席委员的无记名投票赞成的。应该说，在当时情况下，汪是较为得到各方面支持的合适人物。

当时全国农民运动最有影响的省份。他担任黄埔军校党代表，为创建一支革命武装呕心沥血。尤其是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他大力进行财政统一的措施，使一些反动军人和政客难于把持地方税捐以贪污中饱。由于种种原因，中外反动势力都认为廖仲恺是他们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破坏国民政府，改变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主要障碍，必须除之而后快。

国民党内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反动活动，孙中山在世时已时有发生，但由于孙中山的坚定态度和威望，而没有得逞。孙中山逝世后不久，他们便无所顾忌而公开化了。他们打着维护孙中山的旗号，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舆论方面，以1925年5月前后，戴季陶发表的《孙文主义哲学基础》和《中国国民党与国民革命》等文章为代表，在组织方面，沪、粤等地的国民党右派曾多次在胡汉民、伍朝枢等人的家中集会，策划于8月15日开一届四中全会，解决所谓共产党问题。但8月11日被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顾问鲍罗廷发现制止，而没有实现。

当国民党右派企图以会议形式实现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阴谋被制止以后，他们遂决定以暗杀手段，除掉坚持“三大政策”最得力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以扫除障碍。为了除掉廖仲恺，从1925年7月初开始，国民党右派的一些要人就多次在胡汉民家和右派的俱乐部“文华堂”集会进行策划，同时还在廖仲恺经常活动的地方布置侦探和刺客，仅在广州东山区廖宅到越秀南惠州会馆国民党中央党部一段廖仲恺经常走动的路段，就布置了40个刺客。1925年8月20日上午9时，廖仲恺和夫人何香凝同车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出席会议，路上碰到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陈秋霖，请陈上车同往。到达中央党部，廖和陈出了汽车并肩上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台阶，这时埋伏在附近的多名刺客连续朝廖仲恺开枪，廖、陈

应声倒地。廖的卫士当即还击，当场击毙刺客一名，重伤、被捕一名，其余逃脱。枪响后，何香凝立即呼救，陈秋霖已经身亡，廖仲恺身中四弹，送往医院途中逝世。

廖仲恺遇刺身亡，是国民党和中国革命的又一重大损失。为了对付当时出现的复杂局面，在当天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推选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等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汪精卫更是当时广州革命政权中党、政、军名义上的第一把手，当时被认为是国民党左派，实际上是一个优柔寡断的文人政客。孙中山在世时对他的评价是“长于调和”^①，孙中山逝世后因他是孙中山遗嘱的起草人，又善于投政治顾问鲍罗廷所好，被推上国民政府主席的高位。汪精卫当时的状况是：一、无兵权；二、少决断力和号召力；三、只会用革命的词句骗取苏联顾问和年轻的共产党人的信任，维护暂时的权位。特别委员会的另一个成员许崇智，虽是老同盟会员、粤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军事部长，但他在军事上没有多大作为，政治上一向比较右，生活上只讲吃喝玩乐。三人中的蒋介石是一个“极端变化无常”，“非常多疑”，“虚荣心很强（强到病态程度）”，“城府很深的追求权势的人”^②。蒋介石自陈炯明叛变后，由于对陈叛变的估计得到证实和事后对孙中山表现出特别的“忠诚”而获得孙中山的信任。1923年秋冬曾率孙中山派的代表团访苏，从苏联回来之后，虽然对联俄和联共都持保留态度^③，但还是经常革命词句不离口的。

① 《孙中山选集》，第876页。

② [苏]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367—371页。

③ 蒋介石于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致廖仲恺的信也说明他对联俄、联共早持特别异议，而且十分反感，但他表面上仍同苏联顾问及共产党人保持密切联系。

特别是逐渐认识了黄埔军校校长职位的重要性之后，重视了对实力的扩充，加紧对师生的拉拢①。在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第一次东征和平定刘杨叛变中不断得到提升，从粤军参谋长、军校校长到党军司令官、总指挥兼广州市卫戍司令，成为左右时局的实权人物。此时他更是利用特别委员会的权力，以“公正”的面孔，把他发展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一批国民党元老和他的顶头上司胡汉民、许崇智等赶出广州，使他迅速上升到与汪精卫同等重要的地位，形成短暂的在鲍罗廷支持下的汪蒋共同支配的政治局面。

特别委员会成立以后，总政治顾问鲍罗廷因廖案在会上提出了逮捕胡汉民、邹鲁等十余人的建议，终因许崇智的反对而未获通过。但因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是犯疑在逃，胡汉民本人，又有知情不报的嫌疑，鲍罗廷还坚持要身兼广州市卫戍司令的蒋介石派兵将胡汉民逮捕归案。蒋介石在派兵去捉胡汉民的同时，私下先告知胡汉民，使胡逃脱。后经特别委员会通过以派胡汉民赴苏考察为名，将其逐出广州，随着廖案的深入调查，发现该案除与胡汉民为首的一班右派有关之外，还与许崇智为首的粤军一批军官有关。蒋介石出于个人野心，便趁此把他的拜把兄弟和多年的上司许崇智加以拔除。他一方面写密信给许崇智通风报信，劝许暂到上海避风，另一方面派兵包围许宅，将许赶出广东，并将许旧部缴械或收编。通过廖案的查处，胡汉民、许崇智以及其他一批右派军人政客先后被捕或被逐。

这样一来，广州的政治局势得到暂时的稳定和发展，但潜伏着严重的危机。由于蒋介石的权力和地位迅速上升，蒋介石就成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2—33页。

了一切反革命势力所注视而又需要拉拢的人物。汪精卫的无权、无兵、无能，使暂时平衡的天平，迅速倾向了蒋介石的一边，使蒋介石逐渐成了国民党的重心。

二、三二〇事件

廖案处理告一段落之后，由于陈炯明的反革命势力卷土重来，从东南两面威胁广州国民政府。为了进一步巩固和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广州国民政府于1925年10月决定组织第二次东征和南征，任命蒋介石为总指挥、何应钦、李济深、程潜等为纵队司令。至1925年底和1926年初，东部陈炯明和南路邓本殷的反革命势力先后被肃清。第二次东征和南征的结果，一方面是肃清了广东境内的反革命军事残余势力，实现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推动了以工农运动为中心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些所谓革命将领获得了声誉，为他们进入国民党中央党政军最高层创造了条件。

1926年1月1日至19日在广州举行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256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占大多数。大会虽然通过了接受孙中山遗嘱，重申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处分西山会议派^①首要分子等决议案，但由于中共中央会前在上海动员孙科等右派回广东出席大会，选举中又否定中共广东区委会关于少选中派、不选右派的方针^②。结果一批右派重新当选，连被

① 1925年11月，以谢持、邹鲁为首的一批国民党执、监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前，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反对孙中山手订的“三大政策”决议多项。以后又到上海设立所谓国民党中央党部，进行反动活动。故一般称这些人为西山会议派或沪派。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8—119页。

大会警告的戴季陶仍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蒋介石、李济深、何应钦、李宗仁、黄绍竑、吴铁城、陈肇英等一批军人新当选为执行委员或监察委员，在二届一中全会上，蒋介石还当上了由九人组成的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委员。

这个本来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可以取得优势的代表大会，却造成有利于国民党右派的结果。但当时在广州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鲍罗廷却“过高估计了广东形势的稳定性”，他认为“随着许崇智出走、梁鸿楷^①被解除武装，胡汉民被派往莫斯科，在广州似乎形成了一个统一而又牢固的政权……可以认为，在六名军长中有四名是可靠的（原注：大概是蒋介石的第一军，谭延闿的第二军，朱培德的第三军和程潜的第六军）。我们同他们未必会发生误会……有了这些指挥官就可以做很多工作。”^②“正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实际上形成了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联盟，这个联盟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联合。”^③由于错误估计形势，中共在广州的一些重要负责人都纷纷离开广州，鲍罗廷本人也于1926年2月3日，以“回国述职”为名，向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请假一个月，到北京后住进苏联驻华使馆，在那里给苏联高级访华考察团起草书面报告了^④。

鲍罗廷和中共一批负责人的离开，特别是鲍罗廷的离穗，给

① 梁鸿楷原系粤军许崇智部下的一个军长，因廖案涉嫌被捕，所部被缴械或改编。

② [苏]P·A·米罗维茨卡娅：《米哈依尔·鲍罗廷》。

③ [苏]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361页。

④ 这时苏联派了一个以苏共中央委员、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布诺夫（化名伊万诺夫斯基）等组成的高级军政考察团来华，公开名义是私人旅行团，实际是详细调查苏联顾问们的活动情况及华北、华南的政治、经济形势。史称布布诺夫使团。

“虚荣心强到病态”的蒋介石篡权活动以可乘之机。因为在孙中山北上时对蒋有面谕：“鲍罗廷同志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总要容纳他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要象听我的主张一个样子才好。”^①这个面谕蒋介石是亲口在大会上公开过的，所以孙中山逝世之后，鲍罗廷曾起过孙中山化身的作用。廖仲恺被刺前他及时地制止了右派的夺权阴谋，廖案发生后，他迫使右派纷纷离开广东。虽然这些，有时是他亲自出面，有时是通过汪精卫贯彻，但他的权威作用，当时是无可否认的，因此鲍罗廷离穗，一方面使汪精卫失去了依靠；另一方面使蒋介石获得篡权活动的良机。

蒋介石自国共合作实现以后，口里虽然叫了不少漂亮的革命词句，但对真正革命力量的发展，对共产党政治影响的扩大，他是害怕的。以黄埔军校为例，“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成立是经他同意的，但随着这个团体的左倾，他就害怕和憎恨；因而暗地里又指使其爪牙和心腹，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与之相对立，形成了以黄埔军校为中心的左右派的激烈争辩和对抗。这个对抗和斗争既有左右派和蒋汪因素，也有国共两党的因素。“青年军人联合会”是以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核心的左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则是打着孙中山的旗帜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右派团体，他的骨干分子几乎都是蒋介石的心腹和亲信。在开始的时候蒋介石还貌似“公正”地对待这两个团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介石的“公正”就越来越不公正了。1925年11月，在第二次东征途中，蒋介石召集了连以上军政人员联席会议，他在会上以黄埔军校和党军不能分裂为名，要将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和国民党加入共产党的名单都交

^① 《蒋校长演讲集》第4页。《鲍罗廷在中国有关资料》，第276页。

给他。他与周恩来的个别谈话中还明确提出要共产党员退出黄埔军校和国民党^①。在东征军到达汕头时，陈赓在蒋介石的桌面上就看到过“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给蒋开列共产党员在党军中的名单。蒋也因此而疏远刚救过他的生命的陈赓^②，这是蒋介石排斥共产党员的准备和开始。

东征和南征结束以后，蒋介石虽然先后登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国民革命军军事总监的高位，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要当最高领袖，所以他常常以孙中山的唯一继承者和最忠实的信徒自居。但他也明白，要登上最高位，就必须把当时身居党、政、军最高位的汪精卫赶走。汪精卫取得这个地位虽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得到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和以鲍罗廷为首的苏联顾问的支持。所以蒋介石要赶走汪精卫就必须同时打击共产党和苏联顾问。而且着重从这两方面下手，既可以气走汪精卫，又可以不负反叛的罪名。

蒋介石为了达到目的，紧紧抓住北伐这个口号，向苏联顾问和汪精卫左右开弓。因为北伐既是孙中山的遗愿，又是两广统一后的形势要求，抓住这个口号既可得到孙中山忠实信徒的美名，又容易得到人们的同情。可是，苏联顾问，包括当时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这时对南方革命政权的发展方向，是不主张急于北伐的。最好是一方面援助北方冯玉祥国民军的发展，另方面先积累力量，然后才南北夹攻统一中国。在南方实施这个政策的，是一个刚上任不久又不高明的顾问团长季山嘉。季山嘉就是尼·弗·古比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8页。《中山舰事件》，第219页。1981年6月版。

② 在第二次东征攻克惠州后，总指挥部前进途中，因遭陈炯明军林虎部的袭击，蒋介石几乎被俘，幸得陈赓将他救出重围，才免于难。（见《南方日报》1961年9月17日第三版，穆欣：《陈赓同志痛斥蒋介石》，高昊：《陈赓同志在广东》）。

雪夫，在苏联颇有点名气，在加伦回国后来华任南方革命政权的军事总顾问，鲍罗廷北上后，又身兼顾问团团长。他对南方革命政权不仅参与决策，甚至许多具体事务也要过问，特别是在北伐和援冯这两个问题上，要蒋听从他的意见，并通过汪精卫做蒋的工作，要蒋就范，这样就给蒋以可乘之机①。

汪精卫是一个优柔寡断的政客，权势欲极强，他虽位高而无兵权，他想联合共产党搞点直属部队，因共产党中央不同意而没有实现②。他以军队总党代表，军委会主席和黄埔军校党代表身份作过一些人事安排，便引起蒋介石的极大不满③，认为是侵犯了他的领地。尤其是蒋介石的亲信、虎门要塞司令、孙文主义学会骨干分子陈肇英，因利用职权进行走私，给当时的海军局政治部主任李之龙报告汪精卫和蒋介石后，汪精卫以军事委员会命令将陈肇英撤职查办。蒋介石则任由陈自由进出蒋介石常驻的长洲要塞司令部④，当时人们认为这是蒋汪矛盾和蒋介石蔑视汪精卫的一个突出事例。汪精卫在公开场合中也出现过不接蒋介石的电话的事例⑤。这些说明蒋汪矛盾已经表面化。蒋介石对没有经他同意就提拔共产党员李之龙担任海军局代理局长，以及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的亲汪倾向，更是不能容忍的。

为了排挤共产党，打击苏联顾问和汪精卫，蒋介石与其心腹王柏龄，经过精心筹划之后，就亲自出马向汪精卫和季山嘉进攻。从2月7日至3月12日，蒋多次与汪精卫会面，主要内容：

(一)要汪不可“大权旁落”，对苏对共保持距离；(二)要辞退季山嘉等一批苏联顾问；(三)蒋本人辞去黄埔军校校长之外的

① 蒋介石给汪精卫的信。见〔苏〕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9页。

③④⑤ 《中山舰事件》，1981年6月版，第131页。

一切军职。汪均不表态①。在蒋介石加紧对季山嘉、汪精卫进攻的同时，王柏龄放出了大量的谣言，比较重要的有：“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汪精卫、王懋功都加入了共产党准备倒蒋”；“国民政府准备宣布共产”②。蒋介石除了在舆论上做准备之外，还进行了具体的布置和策划：首先是以军委会拟任广西李宗仁、黄绍竑军为第八、九军为借口，诬指季山嘉有意空出第七军军长职位，以此鼓励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反对蒋介石。2月26日，蒋便以王图谋不轨，将王扣留后逐出广州，将自己的亲信刘峙调任驻广州的实力最大的第一军第二师师长。蒋介石这样做，既可以将汪精卫唯一可能运用的实力解除，又可重新夺回在平定刘杨时所取得的广州卫戍司令的实权③，为事变作了军事准备④。

3月9日，蒋介石召开了秘密的军事会议，到会成员都是第一军中的蒋的亲信，“会上通过了采取行动的决定”，还分析了事变发动后的军事形势，他们“预料第四、第五军和第三军的一部分会站到”他们一边⑤。蒋介石为挑拨第一军与苏联顾问和汪精卫的关系，还制造了所谓苏顾顾问主持的参谋团，擅自减少对第一军的拨款，使第一军欠饷三个月的谣言⑥。汪精卫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是有所觉察的，所以在黄埔军校的演说中曾提出过“土耳

① 台湾版《中国国民党九十年大事年表》；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的蒋介石先生》；《蒋介石给汪精卫的信》。

② 《中山舰事件》第59页、133页。

③ 王懋功这次被捕前曾代理广州卫戍司令。

④ 《蒋介石给汪精卫的信》；《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0页。

⑤ [苏]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356页。

⑥ 《蒋介石给汪精卫的信》。

其革命成功乃杀共产党，中国革命未成功，又欲杀共产党乎？”的警告①。在广州的一部分共产党员也感到“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夕的形势相仿”②。周恩来在“三二〇”事变前从汕头回到广州，也见蒋介石神色不对。但由于汪精卫优柔寡断，共产党年轻幼稚，苏联顾问儿戏对待，总的来说，都是手无实力，只能听之任之。

3月17日早上，蒋介石放出了“共产党在制造叛乱，阴谋策动海军局武装政变”的谣言，并于黎明时分乘汽艇从黄埔军校回到广州市内东堤八旗会馆——卫戍总司令部（原东征军总部），进行了紧张策划。接着换乘汽车回广州市东山住处，接着又移驻有坚固工事的造币厂内（即现在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所在地）。“三二〇”事变就是以这里作为指挥中心③。

3月18日上、下午，蒋介石的亲信、孙文主义学会骨干分子、海军学校副校长欧阳格先后以送信和亲访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的形式，制造中山舰有异动，汪精卫要削其职的舆论。是晚7时40分，蒋介石以黄埔军校驻省（即驻广州市）办事处名义，派人到海军局，要该局“请即派有战斗力军舰两艘前赴黄埔，听候差遣。”时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不在局，作战科长即提出派舰具体意见，派员持函往李之龙家，由李最后决定。适李不在家，只好把函件留下。李回家后见作战科长拟派舰的函件，经协商后即签发派中山舰和宝璧舰到黄埔的命令。19日两舰到黄埔后，即向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到。因邓预先不知道蒋要调军舰之事，当即用电话问在广州的蒋介石，蒋表示惊讶。不久，

① 《蒋介石给汪精卫的信》。

② 《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385页。

③ 《周士第回忆录》121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版。

因苏联一参观团在广州要参观舰队，李之龙用电话征得蒋介石同意后，即令两艘军舰回广州，准备给苏联参观团参观。两舰于是晚6时30分抵达广州抛锚^①。

1926年3月19日深夜（约11时左右）蒋介石在原广州火车站附近的第一军经理处，以“共产党阴谋暴动”为借口，召开戒严动员会。与会人员有：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团长蒋鼎文，惠东升以及陈肇英、欧阳格、徐桴（经理处处长）、马文东（原东征军总指挥部秘书长兼军法处长，时任潮梅海关监督兼交涉员）等。蒋介石以广州卫戍司令名义宣布12时开始戒严。派惠东升团和广州市公安局的武装警察，包围苏联顾问团的驻地和共产党的机关（包括“省港罢工委员会”和纠察队）；派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率武装警察一部，以“保护”为名，包围汪精卫住宅；派蒋鼎文率部占领海军局，解除该局武装；派陈肇英和欧阳格率部绑架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与此同时，命令其在第一军的亲信将第一军的全部党代表扣留（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广州占领邮电局、车站、码头，断绝广州市与外界的联系。市内军警林立、荷枪实弹，造成一片恐怖气氛，直至下午才解除戒严。

蒋介石之所以要这样如临大敌，是因为他们准备，如果遇到抵抗，“那就是一场血战”^②。这就是有名的“三二〇事变”或“称中山舰事件”。

这实质上是一场反革命的军事政变。据当时的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的回忆，他早就同蒋介石商量过制裁共产党，并表示

^① 马文东《中山舰事件内幕》，见《中山舰事件》第184—193页。

^② 马文东：《中山舰事件内幕》、陈公博：《苦笑录》、周士第《回忆录》。

可“以我公安局现有特别户籍的登记资料，即行逮捕首要的共产党员十数人，而后，用一艘轮船将彼等运往中山县附近一小岛，或送往上海，至次要分子暂行予以拘禁”，但蒋表示“让我考虑再说。”可见制裁共产党早就有预谋，而“中山舰事件”仅是其中一步行动罢了^①。蒋深夜调动军队宣布戒严，绑架和审讯直属国民政府军委会的海军局代局长，不但党、政、军最高负责人汪精卫不知道，而且连卫戍司令部参谋长李章达也不知道^②。至于说共产党“阴谋暴动”更是“贼喊捉贼”，首先，中山舰的调动完全是遵令行动，只是作战科长给李之龙的函件被蒋介石派人三次搜查李之龙家时被拿去毁灭而已。但海军局值日官李光鄴、吴国祥的记录，明明是写着“派员来局”，这是无法否认的。舰到黄埔后，邓演达报告蒋介石本人，舰从黄埔调回广州，更是李之龙亲自打电话经蒋介石本人同意的^③，说是什么“矫令”，完全是无视事实的诬陷之词。其次，“中山舰”即使真有异动，该舰是属海军局管辖，应该先向海军局调查，由海军局负责，如海军局失职，那么也应由军事委员会或军委会主席处理，蒋介石只不过是黄埔军校校长、广州卫戍司令，无权处理海军的事情。第三，就算是中山舰真的叛乱，中山舰在当时虽说是最大的一艘军舰，但它只不过是一艘844吨的炮舰，仅有各式大炮八门，在舰上的官兵约300人，长短枪三四十支，而当时广州国民政府属下的军队有六个军二十个师。这样一个力量对比，无论如何也不敢有暴乱的行动。第四，如果说的是叛乱，那么，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都不在舰上，又由谁来指挥？前者在别人家宴中

① 《吴铁城回忆录》，第88页。此处转引自《广州枢府史话》第298页。

② 包惠僧：《中山舰事件前后》，《中山舰事件》第139页。

③ 李之龙：《中山舰事件真相》。

被捕，李之龙是在新婚家中被绑架。蒋介石曾在国内和日本学过军事，当过中高级军官多年，应当具有起码的军事常识，所以难怪有人评论它是“阴谋尚不够深思熟虑”^①。第五，在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宣布戒严，逮捕中央政府直属的海军局局长，包围孙中山请来的苏联顾问驻地，包围共产党机关和革命团体，不经党政、军最高领导同意，这是什么行为？真正叛乱者是谁？这本来是一清二楚的。蒋介石也知道这是依理难容，所以3月20日上午，他也假惺惺地托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带亲笔信给汪精卫，说是“紧急处置，请求主席原谅。”^②这么重大的军政大事，只是一纸便条了之，置纲纪于何地！汪精卫当时说蒋介石“造反”是说对了。谭延闿、朱培德说他是“神经病”是不对的^③。因为“尽管蒋介石的天性是歇斯底里的，但绝不是……一时冲动”，“是准备已久了。”^④

发生了这样严重的事件，没有受到任何的谴责和惩罚，这不是偶然的。第一，汪精卫手上没有兵权，指挥不动军队，又不懂发动群众以政治上的优势去压制蒋介石的气焰，反而被蒋介石倒打一耙。事变发生后，初时汪精卫因病躺在家里，当第二、第三、第四军的军长来观察他的动态时，他也曾企图要这些将领兴师问罪，特别是寄希望于当时实力仅次于第一军的第四军，但李济深强调“不能离开广州半步”，“有危险”，没有答应。他们反而跑到造币厂蒋介石的指挥中心去了。3月22日在汪精卫病床前，开了中央政治委员会议。表面上对汪精卫的尊重，而实际上是蒋介石的胜利。因为会议的决议是：解除苏联顾问季山嘉等职务，

①④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356页。

②③ 陈公博：《苦笑录》。

并令其回国；准汪精卫“因病”休假；查办李之龙①。汪精卫从此“失踪”，后来他在给国民党元老张继的信中说及此事，谓蒋介石如此对待他，他无法负政治责任②。蒋介石对汪精卫更是反咬一口。一时说事变是汪精卫夫妇联合季山嘉，指使李之龙，要将他劫持到中山舰上远航威海卫，送往苏联；一会儿又说是汪精卫要杀他。最后还列举了汪精卫十条罪状，说事变是汪精卫纵容所造成③。3月25日，蒋介石以“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呈请国民政府军委会处分。国民政府不但没有给蒋处分，反而把蒋介石阴谋说成是“政府防患未然”拿办“多嫌疑人”是“处置妥当”的。把蒋介石的“专擅”说成是中山舰“不守纪律”。蒋介石的阴谋已为国民政府所接受，国民政府实质上已被蒋介石所控制。

第二，由于当时一部分军事将领看风使舵并受到蒋介石的分化拉拢所造成的结果。例如谭延闿、朱培德之类的将领，本来是在本省站不住脚，然后投靠孙中山的，所以有很大的投机性，有八面玲珑之称，事变之初还说过几句责备的话，但见汪精卫“失踪”，苏联顾问表示让步之后，就纷纷倒向蒋介石一边了。4月16日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蒋介石以政治委员会的主席分给谭延闿，在这前后给了朱培德的第三军2.5万支枪。至于实力较雄厚的李济深，蒋介石更是给了许多好处，先后以中央军校副校长和总参谋长相许④，所以连蒋介石呈请军委会处分的主意，也是李济深给他出的⑤。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1页。

② 《汪精卫给张继的信》。

③ 《蒋校长演讲集》，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给汪精卫的信》。桂崇基：《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

④ 《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401页。

⑤ 《李济深传略》。

第三，由于苏联顾问的首先表示妥协。虽然蒋介石给苏联顾问制造了许多谣言，但事实说明苏联顾问是事变的受害者，事前一无所知。奉系军阀张作霖后来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后所公布的材料，也足以证明这一点①。事变初期，蒋介石拒绝同苏联顾问接触。3月22日，苏联驻广州领事会晤蒋介石，问事变“是对人问题，还是对俄问题？”蒋答：“对人不对俄。”②布布诺夫使团当即作出决定，将蒋介石不喜欢的顾问季山嘉等撤回。在3月24日顾问团会议上，布布诺夫虽然指出事件性质是一次“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党代表的小型的半暴动。”③但在分析原因时，就得出大家所知道的所谓包办过多所造成的结论，布布诺夫本人不久也离开广州回国去了。

第四，蒋介石的阴谋之所以得逞，还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右倾。中共中央事前根本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事件，所以消息传到上海时，还以为是帝国主义的谣言，后经证实时，真象“晴天霹雳”④，于慌忙之下匆匆讨论对策，得出“总应采取让步妥协态度”，便派张国焘为代表到广州具体贯彻。张到广州以后奔走于国民党上层人物之间，表现得非常软弱。更严重的是6月4日，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虽然对蒋介石的一些诬陷作了公开的辩白，但竟然说：“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⑤，这简直是给强盗脸上贴金，完全是以书生气来对待这一事件。

① 《中山舰事件》，第178—179页。

②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

③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373页。

④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99页。

⑤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4页。

第五，蒋介石的阴谋之所以得逞，还因为他利用了一般国民党人的反共心理。当时国民党中央的政治训练部长陈公博后来曾这样回忆：3月24日下午形势已经缓和多了，上午到蒋介石那里去的谭延闿、朱培德回来，“只说介石要限制共产党，其余则得不到什么要领，只是反对共产党和限制他们的活动那就容易办了。那时国民党人心目中，不论其为左派或右派，无不想限制共产党的活动。”^①陈公博这里说的左、右派都想限制共产党的活动虽然有些武断，但主张限制共产党，在上层人士中确是相当普遍。这些人中也包括当时被认为是“左派”的人，他们自己不积极工作，对共产党员的积极负责态度又嫉忌，对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当然更害怕，所以很自然形成这种心理，蒋介石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实现了他的企图。

最后，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本人运用了他的两面派手法。调动中山舰本身，就集中表现了蒋介石的两面派阴谋。后来借口说事变是共产党阴谋暴动，把矛头指向共产党，但见无人相信，共产党又不反抗，自知难以自圆其说。后又说是与共产党团体无关，把事件说成是汪精卫与季山嘉合谋指使李之龙干的。汪精卫拂袖而去，季山嘉被调回国，又知此说难以成立。最后只好说是误会，是误信部下谗言，下令将欧阳格、吴铁城、伍朝枢等或禁或赶出广州，用弃车保帅的方法企图将事掩盖过去。

总之，在当时整个客观形势有利于蒋介石篡权的条件下，蒋介石不失时机地运用了两面手法，轻而易举地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从而使他顺利地逐步地篡夺了军权，并为篡夺党权作了准备。“中山舰事件”成了国民革命发展进程中的转折点，成了新军

① 陈公博：《苦笑录》。

酝酿以至形成的最早的序幕。

三、整理党务案

蒋介石通过“三二〇”事件，虽然赶走了汪精卫，打击了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完全控制了第一军和海军，当上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主席，篡夺了军权，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要篡夺党权，实现他“一个领袖”的欲望。

“三二〇”事件之后，他在言论上既宣传为了“避免将来互相残杀”做“纯粹的国民党员”，限期要黄埔军校的学生表明政治身份；又大叫中国革命要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以争取苏联的援助。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则拉拢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和谭延闿，秘密策划限制共产党的具体措施，以迫使鲍罗廷和共产党就范。1926年4月29日，鲍罗廷从海参崴与胡汉民同船回到广州。蒋介石没有理采胡汉民，而很快会见了鲍罗廷，进行了政治会谈①。这时鲍罗廷，已非三个月前离开广州时能左右局势，运筹决策的情形可比。他必须接受布布诺夫使团不能包办太多的训令，又必须承认蒋介石号令一切的现实。就在5月1日的政治会谈中，鲍罗廷以支持蒋介石准备提出的北伐和整理党务案为条件，换取了蒋介石允许共产党人着重搞群众运动的默契。以维护统一战线的局面②。

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中央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以避免纠纷和减少国民党“老同志”的顾虑为名，由谭延闿等提出整理党务四提案，并被通过（共产党跨党中委持保留态度）。四提

①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114页。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41—42页。

案的第一案是总则。在前言中，把戴季陶一年前反对国共合作的所谓国共之间“无互信”、“互助”、“误会滋生”的理论公开搬了进来，接着作了所谓四项规定：（一）“改善”两党间的关系；（二）“纠正”“妨碍”两党合作之言行；（三）“保障”国民党党纲的统一权威；（四）确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地位”。第二案是具体实施案，本来明文是对待共产党的，但在讨论通过时改为“他党”，具体条文九项：（一）加入国民党的“他党党员”不得怀疑或批评国民党的总理及三民主义；（二）加入国民党的“他党党员”应将名册交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三）“他党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和省等级党部中任执行委员时不得超过各部总数的三分之一；（四）“他党党员”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五）国民党员不经党部许可，不得以党的名义召集党务会议；（六）国民党员不经最高党部许可，不得另有组织和活动；（七）加入国民党的“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指国共联席会议——本书作者注）；（八）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其他党；（九）违反规定者予以惩处。第一二两案是1926年5月17日经全会通过。

整理党务案的第三案是设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及职权范围案，经5月19日会议通过，并选举中央监察委员张静江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规定主席的职权是：（一）常务委员会开会时主席；（二）保存“他党党员”名册；（三）督促常委及中央各部工作之进行。

第四案重新登记党员。限期三个月内完成，标准是声明遵守《建国方案》、《建国大纲》和三民主义等。这是蒋介石所鼓吹的做“纯粹的国民党员”的具体实施，如后来在黄埔军校规定重新登记的党员必须声明政治身份。

蒋介石等人制造的这些议案，完全违背了孙中山关于国共合

作的精神。第一，它引进了戴季陶的反共理论，诬指国共之间没有“互信”“互助”，既否定了国民党“一大”宣言是两党互信的基础，又否定了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建立和发展组织这一互助的事实，更否定了国民党“二大”对戴季陶的警告；第二，它违背了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前后回击老右派反共企图的原则。孙中山反复指出，国民党能容纳全国的革命分子，参加国民党人只看其对国民党纲纪的态度，不问其政治身份和背景。所以孙中山在世时，在国民党各级党部的委员和部长等都没有那种限制，而且第一届中央执委和部长是经孙中山审定的；第三，违反孙中山的民主原则，为独裁专制作了准备。孙中山革命几十年，他政治思想的中心点是民主自由，民富国强，从来没有说过不可进行批评，他在世时对来自善意的批评从来是欢迎的，就是恶意的批评和反对，只要不动武力，都还是采取规劝的态度。蒋介石在孙中山逝世后，以孙中山唯一继承者自居，不准批评国民党，显然是为自己的独裁专制作准备。所以难怪有一个原来在河南省对蒋介石很仰慕的青年，来广东观察后而得出的结论说：蒋介石“其用人……能拥己则容纳之，不能拥己则排拒之”，“种种翻云覆雨，不过欲造自己势力而已”^①。第四，这些决策也违背了国民党“一大”、“二大”通过的党章。蒋介石在提出设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的议案之后，又提议和通过选举中央监察委员张静江为中央执委常务委员会主席，这是明显违章的。因为执委会和监委会是两个不同职能的机构，国民党党章明文规定两个委员会的委员不能互兼，何况还是监委兼执委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后来虽然改为蒋介石担任，但不久又借口北伐军务繁忙，但要张静江代，为其所

① 《邹鲁文集》，第125页。

用，以扩大其势力和影响。

会后不久，蒋介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主席、组织部长、军人部长等重要职务，不久又被任命为北伐军总司令。根据这次会议通过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总司令不仅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指挥海、陆、空军以及一切后勤供应等，而且“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部机关，均须受总司令之指挥，乘其旨意，办理各事。”这是蒋介石独裁的预兆。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部长、秘书等一律遭到排斥，计有组织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秘书沈雁冰，工人部秘书冯菊坡，农民部长林伯渠，青年部秘书杨善集，中央执委会秘书处书记长刘芬等等。以组织部一个部为例，陈果夫接管时29个职员中竟有26人被称为跨党分子而被清退^①。可见共产党员因受整理党务案的影响，在国民党内被排挤的程度。然而当时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和一些领导人则采取掩饰和退让的政策，说“共产党并无屈服”，“为巩固革命基础和为革命前途起见需要一部分革命利益牺牲”，“共产党员不宜有异议”。这就使蒋介石能顺利地篡夺了国民党中央的党权以及军权。

第二节 李济深的短期统治

一、北伐胜利和迁都武汉

北伐战争是孙中山的遗愿，也是两广统一之后客观形势的要

^① 陈果夫：《民国十五、六年间一段党史》。

求①。1926年6月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了革命军迅行出师北伐案，同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6月28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十一两个师，自韶关出发湖南，准备同早已入湘的叶挺独立团和广西第七军的钟祖培旅会同援湘，实际上是北伐的开始。7月1日，国民政府军委会主席蒋介石颁布北伐动员令，7月9日，在广州市东较场举行誓师大会，随后各军即分途出发。

北伐战争的战略方针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在开始时两湖战场是主战场，集中在这个战场的是四、七、八军②。7月11日攻克长沙，9月6日克汉阳，7日克汉口，10月10日克武昌，直系吴佩孚主力基本被歼。在围攻武昌之际，因直系另一军阀孙传芳的移师西向，妄图截击国民革命军，所以江西战场正式开辟。经激战，11月8日克南昌，孙传芳主力随即被击溃。1927年3月20日，上海80万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攻占了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次日，北伐军克南京。这样当时北洋军阀三大派中的吴佩孚和孙传芳两大派系基本被歼或击溃。国民革命军从珠江流域迅速打到长江中下游，整个中国都受到很大的震动。

北伐战争的胜利是由于广大将士的英勇作战和工农群众积极支持的结果。北伐战争是以统一战线的形式进行的一切战争，不

① 广西军在李宗仁、黄绍竑和白崇禧的指挥下，打败了旧桂系陆荣廷和沈鸿英后，表示愿意接受广州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领导。1926年2月29日，组成了两广特别委员会，商讨和实施统一事宜。见《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上册，第四编。

② 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是由唐生智部组成，唐被任命为第八军军长、北伐军前敌总指挥。

同阶级和集团是怀着不同的目的来参加这场战争的。新右派代表蒋介石，就是乘战争胜利之机，利用总司令的名义不断扩充实力和地盘。蒋介石在北伐出师时能控制的“不过两个师团，到江南时，其数量已达20个师团以上①。”从地盘上来说，蒋的势力范围已迅速扩大到东南各省。由于实力和地盘的扩大，蒋介石获得了中外反动势力的青睐。自从1926年11月9日进驻南昌之后，蒋的司令部就成了中外反动势力互相勾结的大本营，形成一种“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的逆转局面，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爆发了迁都之争。

所谓迁都之争，就是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驻地应该设在哪里的问题。随着革命战争的向北推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仍设在广州显然是不适宜的。经反复研究，1926年11月下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②决定迁都武汉。原在广州的各中央机关随即暂停办公，党政要员分批经南昌赴武汉。第一批要员到达武汉之后，1926年12月13日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党政府委员组成中央临时联席会议，推徐谦为主席，正式办公，执行最高职权。可是，当第二批要员在1926年12月31日经南昌时，蒋介石要他们开会重新讨论迁都地点问题。他以中央机关应靠近前线为借口，提出了迁都南昌的要求③。蒋介石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因为关于迁都问题，在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定之前，蒋介石曾多次打电报提议迁都武汉，决议通过后，蒋介石在南昌接见记者时又再次肯定。第一批要员赴武汉经南昌时，在有蒋介石参加的庐山会议上

① 《田中义一与蒋介石会谈记录》，《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九期。

② 1926年7月4日，国民党中央决定以政治会议取代政治委员会。

③ [苏]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491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6页。

还是再三肯定①、蒋介石之所以出尔反尔，重新提出迁都南昌，是因为南昌是他与中外反动派勾结的中心，如首都设在南昌，他可以利用党、政最高机关的名义进行更大的交易。此外，还因武汉以工农运动为中心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有“赤都”之称，是他最害怕的也无法控制的。加以武汉军事上基本上为唐生智所控制，唐这时表现“左”倾，蒋在长沙阅兵坠马事件早已为唐部传为笑柄②，蒋唐势难相容，蒋的这些“心病”是说不出来的，所以只能以靠近前线为借口。但这个理由是很难成立的。因为从军事上说，这时战事虽然东移，但西线还是对峙着，如从直捣幽燕来说，武汉工商业繁荣，而南昌当时只有十几万人，近代化的工业只有一个发电厂，水陆交通和经济发展程度远比不上武汉。蒋介石开会重新讨论迁都地点问题时，连武汉联席会议的主要成员都没有通知参加，即使这样，他的主张在会议上还是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武汉联席会议更是连续打电报和派人要蒋介石到武汉说明原因。蒋介石到武汉后，在各方面的强大压力下，才不得不被迫放弃迁都南昌的要求，放走被困南昌的第二批要员，一场迁都之争才告结束。

蒋介石迁都南昌的阴谋虽然被挫败了，但它说明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已日益明显。为了制止这种倾向，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中央在武汉举行了二届三中全会，会议在提高党权、反对独裁

① [苏]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491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6页。

② 1926年7月11日攻克长沙之后，在长沙举行了一次阅兵式，唐生智选了一匹驯马给蒋介石骑着阅兵，谁知到第八军队前，军号一吹，马惊起跑，蒋即坠落，堂堂总司令连一匹驯马都驭不住，一时传为笑柄。此事唐生智和李宗仁回忆录都有记载，见《李宗仁回忆录》（上），第362—363页。

的口号下，通过了将党、政、军等机构的主席制改为主席团制等决议，这实际上是撤了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静江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的职，是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的一次打击。但由于总司令职务还保留，蒋介石还可以继续发号施令，并最终发展成为新军阀的首脑。

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以后，特别是国民政府北迁之后，广东的党政军大权控制在李济深手里。李济深祖籍浙江，出生于广西梧州，陆军大学毕业生，曾在北洋政府陆军部任职。1920年南归省亲，路过广州，得老上司邓铿的介绍，到粤军第一师任职，先后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师长等职。李的第四军当时被认为是战斗力较强的军队，加上他和李宗仁等新桂系的特殊关系，在“三·二〇事件”中又和蒋介石互相利用，所以相继被任命为黄埔军校副校长和国民革命军参谋长。北伐战争开始以后，李济深以参谋长和第四军军长名义留守广州，随后还以广州政治分会的名义号令粤、桂、闽三省。李济深是一个受封建思想影响很深的人，在权力方面和蒋介石虽有矛盾，但在对待共产党和工农运动方面是很一致的，实际上也变成了一个“新右派”。所以由李济深留守广州，蒋介石是放心的。

从北伐进军以后至“四·一五”大屠杀之前，李济深在广州的统治主要采取了如下的措施：第一，改组国民党省、市党部，使右派在省、市党部中占优势，因此遭到1927年3月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否定；第二，撤换担任广州市公安局长的左派人士，先后由反动分子钱大均、邓彦华担任；第三，接管兵工厂，限制和禁止给工人纠察队发放武器；第四，扩大军事实力，除组建第十三师之外，还组建省防军四个师；划全省为七个警备区，加强军事控制；第五，改组省、市政府，把政权也紧握在手中；

第六，以巩固后方，维持秩序为名，多方限制工农运动。在李济深的统治下，对工人运动开始是“禁止持械游行”，继后又设立罢工仲裁委员会，对劳资纠纷，由农工厅“仲裁”，工人不服也要强制执行。指使、纵容反动工会向革命工会进攻。1926年7月13日，广东机器工会反动头目陈森指使爪牙打死革命工会委员2人，伤10余人；18日，陈为革命工人抓送公安局，广东军政当局则密令释放。1927年1月3日，反动的广东机器工会又纠集暴徒200多人，袭击革命的粤汉、广三等两个铁路工会，打死10人，伤10余人，广东军政当局则置之不理，使革命工人的正当权益和生命都无法保证。

在农村，反动倾向更是明显，北伐出师前，广东的农民运动是全国最发达的省份，有组织的农会会员达70万人，是国民政府的基础和强大后盾。北伐出师后，广东各县的县长“没有一个没有一天不攻击农会”，说“农会就是土匪”，“干涉行政”。军队、民团与土匪勾结进攻农会；右派报纸也大叫农会“扰乱乡村治安”，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遭杀害的事时有发生。花县民团围杀农民，民团首领就是李济深的参谋①。总之当时的广东是“新军阀统治时期，这种新军阀较旧军阀更厉害些……压迫一切民众运动②”。

二、广州“四·一五”政变

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使国内外敌人极为恐慌，他们为本身利益而互相勾结起来。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选中了掌握北伐军大权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而梦想篡夺革命胜利果实建立蒋家王朝的蒋介石，也需要找强大的政治靠山。于是，他们内外

①② 《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第416页、第483页。

勾结，共同破坏中国革命。当时的局势，正如中共中央在1927年1月28日的《对于时局的宣言》中指出的，“中国国民革命运 动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最严重的历史时期”^①。

蒋介石在“迁都之争”失败后，即声称“打算不久和他们（指武汉政府）决裂，到南京后再成立新政府”^②。因此，在北伐军向华东地区进军中，他纠集了一批地痞、流氓充当打手，“走一路，打一路，专打赤化分子”^③。沿途捣毁了执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党部和民众团体，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到处高呼“蒋总司令万岁！”“打倒赤化分子！”等反动口号，气焰异常嚣张。

3月22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不久，白崇禧便率领北伐军开进上海。26日，蒋介石也到了上海，帝国主义分子马上派汽车把他“护送”到法租界，进行一笔血腥的交易。帝国主义答应通过法租界给蒋介石发动政变提供一切方便，并表示愿以驻扎在上海的3万多名侵略军帮助他镇压革命群众，希望蒋介石在上海迅速而决断地行动起来。蒋介石立即“与当地闻人（流氓头子）黄金荣、张啸林、虞洽卿、王晓籁、杜月笙等相结纳，请其协助”^④。并要求上海的华商银行家为他发动政变筹备资金，这些银行家要求蒋介石保证，脱离武汉政府，反对鲍罗廷，反对共产党，后双方达成协议。江浙财团和上海大资产阶级答应“共出1200万元为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之用”^⑤。事成后，再提供3000万元为建立反动政权费用。从此，蒋

① 《响导》，第186期。

② 贾逸君：《中华民国政治史》。

③ 郭沫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④ 荣孟源：《蒋家王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28页。

⑤ 《响导》，第194期。

介石与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勾结起来，残酷镇压中国革命。

1927年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召开了全面反共的秘密会议。

在4月2日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等开秘密会议的同时，吴稚晖、张静江等也召开了所谓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文告。3日，汪精卫回到上海，也参加了会议。经过密谋作出几项决议：（1）定4月15日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解决“党事纠纷”问题，在开会前各地共产党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2）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所发命令，一概无效；（3）各军队、党部、民众团体机关的最高长官和主要负责人，对“在内阴谋捣乱者”予以制裁；（4）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反对政府的阴谋团体，不准存在^①。这四条决议，实际上是国民党右派实行反动政变的纲领。并具体规定在4月15日前大规模地实行清党，正式分共。并分工由蒋介石负责东南——上海，李济深、古应芬负责广东，黄绍竑负责广西，汪精卫则回武汉进行分裂活动。^②他们还立即通知军警机关，对共产党和革命分子马上实行监督。

蒋介石、白崇禧等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首先发动反革命政变，袭击工会会所，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计有5000多人被杀，大批人被捕入狱，白色恐怖笼罩了全上海。

李济深、古应芬于4月12日由沪返穗后，即布置在广东的“清党”计划。他们又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将该党（指共产党）分子克日扫除，并以武汉中央党部已为该党挟持，即日宣布脱离

①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十三辑，第69页。

② 李新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一卷，第318页。

关系”。①决定成立广东省特别委员会，负责全省党务政治军事，委员由李济深、古应芬、李福林、陈孚木、邓彦华五人组成②。该委员会实际上是指挥发动反动政变的领导机关。接着，就召开了特别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于4月15日发动反革命政变。并作了具体的部署：派陈孚木接管《广州民国日报》，曾养甫接管《国民新闻》报；通令本省各级党部，于文到三日之内将共产党分子检举密报本会查办；通告“CP”及“CY”分子于十日内到军政督察委员会自首。③同时委任钱大钧为广州戒严司令。规定“在戒严期间，所有驻在广州市附近的陆海军警，概归戒严司令部指挥调遣。”还规定“在戒严期内，所有一切集会结社非得本司令许可，不得擅自开会，如违者，蓄意捣乱，必严拿究办”④。他们利用反动的广东总工会和广东机器工会为先锋，向革命人民进攻，并在社会上散布“16日共产党将攻击沙面”⑤的谣言，作为他们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借口。

钱大钧上任后，立即调遣大军严密布防。4月15日晨二时起，宣布全市戒严。反动军队在各马路街道协助警察梭巡站守，有两连军队监视电话两局。各马路及紧要地点，均派出双岗步哨警戒，停止一切交通。只有佩带白布蓝色通行证的人和插有通行证的汽车，才能通过戒严地区。反动当局还派出军队会同各区警察，按地址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气氛异常紧张。

①② 《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特别委员会布告》，载《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4月16日。

③ 《特别委员第一次会议》，《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4月16日。“CP”即中国共产党，“CY”即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④ 《钱大钧兼任戒严司令》，《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4月16日。

⑤ 司马璐：《广州四一五清党》，《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五部，第35页。

广州宣布戒严后，反动军队和反动工会联合向广州工人纠察队驻地、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人代表会、钢铁工会、酒楼工会、济难会、海员工会及粤汉、广三、广九车站进攻。各地工人纠察队都奋起反抗，在广三、广九、粤汉车站和东园的罢工委员会总部，芳村的罢工工人纠察队总部等地都发生了激烈战斗①。特别在粤汉铁路火车站，工人事先有所准备，工人纠察队联络附近农军、路警共千余人，用机车两辆当炮垒，奋勇地向反动军队还击。战斗从早上2时战至午后3时，后由于反动派不断增兵，而且切断了工人纠察队与外界联系，敌众我寡难于支持，在大量杀伤敌人后，被迫撤离阵地。②其它各地的反抗也遭到失败。

李济深在向工人纠察队驻地进攻的同时，下令解散广州的革命组织和民众团体。解除了黄埔军校和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武装，封闭了左派工会等机关200多处③。甚至学生和妇女团体也遭到无理的搜查。他还帮助资本家推翻了过去工会与店主订立的一切条约，剥夺了工人过去通过斗争所取得的各种权利。

这次反动政变，逮捕和屠杀的时间延续一周之久。仅以广州计，被捕同志2000余人。其中被“秘密枪毙的有200多人，甚至有些劳动童子军团的团员也遭到惨杀。还有2000多的铁路工人被驱逐。”④这样，广州地区“原来的工人领袖几乎全部被敌人逮捕、杀害或者驱逐了⑤。”大屠杀以后，钱大钧还发布告称：“在当前紧急时期，严禁集会结社和任何形式的罢工。”⑥使广州完全处于白

① 《广州四一五惨案之真象》，《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4日。

② 《广东反动真象》，《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3日。

③ 《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十一号，第104页。

④ 李新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一卷，第322页。

⑤ 刘达潮：《海员斗争的两个故事》，载《老工人话当年》第一辑。

⑥ 广东省档案馆编：《广州起义前后的全国时局》1982年版，第5页。

色恐怖统治之中。

李济深为了欺骗群众，保留了一些工会、农会，但都派出了反动分子充当改组委员，接管了这些组织。同时，还成立了“民众委员会”，作为所有民众团体的领导机关，使一切组织“都集中在中国国民党指挥之下”^①。经改组后的工会、农会，都成了反动统治的工具。如罢工委员会改组后，由反动分子徐天琛任执行委员会会长，公开声称拥护国民党的反动政策。省农民协会在4月16日下午由曾养甫等会同军警占领了会所后，即发表了通令：“着该办事处、各县特派员，一律暂时停止职务，听候派员改组。”^②不久，即派出大批人员到全省各县，着手改组各县农民协会。还有全国总工会、广州工人委员会、妇女协会等团体，都由反动分子所把持。

革命人民对白色恐怖并没有屈服，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广州革命工人纷纷起来反抗新军阀的屠杀政策。4月23日，工人举行了罢工斗争，参加罢工的有海员、汽车工人、人力车工人、印刷工人、渔业工人及一部分店员。他们发表了罢工宣言，提出“反对摧残工会！”“反对雇主的进攻！”“打倒一切新军阀！”“释放一切政治犯！”等口号。立即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当时“被捕的工人有数千人，散发宣言者有六人被杀害”^③。

在镇压工人运动后，国民党内各政派之间的矛盾也尖锐起来，他们都企图扩充自己的势力。李济深为了达到控制一切工会，进而控制全省，于5月26日召开改组委员会总代表会议，但仅通知少数工会派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利用了国民党各政派之

① 《特别委员会各委员会成立》，《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4月18日。

② 《改组各地农运人员》，《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4月23日。

③ 《广州百年大事记》下卷，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9页。

间的矛盾，派出革命工会代表参加了会议，并控制了会场，决议成立工人特别委员会，代行以前工人代表会议执行会的职权。还改选了基层工会组织。这样，使改组委员会失去了作用，工会又回到了革命工人手中。李济深发觉后，即令解散工人代表会，宣布特别委员会非法，将工会职员都当作共产党员加以逮捕，使工人运动再次受到摧残。但革命工人并未放弃斗争，纷纷成立各种武装斗争团体，如“自救队、义勇队（海员）、剑仔队（手车夫）、省港罢工工人利益维持队等等，共计有6500余人”。^①他们武器不多，但组织严密，经常袭击工会的改组委员，使他们十分害怕，轻易不敢外出，不得已外出时必备警卫保护。

6月19日和23日，广州工人为纪念省港大罢工和沙基惨案，先后举行示威游行，有几万人参加，又有不少人被捕。反动政府还下令今后“公共团体要举行集会，仍须得到警备队和公安局的许可。工人不得任意罢工”^②。不久，广州政治分会又通过了一项特别刑法《反革命裁制条例》，规定：无论何人，一经被查获是破坏国民革命，为首者，将予处死，并没收其全部财产^③。企图以高压手段使工人屈服，但斗争仍在继续。6月29日，李济深借口第二次“清党”，再次向工人进攻，从凌晨2时至6时，反动军警围搜了罢工工人宿舍，“围搜工会五千余，拘拿近二百，情形与4月15日相仿佛”。^④广州再次处于军事管制之下。

广州以外的全省各地区，反动派也向革命人民进攻。潮梅警备司令部奉令于4月15日晨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是日晚10时戒严，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规定“在戒严区域内，不论昼夜，

① 《广州百年大纪事》下卷，第381页。

②③ 广东省档案馆编：《广州起义前后的全国时局》第21、40页。

④ 《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第十六号，第154页。

得侵入家宅建筑物船舶中检查之”。①于是，4月15日晚宣布戒严后，汕头的反动军警便随意大肆逮捕革命人士，并侵占市党部、总工会，封闭《广东日日新闻》社，缴了罢工纠察队的械。在轮船、码头、火车站均派有军警把守搜查，一直延续到16日仍未结束。②在佛山，第五军第四十五团会同保安队、侦缉队和警察，于15日晨分头搜捕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当日“被捕的共产党员有10余人。封闭了《农工商学报》社、工人代表会、农民协会”等等。翌日，反动军队还分头前往各乡搜捕，封闭了各乡的农会。16日，“第五军的团长潘枝会同保安队到深村堡围搜，被捕的有20余人”③。驻肇庆的第十三师，于16日下午6时派兵200余人包围了市总工会、农民协会。“逮捕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0余人”④。海口的反动军警，亦搜捕共产党员、封闭革命工会和其他民众团体，在此事件中，“琼崖特委李爱春等数十名共产党员被捕杀害”⑤，其他各地都出现类似情况。

面对反动派的屠杀，全省各地的革命群众纷纷重新组织起来，发动武装起义。陆丰、梅县农民军和工人纠察队，在东江一带联合各县工农军，举起“反蒋倒李”旗帜，组织了“惠梅工农讨逆军”，袭击东江各县的反动派。彭湃率领海陆丰农军在海丰发动武装暴动，成立了苏维埃政权。东江“各县反动派纷纷急电求援，李济深闻讯后，手足无措”⑥，在北江，从广州逃到北江的工人，联合当地农军，组织了1000多人的武装，并联络了驻韶关的鲁涤

①② 《肃清潮梅共产党反动分子》，《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4月19日。

③ 《佛山最近之状况》，《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4月19日。

④ 《搜捕共产党之情况》，《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4月22日。

⑤ 《中共广东党史大事记》，第33页。

⑥ 《粤逆党之命运》，《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日。

平部陈嘉祐师，在韶关收缴了第五军驻韶部队的枪械，成立了广东农民总指挥部和南、韶、连政务处，声势浩大。各地农民武装起义，“使李逆大有束手无计可施之概”^①。为维护反动统治，镇压农民运动，李济深勾结桂系黄绍竑，调第十五军黄旭初师入粤驻韶关一带，后又加调吕焕炎和伍廷飏两师入粤，以加强李济深的军事实力。同时，李济深还成立了“剿办”，划区分剿，其分工是：“钱大钧负责北江；徐景唐负责西江；陈济棠、薛岳负责东江及海陆丰，重点在海陆丰；李福林负责广府各属；南路及海南岛都有专人负责”。^②钱大钧就任北江前线总指挥，联合桂军共1万多人，另有8艘炮舰、两架飞机协助，疯狂进攻韶关的革命军。不久，革命军放弃韶关退到湘粤边境。韶关又被钱大钧占领。海陆丰农军在惠州警备司令胡谦率部攻击下，也遭到失败。

李济深在残酷镇压革命运动的同时，也排斥国民党在广东的其他派别，先逼曾养甫出走香港，后又用扣帽子手法，开除了陈孚木的国民党党籍，^③为独占广东开辟道路。1927年5月，宣布广东省特别委员会结束，广州政治分会改组成立，李济深任主席。8月，广东省政府改组，李济深任广东省主席。同月，又成立了第八路总指挥部，李济深任总指挥。至此，李济深完全掌握了广东的党、政、军一切大权。广东虽然名义上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但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李济深成了广东的真正统治者。

① 《李济深寝食不安》，《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4日。

② 黄绍竑：《阻击叶贺南征军的战争》，载《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四辑。

③ 《反动后之广州——右派、新右派之倾轧》，《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13日。

三、镇压南昌起义军

大革命失败后，为挽救革命，中共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中发动军事暴动，派周恩来到南昌筹备起义，组织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

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准备7月下旬在庐山召开反共会议，通知贺龙、叶挺到庐山，并令其部队集中于德安，企图诱捕贺、叶后即收编他们的军队。贺龙、叶挺和叶剑英等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决定贺、叶不上庐山，部队亦不去德安，而迅速向南昌开进。7月29日，汪精卫、孙科、张发奎、朱培德等在庐山密谋加紧“清共”，议决：(1) 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2) 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3) 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党，通缉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等^①。

7月26日，贺龙、叶挺率部到达南昌。同日，周恩来也从汉口到达南昌，成立起义总指挥部，任贺龙为总指挥，部署起义计划。

1927年8月1日零时，南昌起义爆发了。原属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贺龙、叶挺率部参加了起义。经过5小时的战斗，全歼南昌守敌朱培德部1万多人，占领了南昌，成立了以共产党员为核心、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同时前敌委员会决定起义军离开南昌，南下广东，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再举行北伐。因此，起义军于8月3日至5日先后撤出南昌，向广东进发。

^①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十三辑第167—168页。

南昌起义爆发后，国民党各集团立即联合起来对付起义军。武汉国民政府8月2日发出通令称：贺龙、叶挺即褫军职，照‘谋叛律’治罪^①，“除派兵往剿外，希一体缉拿”。^②令张发奎“督率黄琪翔、朱晖日两军进剿”^③。令“朱培德即饬驻赣东南各处驻军严密兜截；唐生智抽调湘鄂驻军合力剿围”^④。8月4日，张发奎余部在德安附近与起义军作战后占领了德安。5日，朱培德由汉到浔与张发奎、黄琪翔共商进攻南昌。7日，张发奎部占领南昌。

蒋介石发现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的意图后，急令李济深组织堵击。李济深为确保广东的地盘，决定全力阻截，他向“总部领费5万元，成立讨共军第八路总指挥部，荐黄绍竑为副总指挥兼前线总指挥”。^⑤开始，李济深力图把起义军拒之广东境外，同时想乘机把势力扩展到赣东、赣西（赣南已属第八路总指挥部管辖），因而组织各路军入赣。“潮梅警备司令部和惠州警备司令部奉令从东江上流出兵入赣。惠州出兵三个团，潮梅出兵一个团。潮梅第一军第三补充团柏天民部溯韩江上平远入赣东”^⑥。李济深将两广军队编为中、右、左三路。黄绍竑兼中路总指挥率领第七军第四、六两师；钱大钧为右路总指挥率领新编第一师、新编第四师、第十八师（两个团）、第二十师；范石生为左路总指挥率第十六军两个师，合力堵截起义军。^⑦

①④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十三辑，第173页。

② 解放军军事学院编：《南昌起义》，《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六辑第40页。

③ 张英南：《宁汉粤各军阀没有联合围攻，南昌起义军的原因》，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1985年第二期。

⑤ 《新闻报》，1927年8月10日。

⑥ 《潮汕军入赣平叶贺》，《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8月23日。

⑦ 解放军军事学院编：《南昌起义》，《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六辑第42页。

8月10日，两广军队分两路入赣、湘，一路由钱大钧率部“自南雄至赣州，连营百里”，^①堵截起义军南下。中路军黄旭初师跟随。一路由范石生率部入湘，以防起义军经湘入粤。范部在入粤之要道——城口镇，打败了陈嘉祐部，占领了城口镇。^②与此同时，李济深还派陈可钰与张发奎联系，商讨联合“讨伐”起义军计划，双方在避免利害冲突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即张发奎“服从李济深指挥的前提下，李济深同意张发奎及其部队从吉安、赣州取道广东南雄、韶关回广州，增加广州的防务”。^③

起义军到达江西的广昌后，分兵两路向瑞金进军。第十一军为右纵队，第二十军为左纵队，准备在壬田市会合后共同进攻瑞金。此时，李济深调“右路总指挥钱大钧率七千人和由东江调来之苏世安、柏天民两个团约两千人到会昌、瑞金”。^④钱大钧派两个团在壬田市前方布防，封锁这一要隘。8月25日，贺龙的第二十军在壬田市与钱部之五十、六十团遭遇，激战至次晨，钱部失败，向会昌方面溃退。

钱大钧在会昌集结了9个团。黄绍竑部黄旭初师亦由于都洛口向会昌前进，与钱部会合，两部兵力合计有18个团。面对强大敌人，起义军仍决定发动会昌战役。8月26日早上，起义军向会昌发动总攻击，激战至下午4时，终于打败了敌军而占领了会昌城。钱大钧指挥残部向粤赣边界的筠门岭溃退，后经武平、信丰退到广东梅县。钱部经壬田和会昌战役后，损失惨重，“伤亡俘

① 《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第十九号，第134页。

② 《第十六军在湘南歼灭共逆之经过》，《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8月26日。

③ 张英南：《宁汉粤各军阀没有联合围攻南昌起义军的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1985年第二期。

④ 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党史研究》，1980年第四期第13页。

虏逃散的约6000人，只剩得约3000人”。①而起义军在会昌战役中，“也伤亡七八百人”。②两天后，黄旭初师先头部队2000余人，还不知钱部在会昌惨败，仍经洛口来会昌与钱部会合，又被起义军击溃，残敌退至洛口。

会昌战役敌军失败，李济深调黄绍竑部的吕焕炎师进驻南雄，并令黄旭初师撤至粤赣边界处——筠门岭。再次阻截起义军入粤。

筠门岭是赣粤两省的分水岭，地势非常险要。黄旭初利用天险，并在周围构筑工事。起义军到达筠门岭后，屡攻不下而且伤亡颇大，遂决定改变进军方向，由瑞金转经福建的长汀、上杭进入广东省大埔县。

敌人发现起义军转向福建进入广东境内后，急调军队入闽。“福建省军事当局谭曙卿、杨树庄，分别派出省防军、海军陆战队”。③蒋光鼐也率第十师于都、瑞金兼程入闽。李济深眼看阻击起义军入粤的行动已遭失败，即重新策划军事部署，决定将第四军第十一师、第十三师和新编第二师组成东路军，以陈济棠为总指挥，在丰顺、揭阳之线集结；令钱大钧部到梅县以东的松口镇监视留守三河坝之起义部队；黄绍竑带桂军两个师进军梅县，并在上游渡过韩江，由鳄鱼障北边的上罗衣翻过山南的下罗衣，窥伺潮汕。④

9月18日，起义军进入广东省大埔县后，得到各地的情报，

① 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党史研究》1980年第四期第13页。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编：《南昌起义》，《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六期第46页。

③ 《闽军事当局派队防御叶贺》，《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8月24日。

④ 黄绍竑：《阻击叶贺南征军的战争》，载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四辑。

得知兴宁、五华仍在农军占领中；高坡、普宁、揭阳农民暴动失败；汕头工人已破坏了潮汕铁路；海陆丰尚在暴动农民手中。据此，起义军遂决定沿韩江南下。19日，起义军占领了三河坝后又分兵两路，一路由朱德亲自率二十五师据守三河坝；其主力则直奔潮汕。9月23日，起义军占领潮州，后在汕头工农军的协助下，24日，先头部队进入汕头市。

起义军占领潮汕后，李济深的第八路各军于梅县附近集结，代总指挥黄绍竑令东路军以一部进占丰顺城，主力进占汤坑，与中央军联系后，向白坎铺、潮安进攻；中央军与东路军取得联系后，由黄金市进攻隍隍，渡过韩江左岸，以切断起义军退路；并要求右翼军于29日到达新渡墟渡过韩江右岸，断起义军退路；潮梅军于9月27日向揭阳进攻，以阻断起义军通陆丰、海丰之道路。黄绍竑率部到达潮州上游30公里的隍隍墟，截断了潮州与三河坝之间的交通。同时，李济深还派姚雨平率舰队巡视东江。^①监视起义军的行动。

起义军主力在汕头休整三天后，再次分兵，除第二十军第三师师长周逸群率部警卫汕头外，其主力约6500人，在贺、叶率领下向揭阳进攻。9月26日中午，起义军占领揭阳，守敌退至丰顺。

起义军占领揭阳后，黄绍竑即令中央军、东路军同时向揭阳进攻，潮梅军于汤坑附近集结后，亦向揭阳进攻。这时，起义军也接到敌军“已集中汤坑，准备向揭阳进攻”的情报。因而决定主动出击，全力扑灭汤坑之敌。9月28日，起义军行至汤坑附近与王俊潮梅警备旅和薛岳部遭遇，经激战，打败了王、薛部，敌残部撤至汾水坳。陈济棠急令三十二团在右，三十一团在左，同时

^① 《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第二十一号，第129页。

向汾水坳前进，并以张瑞贵补充团，部署于汤坑后约七八里地的小高山上为预备队。

起义军在汤坑与敌军发生激烈战斗。陈部三十二团以汤坑河为依托，和起义军展开了肉搏战，反复多次，形成拉锯状态。后三十一团抢占了制高点，居高临下，攻击起义军。9月29日，陈济棠调张瑞贵团参战，令十三师向汾水坳方面包围。汤坑之役，李济深投入总兵力约两万人，而起义军只有6000人。激战至30日，起义军两翼受敌包围，伤亡近两千人，而且弹药用尽，无力支持，遂决定撤回揭阳。10月1日，起义军主力在离揭阳约20公里之炮台渡过榕江，次日至贵屿，3日到达普宁县流沙镇，与从汕头退出的前委首脑机关会合，召开决策会议，会上周恩来指示“武装人员退往海陆丰，今后要作长期的革命斗争。”^①会后，武装部队向海陆丰撤退，当第一、二师到达流沙镇附近乌石时，遭到陈济棠第十一师和徐景唐第十三师的伏击，与后续部队失去联系。数小时后，首脑机关和二十四师亦被敌军包围，只千余人突围，到达陆丰后又被敌东路军两个师包围，激战至午后2时，起义军全面败退。

9月30日，黄绍竑两个师进攻潮安，起义军连夜撤出。

自起义军主力离开汕头后，李济深即令“海军红鹰、民主两军舰向汕头市炮击”。^②帝国主义也配合行动，“英国军舰六艘，日舰两艘，美法舰各一艘，也开进汕头海面示威”。^③日本陆战队还借口保护侨民和领事馆在汕头登陆，企图乘机挑衅。一队英国水兵也以保护教堂为名而强行登陆。留守汕头的起义军警卫团，曾

^{①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编：《南昌起义》，《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六辑，第55页。

^②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十三辑，第214页。

多次打退了中外反动派的进攻。但后因潮安已失，汕头已失去屏障，于10月1日主动撤出。次日，敌军陆续进入汕头。黄绍竑派兵分赴澄海，揭阳进攻起义军，并相继占领澄海、揭阳。

与此同时，钱大钧调动了3个师共1万多人，从梅县松口镇而下，直扑三河坝，10月2日午后，朱德号召全体官兵“要坚守三河坝，牵制敌人兵力，为我军主力创造有利条件”^①。起义军由10月2日坚持战斗至4日，终因伤亡惨重而撤出三河坝。

这样，进入广东的南昌起义军在李济深的镇压下，遭到了失败，余部终于撤离广东。

第三节 “张黄事变”

一、张发奎回粤

张发奎，字向华，广东省始兴县人。1911年武昌起义后，投入广东模范团当兵，后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堂并加入同盟会，1914年升入武昌第三陆军中学，参加过讨袁战役和驱逐桂系出粤战争。1920年11月，组建第一师时，任第一师少校副官，1921年5月，孙中山在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在广州成立大本营警卫团，张发奎任该团第三营营长，后随大本营驻韶关。6月，陈炯明叛变，张发奎在讨陈战争中失败，随第一师归附陈炯明，任第一师营长。年底，孙中山联络滇、桂军讨伐陈炯明，张发奎与工兵营长邓演达起兵响应，共同组织讨贼联军，并于1923年1月驻进广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编：《南昌起义》，《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六辑，第56页。

州，任第一师独立团团长。以后，又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刘之乱。1925年7月，国民政府整编驻粤各军，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张发奎任独立旅旅长，第二次东征后升为第十二师师长，黄琪翔则任第十二师的一位团长。

1925年7月1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总参谋长兼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奉令统率第四军的十一师、十三师和第五军留守广州。而第四军的第十师、十二师和独立团在副军长陈可钰的率领下，随各军离粤参加北伐，这样，第四军分成了两大部分。1927年4月15日，李济深追随蒋介石在广州发动叛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为此，在武汉的第四军公开宣布脱离李济深的指挥，自成独立体系，并扩编为第二方面军，由张发奎任总指挥，下辖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第十一军（军长朱晖日）、第二十军（军长贺龙），隶属于武汉国民政府。在广州的第四军亦扩编，成立第八路军总指挥部，由李济深任总指挥，下辖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十三师（师长徐景唐），并增编了新编第二师（师长薛岳）、新编第三师（师长黄慕松），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从此，原来统一的第四军已分裂为各不相属、互相对立的两支队伍。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内部存在着宁（蒋派）、汉（汪派）、沪（西山会议派）三个中央，它们为争夺国民党最高控制权而勾心斗角，而且又各自支持各派的地方军阀，因而使这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常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

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宁、汉之间虽然在反共反人民方面已趋于一致，但汪精卫持其在国民党中央的“合法”领袖地位，企图通

过宁、汉合作，达到以他去“统一”国民党的目的。而蒋介石却又以“反共先觉”自居，要由宁方继承国民党的“正统”，拒绝与汪精卫合作。因此，在宁汉对峙局面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利用了这一矛盾，联合西山会议派，先逼蒋介石下野，后又在宁、汉、沪三方的上海会谈中，联合武汉的谭延闿、孙科，排挤汪精卫，迫使他不得不自责“防范共产党过于迟缓，请求处分”而通电下野。^①他们还把汪派的骨干分子排斥出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机构——中央特别委员会，使国民党中央领导权转到了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的手里。

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后，国民党内部争权斗争走上了新的阶段。掌握了特委会实权的桂系与被迫下台的蒋介石、汪精卫之间的矛盾，成为当时国民党内部的主要矛盾。原来互相倾轧、势不两立的蒋、汪在反桂系的斗争中又互相勾结起来了。

蒋介石并不甘心失去对国民党中央的控制权，他一面偕张群到日本寻找强大政治靠山，另方面纠集国内反桂系势力，对抗中央特别委员会。汪精卫也离沪返汉，同武汉的唐生智合谋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与中央特委会对抗。但当时的武汉已在唐生智的控制之下，而一贯以国民党“正统”领袖自居的汪精卫，当然不愿屈居于唐生智之下，故当他得知张发奎部已返回广东，便企图依靠张发奎的实力，谋夺李济深的广东地盘，使广东成为对抗中央特委会的基地，遂决定离汉返粤。

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是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力军之一。“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张发奎因其部下共产党员很多，且多为骨干，为保存其实力，暂未在军队中实行“清共”。7月下旬

①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卷四，第三十六期。

旬，张部奉命东征讨蒋，张发奎在政治上虽拥汪反蒋却无意东征，但又担心唐生智以反共为名吞并第二方面军，实现其当“两湖王”的美梦。于是，便借东征讨蒋之机，离开汉口，移兵于九江、南昌一带。汪精卫、张发奎等得知共产党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于7月29日在庐山召开反共会议，决定：令贺龙、叶挺限期将部队撤回九江；在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逮捕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五等人。^①廖等得知此事后即离开九江到南昌。会后，张发奎也率缪培南等三师向南昌逼近。

8月1日，共产党领导下的南昌起义爆发，第二方面军所属的第二十军和十一军的一部，在贺龙、叶挺率领下参加了起义，十一军的余部在师长蔡廷锴率领下也脱离张发奎，到福建投靠老上司陈铭枢去了。第二方面军基本瓦解。在此情况下，张发奎已无法在江西立足，更无力东征，想回武汉又不容于唐生智，摆在他面前的唯一出路，只有回广东老家伺机再起。张发奎考虑到目前自己兵少力弱，已无法与各派抗衡，决定暂时与李济深妥协，表示服从李济深的指挥，以取得李济深同意他们回粤。于是当起义军撤出南昌时，第二方面军余部在黄琪翔的率领下，以追击起义军为名，与起义军分道奔驰广东，由江西吉安、赣州进入粤北。张发奎则离开队伍赴港活动。

起义军则经福建进入粤东，引起李济深警觉，为阻击起义军进军广东，他将广州兵力抽调至东江，同时拨出一笔开拔费给第二方面军，并派人分别到韶关和香港，迎接张发奎和他的部队到广州。9月21日，正当李济深部在潮汕一带与起义军激战时，黄琪翔以代总指挥名义率部抵穗。张发奎也于9月27日由港返广

^① 《南昌起义》，《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六辑，第22—23页。

州，并“在广州南堤的旧盐务大厦设立了第二方面军指挥部”。①

二、“张黄事变”

张发奎及其部队回粤后，广东政局即出现张李争夺的暗流。李济深同意张部回粤，除当时确无力阻挠外，还幻想利用旧部关系，把张部拉回自己一边，以加强自己实力，共同对付起义军，继续维持其在广东的半独立割据局面。张发奎回粤，不只是为觅得一席休整之地，而且是企图从李济深手中夺取广东地盘，作为他重新起家的基地，实现他当“广东王”的梦想。李济深一贯与桂系关系密切，他不反对中央特委会，主张桂系与蒋、汪合作。张发奎则坚决反对中央特委会，也反对西山会议派。他抵粤后，即发出通电，谴责中央特委会，要求“召集第四届中央监察与执委联席会议，以解决局势问题。”② 10月2日，李济深宴请张发奎及其回粤将士时，张发奎再次发表声明，“只认以前武汉党部政府为正统，并应打倒昏庸老朽分子。”③ 但为了先在广东站住脚跟，还表示“他及其下属将领，均支持李济深作为南方军事首领，并且，在同李济深合作中尽力而为，把本省变成一个革命的模范的新广东。”④

事实上，张发奎在“合作共事”的烟幕下，力图逐步实现其对广东的控制。当李部在潮汕一带与起义军激战时，李曾要求张、黄出兵相助，但张、黄不肯，只作观虎斗，期待两方俱伤，坐享

① 《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9月20日。

② 广东省档案馆编：《广州起义前后的全国局势》1982年版，第106页。

③ 《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二十三号，第135页。

④ 广东省档案馆编：《广州起义前后的全国局势》，1982年版，第105页。

渔人之利。李部镇压了起义军后，由于伤亡很大，元气大损，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整，李济深担心张、黄乘机袭击，遂决定将黄绍竑部主力调回广西，让钱大钧和陈济棠两部进驻潮梅地区，徐景唐部驻江门、四邑，以远离张黄部。徐部开往江门，途经广州时都不敢停留，连夜开拔。

尽管如此，双方小规模的武装冲突仍时有发生。10月10日，从东江回来驻在广九站的李济深部的一个营，与张黄部发生了数小时战斗，结果被张黄部全缴了械。^① 10月24日，张发奎派李汉魂率二十五师赴东江，在惠州将十八师包围缴械，并将师长兼惠州警备司令胡谦扣押。李济深得此消息后，即电令解省，但李汉魂却以贪污舞弊罪在解省途中将胡枪决。^②

张发奎还依仗在广州军事上的优势，逼李济深改组了广东省政府，经改组后的广东省政府，明显地排挤了李济深派人物，张派人物占了优势。如：陈公博取代李文范任民政厅长；谢膺白取代马超俊任农工厅长，邹敏初取代冯祝万任代理财政厅长兼广州财政局长，黄琪翔取代徐景唐任军事厅长，朱晖日取代邓彦华任广州市公安局长。其他新委任的各县长，也完全由陈公博选定，省政府照例通过，李济深不得过问。原李济深与黄琪翔部都称为第四军，经常发生误会，在召开调整番号会议上，张发奎派逼李济深部改称为新编第四军，由黄琪翔部继承第四军番号。

以上情况出现，使李济深在广东的统治地位受到严重的威胁。为反抗张发奎的控制，广州政治分会于10月18日成立临时军事委员会，任李济深为主席，并决定取消李济深之第八路军总指

^① 广东省档案馆编：《广州起义前后的全国局势》。1982年版，第109页。

^② 《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二十四号，第120页。

挥和张发奎之第二方面军的名称。规定“该会受政治分会指导及监督，对政治分会辖内陆军空军及一切军事机关有指挥整理之权。”^①李济深企图利用临时军事委员会，达到调离、改组和瓦解张黄部的目的。他还将在福建的蔡廷锴师接回广东，恢复第十一军番号，请陈铭枢回国重任第十一军军长之职，以利用陈铭枢与张发奎之间矛盾，互相牵制。11月2日，陈铭枢从日本回国抵福州，复任第十一军军长。

李、张之间的矛盾日益白热化，张发奎虽蓄意排挤李济深，夺取广东地盘，但又自感资历不足，难以驾驭广东，只好求助于汪精卫。而李济深也想利用汪精卫的政治威望，继续维持在广东的半独立局面，也决定采取联汪立场。于是，10月7日，李济深、张发奎联名致电汪精卫，请汪回粤“主持党国大计”。不久，又派杨德昭携带亲笔函件到汉口迎汪回粤。这一行动，与汪精卫图谋广东地盘的意图不谋而合。于是，汪精卫在桂系发动讨唐战争爆发前夕离汉南下。10月29日，“汪精卫已偕甘乃光、何香凝及广州派往香港之代表张发奎、陈公博等由港抵广州。”^②

汪精卫到广州后，在广州各界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称此次回粤目的“是商量挽救本党，实现以党治国，以党治军，把一切权力属于本党，无论任何势力皆在本党指挥之下。”因此，“主张将特委会打倒，恢复中央党部，召开第四次中央执监会议，解决一切重大问题。”^③由此可见，汪精卫企图借广东各派实力，恢复其“正统”领袖地位，重新控制国民党中央，张发奎马上明确表示“吾人应一致誓死反对（特委会），并应一致拥护汪主席在粤

①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十三辑，第223页。

② 《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第二十四号，第121页。

③ 《各界欢迎汪何及肃清共匪大会》，《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1月5日。

主持党国大计，及拥护中央委员会在粤开第四次全体会议，恢复中央党部即领导各级党部”。① 汪、张坚决反对中央特委会的态度与李济深谋求蒋、汪与桂系合作的意图相矛盾，故李济深对汪精卫回粤后的态度颇为担心。他既想利用汪精卫，又怕汪精卫危害他在广东的统治地位，因此，他表面上与汪派合作，暗中则处处提防，他曾指使一部分人在社会上散布“汪精卫是党的中心人物，处广东之边陲地，实非所宜，望速归宁，以为全党尽力”② 等等言论，暗示其不欢迎汪精卫久居广东之意。这就加速了汪精卫与张发奎联合，把李济深驱逐出广东的步伐。

汪、张联合驱李出广东的意图，得到蒋介石的支持。蒋介石下野后，把桂系控制的中央特委会看成他复职、重新控制国民党的一大障碍。为扫除此障碍，他采取由反汪转为联汪驱桂的策略。阴谋利用汪、张势力，把李济深和桂系黄绍竑势力驱逐出广东，这既可以打击桂系势力，又可使广东成为蒋、汪联合反对中央特委会的基地，进而重新夺回国民党中央大权。为此，蒋介石特派宋子文到广州活动。11月2日，宋子文由港抵穗后即与汪派人士频频接触。他向汪派表示，只要汪派夺得广东大权，蒋介石从日本回国后即来广州，与汪精卫合作，另立中立，对抗中央特委会。在蒋介石的鼓动下，11月4日，汪精卫等向南京发电，再次声称中央特委会的非法地位，并称“如果南京的委员坚持在南京举行拟议中的国民党联席会议的话，就必须首先废除特委会，至少亦须停该委员会行使国民党中央的职能。”建议“在联席会议开幕之前，提早在上海或广州举行全体中央委员会的预备会议。”③

①《省市党部暨市政府欢迎汪主席大会》，《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1月3日。

②《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卷四，第四十三期，1927年11月6日。

③广东省档案馆编：《广州起义前后的全国局势》1982年版，第123页。

11月7日，蒋介石从日本找到了美、日政治靠山后回到上海。蒋介石虽未到广州，但他到上海后，即在宁、沪间煽动反对特委会的浪潮，与广州汪精卫遥相呼应，并即电请汪精卫到沪共商党事，谓“欲使党从破裂复归完整，非相互谅解，从速举行四中全会，恢复党部不可。”^① 汪精卫立即响应，表示愿意与蒋介石合作。于是，蒋汪携手对付桂系。

蒋介石经与国民党各派协商，决定在国民党联席会议开幕前，在上海召开中央委员会，李济深、汪精卫均被选为在广州的中央委员的代表，前往上海与其他中委商讨召开四中全会与停止特委会等各项问题。

汪、张驱李计划，得到蒋介石支持后而加紧密谋实现。他们多次开会商议，会上，有人主张用暗杀手段，除掉李济深，使李部群龙无首，然后各个击破，进而收编他的部队。但汪精卫等认为这样做必然会引起国民党各派的攻击，政治上损失太大而表示反对。张发奎的大部分高级将领，也认为李济深原是他们多年的老上司，在道义上不忍加以杀害。最后决定用调虎离山计，乘李济深赴沪开会之机，诱骗黄绍竑来穗加以捕杀，拉拢第五军及薛岳、黄镇球师，并派人到香港收集陈炯明旧部及旧桂系军人，把李、黄势力驱逐出广州，让张发奎、黄琪翔在广州打开局面。

会后，即分头活动。汪精卫陪李济深赴沪开会，为解除李济深的猜疑，张发奎也公开声明与李、汪同时离穗出洋考察军事，“把军权交给黄琪翔，并领取了五万元的经费。”^② 与此同时以汪精卫的名义致电给在广西的黄绍竑，谓“有重要问题商量，希望

① 《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第一号，第198页。

② 《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1月16日。

即到广州面谈。”① 诱骗黄绍竑来广州。

11月16日，李济深、汪精卫乘火车到香港后即登上亚洲皇后号轮赴沪。张发奎虽与李、汪同车赴港，但未出洋，一直逗留在香港。黄绍竑接电后即动身，于同日到达广州。

11月17日晨3时半，黄琪翔和李福林、薛岳等，在长堤第四军司令部召集军事紧急会议，决定解决黄绍竑驻省部队。即令十二师师长缪培南、十六师补充团团长李林，暨新编师各部队分头出发。② 黄琪翔派吴奇伟师包围黄绍竑在广州的住宅，经暂短激战后，把黄的卫兵全部缴了械。但黄绍竑已事先得知此事，在被包围前化装逃离该处，后转赴香港。不久，由香港经海防，河内回到广西梧州。③ 其余各部于3时40分陆续奔赴各地。十二师三十四团在城西各要隘路口宣布戒严；三十五团在小北一带严密扼守，三十六团协同第五军渡河之补充团，分布东堤及东鬼基一带，并由公安局派大批保安队分别扼守路口。④ 布置完毕后，即下达总进攻令，由第五军补充团及十二师三十六团向东山寺贝底一带进攻第七军第九旅，激战一小时，第九旅全部被缴械。三十五团及新编第二师在北门将第七军军部缴械。第四军特务营沿维新南路、高第街、水母湾、木排头等处，绕道包围第七军驻省后方办事处，双方激战至上午10时才结束。⑤ 黄绍竑在各地的残余部队，向广九、粤汉两路逃窜，大部被缴了械。在这次事件中，被张黄

① 黄绍竑：《一九二八年粤桂战争》，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第四十一页。

② 《本市戒严之情况》，《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1月18日。

③ 关于黄绍竑来穗脱险的详情，参阅黄绍竑：《黄绍竑五十回忆》，1969年香港版，第192—195页。

④⑤ 《本市戒严之情况》，《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1月18日。

部缴械的有：第八路总指挥部、临时军委会警卫团、黄绍竑驻新编第四军军部之部队、陈济棠第十一师及徐景唐第十三师之驻省部队、省防军、黄埔军校工兵团等。^① 同时还占据了广州军械库和第一弹药厂，虎门要塞和石井兵工厂。为稳定局势，他们于清晨在广州街头张贴了“打倒南京特委会！”“打倒西山会议派！”“打倒黄绍竑！”等标语，并以第四军、第五军和新编第二师的名义，发布军事布告，声称“背叛党国，逼走汪主席，要挟李主席的新军阀黄绍竑之罪恶势力，已于今天十七日的上午被铲除”，“要求各号照常安居就业，不必惊恐。”^②

17日上午7时，黄琪翔偕李福林在葵园面见驻粤各中央委员。会上，由黄琪翔报告是日处置黄绍竑在本市部队工作经过，并呈述不及先行报告的原因，要求各委员指示一切。各委员都表示同意，并讨论了各项重要问题。决定：“临时军委会主席拟以张发奎暂代，政治分会主席拟以顾孟余暂代，省政府主席拟以陈公博暂代。”^③ 接着，广州政治分会又召开会议，由陈公博提议，加派张发奎为政治委员即被通过，并决定由张发奎主持军委会工作。派余恺湛赴港请张发奎回省主持一切。19日，张发奎在余恺湛的陪同下回到广州。24日，张发奎召开军委会特别会议，议决“为应付目前军事便利起见，应设主席团负责，俾使应付，以陈公博、李福林、张发奎三人组成。”^④ 至此，张发奎、黄琪翔已完全控制了广州的党、政、军大权。为巩固和扩大已得的权力，还派兵向驻西江、北江的黄绍竑、李济深部队进攻，占领韶关，逼使

①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十三辑，第248页。

② 广东省档案馆编：《广州起义前后的全国局势》，1982年版，第130页。

③ 《黄绍竑被缴械后之政局》，《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1月19日。

④ 《军事委员会组织主席团》，《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1月21日。

驻肇庆的黄绍竑部退回广西梧州。这一事件，史称为“张黄事变”。

张发奎等夺得广东地盘后，为取得国民党中央的认可和支持，以留粤中委名义向国民党中央电告处置黄绍竑的原因，称“黄绍竑企图延长非法特委会的生命，阻止第四次执监全体会议。擅自调七军集中西、北两江，复挑拨粤中部队，自相猜忌，深恐黄等此举足以助长特委，危害中央，破坏革命，延长私斗。临时军委会诸委员，以时机迫切，爰于筱日(十七日)举行护党运动，分别解散反侧部队。中央在粤同志承认此举为当然处置，并后呈四次执监全体大会加黄以处分。”^①同时，广州政治分会下令通缉黄绍竑。

广州事变消息传到上海后，李济深在沪对各报记者发表谈话，称“广州事变纯系共产党支配一般骄兵悍卒与失意政客，乘机作乱，夺取政权之表现。”要求“国民政府军委会讨伐发动粤变之张发奎、黄琪翔。”^②根据李济深态度，广州政治分会发表声明，谴责李济深，宣布李的罪状，解除其在广东本兼各职，呈请四中全会严重处分。^③

为了取得国民党中央及各派的支持，张发奎把其领导下的驻粤各军改称为“护党军”，并于12月1日，在广州召开“护党运动”大会，在大会上通过六项决议：（一）要求在广州举行第四次国民党中央全体委员会；（二）废除非法的南京特委会；（三）巩固广东，作为国民革命的基础；（四）广西军阀李济深、白崇禧和黄绍竑等同其他反动分子是企图危害本省的危险人物；（五）要

① 《留粤中委电报处置黄绍竑经过》，《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2月5日。

②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十三辑，第253页。

③ 《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第三号，第128页。

求政治分会惩办李济深；（六）支持国民党，推翻共产党。①接着，改组广东省政府，任命李章达为民政厅长、余恺湛为司法厅长、陈树人为建设厅长、朱晖日为军事厅长、许崇清为教育厅长，土地厅撤销，实业厅归建设厅。②

为防止李、桂军队的反扑，张发奎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部署；派二十五师驻惠州，监视在潮梅地区的钱大钧和陈济棠两部，将第四军主力派至肇庆、四会，以防止桂军南下，另派薛岳师和李福林第五军的潘枝两个团到西江、四邑一带，以钳形之势，向徐景唐进逼，留在广州的只有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率领的教导团和军部直属的梁秉枢为团长的警卫团，李福林的第五军主力仍留在河南地区。

事变初期，由于李济深兵力较分散，一时难于集中，黄绍竑的第七军主力在镇压南昌起义后已撤回广西，在短时间内也难以调入广东与张黄部抗衡。因此，双方都处在调兵遣将的状态，暂时还未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击。

张黄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斗争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在上海，桂系联合各派掀起攻击汪精卫高潮，一时，汪精卫成为众矢之的。李济深、吴稚晖指责“张黄事变”是“共产党之阴谋”是“受第三国际指使的”，“是想占广东后，利用广东海岸与海参崴通波之意。”③ 西山会议派及其他中央委员也颇多指责，主张通过战争来解决广州局势。汪精卫却为张黄辩护，他在11月2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广州事变之起因，并非由于共产党的问题，乃是由于对特委会之态度不同。”“由意见之冲突而形成武力

① 广东省档案馆编：《广州起义前后的全国局势》，1982年版，第139页。

② 《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2月5日。

③ 吴稚晖：《弱者之结语》，《天声日报》1927年12月19日。

之冲突。”因此，“主张广东局势问题的解决，应当通过即将召开的会议，而不应当通过战争来实现。”^① 汪精卫把特委会和桂系说成事变之原因，与蒋介石、汪精卫反特委会的意图相吻合，因而得到蒋介石的赞赏，但更加激起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的反对。12月3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在上海召开，会议中心内容原定是讨论中央特委会的废存问题，但会议一开始，李济深坚持先讨论广州事变，矛头直指汪精卫。当时蒋介石的目标是废除特委会，因此采取联汪策略，袒护汪精卫而进行调解，使会议仍回到原来的议题。但当粤中委员到沪后，又掀起反对特委会的高潮，引起了桂系等的反击，由吴稚晖领衔，李宗仁、李石曾等签名提出《对汪精卫等主使张黄叛变的检举案》，李济深提出《粤委员附逆者应当退席听审案》，迫使会议中断了对特委会废存问题的讨论，形成了汪派与反汪派的一场大混战。蒋介石利用各派之间的矛盾，以取渔人之利。首先，他着眼于扫除复职的最大障碍——特委会，决定第一步采取袒护汪派，反对特委会的策略。他以“中立”态度，周旋于各方，以“为促成四中全会召开，应当捐弃成见”为由，^② 说服吴稚晖等撤回原案。同时发表了《致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书》，谓“两方尽蠲前嫌，勿互相猜忌”，劝宁粤双方各委员停止争吵。^③ 由于在混战中显示了蒋介石的作用，双方都争先讨好、拉拢蒋介石。在12月11日会议上，汪精卫乘李宗仁、李济深、吴稚晖等强有力的反粤派未出席会议之机，抢先提出《请蒋介石继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案》，指出“惟有预备会议即日催促

① 广东省档案馆编：《广州起义前后的全国局势》，1982年版，第104页。

② 《两度广州事变与中央执监大会》，《国闻周报》，卷四，五十期1927年12月25日。

③ 《中华民国史料丛稿》，大事记，第十三辑，第265页。

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才是解决党务、政务、军务问题的当务之急。”^①并威胁地说，如对其不能谅解，个人尽可引退。在此情况下，李宗仁不得不就范，马上向报社发表声明，谓汪精卫对蒋介石的态度是反复无常的，称自己才是一贯拥护蒋介石。正当汪、李争先讨好蒋介石之时，阎锡山、冯玉祥促蒋复职的电报也到了上海，因此，在预备会上就顺利地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提案。在两派争斗中，蒋介石重新获得控制国民党中央的权力。

三、镇压广州起义

“张黄事变”后产生的汪、张政权与李济深政权本质上没有区别，仍是一个军阀政权。它对内镇压工农运动，不仅大量捕杀工农群众，残酷压迫罢工工人，取消了省港罢工工人的权利，把他们驱逐出公共饭堂和公共宿舍，甚至把他们驱逐出境。为了取得资本家的支持，张发奎于11月22日在总商会召开的大会上声称“铁军不是赤色部队，他们的事业仅仅是支持国民党，要求商界努力支持政府。”^②他们还利用反动工会，帮助资本家取消原有劳动条件，大量增加各种苛捐杂税。这样，工人在1925年以来所争得的一切权利又被剥夺。他们对帝国主义则采取“亲善”方针，封闭一切对外机关，禁止抵制英、日货，禁止一切对帝国主义所采取的敌对行动。由此可见，广大工农群众在这次事变中“仅仅得到了新的锁链，压迫和屠杀。”因此，广大工农群众纷纷起来反

^① 《两度广州事变与中央执监大会》，《国闻周报》，卷四，第五十期，1927年12月25日。

^② 广东省档案馆编：《广州起义前后的全国局势》，1982年版，第132页。

对这个军阀政权。他们举行示威游行，包围政府机关，罢工运动也时有发生。各行业工人从驱逐改组委员会，夺回工会，到武装起来准备暴动。在各县农村，北江、西江、南路，均发生过农民自发性暴动。尤其是东江的海陆丰农民，在彭湃领导下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对全省农民运动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深刻地影响到军队内的士兵，使一部分士兵站到广大工农群众的一边。而张黄部队主力已调往军阀混战前线，使广州防务空虚，这就给广大工农群众反对军阀斗争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中央广东省委决定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发动武装暴动，“变军阀的战争为民众反军阀的战争。”号召“全体革命群众行动起来，打倒和消灭一切军阀的统治。”^①

1927年12月11日，在共产党领导下，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起义军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占领了市内各机关，张发奎、黄琪翔、陈公博只身逃往广州的河南地区李福林第五军的驻防地。起义军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苏维埃广州公社。

尽管军阀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但在反共反人民方面却是一致的。广州起义爆发后，军阀之间暂时停止了争吵，联合起来对付起义军。蒋介石电张发奎，指责“两次粤变，前则事后未能裁处，后则事先未能防范，应负其责”，令张发奎“戴罪立功”。同时必须“听从李济深指挥，即率所部，会同陈铭枢等友军，于最短期间歼灭共产党。”^②与此同时，蒋介石也致电黄绍竑、陈铭枢、陈济棠等，谓“此番变乱，足证向华（张发奎）实非共党，望毅然捐弃小嫌，誓死共维大局，即与向华协同一

① 罗浮：《广东暴动前的准备》，见《布尔塞维克》，第九期。

②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十三辑第272页。

致，迅平共产党。”^① 在蒋介石的号令下，张黄急调回防桂军兵力，集中5万余军队，从各路急驰广州，海军舰艇也配合炮轰广州市区。帝国主义也纷纷协助反动派镇压广州起义，沙面使领团告李福林，“如有需渡河之处，则愿尽力帮助。”^② 日本军舰“宇治号”停靠码头，用机枪掩护陆战队在长堤登岸。英国军舰“英雷昂号”和美舰“萨克拉门托号”也派陆战队登岸。^③ 英国商船还公开运载张黄部队和李福林部队渡河到市区镇压起义。

12月12日，张黄部队和李福林部队分四路进攻市区。第一路由金花庙附近渡河，进攻西濠口；第二路由广三驳轮运至黄沙登陆，以接应由北江南下之部队。此两路均由第五军担任；第三路由土敏土厂渡河进攻东堤。由薛岳部担任；第四路由猎德渡河，沿广九路进攻，向东堤夹击。由驻黄埔之新编第三师黄慕松部担任。同时，自江西撤回之缪培南、吴奇伟部约4.5万人，向制造局、西村一带猛攻。海路以两炮舰掩护，由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李（福林）四人亲自在舰上指挥。^④ 由机器工会所组成之敢死队，也分三大队渡河夹攻。^⑤ 上午8时，各路反动军队同时发动进攻。起义军据守长堤河畔，堆沙包为垒进行抵抗，激战至10时，因受到市内机器工会的反动武装千余名的袭击，起义军腹背受敌，经过艰苦的巷战后，渐不能支，于下午2时被迫向小北及东郊撤退。

①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十三辑第274页。

② 《广州大暴动纪要》（记者摘录13—15日上海各报消息），见《布尔塞维克》第九期。

③ 《广州暴动之意义及教训》，见《布尔塞维克》第十三期。

④ 韶玉：《广州暴动纪实》，《广州公社》1930年无产阶级书店出版。

⑤ 《广州国民新闻》，1927年12月21日。

从韶关调回的第五军的两个团联合猛攻观音山（今越秀山）起义军。敌莫雄团迂回配合，开始均被起义军打退。双方激战至13日早上，起义军终因敌众我寡难于支持而被迫撤退。

反动军队占领观音山后，便集中力量进攻公安局——苏维埃广州公社所在地。敌军由德宣路、吉祥路、惠爱路、四牌楼一带向公安局组织过五次进攻，均被打退。后由于第五军和机器工会敢死队的增援，使起义军四面受敌，激战至13日中午12时，公安局终被敌人攻破。至此，广州起义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而遭到失败。

广州起义被镇压后，反动派对广州革命群众进行了残酷的、报复性大屠杀。凡是搜查出身上有红布条或发现脖子上有红色印痕的，一律枪杀，他们认为参加广州起义的共产党人大多数是外省人，因此，凡听到外省口音的人，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当共产党而加以逮捕、杀害。据不完全统计，从14日至19日5天内，被杀的革命群众达5700多人。^①当时，东方通讯社香港分社12月19日报导，“每日被杀的共产党尚不下百人，被抢之家，四壁萧条，不遗一物。”广州当时的情景是“路上到处皆有惨杀之尸体，大有血流成河之势。”^②在“公安局门前，置有被枪杀之苏联领事馆尸骸十余具，副领事被枪杀，系事实。”^③由于反动军队的大屠杀，土匪、地痞又乘机抢劫，广州秩序大乱，“至19日，商店依然未开市，阴郁之象笼罩全市。”^④这是广州有史以来罕见的一场大

① 曾干庭：《关于参加广州暴动工作报告》，载《广州起义资料选辑》，第229页。

② 韶玉：《广州暴动纪实》，见《广州公社》1930年版。

③ 左洪涛：《从武昌西湖书院到广州四标营》载《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七辑。

④ 韶玉：《广州暴动纪实》，《广州公社》1930年版。

灾难。

四、“张黄事变”的失败

尽管张、黄等残酷地镇压广州起义，但反汪派仍借此事件再次掀起一场反汪的新高潮。他们诬指广州起义是汪精卫和共产党合演的双簧，并公布了所谓张黄“附逆”的罪证，监察委员邓泽如等还提出了“查办汪派集团案”。12月16日，国民政府特派邓泽如、古应芬查办呈复。后来邓泽如、古应芬向国民政府呈复了查办汪精卫九人之结果，称“汪及其党徒对于11月17日之乱，不独参预逆谋，实为发纵指示；对于12月11日广州事件，则为养奸成祸，害国殃民，彼等身为中委，竟敢肆意作乱，危害民国，破坏革命，罪证确凿，请明令通缉归案，依律严办。”^①这一呈报，使汪精卫的处境十分不利。汪精卫为了摆脱困境，剖白自己不是共产党，乃在上海报上公布了他给陈公博等人的反共密电数件，其中有：（一）请黄琪翔暂时退休认真清共之青电（5日）；（二）致李福林请驱俄领事之佳电（9日）；（三）致陈公博令围俄领署内之共产党员之蒸电（10日）。^②但是，这一切都无法改变他的孤立境况。原与他勾结，扫除复职障碍之蒋介石，现在当他取得了对国民党中央的控制权后，汪精卫已成了他独揽大权的主要障碍，于是，他由联汪转而驱汪，由袒汪转而反汪，汪精卫争夺国民党中央控制权的失败和蒋介石对他策略的转变，就意味着“张黄事变”的必然失败。

^①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十三辑，第287页。

^② 《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第三号，第129页。

12月14日，国民政府下令解除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的职务，任缪培南、薛岳为第四军正副军长，李朗如为广州市公安局长。上海市卫戍司令部奉令把在上海的汪精卫派全部监视起来。蒋介石认为逐汪的时机已成熟，他十分“关心”地劝告汪精卫离开上海。汪精卫在白崇禧的武力相逼下和蒋介石的“好意”劝告下，自知已无法立足于上海，被迫于12月16日秘密离沪到港，并偕黄琪翔再次赴欧洲避难。在离沪前发出“引退”通电，表示愿个人引去，以息纠纷。

在国民党内一片反对声中，广州政治分会为争取主动，下令解除张、黄、朱等的本兼各职，听后查办。张发奎也致电蒋介石，表示服从，声称“广州政治分会已将其免去本兼各职”，并表示今后要“戴罪勉维善后，愿以党员资格，随从补过于将来。”^①还信誓旦旦“与共产党义不共存，一息尚存亦以歼灭共产党为职责。”^②表示了他反共到底的决心，以获取蒋介石和国民党各派的谅解。尽管如此，国民政府仍决定采取战争行动来解决广东局势。12月14日，国民政府授李济深以全权，蒋介石资助30万之军费，令其返粤整顿粤局。李济深在南京当局和蒋介石的支持下，决心驱逐张黄部队出广东，恢复他在广东的统治地位。于是，他任命陈铭枢为东路军总指挥，率领第十一军两个师及陈济棠的十一师、钱大钧的一个师。分水陆两路由福建进入广东。任命黄绍竑为西路军总指挥，率领桂系十五军共三个师，及徐景唐的十三师、广东守备军曾友仁团。黄绍竑率十五军由梧州入粤境。并于12月16日发出通电，称“真日（11日），广州事件实肇端于筱日

^① 《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第四号，第135页。

^②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十三辑第278页。

(17日)之变，而预参逆谋之中央委员陈公博等，实为主要负责人，望一致讨伐。”^①张发奎在各方的严厉指责下，已无法立足，被迫通电下野出洋，把军权交给缪培南和薛岳。

12月18日，李济深电令东、西两路军分别由东江、西江、北江三路会攻广州。缪培南、薛岳率领的第四军，既不能容于广州人民，又面临李济深、桂系的两面夹攻，为保存实力，决定主动撤出广州。在撤离广州前，缪培南、薛岳联名发出通电，解释离开广州的原因，并宣称已作出了布置，把广州交给陈铭枢管理，在陈铭枢未到广州前，暂由李福林负责广州防务。但李福林也随即通电下野赴港，把第五军交由邓彦华掌握。邓彦华原与李济深关系较为密切，就职后即电请李济深、陈铭枢等到穗主持一切，并派人前往迎接。

12月26日，第四军在缪培南、薛岳的率领下，全部撤出广州。^②计划先以全力出击东江地区，把陈铭枢、陈济棠打败后，再回师广州，乘黄绍竑部的兵力尚在分散时把桂系第十五军消灭。如此项计划不能实现，则向赣南撤退。这一计划事先已得到蒋介石的默许。12月29日，黄绍竑部的黄旭初师进入广州市，第五军主动退至河南地区。黄绍竑抵穗后，得知第四军的军事部署，便令西路军出发东江，与陈铭枢之东路军夹攻已移至东江的第四军。于是，在1928年初，广东省的东江地区发生了一场新军阀的大混战。

一月，第四军到达广东省五华县以西、龙川县以东的岐岭坪，与西进的陈铭枢、陈济棠两部发生遭遇战。第四军打败了两

①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十三辑，第277页。

② 邹瑛编著：《缪培南先生年谱》。

陈部队后，以小部分兵力向五华、兴宁追击两陈部队，主力抽回来迎击由紫金县北进的桂军黄旭初师和李济深部的徐景唐师，因而在紫金县以北的潭落圩又发生遭遇战。彼此实力相当，血战三昼夜，双方伤亡惨重。后因第四军无力坚持，余部经铁场、黎咀向贝岭溃退。徐景唐师紧追不放，26日，在黎咀圩双方又隔着东江河岸激战至晚上10时，第四军被迫撤至赣南，徐师也无力追击，只得撤回铁场圩，这一场新军阀混战宣告结束。

1927年11月发生的“张黄事变”，其性质是广东军阀与广西军阀为争夺广东地盘而发生的一场新军阀混战。“它不过是反动派内部的矛盾和新军阀混战总局面之中的一幕”，^①但它也是汪精卫、蒋介石以及桂系控制的中央特委会三方争夺国民党中央控制权斗争的反映。汪精卫策动“张黄事变”，反对桂系控制的中央特委会，争夺中央大权，恢复其在国民党“正统”领袖地位。其结果，他成为国民党各派众矢之的，陷于空前孤立，遭到彻底失败，被迫出洋避难。张发奎、黄琪翔发动事变，意在从李济深手中夺取广东地盘，在“以粤人治粤”的口号下，梦想当“广东王”。其结果，只是昙花一现，损兵失地，自己在国内无法立足，只好逃往国外，而他们的第四军退到赣南后，为了生存下去，被迫接受蒋介石的改编，成为“编遣第四师”。李济深在“张黄事变”中，由于得到国民党军事当局的支持，结果反败为胜，但元气大损，已无力与蒋介石抗争，最后仍败在蒋介石手下，被驱逐出广东。蒋介石先是“张黄事变”的鼓动者和支持者，他利用张黄的军事力量，狠狠地打击了桂系势力，后又利用“张黄事变”而引起的国民

^① 《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1928年1月3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案”，见《布尔塞维克》第十三期。

党内部各派的矛盾和斗争，坐收渔利，扫除了他复职的第一大障碍，废除了中央特委会，接着，又采取驱汪（精卫），排胡（汉民）的手段，最终独揽国民党中央大权。又转而支持李济深，用军事手段解决了广东局势。到第四军走投无路时，又张开双臂，收编了第四军，使之成为自己直接指挥的军队。这样，既增强了自己实力，又削弱了李济深和桂系势力。综观全局，正是蒋介石利用“张黄事变”为自己捞取了很大的一笔政治和军事资本。

第四节 陈济棠的兴起和粤桂战争

一、陈济棠的兴起

陈济棠（1890—1954年），字伯南，广东省防城县人（今改广西东兴各族自治县）。少年时应考乡科，名列第三；又曾在钦县警察讲习所学习。后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在那里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熏陶。①

1908年，在黄埔陆军小学由老师邓仲元（邓铿）介绍，与同班同学邓演达一起参加同盟会。②辛亥以后，接受邓铿的意见，又在广东陆军速成学校就读至毕业。在护国运动中，参加过“讨龙”战争，并在桂军林虎手下充当连长。“粤军回粤”之役，陈济棠在阳江驻地响应，旋被编入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第四团任第一营营长，从此踏上了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征途。

孙中山于统一两广以后，先在桂林、后在韶关指挥北伐，陈

① 参见：陈济湘（维周）撰：《广东防城河洲上峒大四村陈氏族谱》、《陈伯南先生年谱》、《陈济棠自传稿》（台北传记文学社1974年版）、《陈伯南先生荣哀录》。

② 《陈伯南先生年谱》。

济棠随军进抵赣南。陈炯明叛变后，陈济棠追随第一师参谋长李济深，移军驻扎西江。滇桂军入粤讨伐陈炯明，陈济棠等率军在西江阵前起义，参加了讨陈的行列，加速了陈炯明的败退。后升任第一师第二旅旅长，在平定沈鸿英叛乱，东征博罗、惠州，攻击陈炯明叛军主力杨坤如部，在河源击败林虎，协助李宗仁、黄绍竑统一广西等多次战斗中，都屡立战功。

1925年7月，国民政府组建国民革命军，李济深出任第四军军长，陈济棠升任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稍后，陈济棠率第十一师参加第二次东征，在具有关键意义的“河婆战役”中，一举击溃了林虎、刘志陆的主力，扭转了战局，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①从此，陈济棠在军中崭露头角，受到各个方面的重视。1926年初，又奉命进军海南，最后击溃了邓本殷的主力，平定了海南岛。

1926年6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李济深以国民革命军参谋长兼第四军军长身份，率陈济棠的第十一师、徐景唐的第十三师及第五军留守广州。陈济棠所部驻扎广东南路一带，陈并兼南路警备司令，在维护北伐后方治安中不遗余力，成绩斐然。

1927年3月，陈济棠奉派赴苏联考察，历时4个月才归国，他在南京向蒋介石报告苏联之行，表示了反共之意，在当时的“宁汉分裂”中明显地站到了蒋介石一边。他回到广州后复任第十一师师长。

“八一”南昌起义以后，叶挺、贺龙率领起义军撤出南昌，由江西转入广东潮汕一带，陈济棠的十一师以及十三师、新编第一师，奉命前往截击。陈济棠等部同起义军在汤坑附近进行了激烈

^① 骆玉华：《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

的战斗，双方都伤亡惨重，起义军被击至溃散，陈的十一师亦由原来的5000多人剩下1700多人。陈济棠说：“余自从戎以来，历经大小战役不少，而以此役为最惨烈。”^①

“张黄事变”以及“广州起义”以后，张发奎、黄琪翔所部交由缪培南指挥，撤离广州向东江移动。陈济棠部参加讨伐“张黄”的东路军，1928年1月，在龙川县的歧岭一带同缪培南部剧战，陈部大败，再一次遭到了重大的损失，后得西路军的支援才摆脱困境。^②

1928年3月，李济深重新掌握广东军政大权以后，擢升陈济棠为第四军军长兼西区善后委员，负责管辖广州及西江、四邑等地区。从这时起，陈济棠开始插手广东的地方行政。他首先将所部扩编为以余汉谋为师长的第十一师，以香翰屏为师长的第二师和以陈章甫为师长的第二十五师。他在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安插亲信、培植私人势力；还为此而设立了第四军军官教导队（后扩充为“广东军事政治学校”），组织了“西江同志网”，借以培养忠于自己的后备军官和拉拢地方党政领导人。为了树立自己的声望，他一方面在辖区内继续进行“清党”，镇压工农武装力量；另方面也实行清剿土匪加强治安，并修筑公路，开展航运，兴办学校及公益事业。陈济棠在担任广东西区军政领导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在广东社会上赢得了一定的声誉。

镇压了“广州起义”以后，从1928年1月起，李济深重新担任第八路军总指挥、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广东省政府主席，再次掌握广东的党政军大权。

① 《陈济棠自传稿》，第29页。

② 凌仲冕：《“张黄事变”前后的粤局》，《陈济棠史料专辑》第1辑，广州市政协编印，第86页。

李济深以很大力量来对付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爱国运动。1928年3月他增派军队，镇压了于1927年11月建立起来的海陆丰苏维埃。又加强特务组织以对付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先后于1月和2月间破坏了中共广州市委和广东省委的地下组织，逮捕了邓中夏、罗登贤等著名共产党人。

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在山东省济南开炮轰击“北伐军”，杀害了大批人民群众，制造了“济南惨案”。消息传来，广州各界群众十分愤慨，立刻掀起了一个反日运动的高潮。商人们首先行动起来，抵制日货，断绝同日本商号的往来，还准备组织反日经济绝交联盟。码头工人及驳艇船工举行罢工，拒绝起运日货。学生举行罢课，并派出大批学生组织宣传队，到各地宣传抗日。李济深对工、学、商界的抗日活动极为惊恐和仇视，采取了残酷手段予以镇压。他发表声明，“禁止一切有组织的单位机构发动任何反日抵制运动”；大量逮捕参与反日运动的群众，甚至枪杀罢工工人；解散海员工会，封闭省港罢工委员会。即使李济深以高压的手段对付，但群众性的反日运动仍然坚持了一个多月才慢慢地消沉下去。

李济深重新统治广东这一年间，尽管镇压广东境内以及粤湘边境的共产党武装有“成绩”，平定广州市的反日运动也有“贡献”，但并没有因此而取得蒋介石的信任。1929年1月1日，蒋介石在南京公开了国民政府军编遣会议。这是蒋介石为了排除异己，分化瓦解地方实力派，加紧建立军事独裁统治的一个重要步骤。由于这时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势力不断膨胀，隐然成为蒋介石的劲敌，因此，打击桂系成了蒋介石的主要目标之一。要打击桂系，就必须瓦解与桂系关系极为密切的李济深在广东的军事力量。于是，既反共又主动投靠蒋介石的陈济棠便成了

取代李济深的理想人物。

1929年3月，蒋介石趁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机，以召李济深到南京开会为名，待李到南京以后即予以扣留。同时任命陈济棠为广东编遣特派员，负责广东军队的整编并节制广东境内军队。这样，蒋介石就完全剥夺了李济深在广东的统治权力，广东的军政大权则分别由陈济棠和前此不久接替李济深而为广东省政府主席的陈铭枢分管。实际上是蒋介石利用“两陈”的互相牵制，使他能赢得时间，以便集中力量对付桂系并逐步加强对广东的控制。^①

李济深的被扣留，在广州引起很大的反响，第八路军总指挥部立即召开会议，决定一面发电蒋介石请释放李济深，一面集中兵力向湘、赣进军，以武力挽救李济深。3月26日，蒋介石下令“讨伐”李宗仁、白崇禧。蒋、桂战争爆发。

1929年3月30日，陈济棠由南京回到广州。由于广东部分将领曾因李济深的被扣而一度追随桂系，准备出兵对付蒋介石，陈济棠对广州的局势还不明瞭，便不敢进入广州。他只好在停泊于白鹅潭的“海虎”舰上宣布就广东区编遣特派员职。随后在舰上分别约见粤军将领，表示了既谴责桂系“拥兵自大，反抗中央”，又斥责蒋介石“把持中央，剪除异己”的意见，提出了稳定广东政局和军心，徐图挽救李济深的主张^②。接着，他在舰上召见广州各报记者，发表了主张广东和平，不介入蒋桂双方战争，请双方停止出兵的谈话。

陈济棠在取得粤军将领的支持以后，于31日离舰上岸。4月

① 《陈济棠史料专辑》第一辑，第3—9页；第二辑，第1—3页。

② 李洁之：《陈济棠统治广东始末》，《陈济棠史料专辑》，第一辑，第5—6页。

1日，他和陈铭枢联名发表声明，表示忠于南京的蒋介石政府。同日，粤军师长余汉谋、香翰屏、陈章甫、蔡廷锴等10人，宣布拥护陈济棠的主张，服从其命令。陈济棠则命令桂军应全部撤出广东。

4月10日，陈济棠封闭了原由李济深任总指挥的第八路总指挥部，建立“编遣特派员”公署，作为广东军事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

至此，陈济棠取得了广东的军事大权，实际上开始了在广东的统治。

二、粤桂战争

蒋介石于1929年3月19日扣留了李济深以后，即迅速调动部队，对桂系控制的武汉形成了四面包围的态势。26日，下达了“讨伐”桂系的动员令。桂军李明瑞、杨腾辉受蒋介石的重贿收买而倒戈，使驻防武汉一带的桂军主力胡宗铎、陶钧、夏威部内外受敌，被迫仓皇撤出武汉，退向鄂西。4月5日，蒋介石进入武汉，命各军围歼溃逃鄂西的桂军。胡宗铎、陶钧、夏威部无法抵御，于4月20日宣布下野，部队接受蒋军收编。至此，桂系在华中的兵力全被瓦解。

蒋介石于拔除桂系在华中的据点以后，即集中兵力对付广西。他作出了从湘、粤、滇三路围攻广西的部署：以何键的第四路军集中于湘桂边境，攻桂林；以陈济棠的第八路军集中于英德、肇庆，攻梧州；龙云的第十路军则由云南通过贵州，从独山入攻柳州。

面对蒋介石的强大攻势，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决不会坐以待毙，他们决定争取主动，以攻为守。他们认为，只要取得广东

地盘，就有足够的人力财力同蒋介石抗衡，所以确定向广东进攻。

5月5日，李宗仁自称“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通电“讨蒋”。桂军16个团，由黄绍竑、白崇禧率领，分两路东下，直指广州。同时，又与驻在东江的原第五军军长徐景唐秘密联络，约定徐军自东向西配合，会师广州。于是，粤桂战争爆发。

这时，经过编遣会议以后，原在广东境内的三个军，名义上均已缩编为师，师缩编为旅。原陈济棠的第四军改为第一师，辖三个旅：第一旅余汉谋，第二旅香翰屏，第三旅陈章甫。原陈铭枢的第十一军改为第三师，辖三个旅：第七旅陈光远，第八旅戴戟，第九旅蔡廷锴。每旅有三个团，加上陈汉光的独立团，受陈济棠指挥的共有19个团。

5月6日，陈济棠就任蒋介石委派的第八路讨桂军总指挥，发表“讨逆”宣言。陈济棠说：“此次桂军攻粤，越过封川、江口余始获悉，不得已，乃采取内线作战，调集余所属部队，沿三水、清远布防”。①他以余汉谋旅守清远，香翰屏旅守三水，陈章甫旅为预备队，蔡廷锴旅负责监视东江徐景唐部。

桂军一路沿西江进袭肇庆、三水，一路由怀集、广宁、四会渡北江攻击清远。开始时攻势迅猛，5月9日，沿西江进军的桂军占领肇庆，向三水挺进。15日，由广宁、四会进攻的桂军在四会、清远一带渡过北江，占领石角、大塘。北线粤军不支，纷纷溃退。桂军前锋已迫近花县的赤坭、白坭一线，广州震动。陈济棠立即抽调戴戟旅及黄质文团前往白坭增援，自己亦亲赴前线指挥。5月21日，粤军与桂军在白坭附近展开异常激烈的战斗，自晨至暮，双方短兵相接，多次冲锋肉搏。经过整日的血战，桂军

① 《陈济棠自传稿》，第34页。

不支，开始退却，于是全线动摇。在粤军反攻下，桂军被迫步步退却。白坭一战，双方伤亡惨重，陈济棠方面的报导，承认粤军伤亡超过4000人。

桂军在白坭战役溃败以后，已无反扑能力。粤军乘胜追击，桂军全部退回广西。6月2日，粤军攻克梧州。

在东江配合桂军的徐景唐部，曾于5月8日占领石龙，但立即遭到蔡廷锴旅的反击，于5月13日放弃石龙。5月19日，蔡旅乘胜进逼河源。与此同时，闽军又奉蒋介石命由闽南进窥潮汕。徐军辗转退至闽边，在闽、粤两军的进攻下，又转移到赣南。陈济棠命令粤北的余汉谋旅由南雄进入赣南，协同由北向南下的赣军夹击徐军。7月上旬，徐军被包围，最后由粤军缴械并收编，徐景唐部至此消失。

退回广西的桂军，6月上旬遭到粤军从东、湘军从北的夹击，无心恋战，节节败退。6月24日，粤军攻克桂平，直逼南宁。至7月上旬，桂军溃败由吕焕炎负责收编。黄绍竑、白崇禧眼见无法挽回败局，遂逃往越南。广西省政府主席由俞作柏担任。第一次粤桂战争至此结束。①

经过这次粤桂战争，陈济棠进一步在广东站稳了脚跟，也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但粤军的元气亦大受损伤。陈济棠于是不失时机地大力扩充实力。他收编了徐景唐军和部分桂军，又增补新兵，至8月间，使部队发展至5万人。

8月1日至6日，陈济棠出席在南京召开的编遣委员会编遣实施会议，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将广东军队扩编为五个师，两

① 《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编），第49—50页；《陈济棠史料专辑》第一辑，第87—90页。

个独立旅。① 8月17日，陈济棠回到广州后，即改编了他的部队。以余汉谋为五十九师师长，蔡廷锴为六十师师长，蒋光鼐为六十一师师长，香翰屏为六十二师师长，李扬敬为六十三师师长。每师辖六个团。李振球、张瑞贵、叶肇、张达、黄延桢、黄质文等均任旅长。其余未编入这五师二独立旅的兵员，均改为广东省防军。

陈济棠在第一次粤桂战争取得胜利以后，赢得了一段稳定的时局，使部队得到改编和休整。但这种稳定也只能是极其短暂的。当时，各地的反蒋力量纷纷崛起，先后爆发了规模不一的反蒋战争，全国均处于军阀混战的状态。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也在积极从事反蒋活动。率领原第四军余部驻在鄂西的张发奎，同汪精卫的关系密切，引起了蒋介石的顾忌。9月13日，蒋介石命令张发奎率所部由鄂西移防陇海路，企图在调防途中予以消灭。

张发奎洞察蒋介石的阴谋，于9月17日发表通电，举兵反蒋。张发奎所部在湖北宜昌一带突破蒋军刘峙部和何键部的堵截，引军南下。9月27日，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师长李明瑞，响应张发奎的“护党救国”，宣布独立，并欢迎张发奎入桂。

10月2日，蒋介石免去俞作柏广西省政府主席职，以吕焕炎接替。吕即通电欢迎粤军入桂。陈济棠急忙赶往梧州，于10月中旬在梧州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对张、桂军的进攻。

这时，张发奎所部由湖南进入广西，逼近桂林。李宗仁、黄绍竑等亦从越南返回广西，以加强反蒋的声势。张、桂军确定向广东进攻。

蒋介石对张发奎和桂系的联合十分重视，特派总参谋长何应

① 《陈济棠自传稿》，第36页。

钦到广州任总指挥，并增调第六路总指挥朱绍良率领第三师陈继承部、第八师毛炳文部等三个师以及海军第二中队前来广东支援。12月2日何应钦到达广州后，即与粤军商讨作战部署。

陈济棠侦悉了张、桂军分两路来犯，决定分兵迎敌。以朱绍良的三个师负责粤汉路以东沿花县、西龙圩一线；以余汉谋、香翰屏两个师负责三水芦包至花县军田、即粤汉路以西一线；以蔡廷锴、蒋光鼐两师为预备队。陈济棠、何应钦等在新街总指挥部坐镇指挥。

张发奎率部抵达桂林一带以后，即同桂军联合，确定分两路向广东进攻。张部为左翼，由怀集经广宁、四会，到达清远后，从横石渡过北江，然后沿粤汉路以东南下，直扑花县；桂军为右翼，沿西江进入四会，在清远南部渡过北江，进攻艮盏坳、军田，沿粤汉路以西南下，攻取新街。

张、桂军进展迅速，12月9日，张军已进抵西龙圩附近，桂军逼近军田。于是，双方在这一线展开激战。张军的攻势凶猛，“仅经三个小时的战斗而朱部败退”，^①张军的前锋已越过两龙圩，抵达人和圩，距广州仅四五十五华里，广州可闻炮声，市面十分恐慌。但桂军却在军田一带遭到粤军的顽强阻击。粤军依靠早就在军田至芦包一线所修筑的强固工事，奋力抵抗，桂军始终无法突破粤军防线。为了挽回东线的颓势，陈济棠将蒋、蔡两师预备队都投进支援朱绍良部，并派出空军助战。12月11日，东西两线的战斗均极为激烈、艰苦，其危急状况，陈济棠后来是这样形容的：“当使用预备队增援时，敬之、真如诸人，均到司令部休息，且已准备登舰，余以此举影响士气民心甚大，乃告以前方战

^① 《陈济棠自传稿》，第38页。

事有必胜把握，而蔡廷锴亦以预备队使用完了，恐指挥所受威胁（仅有卫士十余人），苦劝余生登车返新街，……”^①。

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桂军始终毫无进展，无法给张军予以支援。而张军孤军深入，又受到蒋、蔡两师援军的打击，攻势受挫。至12日，张发奎不得不下令撤退，在漓江口集中期间，又遭到粤军的袭击，损失很大，只好率残部由怀集退回广西。桂军亦由军田附近退回广西。粤军乘胜追击，于12月19日占领梧州。

第二次粤桂战争，无论从其规模或激烈程度来说，都大大超过第一次粤桂战争，陈济棠能够赢得胜利，进一步说明他在军事上经得起考验，从而增强了他控制广东、割据广东的信心。但这一战役，陈济棠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敌我伤亡万余，单只受伤运返广州留医官兵，即达8000人以上。”^②

张、桂军虽然在进攻广东的战役中遭受到严重的损失，但并没有因此而溃不成军，他们于退回广西整顿以后，仍以顽强的战斗姿态，抵御蒋介石军队的入侵。因此，在1930年这一年中，陈济棠所部几乎都陷入了进攻张、桂军的泥潭之中。

粤军于1929年12月19日攻占梧州以后，朱绍良的第六路军以及粤军的蔡廷锴、蒋光鼐、香翰屏、李扬敬、余汉谋等师先后进入广西。1930年1月8日，陈济棠在梧州召开了征桂的军事会议，上述军师长以及桂军吕焕炎均出席。会议决定以武力消灭张、桂军，平定广西。会议以后，第六、第八（即粤军）两路军由东向西，直扑桂林、柳州、南宁。1月18日攻克桂林以后，即在桂林以南、桂平、北流一线遭到张、桂军的顽强抵抗，无法前

①② 《陈济棠自传稿》，第38页。

进。陈济棠虽然多次入桂督战，并派海、空军支援，仍未有明显进展。双方互有胜负，据点得而复失，战线犬牙交错，双方伤亡惨重。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5月上中旬张、桂军北撤，余汉谋部才得以进入南宁。

1930年二三月间，以阎锡山为中心，组成了包括冯玉祥、李宗仁等在内的庞大的反蒋联盟，分别在鲁、豫、皖发动了向蒋军的进攻。张、桂军为了配合中原战场，决定挥师北指，进击湖北，会师武汉。4月间，张、桂军开始陆续向桂北、湘南移动。

5月，其前锋已越过衡阳。6月初，进抵长沙、岳阳。

陈济棠在获得张、桂军的意图和蒋介石的命令以后，立即从广西调回第六十、六十一、六十三共三个师，转赴粤北进入湘南，只留余汉谋部在桂处理善后。朱绍良的第六路军则由蒋介石派出船舰，从海路远经上海，沿长江直抵武汉。6月中旬，湘、赣、鄂各军集结于长沙、岳阳一带，由何应钦指挥，围攻张、桂军。而粤军则于6月10日占领衡阳，切断桂军后路，^①于是张、桂军不支，于6月17日退出长沙南逃。7月中下旬，全部退回广西，仍然占据着柳州、南宁一带。这时，张发奎宣布下野，其残部合并于桂军。陈济棠又调动所部进入广西讨桂。^②

在湖南击溃了张、桂军以后，蒋介石决定将蒋光鼐、蔡廷锴两师组成十九路军，调往津浦路前线，参与讨伐阎、冯的战斗。这样，蒋、蔡两师就脱离了陈济棠的统辖，后来一直在广东以外的各省参与内战及“剿共”战争，至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成了名著全国的抗日部队。

陈济棠的粤军在广西讨桂，虽然有所进展，但一直无法将

^{①②} 《李宗仁回忆录》第628页。《陈济棠史料专辑》第1辑，第104—106页。

李、黄、白的桂军消灭。战争断断续续地在柳州、南宁一带进行，中间又酝酿过和平解决，一直到1932年还是处于双方对峙状态。后来，陈济棠本人亦参加了反蒋的行列，粤、桂军又联合在一起，成了陈济棠割据广东的依靠力量。

第七章 陈济棠统治的建立 及其失败

第一节 陈济棠统治地位的确立

一、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加剧

1930年3月，冯、阎、桂三集团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历时7个月，以蒋介石集团的胜利而告结束。蒋介石虽能维持中国在形式上的统一局面，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并未结束。蒋介石用武力实现“统一”局面后，踌躇满志，认为这次“讨逆”战事后，靠自己实力已足以支配一切，“深信本党统一中国之局势已经形成，叛党乱国之徒，今后决无能再起。”^①所以，他一面积极筹备反革命“围剿”，企图一举消灭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一面要登上总统宝座，为他的军事独裁统治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在中原大战将要结束时，就迫不及待地致电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要求：“确定召集国民会议之议案，颁布宪法之日期，及制定在宪法颁布前训政时期运用的约法。”^②他企图制定一个设置总统制的约法，把总统凌驾于五院之上，独揽中国的一切大权。这就加剧了国民党

^{①②} 蒋介石：《告中央同志书》，《国闻周报》卷七，四十五期。

内部的派系斗争。最先出现的是蒋、胡之间的“约法”之争。

胡汉民为蒋介石“统一”中国，建立独裁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无论蒋介石发动各派军阀的战争，还是反共清党，胡汉民都帮助过他献谋划策，甚至还亲自出马助蒋。因而，胡也从蒋手中分到了一点权力：担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等职。但胡汉民倚仗其国民党元老资格决不甘心在蒋的卵翼之下，他幻想蒋介石成为傀儡式的国府主席，由他掌握中国实权。但蒋介石却把他摆在“尊”而无权的位置，只把他当作“中央的一个开会机器”。中原大战以后，蒋介石要通过国民会议，制定约法，选举总统，把总统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就意味着胡汉民已得到的一点权力将要丧失。一贯自命为总理信徒，又有政治野心的胡汉民当然不能容忍。为对抗蒋介石的独霸野心，他以“训政已有建国大纲为依据，不应再来一个什么约法”为由^①，极力反对制定约法和选举总统。因而出现了“约法之争”。蒋、胡之间的“约法之争”，实质上是“权力之争”，一个要以军治政，一个要以政治军，都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位。

1930年11月12日，国民党的三届四中全会，使蒋、胡之间的权力之争趋于公开化。会议的争论焦点是国民会议是否应当制定约法。蒋介石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胡汉民则同意召开国民会议，坚决反对制定约法。双方争论不休，使通过的关于国民会议的议决案，就没有明确提出是否要制定约法。但是，全会以后，蒋介石却接着制定约法、选举总统的步骤来筹备国民会议，使蒋、胡之间矛盾又尖锐起来。胡汉民决心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与蒋介石抗争。他发表文章和演讲，以“总理遗教”为依据，

① 李洁之：《胡汉民被囚汤山的侧面》。

宣传他反对制定约法之主张，争取了一部分人的同情和支持。于是出现了不利于蒋介石的局面。胡汉民实际上已成为蒋介石要登总统宝座的绊脚石。蒋介石为了实现当大总统的美梦，决心搬掉胡汉民这块绊脚石。他与亲信密谋后，先由吴稚晖出面，劝胡休养，勿与蒋争，遭到胡的拒绝。后由戴季陶献计，把胡扣押起来，完成其“选举”总统大计。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以宴请议事为名，将胡汉民骗到总司令部后，由蒋的亲信宣读事先准备好的伪造控告信，罗列了胡的许多错误。胡汉民强烈要求蒋介石亲自到会，蒋介石被迫来到总司令部。胡汉民面对蒋介石，对所谓错误逐条加以驳斥，使蒋无言以对，愤然而去。当晚，胡汉民被扣留于陆军司令部，他的卫兵亦被缴械。胡气愤之极，当即提出辞职。第二天被秘密押往汤山囚禁。^①

蒋介石用阴谋手段擅自扣押胡汉民后，深恐引起国人的非议。乃在其控制的报纸上刊载了胡汉民“要求”辞职的消息。诡称“上星期六，谈商约法问题，胡独持异议，并以本人主张不能贯彻，引咎辞职，赴汤山休养。”^②但各报登载的消息说法不一，引起了国民党人的怀疑，纷纷来电询问情况。为此，蒋介石在3月2日国民政府纪念周会上发表谈话，大谈胡的错误，指责他“在中央未有具体决议之前，徒凭个人见解，发为国民会议不当议及约法之言论”，称这必“将引起以后有约法无约法之纠纷，重贻党国无穷之祸患。”他“身负党国重任，不应如此越位失言，淆惑人心”。还诬称胡汉民之所以这样做，其目的是想“以立法院长总揽大权，

^① 有关胡汉民“汤山被禁”之经过，见胡著《革命过程之几件事实》载，《三民主义月刊》，第二卷，第六期，第109—125页。蒋永敬则称胡汉民《屏居汤山》。见蒋著《胡汉民先生年谱》第504页。

^② 《时事日志》，1931年3月2日；《东方杂志》二十八卷。

以启任意毁法造法之端。”^①但又诡称“其既知引咎辞职，中央当念其追随总理曾著劳绩，故本爱护同志之志，虽勿忍坐视姑息，但亦勿忍其毁弃既往革命之历史。”^②同时，在中央常委会临时会议上，由戴季陶作约法问题报告，驳斥了胡汉民的观点以后，作出了两项决议：（1）通过蒋中正等12人所提的《召集国民会议，应于三民主义的训政范围以内确定本党与全国人民共同遵守之约法案》；推举吴敬恒、于右任等11人为约法起草委员；（2）准胡汉民辞去国民政府委员、立法院长本兼各职，选任林森为立法院长，邵元冲为国府委员兼立法院副院长。^③蒋介石还要求国民党中执委会，将前经常务会议暂缓公布之《党员犯罪加重处罚暂行法》重新提出讨论，以平息国民党内部之纠纷。

3月8日，胡汉民在11名卫士的解押下，由汤山移到南京双龙巷胡宅。在胡宅前和双龙巷口均由警卫厅派员守卫，断绝巷内交通，并派出20名手枪队员到胡宅“保护”。门前贴有“遵医生嘱须静养，凡来访宾客概不接见”的启事。^④这表明胡汉民已失去个人自由。

对胡汉民的非法软禁，引起国民党海内外各党部及舆论界的公愤，纷纷要求恢复胡汉民的自由。3月9日，蒋介石在国府纪念周上大谈：“党员无自由论”，谓“革命党员个人的行动，谁也不能自由”。“如果个人要自由，则国家民族就不能得到自由”。^⑤他还宣扬：“为革命的需要，可以随时限止党员和官吏个人自由”

①②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卷八，第九期。

③ 《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3月2日。

④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十七辑。

⑤ 《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3月10日。

的逻辑，①为他扣押胡汉民一事辩解。但他又诡称限制胡汉民自由，是“胡同志因避嫌止谤，打算此后长住南京，不赴别处。中央各同志也希望他如此。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保全他过去的历史。”②这种自欺欺人之说，自然不能平息公愤。

为缓和紧张局势，转移视线，促使国民会议顺利召开，蒋介石一面暂时放弃总统宝座，表示“国民会议只应制定约法，不必而且不应提出总统的问题。”③一面大肆叫嚣“剿共”，提出“限令4月底前肃清各处共匪”，④尽管如此，国民党内的反蒋浪潮仍有增无已。古应芬电告南京国民政府，辞去文官长职务；新任命的立法院长林森也不就职；司法院长兼约法起草委员王宠惠以“赴欧任海牙国际法庭永久法官”为由，请辞司法院长之职，不与蒋合作。胡汉民被扣押后并未屈服，乘铁道部医官邓真德（广东省人）替他看病之机，托他转告孙科和王宠惠，“一定要在两广建立反蒋局面救他，甚至不惜与汪派合作”⑤。于是，胡派中委纷纷离京。有的到广州与古应芬、陈济棠联络，商讨反蒋大计；有的到各处活动反蒋。在国民党分崩离析的情况下，蒋介石仍顽固地于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并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把蒋介石抬到没有总统桂冠的总统地位。而《训政时期约法》也成为他实行独裁统治的工具。因而酿成了一场持续了一年之久的国民党各派合作反蒋的斗争。

① 《时事日志》，1931年3月9日，《东方杂志》二十八卷。

②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卷八，十期。

③ 《时事日志》1931年3月23日，《东方杂志》二十八卷。

④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卷八，十二期。

⑤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

二、宁粤分裂

国民党内部反蒋派的第二次“合作”，开府于广州。胡汉民被扣留的消息传到广州，军政各界极为震惊。当时，胡的亲信古应芬正在广州，他急召在广西梧州前线指挥部的陈济棠回来，商讨局势。

陈济棠与古应芬有较深的历史渊源，早在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大本营时，陈济棠驻军西江一带，而古应芬曾以大本营行营主任驻节江门。陈、古二人就过往甚密，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相互支持。1929年陈济棠取得广东军事大权后，一直得到胡汉民和古应芬的支持，因而在政治上是倾向于胡、古的。同时，由于陈济棠在广东军事方面经常独断专行，不断扩充军队，与蒋介石的矛盾也就尖锐起来。再加上陈铭枢的挑拨，使蒋介石对陈济棠非常不满。1931年1月，陈济棠到南京，蒋介石要求他裁减军队，削减军费，限制他的军饷每月不得超过250万元，而当时陈每月军费是500多万元。这不仅遭到陈济棠的拒绝，同时还向蒋追索500万欠饷，使蒋、陈之间的关系越趋紧张。胡汉民被扣后不久，蒋又电令陈济棠迅速调兵入赣“剿共”，其意在逼陈摊牌。陈济棠权衡利害，认为此时反蒋，可在“伸张正义”的口号下，乘机壮大势力，达到独霸广东的目的。因而决定支持古应芬在广州树起反蒋旗帜，并以巨款接济古应芬，作为其策划反蒋活动的经费，意图把广东作为反蒋派联合的基地。

陈济棠的第一步行动，就要撵走蒋介石安在广东的一只棋子——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陈早已投靠蒋介石，李济深被扣后，蒋任陈铭枢为广东省府主席，意在牵制陈济棠。因而两陈长期貌合神离，明争暗斗事件不断发生。陈济棠乘与张桂联军作战

之机，不断扩军，使陈铭枢受到威胁，在十九路军被调入赣南“剿共”后，更失去依托。为了自保，陈铭枢乘陈济棠远在广西与张桂联军作战之机，利用省府的职权，购置德国武器，扩编了4个团的省保安队，以保持在广东的实力。古应芬与陈济棠在广州密谋反蒋时，把陈铭枢排斥在外。陈铭枢看到广州的反蒋空气逐渐明朗，便一面授意十九路军不要参加反蒋，一面借口出巡西江而离开广州，避开反蒋旋涡。当他从西江再回到广州时，广州反蒋局势已定，便于4月28日晚悄然离穗赴港。陈济棠立即以民政厅长许崇清代理省府主席，接管了省政。以后，又以“蒋介石派人以金钱运动保安队叛变”、“保安队图谋叛变”的罪名^①，用武力解决了省保安队，消除了陈铭枢在广东的势力。陈济棠就这样轻易地掌握了广东的政权。

为了联络国民党各派反蒋，陈济棠在古应芬的策动下，决定与桂系言归于好。他把粤军从广西撤回，并取消在梧州的总指挥部。当时李宗仁、白崇禧已被蒋介石、陈济棠逼得退守一隅、孤立无援、处境极其艰难。在穷途末路中得到陈济棠网开一面的良机，能够重整桂系，真是求之不得。当陈的亲信林翼中到达南宁，李宗仁、白崇禧在会见时，即表示愿捐弃前嫌，联合反蒋。粤军与桂军的联合，成为反蒋派第二次“合作”的军事支柱。

孙科的“再造派”在胡被扣后，决定借此机会，在政治上“再造”一番，以抬高本派的政治地位。于是孙科亲自到上海；钟天心去广州与古、陈接洽；麦朝枢与周一志北上沈阳找吴铁城，通过吴去策动张学良参加反蒋阵线，在路经天津时并联络邹鲁、覃振、傅汝霖等人；梁寒操则到香港与汪精卫联系，表明愿与汪合作反

① 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5月26日。

蒋。孙科到上海后，先以调停人姿态出现，一面电蒋“请先恢复胡汉民之自由，一切均可迎刃而解。”一面又致电广州的古、陈，请力持静默，“勿使时局趋于横决。”^①蒋介石为防止孙科南下广州参加反蒋联盟，特派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四人到沪，劝孙科回南京。但孙科却以调解粤事为名，于5月下旬悄然离沪到港，并指示中央航空署署长张惠长带走航空处飞机多架，飞往广州，以增强反蒋力量。

汪精卫与胡汉民从来是势不两立的，但胡汉民为了脱身自救，要拉起队伍与蒋抗争，因此，指示胡派人士主动与汪派讲和，邀请他们加入反蒋联盟。汪精卫一直被蒋所冷落，蒋扣胡后，也未被召入京，正找不到托身之处，现遇两广反蒋，而胡派又主动找上门，是他创造日后与蒋介石合作时讨价还价的政治资本的最好时机，遂决定与孙科一起参加反蒋联盟。

古应芬等与各反蒋派联络后，1931年4月30日，以国民党四监委古应芬、林森、邓泽如、肖佛成的名义，发表《弹劾蒋中正提案》的通电，历数蒋介石独裁事实：“横征暴敛，罔顾民生；排斥异己，制造祸端；毁法乱纪，动摇国本；厉生独裁，奴役人民。”并“希望维护党国诸同志急起图之。”^②5月3日，陈济棠偕粤军将领联名通电，响应四监委弹劾案，谓“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宜有伸张正义之举。”^③又声明：“如蒋逆不服弹劾，则济棠等当执鞭弭相与周旋。”^④陈济棠在讲话中还表示：“不说成败利钝，勇往

①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卷八，第十九期。

②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卷八，第十八期。

③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十七辑，大事记，第65页。

④ 《八路将领实行出师讨蒋通电》，《陈济棠研究史料》，第84页。

直前，誓无反顾。”① 11日，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等联名通电响应陈济棠等讨蒋电，痛斥蒋介石“包藏祸心，自盘踞南京中央以来，窃党祸国”，并表示了“会师长江，底定金陵”，“救党救国”的讨蒋到底的决心。② 与此同时，广东的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都先后发表反蒋通电。两广首先掀起反蒋浪潮。

接着，两广将领商定了出兵讨蒋的计划。粤军负责江西、湖南；对江西取守势，对湖南与桂军联合攻衡阳。并由广东省每月供80万元为桂军出师费。为此，在军事上作了部署：粤军以香翰屏师和李扬敬师分别布防于东江、北江，朱为珍的新编第一师调往西江，并以大批军火运往韶关，发给各部队，从事于讨蒋军事准备。陈济棠在争取十九路军参加反蒋联盟的计划遭到失败后，封闭了十九路军在广州的枪弹库和驻粤办事处。李宗仁、白崇禧在粤军退出广西后，派夏威为梧州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行营主任，接收了粤军退出的地盘，组织了兵站筹备处，任何莘为兵站总监。并将邕、梧各地军用品转运桂林，以备反蒋军事行动之用。

两广军事将领发出反蒋通电后，反蒋各派的要人纷纷云集广州。5月24日，汪精卫、孙科、许崇智、唐绍仪、陈友仁等由港抵穗，与在粤的反蒋派共商大计。26日发出联合通电，要求蒋介石在48小时内下野。③ 同时，孙科又电蒋，要求他“于谈笑之顷，放弃党国所付与之职责”，④ 向蒋介石宣战。

各反蒋派经协商后，决定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作为这次反蒋联盟的最高组织形式，规定凡属国民党

① 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5月5日。

②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十七辑，“大事记”，第71页。

③ 《二月月刊》，广东省档案馆藏。

④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卷八，二十一期。

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赞成反蒋者都可参加，并由非常会议产生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峙。

5月27日，非常会议正式成立，发表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成立宣言》，指出其主要任务：“在于推翻蒋介石之独裁，完成国民革命。”^①并选出汪精卫、邓泽如、孙科、李文范、邹鲁为常委，以梁寒操为秘书长。决定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否认蒋介石国民党中央的合法性。

同日，非常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政府组织大纲》，产生16人组成的国府委员会。推举唐绍仪、汪精卫、孙科、古应芬、邹鲁、邓泽如、肖佛成、林森、李宗仁、许崇智、陈济棠、唐生智、蒋尊簋、李烈钧、陈友仁、熊克武为国府委员。其中汪精卫、孙科、古应芬为常委，陈融为秘书长。规定不设国府主席，由常委轮流担任，首任主席由汪精卫担任。国府委员会下设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外交、财政两部。政委会委员有李文范（后改为杨熙绩）、刘纪文（后改为李仙根）、麦焕章、罗翼群。其职权是管理内政、教育、交通、实业等政务与事务。外交部长由陈友仁担任，财政部长由邓召荫担任。28日，发表了《国民政府成立宣言》，宣告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声称：“南京政府已成为蒋介石独裁的工具”，因此，广州国民政府“自今日始，事事当反蒋中正之私，而向于总理之公。”^②5月31日，国府委员联名通电就职，重申了他们的政治主张：（1）反对武力统一、中央集权，当以建设求统一，以均权求共治；（2）不主张以武力解决时局，如有以武力相压迫者亦师不畏。^③

①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十七辑，第80页。

②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十七辑，第81页。

③ 《一周闻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卷八，二十二期

广州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内的胡派、汪派、孙派和地方实力派联合，以两广地盘作依据，以陈济棠的武力为后盾的西南反蒋局面已经形成。反蒋派谓在广州成立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是“根据总理的主张，养成民主制度，巩固民主势力。”^① 标榜这次运动：“是民主政治推倒独裁政治的运动，与倒满、倒袁完全一致”，“是民主政治与专制独裁政治最严重的斗争。”^② 但其实质是在“反蒋、反共”口号下，从蒋介石手中夺取中央控制权，它只不过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又一次权力之争而已。广州国民政府为了与蒋介石抗衡，对外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派陈友仁到日本，提出对满蒙问题让步，以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援助。并聘请日驻粤领事为顾问，聘下级军官七名以充军事顾问。对内把反共反人民与反蒋列为两件大事，以联络一切反动派。因此，宁粤之争，其结果只有害于人民，有害于国家。宋庆龄曾经指出：“粤宁对峙，互暴其短，自炫其长”，“而究其实际，两者皆依赖军阀，谄媚帝国主义，背叛民众，同为革命罪人。”^③

参加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的反蒋派和地方实力派，都各自有不同的政治目的。他们都为本派和个人私利，尽量捞取更多权力。因而，从它成立之日起，就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明争暗斗。两广实力派企图借反蒋派力量称霸一方，维持两广的割据局面。其他反蒋派则想乘机大干一场，取蒋而代之，以期夺得国民党中央控制权。

作为这次反蒋联盟霸主的陈济棠，只准反蒋派在广州开府，

①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十七辑，第81页。

② 《对时局应有的认识和努力》，《陈济棠研究史料》，第100页。

③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卷九，第一期。

并不想给他们以实权。他利用自己的军事实力，在主要部门安插亲信，牢牢抓住军权、财政权、人权，不容他人插足，甚至还不断排斥和限制异己，这就使为争权而来的各反蒋派别甚为不满。

对汪精卫的改组派，陈济棠只欢迎汪精卫个人到广州，对改组派的骨干陈公博、顾孟余、甘乃光等持拒绝态度。汪精卫认为这是“去皮存骨”，非常忿恨，几乎要拒绝合作，后在孙科、李宗仁、覃振等的劝解下，被迫接受，只有他这一根去了皮的骨头到广州参加非常会议。蒋介石乘此机会派宋子文暗中拉拢汪精卫，谓“广东要汪先生是只要骨头，不要皮，我们南京要汪先生是连骨带皮一起要。”^①因此，汪派顾孟余愤恨地说：“我们与其受地方小军阀的气，不如投降中央大军阀。”^②这就表明，从一开始，汪、陈之间已存在裂痕。

孙科的“再造派”本想乘此机会大干一场，因而异常活跃，但也受到陈济棠的诸多限制。王昆仑在《中央导报》发表《招我们的流亡弟兄们》一文，遭到陈济棠的责难。陈想借此撤销“再造派”文人在非常会议的职务，分别给资出洋读书，让他们离开广州，因怕孙科翻脸，加以元老派的坚决反对，才作罢论。

许崇智被邀请参加非常会议后，在军事上颇有抱负，想乘机收集旧部，重新拉起队伍，既为自己重振军威，又可壮大反蒋声势。因此，要求陈济棠、古应芬在经济方面给予支持，但陈、古却以“粤中财政困难，二百万元巨款，不易筹措”为辞，^③加以拒绝。为此，许崇智愤走香港，并致信非常会议，要求辞去一切职务。甚至连张惠长也看不惯陈、古的所作所为而愤走香港，声称

①②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

③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卷八，二十七期。

“非去古应芬、林云陔，粤局前途绝望。”并谓“陈策、许崇智、余汉谋均有此意见。”^①他虽未点陈济棠之名，但其矛头显然是对准陈、古。陈济棠因而称病不出，而古、林也只得递上辞呈。后经汪精卫、邹鲁等人调停，反蒋联盟才勉强得以维持。

广州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于1931年7月誓师北伐讨蒋，造成了对蒋介石很不利的形势。当时蒋的大部兵力用于江西，全力“剿共”，而又屡次被红军击溃，丧师失地，抽不出多余兵力来对付粤桂军。况且，北方、西南各地的军阀，又有可能对蒋产生动摇。因此，蒋介石一方面采取强硬的政治攻势，全力攻击反蒋联盟。指责陈济棠“利用四监委的名义，背叛中央，联络张、桂军，并与改组派汪精卫这些人统统联合起来，割据广东，叛抗中央。”警告陈“如不改悔，将成为陈炯明第二。”^②南京国民会议通过警告陈济棠之决议案，并发动嫡系将领发表通电，要求中央讨伐陈济棠。声称：“中央对粤决不姑息，倘仍执迷不悟，惟有讨伐。”^③又攻击汪精卫反对政府，破坏统一，罪大恶极。指责孙科“好货利而昧大义，翻云覆雨，胸无主宰。”^④还说孙科赴粤非政治原因，而是他贪污铁道部2000万公款，企图脱身。并密电粤军将领香翰屏，以第八路军总指挥一职相许，要他反戈一击，瓦解反蒋联盟。另一方面，蒋介石又不断放出和平空气，表示“粤变为党务和政治上之一种纠纷，决不轻启兵戎。”^⑤声称：“政府惟一之责任在剿匪，党国存亡在此一举。”^⑥他还派出张继赴粤，以调

①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卷八，二十五期。

②③ 《上海民国时报》，1931年5月16日、23日。

④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卷八，二十二期。

⑤ 《东方杂志》二十八卷，1931年6月5日。

⑥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卷八，二十四期。

解宁粤纠纷。6月14日，国民党三届九中全会，在胡汉民未恢复自由的情况下，推举胡汉民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府委员，恢复李济深党籍，任国府委员，并派吴稚晖劝胡、李就国府委员职，以缓和宁粤间的紧急局势。

在蒋介石的“和平”攻势下，广州国民政府内部出现了主和派和主战派。陈济棠、古应芬的反蒋，一方面为了救出胡汉民，另一方面只想独霸广东，没有问鼎中原、与蒋争天下的雄心。因而不想“北伐讨蒋”，极力主和。汪精卫、李宗仁等认为以其坐待失败，不如冒险一战，或可能促起各方响应，壮大声势，迫使蒋介石下台，故极力主战。为此，桂军除大量向国外添置军械外，还派军队进至桂湘边界的全州，采取积极的反蒋军事行动。但由于主和派在广州政权中占着优势，粤桂军就不能采取统一的步骤。汪精卫要求提供200万元为桂军出兵进攻湖南的开拔费，又遭到陈、古的拒绝。汪精卫感到无法维持下去，愤然称病离穗赴港，使广州国民政府再次出现分裂。陈济棠、古应芬认为在西南联合反蒋不能没有汪精卫，只得请孙科出面调解。表示军事上尽量协调一致，积极备战，并派孙科和陈维周赴港劝汪精卫回粤。为防止陈济棠的变卦，汪精卫提出了回省的三个条件：（1）第一集团军须即日全数出兵湘赣北伐；（2）粤省东江及后方防务应调第四集团军东下协助防守；（3）调粤助防之第四集团军，粤府应予以充分之补充，以后该部之军饷，亦由粤府完全负责给发。^①陈、古对此曾不完全同意，但为促使汪精卫尽快回省，维持反蒋局面，勉强接受。8月29日，汪精卫由港返穗，一场风波暂时平息。

9月1日，国民政府下达入湘动员令，第四集团军任前锋，

^①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卷八，三十六期。

第四军吴奇伟部两个团在副师长韩汉英指挥下进驻祁阳，其余到达湘边的零陵。但陈济棠对出兵北伐仍持消极态度。他以各军须选举出席国民党四大代表为借口，延缓进军行程。又采取步步为营的办法，待后军到达后，前军才前进。因此，当桂军已深入湘南境内时，粤军仍在广东省界观望。

9月11日，国民政府任陈济棠为联军统帅，统一指挥粤、桂军北进。陈令收编的唐生智旧部龚浩等占领宜章、郴州、耒阳，并任龚浩为攻湘总指挥。稍后，粤军李扬敬部进驻郴州，准备与桂军会攻衡阳。一时湘南局势紧张，蒋介石立即派刘文岛、顾祝同、周佛海到湘与何健商议军事，并调在赣的谭道源部赴衡阳协防。9月14日，粤桂军五万人攻衡阳，与顾祝同部发生激战。同日，攻湘总指挥龚浩率部攻占衡阳城。15日，粤军突然由耒阳、郴州、宜章退回坪石。桂军也于16日由永州退回全州。留下龚浩部仍在距衡阳城15公里处。双方军事上又回复到原来的僵持状态。

正在这时，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东北全境很快沦陷。全国人民反对蒋介石的卖国政策，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这对蒋介石和反蒋派都是不利的。为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双方急需联合起来。于是在所谓“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口号下，双方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争端。9月20日，宁方电粤方：“劝速蠲除成见，共纾国难。”^①这对于原来就不大愿意“出兵北伐”的陈济棠，真是求之不得，于是立即复电响应，并于21日电令停止入湘的军事行动，命粤桂军撤回原防。宁方也令何应钦中止入湘。因此，宁粤双方在“共赴国难”口号掩盖下，又重新进行一场政治权力分赃的交易，从分裂转向

^①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卷八，三十八期。

“合作”的谈判。

三、陈济棠统治地位的确立

宁粤双方表示了和平解决争端的意愿后，蒋介石先派陈铭枢、张继、蔡元培携带他的亲笔信于9月25日赴港议和。粤方也派出汪精卫、孙科、李文范于同日赴港，蒋介石企图通过谈判，要求全国“群集于国民政府之下”，“一致听中央指挥”^①。而粤方对蒋介石总揽党政军大权颇为不满，要从蒋的手里分取一部分权力。要求蒋放弃党政，专治军事，主张“蒋介石主军，胡汉民主政，汪精卫主党”^②。因此，会谈一开始就展开激烈的争权夺利的斗争。

粤方提出解决时局的三个办法：（1）蒋中正下野；（2）取消广州国民政府；（3）以统一会议产生统一的国民政府。^③同时认为，二十年党国分崩离析之原因是“因为以武力挟制政治，故民主政治之先决条件，在使武力受政治之支配。”其办法是：（1）废除陆海空军总司令；（2）设军区，军区之划分不必同于行政区域之划分；（3）军需之独立，革除以人支配军队，以军队长官支配军饷之恶习；（4）国防统于中央，保安队属地方。全国军队应负此两大任务，至于政治，绝对不容干涉，统一于国民政府。^④宁方认为蒋介石下野难以接受，双方争执不下。蒋介石为引诱粤方代表赴京谈判，表示本人问题可以在和平会议上讨论，同时表示“本人不暇兼顾政务，对军事愿效驰驱。”^⑤但粤方又提出先释放胡汉民，会谈地点应在上海，为确保粤方代表安全，要求宁沪警备部队必须由持中立的十九路军担任。蒋介石同意调十

① 记者：《辽京被占纪实》，《国闻周报》卷八，三十八期。

②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卷八，四十期。

③④⑤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卷八，四十二期。

九路军入京卫戍，并于30日任陈铭枢为京沪卫戍司令官兼淞沪警备司令。这就为进一步会谈提供了条件。同日，宁粤双方代表抵穗继续会谈。最后议定六项条款，会谈才告结束。

10月12日，陈铭枢回京见蒋，提出只有先释放胡汉民，粤方代表才能北上谈判。蒋被迫答应。次日下午，陈铭枢到胡宅，^①告知蒋想与胡会面，劝胡捐弃前嫌，以国事为重。胡表示同意，并在陈铭枢陪同下去面见蒋介石。在双方见面时，蒋介石当即决定让胡汉民赴沪，等待参加和平统一会议。14日，蒋介石又亲往胡宅拜访。当天下午，胡汉民在陈铭枢、张静江、吴铁城等人陪同下由宁赴沪。这样，演了八个月的“捉放胡”闹剧，在胡汉民离京时，由南京政府宣布胡汉民“销假视事”而告结束。

胡汉民抵沪后，马上致电粤方，称赞他们“备尝艰苦，不怕牺牲”，盼望“推举代表来沪，进行议和，共商大计。”^②非常会议决定派出汪精卫、孙科、古应芬、邓泽如、李文范为代表（后又加派邹鲁、陈友仁）赴沪议和，由陈济棠、李宗仁留粤主持军政事务。这正合陈济棠之意，乘机把这一批政客“送出门”。10月21日，粤方代表到沪。次日，蒋介石也由京到沪。双方随即开始会谈，决定“党、政、军诸方面问题，俟南京推定代表来沪，与粤方代表先开预备会，共议详细草案，然后，再赴南京正式会议决定。”^③

27日，宁粤双方代表在上海举行所谓“和平会议”^④，粤方坚持政治制度改革和一、二、三届中委决定党事两提案。而宁方却坚

^① 据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称：7月13日，胡汉民由双龙巷寓所移居香铺营孔祥熙官邸。

^②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卷八，第四十二期。

^③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十七辑，第188页。

^④ 《民国大事日志》，《中华民国大事记》均作“预备会议”。

持“政治中枢不宜更动，政制亦未宜轻改”^①。这时，蒋介石也发表谈话，称“稳定政治中枢，无论如何不使动摇”^②。并表明“本人现在决不辞职”^③。这种出尔反尔的态度，引起粤方反感。陈济棠等致电粤方代表，谓“蒋忽于纪念报告中发极不合理之言论，不啻把和平的假面具遽尔揭开”^④。因此，要求粤方代表务必贯彻在粤商定之主张。由于双方各抒己见，致使和谈中断。后虽经张继等斡旋恢复谈判，但终无法弥合，最后议决由宁粤双方“各于所在地克期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其办法是：开会时双方发表通电表示党之统一；双方提案，均交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南京开第一次会议时处理；双方协商中央执监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由四届一中全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并改组政府。南京政府改组后，广州国民政府即取消。”并商定，原一、二、三届中委除中共党员外，一律可在四届被选，双方各再加同等人数的新选中委，互相承认，再合起来，同到京开四届一中全会。这一场政治权力分赃会议，至此才结束。

11月12日，宁方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开幕，通过了追认《恢复党籍案》，选出了新的中委，表示了他们的宽容和团结。18日，粤方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到会的各派为争中委名额，搞得乌烟瘴气。会议一开始，在陈济棠的操纵下，由邓泽如、肖佛成等以“非常会议”的名义，提出否决京粤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委为第四届中委的决议案，主张四届中委由大会自由选举，为新贵们争席

① 《上海统一会议》，《国闻周报》卷八，第四十三期。

② 腾霞：《上海会议》，《国闻周报》卷八，第四十四期。

③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十七辑，第197页。

④ 《用整个党的力量去推倒独裁》，《陈济棠研究史料》，第166页。

位。并指责会谈中的粤方代表出卖了非常会议，向蒋介石投降。攻击矛头指向汪精卫和孙科。孙科等以及汪派的曾仲鸣等200名代表愤怒退场。孙科赴港后致大会一书，指责大会推翻了沪案是立场错误，要求他们“牺牲成见，服从胡、汪指导，推翻前议”。^①李文范要求辞去大会秘书长职务。孙派的陈策、张惠长还调动海、空军分别在虎门、唐家湾集中，向陈济棠实行武装威胁，使广州形势一度异常紧张。

在沪的胡汉民、汪精卫眼看广州“四全”大会面临流产，担心失去了与蒋介石讨价还价的政治资本，遂决定由胡汉民亲临广东调解。11月27日，胡汉民在伍朝枢、马俊超等人陪同下抵港。与孙科商讨解决粤局的办法。28日抵穗，^②会见陈济棠等人，提出解决方案后即回港。12月1日，粤方“四全大会继续开会，通过了胡汉民的调解方案，议决：（1）历届中委除共产党及反动者外计120人，由主席团提出通过，余40人双方自由选举，（2）宁方已经选出24人，可由大会承认，以示宽大；（3）在议决以前被开除党籍者，除共产党外，一概恢复”。^③2日，李宗仁、马俊超到港迎接胡汉民、孙科等人回粤参加会议。但会议进行选举中委时，陈济棠又指使焦易堂借故发难，反对主席团，造成会场上大打出手，混战一场。后经香翰屏电召保安队到场弹压，才安定下来。大会选出24名新中委，议定成立中央党部执监两会临时常委会。会议于5日结束。

汪派的200多名代表在调解成功前已由港到沪，并于4日^④在

①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卷八，四十七期。

② 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

③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卷八，四十八期。

④ 《中华民国大事记》，《民国大事日志》均有记载。

上海大世界召开了汪记的“四全”大会，选出10个中委电告粤方，但粤方否认其合法性，引起汪派不满。汪精卫对代表声称：“于沪选结果必尽心力维持，当用温和或激烈手段力争，本人等中委可不做，目的必达到才罢。”^①后来，这些中委也被四届一中全会所接受。

7日，粤方选出的中执委由胡汉民领衔，电促蒋介石下野，声明蒋若不下野，解除兵权，粤方中委决不到京参加四届一中全会。迫于当时的形势，蒋介石只得又一次施展其“以退为进”的伎俩，作了一番卷土重来的部署后，于12月15日通电下野，谓粤方要求：“中正必须下野，解除兵柄，是必欲中正解职于先，和平统一一方得实现。”因此，他“惟有恳请中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②。同日，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准其辞职，并推选林森代理国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

蒋介石通电下野后，各地中委纷纷北上，但汪精卫、胡汉民均未进京，静观局势发展。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开幕，蒋介石参加了开幕式后即飞回老家奉化。会议开始，吴稚晖发言煽动分裂，他为蒋介石不抵抗日本侵略军的卖国政策辩护，并含沙射影地攻击粤方是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卖国贼。使孙科愤而退场，即离宁赴沪。由于胡、汪、蒋都未参加会议，而孙科又可能成为改组政府的行政院长，当时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退场，引起大会的混乱。于是，于右任、何应钦等到沪劝慰。27日，孙科在李济深、李宗仁等陪同下返回南京，继续参加会议。大会于29日结束。

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经过双方激烈争吵，终于实现了各派的政治分赃。所谓“统一合作”政府正式成立，而第二次反蒋联盟

^{①②}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卷八，四十九期、五十期。

也随之解体。

1932年元旦，“统一”的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林森任国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长。同日，粤方发表通电，宣布取消非常会议及广州国民政府，“以党权统一于中央，以治权还诸统一政府。”又称根据四全大会决议案，“设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在中央指导下，以行均权共治之责。”^①同日，西南两机关宣布在广州成立。^②实际上仍维持了广东半独立的反蒋局面，一直延至1936年夏，胡汉民病逝和陈济棠垮台才结束。

西南执委会常委由陈济棠、白崇禧、刘纪文、陈策、李扬敬五人组成。西南政委会常委由唐绍仪、肖佛成、邓泽如、陈济棠、李宗仁五人组成。从组织的成员看，主要包括三大派：胡汉民的元老派，孙科的太子派，两广的实力派。他们表面上“统一”于西南两机关中，但却同床异梦、各有打算。胡派和孙派都想利用西南的半独立局面，与蒋介石分享权力，最终把蒋搞下台，由他们控制中央大权。而两个实力派则要利用这块招牌来维持两广的割据。

西南执委会、政委会表面上拥戴胡汉民为西南的反蒋旗帜，但实权却操纵在陈济棠手里。胡、陈之间是互相利用，互相依托的。陈济棠要利用胡汉民的政治威望，来维持广东的割据；而胡汉民为了和蒋介石、汪精卫抗衡，也只有利用陈济棠的实力，支撑西南的反蒋局面，以图发展。陈济棠对胡汉民表面上很尊重，但不是言听计从，更不给胡以实权，使胡、陈之间矛盾日增。后来胡汉民为避免矛盾公开化，索性常住香港，很少到广州。他依

①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卷九，第四期。

② 亦称西南“三机关”，因同时成立的还有以陈济棠为委员长，包括27名委员的军事委员会西南分会。

赖元老派在西南执委、政委会支撑局面，而自己则每月由西南政委会拨给他港币10万元，作为政治活动经费，他在香港办有《中兴日报》、《三民主义半月刊》作为他的政治喉舌。他经常发表文章，想通过出版活动与汪、蒋争国民党正统地位。

西南政委会实际上受陈济棠所操纵，以陈的意见是从。广东省主席先是孙派的伍朝枢，后来省府改组，便由元老派的林云陔担任。但省府的民政、财政、教育三厅长均由陈的亲信所把持。建设厅长虽由胡派的何启澧担任，但下层的农林局、公路处、省营物产经理处全为陈派所掌握，建设厅长成了光杆司令。尽管如此，陈济棠还千方百计地要把广东省经济建设大权抓到手。他在第一集团总部设立了“军垦处”，名为负责军垦事业，实际为他争夺全省经济建设大权作准备。

3月，广东省党部改选，元老派与陈派分别提出名单，然后进行协商。由于会议是在陈的亲信操纵下，结果陈济棠拟定的名单获得通过。从此，他们又把持了省党部。

广州市政府机关元老派势力较大，市长是元老派刘纪文，使陈济棠不能事事指挥如意，因此必须夺得市参议会的控制权以对付市府。他出钱收买代表在10月市参议会选举中争得半数以上名额，控制了参议会，以阻挠和破坏市府的某些政策措施。他还以“杜绝钻营，铲除污弊，刷新吏治”为名，①举办“政治深造班”，使一些人贴上“陈的学士”标签，担任各县县长和县的局、科长，从而加强对基层的控制。对元老派唐绍仪担任中山模范县县长亦尽力打击排挤。1934年发动其爪牙搞“控唐案”，指责唐绍仪在中山县截留国省税收，贪污违法。同时在京沪组织了中山公民请愿

① 陈遁曾：《陈济棠的政治深造班》。

团、罢唐团，向唐绍仪发动攻击。迫使唐绍仪辞去县长之职，避居香港。

陈济棠在广东排斥和打击元老派的所为，引起了在粤的“元老重臣”不满，纷纷离粤，最后仍留在广东的元老派也只能成为陈济棠的帮闲清客。

孙科离粤后，陈济棠也不断排斥孙派势力。由于广州“四全”大会，孙派陈策、张惠长、陈庆云等曾用武力威胁陈济棠。12月4日，陈济棠借口虎门要塞司令陈庆云与杜案有关（杜煊泰镇压抗日群众），奉令查办，免去其虎门要塞司令之职，即派陈达接管。陈庆云拒不交代，调守备队3000人集中虎门，陈策的海军、张惠长的空军均采取一致行动，支持陈庆云。陈济棠最后由石龙派出陆军前往武力接管，才迫使陈庆云退出虎门要塞。

孙科前往南京任行政院长前，为保持在广东的势力，利用快要撤销的国民政府会议，通过任命伍朝枢为广东省府主席，并划琼崖为特区政府，直属南京国民政府。其理由是：“琼崖比较不易受军事影响，足为三民主义之试验场”。因此，该处“令其实施三民主义”。^①实质是要分割陈济棠独霸的广东地盘，同时又可以为他所控制的海、空军获得自己的根据地。伍朝枢为了替孙科攫取这一地盘，表示不就广东省府主席和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长等职。而接受了琼崖特区行政长官的任命，并表示要到琼崖发展实业。在西南政委会成立后，他正式通电就职，要求政委会提供经费50万元，并着手组织班子，但受到陈济棠的多方阻挠，使其迟迟不能上任。

宁粤分裂时，空军从第一集团军划出，形成了空、海军与陆

^① 罗翼群：《西南反蒋的回忆》。

军鼎足而立，使陈济棠非常不满。孙科北上任行政院长后，陈济棠便以武力接管了原由孙派陈策、张惠长控制的海、空军权（详见本书下一节）。接着又于1932年7月，指使一些琼崖的国民党员，搞所谓反“改特”运动。要求西南政务委员会收回琼崖划为“特区”的成命。陈济棠又公开指责伍朝枢与陈策狼狈为奸，后由广东省政府派南路绥靖委员陈章甫兼任琼崖绥靖委员，使“琼崖改特”流产。伍朝枢被迫辞职离粤。从此，孙派人马与西南政委会割断了关系，他们的势力被逐出广东。

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只是借“西南”这块招牌，维护其在广西的割据。对西南两机关的命令，有利的就接受，不利的则置之不理。对陈济棠独占广东的行径不闻不问。因此，两广实力派暂时能相安无事。

陈济棠利用各派联合反蒋的时机，打着西南两机关的招牌，以实力作后盾，最后控制了广东的党、政、军一切大权，成为割据广东的“南天王”，时间达五年之久。

第二节 陈济棠的军事专政

一、建立严密的军政机构

陈济棠割据统治广东地区，是靠军事起家的。为了强化军事专政，建立一整套严密的军政机构，陈济棠作了多方面的努力。首先是抓紧时机，扩充军事力量。广州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于5月成立以后，即于6月2日召开非常会议第二次常会，成立军事委员会，以陈济棠、李宗仁、唐生智为常委。将陈济棠的第八路军改称第一集团军，扩大为三个军，陈仍任总司令，缪培南任参

谋长。原余汉谋的第五十九师扩编为第一军，余任军长，李振球、莫希德和叶肇分任师长；原香翰屏的第六十二师扩编为第二军，香任军长，张枚新、张达等任师长；则李扬敬的第六十三师扩编为第三军，李任军长，黄延桢、黄质文等任师长。此外，又将原黄任寰第一独立旅扩编为第一独立师，黄任师长；原张瑞贵第二独立旅扩编为第二独立师，张任师长。并新增第三独立师，李汉魂任师长；第四独立师，邓龙光任师长；教导师缪培南兼任师长。又扩建四个独立旅和一个警卫旅，独立旅由陈章、范德星、严应鱼、李洁之分任旅长；警卫旅由陈汉光任旅长。集团旗下还建有炮兵团、战车营，工兵、宪兵等特种部队。总兵力已达150个团，15万人以上。

与此同时，又按照孙科的主张，将原广东舰队扩编为海军司令部，以陈策为司令。接管各舰艇和海军学校、修船厂、仓库等，并成立一团陆战队驻扎琼崖。将原属八路军总指挥部的航空处及其航空队扩编为空军司令部，以张惠长为司令。接管了飞行大队、空军学校、一团地勤部队和飞机场、修械厂、仓库等。

1932年1月，孙科同蒋介石妥协，前往南京任行政院院长，陈济棠对孙系的张惠长及陈策控制了空海军很不放心，决心收回海空军权。

陈济棠首先提出，广州国民政府撤销后，海、空军军饷仍由广东供给，应隶属于第一集团军。接着于9月30日，乘张惠长赴南京之机，突然任黄光锐为第一集团军空军司令，用武力接管了空军总部。后又由西南政务委员会作出裁撤空军司令部，任张惠长为第一集团军高等顾问的决议。

海军的解决则并不顺利。因为海军司令陈策眼看空军被改组，海军也会难逃厄运，便作最后挣扎。他将驻省河的海军宣布

戒严，自己则离穗赴港。5月3日，在陈济棠操纵下，西南政委会通过决议，裁撤海军司令部，将海军拨归第一集团军管辖，任邓龙光为海军司令，陈策调任第一集团军总部高等顾问，并电促陈策返省。

海军的一些大舰都反对陈济棠接收，张鼎等海军将领发出拥护陈策的通电。并将中山、坚如、执信等数十艘舰艇集中于虎门外的赤湾、伶仃洋一带，将飞鹰、福安、海瑞、海强等舰驶往海南岛，与海军陆战队据守海军基地。又在海口宣布成立“海口行营”，公开与陈济棠相对抗。

陈济棠派香翰屏、詹似菊等向海军疏通无效，决定用武力解决。一面向南京军委会报告，谓“粤海军之改组，系整顿内部，绝无何种作用。一俟改组整顿就绪，再将详情呈报”。^①一面派飞机向停在赤湾和伶仃洋的舰队轰炸，各舰队仓促应战，相继失败后逃港。陈济棠最后将驶向海南岛的飞鹰舰炸沉。在海南岛的张鼎等将领，眼看大势已去，乘福安号舰逃往香港，其余各舰亦先后逃往香港，后被陈济棠所收编。接着，陈济棠派陈汉光率警卫旅前往解决驻海口的陆战队，在大军压境之下，陆战队表示屈服。陈汉光旅即驻防琼崖地区，负责绥靖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陈策被迫接受调解，允任海防司令，但反对海军隶属于陆军，又发生冲突。最后，西南政委会议通过彻底解决海军问题的四项办法：（1）陈策由政委会资送出洋；（2）舰队分江、海防，海军司令由中央委任，江防由第一集团军荐任；（3）陆战队调返黄埔训练；（4）陆战队司令亦由第一集团军荐任，由周宝衡任海军司令职。^②从此，海、空军归于第一集团军

^①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卷九，二十期。

^②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卷九，二十期。

管辖。这样，陈济棠终于掌握了广东陆、海、空军大权。

后来陈济棠又大大加强了他的海军和空军的实力。向英、意两国订购鱼雷快艇四艘；在香港制造“海维”、“海周”两艘小舰。派员到英、意去学习鱼雷快艇技术，设营训练水兵，在黄埔新建鱼雷舰艇基地。到1935年春，还向法国购置鱼雷艇一艘，并在香港收购4000吨的旧货轮一艘，改装为运输舰。空军则扩编成四个飞行大队，又设空军教导总队，将原空军掩护大队扩编为警卫团。还增购了几批新式飞机，其中有美制驱逐机29架（含波音驱逐机9架）、侦察机10架、单翼机6架、运输机1架，共拥有各式飞机130余架。同时为空军学校购置最新教练设备，扩充和新建飞机机修厂、装备厂、白云机场。成立多处航空站，聘请美、英等国空军顾问。陈济棠的空军成为他手中的一张“王牌”。他常以招待贵宾参观空军表演为名，炫耀自己的空军实力。

由于陈济棠把陆军部队的主力放在粤北和粤东，以防蒋介石的部队入粤，因此，后方治安便由各县自行负责。于是，在总司令部之下增设警卫处，从事整顿全省各县的警卫队。同时还增建一个军垦处，实行军垦，以补军食。

陈济棠经过多年经营，逐渐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服务于军事割据的海陆空武装部队，同其它只是拥有陆军部队的某些地方军阀相比，他的军事系统是较为完整和强大的。

二、镇压工农革命运动

反共反人民，镇压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是所有封建军阀的特点，陈济棠也不会例外。但是，陈济棠对共产党和对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态度却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有不同的变化。这种变化，大致是以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来划分。从他担任

第八路军总指挥后到“一二·九”运动之前，他有时提抗日、反蒋、反共；有时又只提抗日、反共，谓“剿共与抗日，同样重要”^①。一时强调反蒋，一时又强调反共。反蒋是为了巩固在广东的统治地位，不受蒋介石并吞。反共却一方面基于阶级本性，害怕工农革命运动的发展，危及他的统治基础；一方面却是适应蒋介石反共反革命的要求。所以在反共问题上，既表现出某种积极性，亦有虚张声势，马虎应付的情况，甚至与红军达成某种协议，让红军从他的驻地顺利通过。这充分反映了地方军阀的两面性。从“一二·九”运动到1936年两广“六一”事变、陈济棠倒台，在这半年时间里，由于人民群众的抗日运动已发展到足以危及军阀的统治割据，所以他赤裸裸地镇压学生抗日爱国运动。

陈济棠割据广东以后的“防共”、“剿共”，是从1932年1月开始的。当时赣州被工农红军攻占，江西告急，蒋介石要陈济棠从广东出兵赣南相助。陈济棠以为蒋惯于借刀杀人，深恐派兵入赣与红军作战会受到损失，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反有被蒋消灭的危险。但又认为红军在江西的大发展，同样是构成对广东的严重威胁，与其在粤赣边“防共”，不如进兵赣南。这一方面可以满足蒋介石派兵助剿的愿望，减少蒋借机吞并的危险；另方面利用时机，进入江西，扩张地盘和势力，更有利于巩固粤防。因此，经过与将领们反复筹谋，陈济棠才决定派兵入赣。

1932年1月，陈济棠派出范德星的独立第一旅开往大庾驻防。2月，陈济棠派遣余汉谋的第一军入赣。以李振球的第一师由南雄经大庾、南康往赣州，接替罗卓英部队的防地；以叶肇第二师由南雄经九渡水、大窝、小窝及南康西侧向上饶方面进击，

① 《第一军月刊》，广东省档案馆藏。

部队驻扎在信丰及其附近地区。独立第二旅由余汉谋指挥，驻南雄维持后方联络线。余的司令部、军直属教导团、特务营、炮兵、工兵驻大庾城。

余汉谋待部队初步驻定，就积极筹划和采取“反共”“防共”的各种措施。他饬令赣南各县成立所谓“铲共团”，即地方反共武装，在军部则成立赣南警备团。这些地方武装，完全是按正规部队的编制进行组编；经费由赣南地方财政、税收负担。余又命令部队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禁止食盐、布匹、药材等生活必需物资运入苏区。但在很多时候，他却暗地与商人勾结，将食盐、布匹等“偷运”苏区，并套运钨砂，以中饱私囊。

陈济棠的部队进入赣南，参加蒋介石的会剿行动，对苏区红军和群众进行“围剿”、“扫荡”。制造无人区，给红军造成相当的困难。但陈济棠部队亦多次遭到红军的严重打击。1932年七八月间，红军发动围攻大庾城和发动水口之役。给余汉谋部以重大创伤，迫使余军在水口地区部队向南雄撤退。正因为如此，陈济棠为了保存实力，与红军之间既有对抗、又有妥协。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开始，须通过赣南、粤北。起初，陈济棠害怕红军转战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除原有驻赣南等地部队外，还增调兵力，构成了堵截红军的三道封锁线。红军为了避免和陈军大规模交战，决定对陈济棠作争取工作。以红军不进入广东腹地为条件，说服陈军为红军取道粤北提供便利，朱德曾几次写信给陈，提出了五条谈判建议，希望双方派出代表举行谈判。① 陈考虑到与红军交战弊多利少，遂复电同意谈判。谈判于10月上旬在江西寻邬境内举行。双方就停战、解除封锁、互通情报和抗日反蒋等各种问题

① 《关于抗日反蒋问题给陈济棠的信》，《朱德选集》，第18页。

进行了商谈。最后达成协议，红军于行动前将行军路线的主要地点告知陈济棠，陈军则后撤20公里，为红军通过提供条件。10月底至11月，红军部队便源源不断地顺利地通过广东仁化西出湖南。对于红军顺利地突破蒋军的第一道封锁线，陈济棠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陈济棠在海南岛的“剿共”则是毫不妥协的。1932年7月，陈济棠秉承蒋介石“围剿”红军的旨意，派遣其嫡系部队警卫旅陈汉光部到海南“剿共”。陈汉光纠集当地的反动军警和民团，采取分进合击，各个击破的战术，由北向南，齐头并进，妄图消灭海南红军于荒山野岭之中。8月1日，陈军集中优势兵力，向琼山、澄迈边境的羊山根据地进攻。经过五昼夜的残酷战斗，红军损失惨重，被迫撤到母瑞山区。于是，陈军便长驱直入，把根据地划为无人区，强迫群众迁移到据点堡垒里去。陈军所到之处，实行惨无人道的屠杀、焚烧、奸淫、虏掠，无恶不作，无数的村庄变成了焦土废墟，成千上万的善良人民惨遭杀害。红军退至母瑞山根据地后，陈军把母瑞山包围起来，步步进逼，不断向山上压缩。为了摆脱长期的孤军作战，红军主力部队决定突围。但又由于叛徒投敌，突围主力部队又一次遭到惨重的损失。留在母瑞山坚持斗争的仅100多人。后来，经过艰苦的辗转战斗，只剩下26人，成为海南革命斗争的火种，直至1935年以后才又慢慢发展和复苏。

除对赣南、海南的红军“围剿”外，陈济棠还在南路的斜阳岛“围剿”农军，在粤东“围剿”大南山根据地。总之，只要有红军和赤卫队活动的地区，都有陈军的铁蹄所至。在城市镇压人民的抗日爱国运动，陈济棠也不遗余力。

“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推动下，广州的

工人、农民、学生、小商人、民族资本家和一切爱国人士纷纷动员起来，投进了抗日的高潮之中。在开始的时候，为了反蒋的需要，陈济棠也宣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妥协。但当人民群众真正动员起来抗日的时候，他就显得害怕和退缩了。

1931年10月10日，中山大学爱国学生和群众到永汉路（今北京路）查禁日货。在专卖日货之新世界洋货店检查出大批日货，该店却拒绝抗日群众的爱国行动。群众便愤起将该店日货全部焚烧。该店系永汉公安分局局长杜煊泰所开设。杜得到陈济棠的命令后带领武装赶到现场，对查禁日货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80多人，伤六七十人，制造骇人听闻的“双十惨案”。十一日，广州各界代表向广州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惩办凶手杜煊泰。汪精卫、邓泽如、肖佛成等接见请愿群众。谓公安局长陈庆云已经引咎辞职，将组织特别法庭对杜煊泰进行审讯，对死难者将给予抚恤。12日，中山大学全体学生为抗议屠杀政策举行罢课，并就惨案发表宣言，表示“誓以鲜血争民意，以头颅保卫国土，内除祸国殃民之大煞，外抗日本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国存与存，国亡与亡！”^①陈济棠立即当天调集大批军车开入城内，并宣布戒严，命令香翰屏为广州市公安局长兼戒严司令，以对付人民群众的抗日怒潮。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也立即得到了广州青年学生的热烈响应。12月12日，中山大学学生首先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在中大、广雅等校的带动下，全市学生，接连举行了四次抗日示威大游行，前后持续了一个多月。并成立了广州市学生抗日联合会。还开了有万人参加的广州市民抗日大会。

^① 《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1年10月13日。

1936年1月9日，举行抗日大会的游行队伍，路经惠爱西路（即现中山六路）时，群众到教育厅前去示威，质问教育厅为何每次举行示威游行，就下令放假和封锁学校。愤怒的学生们高呼：“反对法西斯奴化教育”、“我们要抗日爱国的自由！”教育厅官员不敢出来接见，几百名愤怒的学生象潮水般地冲进教育厅，痛骂省教育厅推行法西斯奴化教育，动手把教育厅办公大楼的桌子、花瓶、玻璃窗等砸个粉碎。因此引起了陈济棠很大的震动，决心镇压广州学生的爱国运动。几天后就发生了“荔枝湾惨案”。

1月13日，中山大学、国民大学附中和其它几个中学的学生900多人集中在荔枝湾举行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刚走上桥头，迎面来了100多人，打着“市民抗日锄奸团”旗号，混进游行列。这批人是国民党市党部组织的，由公安局长和特侦队长所率领的警察、特务和流氓。当这班家伙来到荔湾桥上，就把“市民抗日锄奸团”的旗帜丢在地上，大喊冲杀，掏出手枪，挥动铁棍，劈头盖脑地向手无寸铁的游行学生袭击。一时间，枪声大作，铁棍横舞，示威游行队伍被冲散了，当即有100多人被打伤，有的被打成重伤，十多人被特务绑走。这就是轰动全省的“一·一三”荔枝湾惨案。

荔枝湾惨案的第二天，陈济棠又以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宣布在广州实行戒严。任缪培南为“戒严司令”，派出军警封锁省港交通，调遣军警在广州市日夜巡逻，通往石牌的道路禁止市民来往，还秘密逮捕了中大等校的学生多人，邓初民、何思敬等进步教授被迫逃亡。

三、加强对政权的建设和控制

第一，实行军事分区防守，以军统政。

陈济棠将全省划为五个绥靖区，“厉行分区绥靖的工作”^①，每个区设绥靖委员一人，派一高级将领兼任，分兵驻守。中区以广州为中心，辖珠江三角洲和西江各县，由第二军军长香翰屏兼任委员；北区以韶关为中心，辖粤北北江各县，由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兼任委员；东区以汕头为中心，辖惠州、潮州、梅州所属各县，由第三军军长李扬敬兼任委员；南区以梅县为中心，辖高、雷、钦、廉所属各县，由陈章甫任委员；琼崖绥靖区，辖海南岛所属13县，由南区绥靖委员陈章甫兼任委员，后由驻防海南岛的警卫旅旅长陈汉光代为负责。每个绥靖区之下，均设政务处、军事处、军法处和总务科，处理绥靖区的具体事宜。绥靖区实际上是军政合一的机构，是陈济棠以军统政的一项重要的具体措施，把地方行政完全纳入军事系统之下。陈济棠曾说：“为工作之利便起见，绥靖委员，虽属军事人员兼职，然其组织系统，实置于省府管辖之下。”^②这实在是军政合一的最好说明。

根据以军统政的要求，绥靖区的任务是“以积极肃清匪共，整顿地方治安，整理警卫队等事为主，对于政治及建设事业的设施，只站在督促扶助之地位……”。^③具体来说，绥靖区一方面是加强各县的行政基层建设。陈济棠提出各绥靖区“商得主席同意”，得“保荐有军事经验之人员，使任当地之县长者，此不过系尽举贤之责而已。”^④因此，在他统治广东期间，各区县为了“尽举贤之责”，层层举荐人员，充实县、区、乡行政力量。另方面，加强各县和地方的警卫队，配合肃清“匪”患。

陈济棠除分区派兵驻守外，还命令各绥靖区所属县市设立警

① 《广东党务月刊》第三、四期合刊。

②③④ 《改革陋习，刷新政治，造成模范新广东》，原载《军声》第四卷第四期，此处引自《陈济棠研究史料》，第132页。

卫队和警察。警卫队的兵员和经费完全由各县市自筹。各县不仅建立警卫队，还“应注意训练后备队，使乡村壮丁，皆有受军事训练之机会。”^① 警卫队的常备队，1935年整理缩编后，尚有9个大队，86个中队，198个独立小队。1986年编为大队制，即将原无管辖的中小队分别并编，总共有45个大队。计增加36个大队部，59个中队部，警卫队的后备队至1986年6月，计有一个大队、8847个中队、2785个独立小队、33个独立分队。官兵总数共约106.88万余名。警备队的任务，是配合正规部队，侦捕违反治安分子，肃清“匪”患，以辅助陆军控制力量的不足。

当时的所谓“匪”患，包括一些散兵游勇留落地方，聚集山林，当了土匪；或者是在地主土豪劣绅的残酷压迫、剥削下，无以为生，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占山为王；或者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争取人民解放的革命武装力量。在陈济棠统治的几年间，被捕和监禁者达2000多人，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当然也应看到，陈济棠对全省各地的打家劫舍，勒收行水的土匪，亦使用了剿抚兼施的办法，起到了逐步肃清的效果。例如，对拥有200多人，盘踞徐闻山的土匪，曾持枪抢劫，祸害地方多年，民愤较大，陈济棠一举将其肃清。这些剿匪措施，对维持地方正常秩序，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受到了人民的欢迎。

第二，培养使用亲信党徒，以加强省政的建设与控制。

陈济棠在广东地区大批使用和提拔自己的亲信。广东当时的省主席是林云陔，林是胡汉民、古应芬的亲信。因为陈济棠在政治上与胡、古有着特殊的关系，故陈、林合作比较好。林并没有实

^① 《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提议书》，原载《军声》第四卷第四期，此处引自《陈济棠研究史料》，第139页。

权，人事行政等大事，要取决于陈济棠。民政厅长林翼中，财政厅长区芳浦，教育厅长黄麟书，都是陈济棠安插的亲信。

林翼中根据陈济棠的指示，在广东军事政治学校内，设立政治深造班，吸收青年知识分子接受训练，学习政治基本知识。毕业后都派往各地担任县、市长，或县市政府的秘书、科长等职务，作为加强地方政权建设的骨干力量。陈济棠还设立广东行政人员训练所，分别抽调各县现任区、乡长来所轮训，以增长他们的行政知识，提高行政效率，同样成为他统治地方的骨干力量。这样，陈济棠在全省上下，形成了以他所培养的骨干力量为核心的庞大的关系网和严密的行政机构。

1934年广东省成立临时参议会。参议会规定一等县各选参议员二人，二、三等县各选一人；全省的自由职业团体、教育界、商会、工会、农会等各选五人。名义上是由参议会选出议长、副议长，实际上人选都是由陈济棠指定与他有着亲密关系的人来担当。例如议长林国佩是经常出入陈的高级军事机关，与绿林打交道的“堪舆先生”，副议长彭卓任、霍广河，秘书长梁祖浩，都是陈济棠和林云陔的亲信。省参议员的职责，按照组织章程所规定的是：“省参议会为全省民意机关，参与全省施政方针。关于省行政事项，省参议会得向省政府建议，省政府亦得送交省参议会审议。”^① 陈济棠也面对参议员说过：“诸君的地位，是政府与人民联络的枢纽，使人民与政府联成一片通力合作，便是诸君的唯一任务。”^② 要求参议员“以求对得住政府，对得住人民，尽力于联络政府与人民的责任。”^③ 不管陈济棠说得如何冠冕堂皇，他所建立

^① 《陈济棠研究史料》，第235页。

^{②③} 《陈济棠研究史料》，第235、237页。

的参议会这个“民意机关”，由于参议员不是选举产生，而是由军事统治者所指定，所以参议会只能是唯陈济棠之命是从。这样的参议会当然不能代表民意，只不过是一点民治的点缀品罢了。

陈济棠还运用各种政治力量和手段，把手伸入工、农知识分子等组成的民间组织，使之为其服务。如林云陔就利用中山大学的一些学生组织，组成“抗声社”，为他们培养私人势力。

第三，提出三年施政计划，进一步强化政权建设。

1932年9月27日，陈济棠提出《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提议书》，拟定了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大纲草案，“确立施政原则，厘定施行程序及进度表，务求纲目俱举，率由有章，建设前途，不无裨补”^①。三年计划分为“整理”和“建设”两个方面，对过去的进行整理，对未来的进行建设。整理之部只包括“吏治”和“财政”，而建设之部则分为乡村建设、城市建设和交通建设，前两项建设均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和救济四个部分。各部分都定出了三年进度表。这一《提议书》是经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政务会议通过，交给广东省政府，于1933年1月1日起施行。

关于政治建设，陈济棠认为，必须“依照训政时期的需要，积极的训练人民，使有相当的政治知识能力，借以促进地方自治，以期人民能够行使四权”。^②主要是抓三项：第一，所谓保卫地方治安。认为广东“连年来受土匪、共产党的骚扰危害，弃走、逃散、流离失所的不知多少。”经过一年“倾注全力于绥靖工作”，已近完成，但“各地的零星土匪尚有未尽肃清的”。一方面要督饬各地军警，继续搜剿，“务必第一年内，将全省各地的土匪、共匪，完全

^① 《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提议书》，见《陈济棠研究史料》，第137—142页。

^② 《三年施政计划是准备建设新广东的计划》，原载《西南党务月刊》第十三期，此处引自《陈济棠研究史料》，第159页。

肃清”。另一方面要积极编练，整理各县地方警卫队，务于计划的第一、第二年内，使全省各县的地方警卫队训练完毕。第二，所谓完成地方自治。认为计划前，全省各县市自治组织已大致就绪，未能成立自治机关的只是少数。第一年内，一方面要督促未成立自治机关的各县，迅速成立；另一方面要求已成立自治机关的各县市，实行人口调查，训练人民行使“四权”。务于第三年内，全省完成自治基础。第三，所谓举办救济事业。如设平民医院、养老院、育婴所、贫民教养院等等①。在三年计划中，强调“物质建设，精神建设，须平衡发展，不宜偏重物质建设。”所以在教育方面，强调“训育主义化。训育学生，固以三民主义为依归。惟主义之训育，断非每周讲授三民主义三、二小时所能竟其功。应变换方法，以主义原理归纳于各种社会科学中，庶学生对于主义自然发生坚固之信仰；平日尤须注意于实际之训练。”②

此外，陈济棠还以经济建设，文化教育思想建设，来保证其政权的各项措施的执行。

第三节 陈济棠的经济建设

一、重视经济建设的起因

陈济棠是在新军阀混战、国民党派系纷争、外患日亟的历史条件下崛起主粤的。作为广东的地方实力派的陈济棠，为了巩固

① 林云陔：《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的报告》，原载《广东党务月刊》，此处引自《陈济棠研究史料》，第164页。

②《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提议书》，原载《军声》第四卷第四期。此处引自《陈济棠研究史料》，第139页。

他在广东的封建割据，他除了加强军事专政以外，也为广东人民做了一些好事，以博取民心，抬高自己的声望。如前所述，早在他担任广东西区军政领导人的时候，就注意办了一些公益事业。1931年全面掌握了广东的军政大权以后，便以更多的精力来关注广东的经济建设。其所以这样做，具体说来，原因不外是两个方面。

首先，陈济棠要把自己标榜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之一，以便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增强同其他军阀竞争的能力。他在谈及他的“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时说：“该计划的立案基础，完全遵循‘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三民主义’原则，并参酌地方实际情形拟订。”^①“余之经济计划，乃总理实业计划之部分”^②，“黄埔商埠亦根据总理之实业计划而开辟。”^③显而易见，陈济棠是有意将自己要搞的经济建设纳入孙中山学说的轨道。陈济棠认为，当时，破坏工作大体已告成功，而建设工作益加需要加紧进行，必须预定步骤，严厘方案，一致努力，进行建设，使人民权益有所寄托，“才可以建树新的广东，才可以救起垂危的中国。”^④

陈济棠的这些说法，确是“冠冕堂皇”。当然，我们也不能认为这都是虚假词句。陈济棠受过资产阶级革命的熏陶，参加过同盟会，追随过孙中山，对国民革命有一定的认识。但他毕竟是一介武夫，在当中下级军官时，只晓得服从命令，当掌握了军政大

^{①②} 《陈济棠自传稿》，（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42、47页。

^③ 《陈济棠自传稿》，第47页。

^④ 陈济棠：《改革陋习，刷新政治，造成模范新广东》，引自《军声》第四卷第四期，1932年10月出版。

权，要实行封建割据以后，才开始懂得政治的分量。所以，他的这些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是装点门面，以提高自己的声望而已。

其次，最直接、最紧迫的原因，就是要解决其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以加强其广东的经济实力，使自己在军阀混战中立于不败之地。陈济棠认为：“过去政治之病态，以财政无根本解决之方案为百病之泉源。年来本省财政，窘枯已达极点”，“情势急迫有如累卵。”^①事实确是如此，陈济棠刚上台时，广东的财政十分困难。自民国元年以来，广东一省财政，养好几个省的军队，北伐时又承担了主要的军政费用，广东积欠的内外债达2亿元，军政各费2000万元。^②陈济棠为了维持他赖以立足的15万军队和一个臃肿的官僚机构，每月财政赤字达70万元，^③军队一度欠饷三至五个月。陈济棠完全懂得：“部队无粮饷，父子亦无情。”军队经费不迅速解决，随时都可能引起官兵的哗变。于是他苦思焦虑，寻求解决这一严重问题的办法，以稳定官兵情绪。

起初，陈济棠以秘密增发广东省银行银毫券的办法以资应付，但很快引起了货币贬值、金融波动。这种“饮鸩止渴”的方法，不仅不能作长久之计，反而危害很大。后又企图以扩大赋税，增加收入来解决这一问题，但当时苛捐杂税已经繁重，无由下手。

到了1932年夏秋间，经过一班谋臣策士的反复商讨以后，才确定一个解决庞大军事费用的原则性方法：由政府发行公债，兴办实业，奖励华侨投资，培养税源，实行工兵政策和屯田制度等等，

① 陈济棠：《改革陋习，刷新政治，造成模范新广东》。

② 区芳浦：《广东财政整理之经过及今后之设施》，引自《香港中兴报周年纪念册》。

③ 曾仲谋：《广东经济发展史》，1947年版。

用以扩大财政收入。简单说来，就是加强经济建设，以增加财源。后来，又接受了岭南大学农学院教授冯锐关于发展广东蔗糖业的计划，在发展蔗糖业的基础上，逐步发展造纸、纺织、饮料等行业。这是一个适合广东具体情况，而且投资少、利润多、收益快的计划，甚得陈济棠的赞许。陈济棠就是根据这些计划，正式提出“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大纲”的。

在开始推行三年计划的第一天（1933年元旦），陈济棠作了《三年施政计划是准备建设新广东的计划》的讲话。他提出：“三年施政计划的唯一目的，是要做成三民主义的新广东。”要求“一方面，依照训政时期的需要，积极的训练人民，使有相当的政治知识能力”；另一方面，“注意民生建设，以期满足人民衣食住行四大需要，以政府力量，为人民造产，并以适当的方法，使国民经济均匀发展”，以求达到“革命的策源地的建设工作突飞猛进，使我们抵御外侮的力量，从今天起日益增加。”^①一句话，就是要通过三年建设，增强广东的经济实力，以便稳固他在广东的统治地位。

二、整顿财政金融，发展商业

如前所述，陈济棠初上台时，财政经济十分困难。当时对于财务行政，全是沿用旧制，不是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收入，开发税源，而是靠征收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来维持。但是行政费用，特别是军费开支天天增加，面临着经济破产，难以维持下去的危险境地。而且，由蒋介石派来担任广东省财政厅长的冯祝万又从中作祟，企图以减少收入来搞垮陈济棠的统治。因此，1932年5月，陈济棠将冯免职，改任亲信区芳浦为广东省财政厅长。

① 广州《民国日报》1933年1月5日。

区芳浦上台后，即进行整顿各税务机关，逐渐撤销承商，收回自办，并严追欠缴税款。同时整顿各项税捐，特别注重烟税和赌税，很快就改变了冯任时期的状况，还增加了几种新税，也废除一些捐税，使财政收入不断增加。从1932年初的每月约500万元，至1936年6月增至约800万元①。

以营业税为例，1932年为387,998元，至1935年便增至1,540,000元（预算）。

对于禁烟税的整顿，到1931年只一年功夫，每月烟税就由1930年时的50万元，增至100万元。对于赌税，陈济棠以化私为公的名义进行整理。首先，将全省划分为若干地区，定出应缴捐款，公开招商竞投，以出最高价者承包。其次，除默许驻防军附征加一保护费作为该部队的公积金外，不准任何机关或个人从中勒索。这样，每月赌捐收入很快由四五十万元增至约100万元。

又改田赋（钱粮）为临时地税。原来的田赋是农业收益税，是按照耕地的肥瘠、每年收益情况而课税的，俗称“钱粮”。1934年春，陈济棠把它改为临时地税，按照评定地价征收1%的地税，以五成解省，五成留县，实质上是有意把土地税与土地收益税混淆起来，以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计当时查得各县田亩共3100余万亩（统计局调查为2400多万亩②），评定地价额共13.9亿余元（统计局调查为16.4亿余元③），每年征收地税共1390余万元（统计局调查为1411万余元④）比之钱粮旧额820余万元，增加了征额500多万元。⑤

另又征宅地税（按地价1%征收）、沙田税（按地价2%征

① 李洁之：《陈济棠统治广东的始末》。

②③④ 《广东经济年鉴》（下）1940年度版财政R104页。

⑤ 李洁之：《陈济棠统治广东的始末》，《陈济棠研究史料》，第400页。

收）、契税、典商营业税、烟酒牌照税、香烛纸宝捐、洋米入口税、洋糖入口税、舶来物产专税等，也增加了一大笔收入。

陈济棠对税收的整顿，有其合理的因素，如加征洋米、洋糖等入口税，对保护国内工农业生产是必要的。加征典商及各种土地税，本来是一种削弱封建剥削的手段，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赋税又往往转嫁于劳动人民，实际上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况且，临时地税又订得极不合理^①，引起农民的反感。更有甚者，陈济棠是不仅不禁烟赌，还借烟赌来增加财源。况且，在开烟开赌中，使不少军政要人可以中饱私囊^②。由此看来，陈济棠之征烟赌税，除了增加收入外，还作为拉拢部属的手段。

1935年冬，南京政府宣布改革币制，将民间的白银收归国有。广东省银行乘机大发纸币，收兑全省白银（光洋、毫银）。在未收白银之前（1935年11月），广东省银行发行的毫券仅4000多万元；从收购白银开始，到1936年7月底止，发行总额竟达到2亿4000多万元^③。陈济棠在这一兑换中的收入就十分可观。但因发行纸币的准备金严重不足，以致信用丧失，纸币贬值，汇价反常，使广大人民在经济上遭到严重的损失。

陈济棠的整顿金融，首先是将蒋系控制的中央银行广东分

① 李洁之在《陈济棠统治广东始末》一文中说：临时地税的征收，“增加农民的负担，而且是很不公平的，……当时钦廉地区每亩田价约40元，它每年所纳税款只是0.4元；广州地区每亩田价约80元，它每年所纳税款只是0.8元；而兴梅地区每亩田价400元以上，它每年所纳的税款就要4元多。可是上述各地区农业收益大体上是相差不远的，至多也不到一倍”，作交的地税却相差很远。

② 据说当时承包烟税的霍芝庭等人，每月收入共200万元，除上缴固定税款100万元外，以50万元交第一集团军司令部，剩下50万元还以若干孝敬有关人士。

③ 《广东经济年鉴》（下）1940年版金融S第45页。

行，改组为陈济棠直接控制的广东省银行，“成为全省金融的重心”，并在香港、汕头、海口、韶关、北海、梅菉等地设立支行。又组建广州市立银行。另筹设工商劝业银行，“以促进商业之发展”。同时鼓励十七家民营银行大力扩充金融业务。商业银号到1933年发展到498家，比1929年增加51家^①。还开设了营业规模超过香港的早午晚三市的银市。金融事业的发展，有利于资本的集中与流通，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商业方面。国内的省际贸易有很大的发展。1927年进口为152,324,971元，出口为24,044,759元。1936年增至185,116,472元，出口为70,366,116元。1936年比1927年进口增加3200多万元，出口增加3600多万元。^②

各省货物进口，平均每年约有1亿8600余万元；而本省货物输出于各省者，平均每年只有3230余万元；出入口比较，平均每年入超有1亿5400余万元。若将国际贸易入超与省际贸易入超合计，平均每年约有2亿6000余万元，数字相当巨大，说明了当时广东的商业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至于这么巨额的入超，则大半需仰赖于华侨汇款来填补。1931—1935年，广东省华侨汇款回国的数额是相当巨大的，约占全国侨汇的80%左右。广东全省侨汇收入1931年为34,520万元，1932年为27,170万元，1933年为25,380万元，1934年为18,505万元，1935年为26,800万元。^③

为了加速商业的发展，繁荣市场，陈济棠把广州的惠爱路（今中山四、五、六路）、上下九路和西濠口等处建设成为广州的

① 《广州年鉴》（上），1935年版，经济，第2—44页。

② 据历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广东省档案馆存。

③ 《统计月刊》第2卷第12号，1936年12月出版。

三大商业中心区。又发动各方面集资兴建和扩建了一批旅馆、酒家、茶楼、商店、戏院；鼓励小商小贩摆摊设档，增设全市商业网点；并组织“舶来农副产品”、“外国削价商品”等展销。那几年间广州的市场活跃，物价也比较平稳。

下面的三份附表，可以反映当时广州市的物价状况。

表一、广州市趸售物价指数表①

1926年=100 简单几何平均法计算

类 别	米类	其它食品	衣料	燃料	金属及 建筑材料	杂项	总指数	百 元 购 买 力
年 份	物品项数	20	61	38	14	39	18	190
1931	101.53	118.70	104.85	129.50	111.18	123.05	113.05	88.11
1932	95.54	121.05	101.91	129.75	113.41	128.70	113.79	87.88
1933	84.02	103.12	91.60	111.19	113.20	122.23	104.54	95.65
1934	74.64	100.24	76.71	109.01	99.84	111.54	94.28	106.07
1935	77.95	98.45	63.29	100.49	81.71	98.60	84.63	118.16
1936	104.19	117.40	90.02	117.36	94.20	118.49	105.40	94.88

这几年的对外贸易也取得成绩，其特点是入超缩小，减少了金钱的外溢。

广州的对外贸易，原来居于全国第四、五、六位之间（在上海、天津、大连、汉口之后），自1929年以后，其地位才高出汉口，而次于大连。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大连被日本占领，广州始跃上全国第三位。1935年，广东对外贸易总额尚占全国总额（东北三省除外）的35%，1936年则不及33%；与香港比较，

① 广东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制。

表二、广州市批发物价指数表①

1926年=100 简单几何平均法计算

类 别	米 类	其它食品	衣 料	燃 料	金 属 及 建 筑 材 料	杂 项	总 指 数
物 年 份 数	17	52	36	15	47	19	186
1931	103.0	112.9	100.4	119.0	114.5	124.6	111.4
1932	90.4	114.2	95.9	117.3	116.5	122.5	109.7
1933	87.4	111.4	89.8	114.8	109.5	109.2	104.1
1934	72.7	102.4	85.2	101.5	97.1	105.5	94.6
1935	73.1	103.9	70.8	98.9	86.1	102.7	89.1
1936.1	88.5	116.7	78.0	102.8	83.1	107.8	95.1
1936.6	101.3	126.8	86.2	123.4	92.3	112.6	105.1

表三、广州市零售物价指数表②

1926年=100 简单几何平均法计算

类 别	总指 数	食 品					衣 着 类	燃 料 类	杂 项 类
		米类	面类	蔬 菜类	其 它 食 品	平 均			
物 年 份 数	50	6	7	8	10	31	8	4	7
1934	102.70	78.16	96.10	125.20	117.50	105.50	89.70	81.20	121.00
1935	98.40	80.00	91.10	107.40	123.70	102.40	79.10	81.70	118.00
1936	117.47	109.75	100.60	112.82	167.93	124.89	98.61	95.66	124.20

① 国立中山大学编制。

② 广东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制。

仅及其25%。①

广东输出货物以生丝、绸缎、丝绣品、针织品、干鲜果品、蔬菜、水产品、土纸、木、竹、藤、矿砂、五金为主。据1936年统计，编织物、针织品值1290余万元（国币），占第一位；次为生丝，值1120余万元，又次为动物产品，800万余元，再次为蔬菜，613万元，矿砂及果品，各占400余万元。

广东入口商品中，以米谷、矿物油、五金、化学品、糖、水产品、机器及电器、用具、煤、面粉及车船等15类为大宗，多是制成品。1936年进口货物中，米谷值1000余万元“关金”，居第一位；次为煤油、汽车，值600余万元；又次为金属及矿砂值400余万元；再次为机器及工具，值370余万元。

广东进出口货值情况摘要：1927年进口242,546,702元，出口165,355,868元，入超77,190,833元；1930年进口为243,917,570元，出口为164,654,677元，入超79,263,894元；1932年进口为314,259,054元，出口为92,538,205元，入超221,720,849元；1936年进口为130,171,033元，出口为84,546,595元，入超45,624,438元。②

从以上情况可见，入超最高的1932年达2.2亿多元，以后入超逐年下降，其主要原因，一是加征了洋米入口税，粮食的进口大大减少，二是广东的工农业生产有所发展，许多商品慢慢可以自给，进口自然减少。例如糖是最明显的。三是1935年11月实行了新币制，对外汇兑渐趋稳定，这就便于输出而碍于输入。因此，广东对外贸易亦渐趋好转。例如1936年的洋货进口，比1935年减

① 《统计月刊》第2卷第12号，1936年12月出版。

② 据历年《粤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

少2000余万元，出口则比1935年增加900余万国币元，一反几年来出口减退甚于进口减退之趋势。1934年全年的入超，只及1932年的三分之一，1936年更只及四分之一。说明入超的下降是迅速的。这个成绩亦不能低估。

三、推进工农业生产

广东原有的各种工业，如顺德的丝业，石湾、高陂、枫溪的陶瓷业，北江的纸业，海康的席业，广州的胶业等等，本来有一定的基础，但都因墨守旧法，未能改良，以致出口滞销，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陈济棠的三年计划开始后，广东省政府一方面设法督促人民将原有各种工业逐渐改良，以适应市场的需要；另方面鼓励人民兴办各种新工业；民间一时不易集中资金与人才来经营者，则暂由政府举办，以资提倡①。经过几年的努力，全省新建省营近代企业20多家，为全国同类企业之冠；全省民营企业也从几百家发展到2000余家，其中新式企业达347家②。新建省营企业开始只有资本5万元，不出10年，总资产达7000万元以上③，民营企业的总资产也从1930年的654万元，发展到1936年的1500万元左右④。这在当时世界经济不景之年，极为不易。

工业方面，优先发展蔗糖工业，先后建成糖厂6间（市头、新造、顺德、揭阳、惠州、东莞），六厂每日榨蔗共约7000吨，共制白糖约725吨⑤。几乎每个糖厂都附设酒精厂（车间）。

① 林云陔：《三年来本省施政状况》，1934年8月，《广东西北区绥靖月刊》第30期。

②④ 伍炳立：《广东工业》，广东实业公司印行，1947年版，第33页，9页，11页。

③ 符泽初：《战前广东之工业》，中央日报社编，1947年版。

⑤ 符泽初：《战前广东之工业》，第11页。

在广州西村设化学工业各厂和广东工业试验所。其中士敏土（水泥）厂，每日可产水泥600吨，全年约20万吨。肥田料厂分磷肥、氮肥、钾肥三部分，磷肥部于1936年底完成，计划日产50吨；氮、钾肥部在建设中，遇抗战爆发而停止。电解厂（后并入硫酸苏打厂）；硫酸苏打厂，硫酸部已开工，苏打部亦已完成（该厂设计的生产能力，每日可产硫酸10吨，盐酸2吨，烧碱6吨，漂白粉7.5吨）。饮料厂，内分啤酒、汽水两部，1937年4月投产，每日可产啤酒7000公斤、汽水1万公斤。西村水泥厂内还设有省营泥城火电厂，每日发电量为1000瓩。省营其他各厂亦均有自办的电力房，如麻织（包）厂发电机，所发之电力，除自用外，还可供应梅菉全市。造纸厂的电力房规模更大，除自用外，尚可供应广州河南全区居民用电。此外，还有电解厂、燃料厂等。

广州河南则以纺织、造纸工业为主。纺织厂设于河南旧士敏土厂，全厂分几个部（或称几个厂），即棉纺（纺锭2万、织机200台）、丝织（新式铁机60副）、毛纺（设机2000锭，内还设有整染印花组）、绢丝麻纱（设机900锭）以及机械部等。全厂工人共2000余。造纸厂建在广州南石头，为省营各厂中规模最大者。从1933年9月开始筹建，至1938年3月完成，9月正式投产，计划每日制新闻纸50吨，但开工未久，广州即告沦陷。

在广东南路的梅菉，建有麻织（包）厂，每日可织造麻包5000个，供应糖厂和士敏土厂之用。^①还有广南造船厂、木炭汽

^① 以上综合《陈济棠先生之思想及贡献》，《陈伯南先生年谱》，台湾1972年出版；陈元瑛：《广东两年来建设事业之回顾》，工业部分，广东省建设厅编印。谢英明：《陈济棠主粤时期省营工业概况杂记》，《广东文史资料》第28辑，《战前之广东工业》第10—11页；《广东经济年鉴》，（下）第十四章，工业部分。

车炉厂、硫酸铦厂等。

军事工业方面，除了扩充原有的石井兵工厂外，新建了潖江兵工厂。该厂全部进口德国机器，购买机器及建造厂房费资3000万大洋。该厂规模完全仿德国克鲁伯炮厂，设计有炸弹厂、大炮厂、机枪厂、毒气厂、防毒面具等厂，1935年底建成并开始投产，有一部分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作用。还建立了韶关飞机制造厂（实为装配厂）。①

矿产一方面鼓励人民开采，一方面由政府开发。在此期间，各种矿业具有相当发展。钨矿除东江继续开采外，始兴、乐昌、翁源、英德、台山、中山、阳江、电白、云浮等均有开采。省政府将钨矿定为专卖，钨价比前增加4—8倍。1933年，陈济棠向富国煤矿投资125万元，使富国煤矿由手工生产改为机械生产，产量大增。②还筹建省营乐昌北江煤矿和乳源县狗牙洞、土猪岭、杨梅山各煤矿，收回曲江八宝山钨矿，试探英德长冈银铅矿等。军垦处在广州增埗设炼矿厂，开工未及半年，已获利14万元。③对民间开矿，则改善领矿立案手续，减轻矿税，严禁巧立名目，附收矿产捐税，又代购钻矿设备，以利开采。各公司呈请立案者共两百数十起，呈请立案待勘者尚有40余起。④截至1935

① 综合罗明燏：《我所认识的陈济棠将军》，载《陈济棠史料专辑》；林扬永：《陈济棠在广东办实业的意图》，见《广州文史资料》第2辑；符泽初：《战前广东之工业》第10—11页。

② 李翼纯：《两广矿业之检讨与今后发展之方法》，《广东省水运史料》，《航运篇》（二）。

③ 罗贯一：《抗日战争前富国煤矿增资及扩充实况》，《广东文史资料》，第39辑。

④ 陈元瑛：《广东两年来建设事业之回顾》。

年的统计，矿区共332处，面积6000多公顷。①其中采用新式方法开采者只有曲江富国公司一处。1935年采煤约15万吨。其余则采用旧式方法，全省煤产量不过二三十万吨之间。产地主要在乳源与湖南省宜章交界之狗牙洞、乐昌土猪岭。②另外还开采曲江八宝山钨铋矿、英德硫铁矿及狗牙洞飞鼠岩灰石矿，并积极筹办广东钢铁厂及开采乌石岭、紫金、云浮等处的铁矿和恩平的金矿等。③

由于工业的发展，大大减少了洋货进口，增加了收益。就以水泥和糖为例，1931年至1932年间，平均每日进口洋泥5000桶，每年计达2480万元。自西村土敏土厂建成后，每日生产水泥可达3000余桶，全年收入1080万元；洋泥也被迫减价，每年可得利益630万元。仅该厂每年就可挽回利益1700万元以上。又如洋糖每年输入约3000万元，头两年建成三个糖厂，共产糖200余万担，足供全省销用有余，每年即可挽回3000万元。仅两年时间，因水泥、糖业收入增加，全省裁去苛捐杂税300余万元，④并拨农村救济款500万元⑤。

农林渔业方面，由于连年军阀混战，天灾人祸，民生困难，二十年代末，广东的农林渔业仍是一片萧条。陈济棠上台后，以农业科学家冯锐任农林局长，为解决粮食问题，他从三方面着手：1.增加洋米税，使洋米不易输入；同时鼓励农民增加粮食

① 《广东省统计汇刊》第一期。

② 《广东经济年鉴》（下），矿产，第96页。

③ 何启丰：《序》，广东建设厅第二集，矿业专号。

④ 陈元瑛：《广东两年来建设事业之回顾》。

⑤ 冯锐：《广东复兴糖业之经过述略》，广东省政府广州市第一蔗糖营造场，1934年编印，第9页。

生产；2.改良稻种；3.进行水利建设。经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一定的效果。

广东粮食向来不能自给，每年产米约7500多万担，而消费则需9000多万担，不敷约1400多万担，故每年需向国内外购买1000万担以上，其中洋米约占85%。

1923年至1935年平均每年进口洋米300余万公担，而以1933年为最高峰，进口达1020余万公担，价值约1.017亿余元。为了减少进口，促进本省粮食生产，从1933年9月16日起，开始征收洋米税，以后洋米谷及面粉的进口数量均逐年减少。例如1931年，进口洋米3,294,318公担，杂粮86,932公担，面粉9,622,056公担。1936年进口洋米为2,756,718公担，杂粮420,540公担，面粉2,674,024公担。比1931年有较大幅度减少。①

水稻为广东最重要的农作物，在全省耕地面积4000余万亩中，稻田占3000余万亩。当时是以改良稻种来提高粮食产量。在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丁颖领导下试验育成功的优良品种达五六十种，产量至少比土种增加25—35%②，这对推进广东的水稻生产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的农林局也注重示范及改良、繁殖良种，并在各属设农业推广处，在主要农产区设研究场所，在各县作巡回示范展览和表演。省农林局还设农艺、水产、园艺等十个系，加强了农业技术的研究。特别注意防治牛瘟等③。这些对广东粮食生产也起了良好的作用。

为了发展制糖工业，就必须大力倡导农村种植甘蔗。省农林

① 根据《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

② 《广东经济年鉴》1940年版，农业，G52页。

③ 何苏照：《陈济棠时期的广东经济》，《开放》1985年第1期。

局引进和推广爪哇蔗等优良蔗种，使甘蔗产量大大提高。还采取办糖厂与种甘蔗合并经营的方针，省政府给蔗农的贷款共54万元，使广东植蔗面积创历史最高纪录，达到91万亩。每年产量为4550万担。蔗糖除供本省消费外，尚有余量远销国内外。^①

蚕丝原为广东经济价值最高的农产品，极盛时代，新式丝厂逾百家，年输出平均5万余包，价值7000余万关两，成为本省外贸收入的主要来源。自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丝价继续跌落，日丝又贬价倾销，广东丝业受到严重的打击。输出大为减少，以致生产锐减。自1930—1932年三年间，丝厂从121间减到58家，开工丝车减少42000余部，大量工人失业。到1934年只剩下丝厂37间，丝车只有19000余部。

陈济棠为了振兴广东蚕丝业，挽回外汇收入。他在顺德设立蚕业改良实施总区。下设9个分区，改革生产工序，生产出新的丝绸品种，可与杭州丝绸竞争。还成立了“广东省蚕丝促进会”，由专家、学者和老蚕农组成，负责研究和指导全省的蚕业改良工作。

广东水果种类繁多，以蕉、橙、柑桔、荔枝、龙眼、杨桃、梨子、椰子、李子为大宗，其中有不少出口。中山大学及岭南大学农学院对果种进行了改良，并加以推广。所以，这几年间广东水果输出也不断有所增加。如1932年输出外国的水果为261,329公担，输往国内176,340公担，共437,669公担；1936年输出国外水果增至396,452公担，输往国内为335,191公担，合共731,643公担，比1932年大大增加^②。

此外，对淡水渔业和海洋渔业的开发也取得了一定发展。这

① 《广东经济年鉴》1940年版，农业，G52页。

② 《广东省统计汇刊》第1期。广东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1939年10月编印。

几年，渔产品的数量增加相当迅速，到1935年，仅塘鱼的产值就达到7100万元。①

四、改善市政、交通

广州市的市政建设，民国以后有过多次庞大计划，二十年代以来也相继修建了一些马路和公用设施，但因连年战乱，各项建设断断续续，始终未能使广州市的面貌改观。

进入三十年代以后，由于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广州市的市政建设。首先是马路的修建加快，几年间先后建成了西湖路、豪贤路、清平路等24条马路。到1936年止，全市新修筑马路的总长达134公里，其中四分之三是由1930年至1934年间建成的。

当时，广州市公共交通事业也有较快发展，到1935年，公共汽车公司增至19家，开辟营运线路19条，公共汽车121辆，全市的汽车总数达2000余辆，比1929年增加了1100余辆②。

为了改善广州市区珠江两岸“河南”和“河北”仅靠渡船来往的交通状况，陈济棠执政以后，广州市政当局曾着手筹建横跨珠江两岸的三座铁桥。即海珠铁桥、西堤铁桥和黄沙西南大铁桥。1933年海珠铁桥首先建成，西南大铁桥亦已开工，西堤铁桥则还在勘察中，后因陈济棠倒台而停顿下来。此外还取直和加高了珠江南北3800米堤岸；③修建西堤码头等一批过江轮渡码头；在河南洲头咀新建了广州至香港的客船码头，借以繁荣河南区工商业。④这样，广州市区的水陆交通都有了明显的改观。

① 《广东省统计汇刊》第1期，广东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1939年10月编印。

② 《统计月刊》第二卷第1号，广东省调查统计局1936年1月出版。

③ 《广州年鉴》（下）工务部分。1937年版。

④ 何苏照：《陈济棠时期的广东经济》，《开放》1985年第1期。

对于市内的基本建设，这几年也大规模地、有重点地展开。他们吸收华侨投资，在西濠口一带兴建了爱群大厦、大新公司（今南方大厦前身）等高层建筑及一批旅馆、饭店；在东山建立西式住宅区。还由政府投资或募捐、赞助，建成了中山纪念堂、中山纪念碑、中山图书馆、市府大楼等壮丽宏伟的建筑物；又在沙河等地建筑了一批居民住宅。1931年至1933年，广州每年增加建筑物5000多间，1934年增加3,236间，面积148,621平方米，1935年增加2448间，面积130,883平方米。①

以广州市为中心，全省的交通状况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公路建设的发展较为明显。在三年计划期中，由省库给修筑公路拨款共1041万余元，加上各县、乡的就地筹款，使公路建筑有了较为充裕的经费。② 经过省、县、乡的分头兴筑，仅1933年和1934年就修筑了4000多公里的公路，使当时广东的公路里程居全国各省之冠。据《中国经济年鉴》刊载1933年数字，广东省公路共有11,244公里，超过了国内公路比较发达的省份一倍以上（当年排第二位的是山东，5,520公里，第三位是江西，4,622公里），建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纵横省内的17条公路干线和326条支线。营运长途汽车达到1278辆。③ 不仅全省四通八达，而且还通达赣、湘、桂、闽四邻省边境。

铁路交通也有发展。修筑了多年的粤汉铁路于1936年全部建成通车，这对于沟通湖南、湖北和长江流域，发展工商业裨益至巨。对粤汉铁路南段、广三铁路、广九铁路、新宁铁路、潮汕铁路则加强维修与管理，使铁路的客货运输量大大提高。除新宁铁

① 《统计月刊》第二卷第5号，1936年5月出版。

② 《统计月刊》，第二卷第1号，1936年1月出版。

③ 何苏照：《陈济棠时期的广东经济》。

路亏本外，其他均有盈余。

广东江河交错，广州为东江、西江、北江三江出海之枢纽，水上交通向称繁盛、方便。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因受不平等条约的损害，内河、沿海航权丧失殆尽。广东本为华南航运中心，但全省大小船只不过6万余艘，其中多数是小船、渡船、渔船。至于轮船仅有500余艘，合38,613.104吨，与香港、上海、青岛等口岸比较，更形落后。而广东沿海各主要航线，几无一处不为外轮所侵占，粤省航业之衰落，于此可见一斑。况且，由英国人控制的粤省海关，使沿海、内河中外商船交通，全由外国人主管，因而我航商受其梗阻，航业受其摧残。

1931年10月，广东省当局筹备接收海关代管船舶事权手续，并于11月在广州设立全省港务管理局，以行使航政局职权。1932年1月间正式接收向来操在外人手里的粤海关理船厅代办事权；2月以后，相继接管粤海、潮梅、琼海、三水、江门、拱北、北海等关的丈量、检验船舶事权。在广州以外，各重要港埠设立分局，并制定《广东省港务管理局组织章程》。至1933年1月，全省的航政均并归由港务局办理。①

还成立航海讲习所，训练航运技术人才。改组了广东内河航业防卫处，以加强河道交通之安全。注意疏浚内河航道，设立内河航运水上标志。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广东省各江航线里程到1935年已达3134.5公里。又在各口岸建大小内港码头55座，其中大部分已开工兴建或完工。还筹备黄埔开港；在黄埔建立官营的广东造船厂，在各地建起26家民营的船舶修理厂，加强了对船舶

① 王尧：《航业政策》，1934年出版；《广州年鉴》（下）卷十四，交通第83—113页。

的维修。①

当时省、港、澳以及东、西、北江各埠和珠江三角洲各县的水上交通均十分方便，船只往来频繁，许多县城都有班轮来往于广州、香港和澳门之间。1935年广州口岸出入商船总数达18695艘，比1933年增加了11407艘；总吨数为933万余吨，比1933年增加了200多万吨。

全省各口岸（含广州）商船进出口的情况也有所发展。1935年比1933年增加3500多艘，合115万余吨。

除了大力发展水陆运输以外，亦注意航空事业。1933年夏在广州成立的西南航空公司，开创了广东民用航运的新纪元。当时公司除飞机和飞机零件从外国购入外，其余飞行、机技、管理人员均为中国人。西南航空公司的资本，采取集粤、桂、滇、黔、川五省官股的办法，先由广东省认股银洋100万元，广西省认股50万元。最初只辟广州——梧州——南宁一条定期航线。到1934年增辟了：广州——梧州——南宁——龙州；广州——茂名——海口（后改为广州——梅菉——海口）；广州——梧州——桂林；广州——梧州——南宁——柳州——桂林等几条国内航线。还开辟了广州——梧州——南宁——龙州——河内（越南）；广州——北海——河内两条国际航线。公司的营业收入原可勉强自给，但由于公司的实际负责人贪污浪费，又人浮于事，以致入不敷出，亏蚀甚巨，至1935年便无法支持而宣告结束②。

电讯事业也有较快的发展。在全省100个县中，除海南岛新设的乐东等三个县外，全部可通长途电话。广州、汕头间的无线

① 《统计月刊·交通专史》，1936年版。

② 阙宗华、郑厚邦：《西南航空公司的成立及其结束》，载《陈济棠史料专辑》。

电话于1933年接通。同时还筹建广州至江门、香港、海口、东兴、上海的无线电话，并准备接通国际电话。

广州、汕头、佛山、北海、海口、梅菉等七市镇，均设了市内电话，其中广州一市，即拥有电话机8300多台。

无线广播电台亦开始设立，已经播音的有广州市府、广东无线电专门学校、西南航空公司三个播音台。①

五、经济建设成就的原因和局限

陈济棠治粤时期经济建设取得如上所述的成就，其原因可以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来探索。

客观方面。其一是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这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设备大量积压，到处寻找出路，各个集团之间的竞争十分剧烈，纷纷降低条件，向外倾销。加以受危机的侵袭，使他们自顾不暇，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有利于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其二是自1929年冬第二次粤桂战争以后，广东境内一直无重大战事发生，陈济棠的部队虽然还是连年征战，但都是在省外，只偶尔在广东边境进行。这就使得广东大部分地区在六七年间却保持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这在民国以后来说，也是空前的，因而就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内部条件。

当然，这个客观条件，只能使经济发展存在着可能，还必须加上主观的努力。主观方面的因素，大致有如下几点。

第一，陈济棠统治集团能及时地抓住了于我有利的国际环境

① 《统计月刊》第二卷第二号，广东省调查统计局1936年2月出版。

和广东内部条件，积极吸收外资、侨资和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人才，把经济建设摆到了重要的地位，从而促进广东建设事业的发展。这一点，国内许多地方军阀都无法做到，而陈济棠集团能够这样做，不论其动机如何，也应该认为他们是颇具胆识的。

第二，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广东同外国的交往较早，有一批接受过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的知识分子。陈济棠等人对这批人才十分重视，并发挥他们的作用。如早年参加同盟会、后留美得硕士学位的林云陔，1932—1934年出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建设厅长，成了陈济棠经济建设的得力助手。陈济棠和林云陔不惜重金礼聘了几十名留学欧美的专门人才返粤，分别担任局长、处长、教授、校长、厂长、经理和工程师等，赋予技术、经营管理之大权。如委任留美农学博士、岭南大学农学院院长冯锐教授为广东省建设厅农林局长，兼统办四间糖厂的总经理。冯向陈提出发展广东糖业三年计划，①陈接受并付之实施后，初步建立起以制糖业为中心的省营工业体系。冯锐成为陈、林的首席经济策士，并以冯为核心，形成一个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智囊班子。他们设想了一个切合广东实际情况的经济布局，即以广州为中心，沿着珠江水网，顺纵贯南北的粤汉、广三和广九铁路伸展开来，北至南岭，南至高雷钦廉，东至潮汕，西至梧州。②

陈还聘请外国专家30余人和国内知名的学者，如邹韬奋、许崇清、张东荪、林砺儒等来粤，开办学校、训练班、培养各种人才。

在一大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的支持下，陈济棠经营的广东地方经济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① 洗子恩：《关于冯锐史料的补充》，《广东文史资料》第17辑。

② 吴志辉：《陈济棠时期广东的经济布局》，《广州研究》1985年第3期。

第三，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和吸收侨汇、侨资。陈济棠等人大胆吸收外资和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不少先进设备只收原价的三分之一），从较高的生产水平起步。他们决定大力使用现代化机器生产，尽量采取机器借款实施工业建设的计划，即向外国购进机器，其条件是外商运进机器时，派工程师随行，负责安装开工，保证运行，以若干年为限，贷款亦规定于开工出产始分期偿还，年息一般为五厘左右。这样做，无须现款就可以购进廉价的、新式机器，有人称之为“无本办工业”，又有利于培训我国的技术人员。

广东毗邻港澳，又是著名的侨乡。广大华侨、港澳同胞素来爱国爱乡，关心乡梓的建设事业。陈济棠等人采取各种措施，广泛地吸收侨汇、侨资，仅侨汇一项，1933年为2.5亿多元，1934年为1.85亿多元，1935年为2.68亿元，1936年又增加了五六千万元。^①这个数字在当时相当可观，对广东建设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四，充分发挥和利用广东优越的自然条件。广东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土壤肥沃，得天独厚，适合甘蔗以及其他热带作物的生产。因此，他们制定了《复兴广东糖业三年计划》，并以此为中心，带动其他工业的发展。首先在广东适宜发展蔗糖事业之地区，划分为五个蔗糖营造区，设四个繁殖场来选择比较适合广东的最优良蔗种加以推广。第一年先筹建广州、惠阳、潮汕三区四个糖厂。从美国等处进口最新的设备，商定分20期(年)付款，然后以第一年纯利所得，为第二年投资之用，以第二年纯利所得，为第三年投资之用，如此类推。又订立贷款植蔗法，以优惠

^① 《广东经济年鉴》（下）1940年版。第十九章，金融，S第133页。

的低息贷款给蔗农，蔗农将甘蔗售给糖厂，糖厂优惠收购，称之为“预约种蔗”。农民种蔗每亩得利百元，比种其他农作物收益大，故全省除潮汕、徐闻等处恢复和扩大种蔗外，原来很少种蔗的珠江三角洲也大面积种植，使全省甘蔗面积数倍增加，故糖厂原料源源不绝。①

除蔗糖外，陈济棠等人还注意优先发展那些属于广东地方优势的产品，如水泥、橡胶、麻织品等。由于这些产品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在国内外市场都有销路，使广东产品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同时，还考虑到主厂与附厂互相配合，充分利用废料。如糖厂利用废料附设酒精车间、硫酸厂与肥田料厂作为姐妹厂而兴建，麻袋厂为糖厂、水泥厂提供包装而建设，等等。

陈济棠政权还注意发挥广州作为经济中心的作用，大部分新厂设在广州，着意把广州建设成为华南与西南地区的“首善之区”，以带动珠江三角洲乃至整个华南地区经济的发展；而这些地区的发展又必然反过来推动广州的发展。

广东与港澳历来关系密切，他们一方面通过港澳了解世界市场的动态，确定对策。利用当时世界市场萧条的国际环境，压低价格，进口发展广东经济所急需的成套设备和广东缺乏的钢铁、汽油、柴油等原料、燃料；另方面又通过港澳市场及时了解经济行情，以确定广东地方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规模。如了解到我蚕丝业竞争不过洋货，就当机立断，收缩蚕丝业生产，发展蔗糖业。当资本主义国家的同类商品在国外大量倾销时，即及时地将产品转向广大的国内市场销售，以避免损失。

广东水网地区颇宽，水上交通方便，运费低廉，为了充分利

① 冯锐：《广东复兴糖业之经过述略》，第6页。

用这个优点，在设厂布点时多选择在珠江水系网络上，提高珠江水网的运输能力，因而能够不断开辟新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①

第五，制定保护本国工业的法规和政策。广东历来洋货倾销严重，所以市场问题突出。陈济棠政权制定保护本国工业的法规，即关税保护法，对洋货进口实行专税、高税限制，以保护民族工商业。例如我水泥出产后，质量优于洋货，但洋货贱价倾销，省产水泥几难立足。于是由省政府施行保护幼稚工业法规，征收洋泥附加税。实施后，五羊牌水泥售量迅速上升，于是产量大增，售价也随之减至一半以下。②又如进口白糖加税后，其价高于我省白糖，使洋糖几乎在市场上绝迹，保证了我制糖业的飞速发展。

总起来说，陈济棠治粤八年（严格地说只统治五年多），对广东建设颇有建树。当然这也不仅是他个人的功劳，这和当时的各界人士和劳动群众的努力分不开的。对陈济棠来说，姑勿论他当时主观意图如何，这些成就是在客观上却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文教事业的发展，有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与提高。

但是，陈济棠的统治毕竟是地方军阀的统治，其发展经济之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高利来解决庞大的军政支出，巩固其割据政权，因此，其经济发展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第一，缺乏较为周密的建设计划，规模过大和不当之处，比比皆是。陈济棠的五年计划无量力而行、实事求是之意，以致许多计划只能是一纸空文。广州三座珠江大桥只完成一座；渝江水

① 曾养甫：《广州之工业》，1937年版。

② 符泽初：《战前广东之工业》，第5页。

电厂、南石头钢铁厂、黄埔造船厂等大型企业和黄埔开港都是纸上谈兵，一个都未能动工建设，陈济棠自己对此亦“至引为憾”。①一些已投产的工厂，或因销路不好（如硫酸厂竟建了两个），或因原料进口价高（如饮料厂），被迫停产或半停产。企业的布局也不尽合理，例如在筹建与广州通无线电话的省内外仅有的五个城市中，竟然将地处一隅的小县防城东兴也列上；已建成的六大糖厂，番禺的新造和市头只相隔三四十华里，以致造成蔗源紧张，这些布局都是极不合理的。大概是由于陈济棠是防城人，而冯锐是番禺人的缘故。

第二，资金不足，负债累累，货币贬值，金融不稳。陈济棠虽然通过经济建设增长了收入，但军费开支及投资额均很大，只得常常靠借债来填补。据不完全的统计，陈济棠在1931—1932年，发行了两次军需券，仅第二次就1000万元，又发行了国防公债3000万元，还为了应付货币风潮，多次发行金融库券等等，这些债务，都无法按期偿还。1933年，又大量发行广东省银行纸币，仅以500万元准备金就发行了2700万元，以致当年11月发生了挤兑风潮，无法应付，只好部分纸币停兑。1935年实行币制改革以后，银币外流，物价波动，金融混乱，当局束手无策。其结果还是使老百姓受害。这种状况，几乎是军阀统治的通病，陈济棠也没有例外。

第三，过分追求利润和眼前需要，严重忽视基础工业和农林基本建设，使当时广东经济发展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陈济棠不兴建钢铁、机器等工业，使机器、钢材、甚至铁钉，都全靠进口洋货，连煤炭也依赖进口。对矿业极少投资，在为数超过

① 《陈济棠自传稿》，第46页。

100吨的煤矿中，仅一处是机器生产。然而，对于湛江兵工厂的建设，却投资3000万大洋，几占工厂投资总额的一半。对农林基本建设虽有计划，但实行极少。

此外，贪污浪费严重，玩忽职守、走私漏税等弊端亦极为普遍，所以陈济棠时期的经济建设虽然有着较为明显的发展，但人民真正得益并不显著，故不能对其客观上的积极意义作太高的估计。1936年3月，陈济棠在回顾三年施政计划执行情况时，也承认：“三年中，关于建设之实施，农村之经济，交通之扩展，兼营并进，日夕不遑，自问未敢怠荒，即国内外一般之评论，亦多视为政治渐入常轨，但就成绩而言，则政府自省甚愧，实效未彰，而尤于人民方面尚少普遍的实际利益。推其缘故，在承办之人，既不根据原定计划，努力迈进，而执行者又多敷衍了事，脱去本根，徒循枝叶，间或误入歧途，滋生弊窦。”^①陈济棠虽然好大喜功，但在事实面前，也不得不承认他的经济建设存在种种弊端。

第四节 陈济棠的文化教育

一、发展教育事业

如上所述，陈济棠统治集团重视人才，重视利用知识分子的力量来发展经济，巩固割据统治的基础，因而也就重视教育事业。他们提出要“以改进全省教育，培植民族能力，振兴民族精神”，按照这样的目的，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其主要内容是：改善各级学校制度，推行社会教育，重视发展小学教育，增加职业教

^① 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3月4日。

育，扩大师范教育，改善中学教育，扩充高等教育，设立编译馆、仪器制造所等。①

为了实现上述的教育工作任务，陈济棠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1930年，全省教育经费预算为213万元，占全省经费预算总数的4.3%；到1935年全省教育经费预算增为503万元，占全省经费预算总数的10.8%，比1930年增长了122%。另外，各地还通过华侨捐款、私人办校等多种方式，自筹了大量的文化教育经费。这就使广东教育事业的发展有了相当的物质基础。②

陈济棠本人对教育工作也相当重视。他多次出席广东省的教育会议并发表意见，在1932年10月召开的第三次教育会议上，陈济棠作了题为《要把整个教育事业进行整顿》的演说，提出在农村就地设立农业学校；要极力注重人格的修养和体验力行等三点意见。③他在国民党广东省第六次全省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本省《党员现在应负的责任》的宣讲中，几乎都是谈教育问题，他要求国民党员“积极负担义务教育，推行识字运动。”④在陈济棠的推动下，广东省各级政府把教育工作列为重点项目，从财力、人力、物力等方面予以大力的支持，从而使得这几年间教育工作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

在学校建设方面，除了加强包括国立中山大学和私立岭南大学在内的六所高等院校的师资和设备外，1934年7月，在广州创办了省立勷勤大学，内设工学院、师范学院（后改为教育学院）、商学院等。创办了省立国医学院和体育专科学校，还开办了一所与大专相当的广东陆军军医学校。全省高等学校学生人数，从

① 见谢瀛洲：《一年来广东教育之设施及计划》。

② 何苏照：《陈济棠时期的广东教育》，载《广州研究》1985年3期。

③④ 《陈济棠研究史料》，第143—146页、第220页。

1932年度的4000人增加到1934年度的6000人，即增长50%。还筹办省立农业、水产、美术、音乐等四所专科学校。又建成了中山大学石牌新校址，使中山大学由原处文明路的狭窄校舍，迁至风景如画、校园宽敞的石牌新址，图书和各项设备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成为当时全国有数的名牌大学。

这时期广东的中小学职业学校、师范学校、成人教育等均有较大发展。1934年同1931年相比，小学增加400多间，学生增加14万人；中学增加90间，学生增加1.6万多人；职业学校增加20多间，学生增加2000人；普通师范学生增加1300多人；简易师范学生则更大幅度地增加。^①

为了适应文化教育和科研事业的发展，在陈济棠的建议下，于1933年成立了科学委员会，聘请留学欧美的专家及外籍专家80多人，从事军工、民用等科学规划及研究工作；又派出几十名公费留学生到欧美学习织造机械、水电、水利等专门学科。^②还建成了一批图书馆、博物馆，设立了各种科学研究机构，开展了初步的科研工作。截至1936年5月止的统计，广东省各县市的公立图书馆已有89间，藏书达64万余册，全年阅览人数达52万多人次。^③另有民间图书馆35间。

如上所述，对于社会教育，陈济棠颇为重视，在他的倡导下，全省办起了以教识字为主的民众学校910所，民众阅报处1168处。有88个县建立了民众教育馆。还办了工、农、商业等职业培

① 林云陔：《三年来本省施政状况》，《陈济棠自传稿》；何苏照：《陈济棠时期的广东教育》。

② 《粤系军事史大事记》，载《广东文史资料》第49辑第15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③ 《统计月刊》第二卷第10号，1936年10月出版。

训性质的补习学校29所。参加民众教育工作的教职员达到4300多人。① 在这些工作人员的努力下，使学识字、学手艺在广东的部分地区形成了风气。

二、提倡尊孔读经

陈济棠为了巩固和加强他在广东的统治，除了加强军事专政、镇压革命运动、强化政权建设等等之外，还大力加强对人民思想的控制和统治。其主要的方法有二：一是大力提倡尊孔读经，灌输“忠孝”思想，实施封建的愚民政策；二是利用风水、鬼神、命运等迷信思想来麻痹人民。

1927年“四·一五”清共以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新思想在广东的传播已被定为非法，遭到了严重的摧残。但革命群众和进步青年仍在秘密地学习和传播具有新思想的书刊。反动当局则视此为对他们统治的威胁。除了公开的禁止和镇压之外，还采取各种办法加以提防。

1933—1934年间，蒋介石大力提倡所谓“新生活运动”，企图以封建的道德来抵制新思想的传播；山西军阀阎锡山、湖南军阀何键等也在提倡复古读经。所以陈济棠的尊孔读经也是在当时那种背景下产生的。

在参谋长黄任寰的极力推荐下，陈济棠确定以《孝经》一书作为“尊孔读经”的中心读物。他鼓吹社会主义学说不适合于中国国情，只有提倡复古读经，才能使人们的思想有所遵循，所以下令青年学子一律要钻研四书五经②。《孝经》一书，在陈济棠看

① 《统计月刊》第二卷第7、8、9期合刊，1936年4月出版。

② 见许崇清：《我审查〈孝经新诂〉经过》，载《南天岁月》第340页，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来，其中“孝始于事亲，终于事君”等语句和“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的论点，正适应于巩固陈济棠统治的需要，因此特别受到他的重视。

1933年6月，陈济棠向西南政务委员会提出全省学校恢复读经案，内容包括：由教育厅将《孝经》、《四书》摘其“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编为经学教科书，大、中、小各级学校，以经学为主科；作文命题，经学应占其半等等。西南政务委员会予以通过。陈济棠便命令重刊《孝经》，颁发各部属、各学校诵习，并为《孝经》作序。^① 1933年12月，陈济棠又向西南政务委员会提出：“恢复孔（子）、关（羽）、岳（飞）祀典”提案。提案中说：“欧风东渐，异论朋兴，人欲横流，四维尽圮。青年学子，误解自由平等，明决礼纪之防，幽无天鬼之畏，放僻邪移，尽拔其做人之根本，而于数千年国粹所系属，群伦所托命，庄严璀璨之文武二庙，反目为神权，指为迷信，诋毁之惟恐不力。”对此，他认为，只有崇敬孔子、关羽、岳飞才能“激发人群孝悌、忠勇、仁爱、信义、和平、廉耻之心。”唯有“尊崇前判，启迪邦人，庶有裨于心理之建设。”陈济棠的这一提案，经西南政务委员会会议决交省政府办理。^②

为了表示对尊孔、尊关、尊岳的身体力行，陈济棠于1934年8月，亲率文武官员祀孔，自任正献官。9月又以正献官身份率文武官员祀关、祀岳。第一集团军并编印关、岳事略，分发官兵阅读。^③

陈济棠尤其重视在他的部属中培植“忠孝”思想，因此，作为

① 广州《民国日报》1933年6月18日。

② 《军声》第五卷第六期。

③ 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3月28日、9月14日。

培养其统治骨干的广东军事政治学校也就特别重视“尊孔读经”。该校秘书卢允衡为了迎合陈的提倡读经的意图，特编辑《孝经新诂》一书，竭力设法在校内外刊行。后来，在陈济棠的指令下，西南政务委员会政务会议于1934年秋竟然决议、通令教育机关办理该书的刊行。

陈济棠提倡“尊孔读经”的这股狂热，也引起各方面的反感和惊诧；就是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意见亦并不一致。当时正在香港养病的胡汉民，听到陈济棠提倡复古读经的消息，认为陈济棠得志，竟连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不要了。他即写信给当时的广东省教育厅长许崇清，征询他对读经的看法。许写了评《孝经新诂》的文章，长约五六万字，作为答复。内容主要是反对青年学子复古读经。不久，这篇文章在香港一家由胡汉民主办的杂志上登载出来。陈济棠看了大发雷霆，派人去质问许崇清，并立刻授意西南政务委员会免去许的职务，①以泄私愤，并借此给反对读经者以警告。广州市教育局长陆幼刚秉承陈的意旨，采取各种手段，通令广州市各中、小学校一律采用《孝经新诂》为教本，以为陈济棠挽回面子。②

1934年9月，陈济棠亲自出马，向广东各界人士发起组织“广东仁爱善堂”，择定三元宫为堂址。宗旨为“协助政府发展救济事业，提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10月，该堂举行成立典礼，陈济棠亲临大会发表演讲。③接着，陈维周以“提倡中国固有道德，改造人心，保存国粹”为名，倡办明德社（取“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之意），自任社长。1935年5

① 徐舜英：《陈济棠提倡读经的前因后果》（手稿），广州市政协文史办藏。

② 许崇清：《我审查〈孝经新诂〉经过》。

③ 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10月10日。

月，明德社开办“学术研究班”，轮训第一集团军政训人员，研究科目为《孝经》、“四书”、群经大义、宋明理学。^① 6月，陈济棠亲自到该班讲“明德要义”。明德社又于1935年5月出版《新民月刊》，其宣传中心是“八德”：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提出忠恕，天人合一，说孝之类。陈济棠对于这一类文章和宣传，十分赞赏。

1935年6月，陈维周又开办学海书院，设董事会，自任董事长，聘请张东荪为院长，陈玉昆为副院长。招考大学毕业生入院读经，他们把大学、中庸、春秋、三传、汉书、通鉴和西洋哲学、近代政治思想等列为主课，又采用了一些时论书刊，融贯到所谓“固有道德，不偏不激”的假想中，以麻痹学生^②。除张君劢、张东荪等负责讲学外，连陈济棠本人也当仁不让，自任讲师。

总之，陈济棠对提倡复古读经、尊孔，确实费了很大的气力，在当时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他仍如此对待，可见他对钳制人民的思想实在是重视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于是一般趋炎附势之徒，为迎合陈济棠的意旨，推波助澜，投机于“读经”、“编经”的时髦事业，以为进身之阶。“读经”之风，极一时之盛。^③

陈济棠还要求广东省教育厅设立编经委员会，着手编订适合于初小各年级的《新公民课本》和适合于高小至初中各年级的《经训读本》。要求小学一年级就要粗明经义，高小至初中要分年读完“四书”，高中以上便要诵读“五经”；而《孝经》则贯穿从小学到高中的整个过程，^④企图以此把青年学生的思想控制起来，服从和支持他的统治。

① 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5月6日。

② 章董朋、陈世等：《明德社和学海书院》，载《南天岁月》第334页。

③ 徐舜英：《陈济棠提倡读经的前因后果》，广州市政协文史办藏。

④ 秦钩：《提倡读经》，载《南天岁月》第338页。

陈济棠为了笼络和驾驭部属，在林翼中献策下，于1932—1933年以“统一意志、团结力量”为名，大搞封建式的歃血结盟，举行“效忠宣誓”，以达到巩固自己的统治和反共、反蒋的政治目的。他在广州黄花岗烈士坟场，命令文武部属深夜分批前往宣誓，并每人轮流用刺刀分别向草人或木制人刺三刀（意指帝国主义、共产党和蒋介石），刺毕即饮血。参加第一批宣誓的有余汉谋、缪培南、何莘、李扬敬、唐灏青、杜益谦、李汉魂、邓龙光、曾强、李洁之等10人，由陈济棠亲自监誓。余汉谋等人回到自己的部队后，即率领部属分别照样宣誓，还发给参加宣誓者一枚“忠”字小铜章。^①

陈济棠的封建迷信思想很严重。他自幼受其做过测字算命先生的胞兄陈维周的深刻影响，对星相、风水、扶乩等迷信甚深，在其广州梅花村私寓中，还设坛供奉神佛偶像，朝夕膜拜，求神灵庇佑。因而一些星相、风水术士，如翁半玄、詹慕禅（天眼）、廖鹤洲、温香远等，成为他家的座上客。后来詹慕禅还做了广东省参议会议员，翁半玄被任命为省教养院院长；廖鹤洲成了三水县县长，温香远则发了大财。^②

在陈济棠统治时期，看相、算命、占卦、扶乩、看风水、拜神、问卜、捉鬼等等迷信活动在广东大行其道。^③陈济棠、陈维周为其母迁葬坟地到花县芙蓉嶂时，风水先生胡诌陈济棠有“九五之尊”的相格，芙蓉嶂（洪秀全之母葬于此山）的“真穴”，“能发全国第一人”，“代代必封王”。陈氏兄弟为此耗费巨资，动

① 刘绍武、秦钩等：《歃血盟誓》，载《南天岁月》第208页。

② 徐舜英：《陈济棠封建迷信思想的透视》（手稿），广州市政协文史办藏；卜汉池：《芙蓉嶂风水骗局》，载《南天岁月》第350页。

③ 卫恭：《迎“活佛”》，广州市政协文史办藏。

用大批民工、军队，大兴土木，为其母迁葬。这充分反映了陈济棠的野心和封建迷信思想。①

1935年，陈济棠发电给蒋介石，介绍陈维周充任福建省主席。蒋复电陈济棠着陈维周到南京见面。陈维周于11月带了以秘书为名的看相先生翁半玄等同赴南京，乘机细看蒋的相格，认为蒋明年必有大难。返时又秘密到浙江奉化探看蒋的祖坟风水，认为不如花县芙蓉嶂的风水好。陈维周、翁半玄等人以此来怂恿陈济棠发动倒蒋事变。②

三、社会生活畸形发展

陈济棠治粤时期，在经济、文教建设方面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其消极面除以上谈到的，还有烟、赌、娼等，盛极一时，社会生活畸形发展，给广东社会带来了很深的祸害。

鸦片烟是近百年来毒害人民身心健康罪魁。在民元、二年间同盟会掌握广东政权时稍有遏制，其后一直被各派军阀利用来作为搜括民财和麻醉人民的手段。历来的所谓“禁烟”，只不过是实行鸦片烟专卖，禁止自由买卖而已，鸦片的价格由统治者控制，作为发财之道。

到了二、三十年代，鸦片烟多来自云南、贵州等省，分由湖南、广西两路流入广东各地，广东的烟价比产地高出一倍以上，因此大小军阀都以走私鸦片来大饱私囊。早在陈济棠驻防南路时，陈维周就凭借陈济棠势力承办地方防务税捐，走私贩毒，大刮民财。

① 卜汉池：《芙蓉嶂风水骗局》；邝震球：《陈济棠芙蓉嶂葬母之内幕》（手稿），广州市政协文史办藏。

② 梁镜泉：《陈维周看相判定蒋介石之命运》，广州市政协文史办藏。

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每年从烟赌收入的巨款，除分赃外，尚有相当部分作为补充军队的军费，因此，其部队所到之处，即以“禁政”随之，其实质是军队武装走私鸦片并实行专卖。

在陈济棠以前，鸦片烟专卖的月饷不过50万元，后来陈维周委托霍芝庭接办，月饷由50万元一跃而至100万元。霍芝庭成为陈济棠统治时期的烟赌总承包商。但霍自己始终不出头露面，只进行幕后活动。如赌馆“裕泰公司”，由吴礼臣出面经营；禁烟局长，先是周景臻，后是温仲声，都是陈济棠指派的僚属。

霍芝庭承包的烟赌饷，按三种形式进行分配，即：公开的、半公开的、不公开的。公开的缴纳给省财政厅部分；半公开的交给第一集团军三个军的军需处；不公开的是发给各级将官的每月特别津贴。因此，由公到私，都从霍芝庭的承包烟赌中得益。所以，霍芝庭被称为陈济棠的“烟臣”和“大荷包将军”。^①

陈济棠允许在广东公开设立烟馆和赌场。烟馆则美名为“谈话所”。为了“维持市容”，广州河北区只准在横街内巷开设，不能设在马路通衢；河南地区则处处都可开设。这些都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手法。^②

1933年冬，陈济棠大开烟赌，遭到各方面的责难和抨击，不得不虚张声势，扬言“要禁绝省河（广州市区）烟赌”，实际上只是表面上收敛一下。但又在深圳另辟烟赌区，命名为“娱乐场”。先开办“又生番摊公司”，还办了大酒店、大餐馆、大赌场等，用以吸引烟赌客。

赌博在广东早已盛行，霍芝庭经营则始于1919年。后来广东

^{①②} 凌仲冕：《陈济棠时代广州烟赌状况的一滴》（手稿），广州市政协文史办藏。

的山铺票便全部由霍芝庭承办，月饷40万元，①及至陈济棠统治时期，广东赌风之盛，殊为惊人。当时，赌博的种类很多，最普遍的有麻雀、番摊、牌九、山铺票、铺票、花会、骰宝等等。不但在城市中盛行，在乡村里也非常流行，使许多人因迷上赌博而荒工废业、夫妇反目、兄弟争斗、父子不亲、朋友失信、欺骗成风，形成颓废的社会风气。②

1935年冬至1936年4月，莫秀英曾在广州荔湾冲西岸办了一家非公开的俱乐部，人们称之为“文武赌场”。内分“文德”、“武功”、“内教”三部分，名义上为清谈游乐的地方，实际上是供官僚赌博以及卖官、鬻爵、行贿论价的场所。在上者以官为饵，在下者以钱为报，上下交征利，就是这个俱乐部的主要内容③。

娼妓古已有之，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民国以来统治广东的各派军阀，只作半公开的提倡，陈济棠统治时代，各游乐场所，热闹非常，楚馆秦楼更一时鼎盛，为生活所逼的妓女大大增加，嫖妓风气，极其广泛。

广州娼妓的聚集地原只限于大沙头附近，后因大火焚毁，东堤海面之合昌排便继大沙头而勃兴，花舫鳞接，大号花艇笙歌达旦，小号沙艇亦争妍斗艳。陈济棠时期复填了陈塘之小涌，名为新填地，酒楼、旅馆不断增加。甚至发展到珠玑路、塘鱼栏、带河路一带。每当夕阳西下，游人如鲫，达官贵人，王孙公子，寻花问柳，一掷千金而在所不吝。

政府当局设有“花捐”，以人为货；花捐还附加“国防”或“浚河”等费。这实际只是把卖淫通过“花捐”之征收而承认其“合法地

① 吴湘衡：《我所知道的霍芝庭》，广州市政协文史办藏。

② 谢哲僧：《陈济棠时代赌场的见闻回忆》（手稿），广州市政协文史办藏。

③ 柳蒿人：《记莫秀英的“文武赌场”》，广州市政协文史办藏。

位”。

花捐招商投承，由广州市财政局定出每年花捐收入底额，定期公开招商投承水陆花捐，以价高者得。投得者由财政局发给一纸“公文”，承商便可挂出“承办广州市水陆花捐××公司”的招牌来收花捐，这个公司称为“总商”。

“总商”又划分水陆或不同地段另行招商投承，这些人叫做“分商”。在“分商”投得后，按投额及利润分配于妓女身上，妓女实是最大的花捐承担者和受害者。①

陈济棠在经济、文化建设中取得成就并给予人民以一定的益处，也无法补偿群众在社会生活畸形发展中所遭受的损害。军阀统治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仍然是历历可数的！

第五节 陈济棠的失败

一、陈、蒋矛盾加剧

1932年1月1日，广州的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宣告取消，在汪精卫派和孙科派的支持下，“统一”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表面上，蒋介石、汪精卫、孙科等取得了一致，原来的“宁粤分裂”变成了“宁粤合作”。但是，国民党内部各派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派系斗争在新形式下继续发展。

陈济棠因为得到以胡汉民为首的元老派的支持，依然保持着在广东的统治地位。他们同广西的李宗仁派联合组成的国民党西

① 佚名：《旧社会在广州的嫖妓风气》（手稿）；叶永春：《广州花丛回忆录》（手稿），均为广州市政协文史办藏，《南天岁月》第357页。

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名义上是隶属于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实际上是同受蒋介石控制的中央党政部门持对立状态。在蒋介石看来，处于半独立地位的西南政权，始终是心腹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

所谓“统一”的南京政权也并不统一。汪精卫、孙科等同蒋介石的妥协只是暂时的表面的。随着蒋介石权力的恢复和发展，南京的国民政府一直处于动荡之中。行政院长孙科到任还不满一个月，就辞职避居上海。被任命为司法院长的属于孙系的伍朝枢，一直没有到任，后来索性辞职。孙科改任立法院长以后，也迟至1933年1月才赴任。接替孙科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仅干了半年左右，8月初即提出辞职，后来又以“养病”为名，出国远走欧洲。

1932年3月6日，蒋介石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后，权力更形集中。他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深入的侵略步步退让，而集中大部分兵力去“围剿”江西的工农红军。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就使他同国民党各派系和各地方实力派的矛盾更加复杂和尖锐起来。1933年5月，冯玉祥违反蒋介石的意旨，在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自任总司令，率部抵抗日军的入侵。同年11月，蒋光鼐、蔡廷锴率十九路军在福建宣布反蒋抗日，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联合李济深等反蒋力量，声势颇大。但是这些反蒋抗日力量都因孤立无援，在蒋介石的大军压境之下，很快就失败了。

最令蒋介石不能容忍、耿耿于怀的是由陈济棠所控制的、以两广为基地的西南政权。由西南“两机关”成立之日起，蒋介石就千方百计，妄图扼杀“两机关”。他先是通过汪精卫，后来又指使受他支配的国民党元老，劝说西南方面取消“两机关”。在遭到拒绝以后，又以高官厚禄拉拢陈济棠、李宗仁等实力派。1932年3

月，蒋表示拟委陈济棠为全国剿匪总司令，白崇禧为副司令；4月，又特派陈济棠为第八路军总指挥，李宗仁为第九路军总指挥。陈、李、白均置之不理，部队仍使用原来番号。^①蒋介石又一再调陈济棠所部前往赣南“剿匪”，企图借工农红军的力量来削弱陈济棠的实力。还常常从陈济棠内部制造矛盾，引起混乱，借以搞垮西南政权。

蒋介石的种种阴谋诡计，不仅不能扼杀西南“两机关”，反而使元老派和两广实力派的反蒋决心愈益坚定。1932年4月，胡汉民公开表示不赞成取消西南“两机关”；而陈济棠、李宗仁则表示不就南京国民党中央所委的职务。^②稍后，陈济棠在纪念周会上讲话更明确地宣称：“广东的军队，一面抗日剿共，一面反蒋。”^③1933年5月，冯玉祥率同盟军在察哈尔抗日，西南各要人联名通电支持；当冯玉祥遭受蒋介石出兵攻击时，胡汉民、陈济棠、肖佛成等电南京政府，要求“速将入察之师，停止前进”，并表示如南京当局“仍抑内媚外”，西南“决取断然处置”^④。以胡汉民、肖佛成、陈济棠等为首的元老派和两广实力派，出于斗争的需要，对蒋介石的独裁和不抗日政策表示出深痛恶绝的态度。对原定1933年底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中全会，西南的中央委员拒绝出席，迫使会议延期。他们还在发表的时局宣言中提出八项主张，包括：“消灭蒋介石独裁统治，组织真能代表国家人民利益之政府；新政府对外必须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保障国家独立。……”等内容^⑤。

①② 《粤系军事史大事记》第101页。

③ 《粤系军事史大事记》，第104页。

④ 广东档案馆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第184页。

⑤ 《广州百年大事记》下册，第453页。

但是，蒋介石不仅不能容纳西南的意见，反而变本加厉，多次镇压各地的要求抗日的反蒋力量，致使日本侵略者在占领热河后又进窥华北。蒋介石还企图通过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和平的手段，所谓合作的方式，来取消西南的半独立状况。对于蒋介石的行径，西南中委多次通电予以申斥。1934年9月，肖佛成在发表谈话中指出：“自四全大会开会以后，政府丧权辱国，失地数省，党国已陷于危境。五全大会之任务，自当以抗日救亡为重，而中央此次所颁议题，无一及此。显系当事者之存心规避，……”。^①稍后，肖佛成又说：欲言合作，“南京政府必须变更其错误之政策”。^②1935年1月，胡汉民在香港发表文章，指责南京政府对宁粤合作“缺乏诚意”，“团结既未见精诚，国难尤未见共赴”，要求“彻底改变其错误政策。”^③胡汉民随即离港赴欧，实际上拒绝了蒋介石的所谓合作。1935年12月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推选胡汉民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屈就”行政院院长。蒋介石以此来表示他的宽宏大量，以便求得同各派的共同合作。但西南方面并没有被此种假象所迷惑。“一二·九”运动的第二天，肖佛成即发表了《告同胞书》，痛斥蒋介石继续实行卖国政策。^④1936年1月，胡汉民由欧洲归国抵达香港，蒋介石多次派代表去欢迎胡到南京莅任，胡并不听从，索性回到广州。

总之，蒋介石和元老派及两广实力派之间的矛盾，经过几年的交锋，不仅无法调和，反而是在不断的发展。尤其是西南方面将抗日和反蒋结合起来，使蒋介石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地位，

^{①②③} 《粤系军事史大事记》，第157页。

^④ 《粤系军事史大事记》第179页。

因而矛盾的公开爆发乃是势所必然的了！

二、“六一事变”

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因脑溢血突然在广州逝世。胡汉民的去世，对当时的政局发展产生着微妙的影响。

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一向以孙中山的左右手和继承人自居，在国民党内实在也享有较高的声望。但自蒋介石掌握了中央大权以后，一直受到排挤，郁郁不得志，因而多年来均站在与蒋对立的地位，成为国民党内反蒋派别的灵魂。他依靠了两广实力派，建立起西南的反蒋基地。在西南“两机关”中，尽管由于陈济棠的控制而使胡汉民没有掌握实权，但不论元老派抑或实力派，都尊重胡的领袖地位，重大决策都同胡商讨并取得他的同意与支持。所以，有了胡汉民的存在，不仅使西南反蒋的号召力倍增，蒋介石也不敢作过份的逼迫和威胁，而且对于西南各派间的团结也较易维系。

因此，胡汉民的去世，给蒋介石提供了拔除“两机关”统一西南的极好机会，而对于陈济棠在广东的统治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在胡汉民去世的第二天早晨，蒋介石就急不及待地致电陈济棠，请陈即派亲信人员赴京，共商善后。陈济棠为了探听蒋介石在胡死后对西南的新政策，便派其兄陈维周入京谒蒋。“据说，维周在南京时，探悉了中央彻底解决西南的三大原则：一、彻底解决广西的李、白，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二、驱逐肖佛成等反蒋的元老离粤。三、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①

蒋介石作出这样的决策是合乎逻辑的。由于胡汉民的去世，

^① 《李宗仁回忆录》，第662—663页。

蒋解决西南问题可以肆无忌惮了，况且没有胡的存在，西南各派必然会日渐走向分裂，而“拉一派，打一派”又是蒋消灭异己的惯用手段。所以，正如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所说：“维周回粤后，即将详情密告乃弟。济棠得讯大恐，他深知两广团结的重要，和蒋先生分化离间手段的毒辣。中央既可授意广东解决广西，又何尝不可反其道而行之？反复思维，为之惴惴不安，深觉今后两广的局面，决难长久维持，与其坐待中央部署妥当，各个击破，何妨抢先一步，采取主动呢？”^①也就是说，蒋介石决意立即解决西南，逼使陈济棠采取主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无疑是陈济棠决心公开反蒋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白崇禧以吊唁胡汉民为名，由广西抵广州。白在同陈济棠会谈以及会见在穗的粤军高级将领时，都分析了当时国内形势，提出应乘此有利时机，借“抗日”为名，出师北上倒蒋的主张。^②白崇禧在广州的活动，对于陈济棠倒蒋决心的确立，起了促进的作用。

稍后，蒋介石特派居正、孙科等中央要员来广州，参加于5月25日举行的胡汉民的丧礼。居、孙等人向陈济棠转达了蒋介石的意旨：加强团结，一致抗日，首先要取消西南“两机关”，两广军队要实行改编，财政要统一，等等。^③并且，自胡汉民死后，蒋介石即在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等地积极进行军事布置，表现出以武力统一西南的迹象。蒋介石的这些作为，使陈济

① 《李宗仁回忆录》，第662—663页。

② 李洁之：《陈济棠统治广东始末》。

③ 阚宗骅：《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两广“六一”事变经过》。

棠更加确定了不惜一切、孤注一掷的决心，并迅速成为行动。①

其实，陈济棠的反蒋决心在形成的过程中，也是顾虑重重、反反复复的。当他于5月16日第一次同在穗的高级将领商议时，许多人对反蒋不置可否，意见无法取得一致。在第二次商讨时，余汉谋就认为蒋介石在军事上处于绝对优势，反蒋没有必胜的把握，这实际上是持反对意见。②随后，莫希德等多位将领，又准备联合制止陈济棠的反蒋行动。③正因为如此，陈济棠也曾一度取消反蒋的决定，并通知了各高级将领。④后来，大概是由于陈济棠、李宗仁派赴湖南的密使陈维周、刘斐归来，得到何键口头答应“支持”两广的信息，⑤使陈济棠又重新坚定起来，于5月30日最终作出了举兵反蒋的决定。陈济棠作出反蒋决定的过程，表现了他自己的决心不大，内部渐趋不稳，这些实在已是失败的征兆。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公开揭出反蒋旗帜。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党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饬令将陈、李所部之第一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改称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

6月2日，又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名义通电全国。通电指出：“日人侵我愈亟，……除全国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

① 《粤系军事史大事记》第186页。关于陈济棠决心倒蒋的原因，有些回忆录提到他的迷信思想所起的作用。例如说陈济棠乃兄陈维周上京看了蒋介石的相，认为蒋介石难逃1936年的灾难。又如：陈在发动“六一事变”之前，请术士为他卜卦，卦中有“机不可失”字样，等等。把这些说成是促陈反蒋的重要原因，只能仅供参考。此外，亦有回忆录说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于“六一事变”前夕来广州同陈密谈，表示日本支持陈反蒋，亦是陈下决心的原因之一。但没有更多的事实作证。

②③④ 李洁之：《陈济棠统治广东的始末》。

⑤ 刘斐：《两广“六一事变”》。

战外，则民族别无生路”。通电斥责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中央忍辱负重之苦心，国民非不谅解，惟和必有方，忍必有期。长此因循，则敌人无餍之求，日甚一日，得陇望蜀，岂有穷期。”“国家之土地，先民所遗留，亦民族所托命，举以资敌，宁异自杀”。通电要求国民党中央领导抗日①。

6月4日，第一、四两集团将领以陈济棠、李宗仁为首联名发出通电，拥护西南“两机关”6月2日通电的主张，请“两机关”明令“北上抗日”，表示誓率所部“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②

同一天，广州各团体集会，会后列队向西南各机关请愿“出兵抗日，以救危亡”，参加者达2万多人。③第二天，陈济棠在向记者谈话时说：“盖今日我民族已届生死关头，非抗日必无出路”，并表示对民众请愿抗日“极同情”。④

6月1日以后，陈济棠、李宗仁的第一、四集团军分路北上。当时两广的兵力总计9个军，约30多万人，并有飞机100多架，江防舰艇数十艘。陈济棠的部署是：以第一、三两个军向江西，在取得赣州、吉安后，直下南昌，以第二军出湘南，会合桂军及何键的湘军攻取武汉。6月9日，桂军第十五军军长夏威率领三个师进抵湖南永州，粤军第二军军长张达率领四个师占领郴州。

对于西南“六一事变”的反蒋行动，蒋介石亦早就有所准备。他积累了多年来扑灭各个反蒋派别的经验，以各种手段来对付陈济棠。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670页。

② 程思远：《两广事变》。

③ 《广州百年大事记》下册，第479页。

④ 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6月5日。

蒋介石一方面通过函电的申辩、商讨，来缓和反蒋的空气，并作缓兵之计。6月7日，蒋介石复电陈济棠说：“今日救国图存，必以整个之国力，取一致之步骤”，“若一隅独标揭于先，则整个国家之尊严，即已丧失于国际之间”；并嘱西南部队切莫进入邻省边境，又请派负责人赴京共同商决一切。^① 8日，蒋介石在中央机关纪念周会上致词，又大造安定团结的舆论。9日，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复电西南各委员：“华北危急，诚如电言，救亡御侮之道，中央与诸同志初无二致。惟须有一致之步骤，整个的计划，乃不致授人瑕隙，自召分崩。……希饬所属部队，勿固轻率之自由行动，致误救亡大计。”^② 蒋介石这些言论，显然是哗众取宠的不实之词，当他争取得时间，完全控制了两广的局势以后，就一反原来的伪善态度。7月2日，蒋介石致电李宗仁、白崇禧，发出最后警告，限令进入湖南的广西军队于一周内完全撤出。7月18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上力主以武力对付“两广事件”，他说：“决不可顾虑外患之压迫，就听少数人破坏纪律，自由行动，……正唯有外敌之压迫，中央更不得不彻底肃清内乱。”^③

另一方面，蒋介石立即调兵遣将，阻止粤桂军的北上。他将湖北驻军调入湖南，加上假装支持西南而实际拥蒋的何键部湘军，实力已是不弱；还派陈诚到长沙部署一切。6月10日，蒋军两个军抢占衡阳以后，并作出进军粤、桂的态势。这样，使得粤、桂军停在郴州、祁阳一线，无法前进。

此外，蒋介石还采取更加阴险的手段是：收买、分化陈济棠

^① 程思远：《两广事变》，载《广州文史资料》37集。

^② 刘斐：《两广“六一”事变》。

^③ 《粤系军事史大事记》，第190页。

的将领，从内部搞垮陈济棠的统治。而陈济棠那种仅靠封建关系和家长式统治来维系的部属间的团结，在蒋介石的离间手段下，很快便告瓦解。陈济棠的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首先起来倒陈便是最明显的例子。

余汉谋本来是陈济棠一手栽培起来的嫡亲和亲信，但和陈济棠之间亦早就存在着相互猜疑。1929年第一次粤桂战争时，余汉谋就曾因有“倒戈之嫌”而一度被陈济棠扣留。1932年以来，第一军一直被置于赣南“剿共”，余对陈自然有所不满。陈济棠对余汉谋很不放心，于余汉谋在广州东山的住宅对面设特务点进行监视。而蒋介石也早就从陈济棠的部属中寻找可以打破的缺口。他曾派上官云相（陈诚部的将领，余汉谋的妻兄）以探访姻亲为名，从赣北秘密到余的驻地大庾盘桓数天，窥探第一集团军的情况。蒋介石的亲信、时任湖北省主席的杨永泰，亦同余汉谋的高级幕僚杨竹轩以同乡兼同学的关系，过从甚密，5月中下旬陈济棠酝酿反蒋期间，余汉谋就是派杨竹轩去武汉向杨永泰告密^①。李宗仁在回忆录中也这样说：“不料中央谋粤已久，反间工作做得十分有效。……自非常会议之后，蒋先生即派蒋伯诚为代表，常住广州。伯诚是个老官僚，善于应酬，与济棠的部属过从极密，乘机大施反间之计，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空军司令黄光锐都和蒋伯诚有勾结。‘六一’之后，蒋伯诚在反间上所用的款项多至数百万元。”^②正是由于蒋介石多方面的长期离间工作，余汉谋终于走上了投蒋叛陈的道路。余汉谋和黄光锐的投蒋，就成了陈济棠“六一”倒蒋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① 阎宗骅：《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两广“六一”事变的经过》。

② 《李宗仁回忆录》，第670页。

三、陈济棠下台

自6月中旬起，粤桂军在湘南受阻，无法北上，陈济棠反蒋的局势实际上已是急转直下，但他仍想作最后的挣扎。

为了鼓舞士气，并重新组织军事力量，西南当局再次在广州组织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有5万人参加的“抗日示威游行”。① 6月21日，又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组织脱离南京的、独立的军事委员会，由陈济棠任委员长，李宗仁任副委员长。23日，陈济棠宣布就任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白崇禧就任第四集团军正、副总司令。后来，又改为抗日救国军第一、第四集团军联军，以陈济棠为总司令，李宗仁为副总司令。但是，这一切，都由于陈济棠的部属众叛亲离，而没有起到任何积极的作用。

6月30日，陈济棠的空军首先发起了叛陈的行动，黄志刚等率战机七架北飞投蒋。7月4日，按照早就安排好的密谋，余汉谋以主持第一军军士教导队毕业典礼及准备抗日反蒋军事行动为借口，脱离了陈济棠的控制，由广州返回江西大庾。余汉谋一面电告蒋介石，一面部署兵力，向南雄、韶关推进，对陈济棠实行“兵谏”。7月6日，副军长李汉魂、副军长邓龙光和虎门要塞司令李洁之先后通电“反陈”，李汉魂还离职赴港。7月7日，余汉谋乘蒋介石派来的专机，与前来迎接的上官云相一起飞往南京。9日，余汉谋在南京致电广东将领，表示服从中央，共济“国难”。② 7月10日，蒋介石免去陈济棠的本兼各职，以余汉谋为广东绥靖

① 《粤系军事史大事记》，第188页。

② 胡铭藻：《李汉魂封金挂印与余汉谋回粤倒陈纪要》。

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至此，陈济棠才不得不承认已不能掌握部队，对坚持西南反蒋局面完全失去信心。

7月18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撤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以及第一、第四集团军的名义。^① 14日，余汉谋在大庾通电就任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职，通电并逼陈济棠释兵下野。驻韶关的第四师师长巫剑雄首先响应，欢迎余汉谋回粤主持。于是，余汉谋的部队向韶关、翁源一带推进。17日，余汉谋部越过韶关南下，陈济棠军放弃英德，退集于花县军田一带。

7月18日，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空军司令黄光锐公开倒陈，驾机离穗飞赴香港，所部空军飞机72架飞往粤北，投奔蒋介石。

陈济棠眼见大势已去，于7月18日下午宣布下野，避居香港，行前将军事交李扬敬，政治交林翼中负责向余汉谋交代。临行前致电余汉谋，表示“救国主张，无方贯彻，现决摆脱仔肩。此后对于救国责任，广东治安，袍泽维系，偏劳吾兄，独负其责，……”^②

陈济棠抵港以后，于7月19日又连续发出“告国人”、“告粤人”、“告袍泽”诸电，表示了对蒋介石的不满。

7月24日，余汉谋进入广州，重行分配粤军防务。29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黄慕松为广东省政府主席，次日，又任命曾养甫为广州市市长。

至此，陈济棠在广东的统治正式结束。

^① 《广州百年大事记》下册，第480页。

^② 《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7月19日。

结 束 谱

1936年7月，陈济棠公开武装倒蒋失败，作为和蒋介石的南京中央政权相对立的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及第一、第四集团军，均被撤销，陈济棠逃往香港。这样，无论从组织形式和实际权力来说，都改变了广东原来的半独立的军事割据状态，结束了陈济棠在广东的统治，广东正式统一于南京的中央。

对于被陈济棠割据统治了五年多的广东，即使宣告了统一，蒋介石还是很不放心的。为了亲自处理统一后的广东政局，以及对付仍在对抗蒋介石中央的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蒋介石于8月中旬由南京飞抵广州，在广东逗留了一个半月之久，这是他自统率国民革命军北伐离开广东以后从未有过的情况。

经过蒋介石的周密安排，广东的军事大权已经由完全投靠了蒋介石的余汉谋牢牢地掌握；省、市政府交给了蒋介石信任的黄慕松和曾养甫（黄慕松于1937年3月去世后又立即改任蒋介石的亲信吴铁城为广东省政府主席）。省、市党部则完全由CC派所控制。为了加强对广东的直接统治，蒋介石还任命他在军事上的第一副手何应钦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这个措施，当时在全国范围里都属罕见。蒋介石作了这些妥善的处置以后，才于9月下旬离粤经南昌返回南京。

余汉谋掌握了广东的军事权力以后，一切行动完全遵照蒋介石的意旨。蒋介石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迫使广西的李宗仁、白崇

禧屈服，是得到了余汉谋的强有力的支持。余汉谋制止了第七路军（原十九路军）翁照垣部在北海同日军的摩擦，并武力接管了北海，^①亦是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对日妥协的指示而行事。尽管余汉谋掌管广东权力还不足一年就爆发了全面抗战，但事实足以表明，余汉谋完全没有重新在广东建立对抗蒋介石的割据迹象，广东已经成了南京中央政权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地方军阀在广东的割据统治局面也就由于陈济棠的垮台而正式结束。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压倒一切，全国上下，包括蒋介石和各地方实力派的军队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均开赴抗日前线。广东系的军队，亦在本省以及全国各地战场上英勇杀敌，得到了全国人民的高度赞扬。1938年10月以后，广州及广东沿海部分地区沦入敌手，由共产党和国民党分别领导的游击队，在敌后打击敌人，牵制了日军的兵力，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功勋。在整个抗战八年中，都不存在进行地方军事割据的可能。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广东的国民党党政军领导人虽经多次更迭，但一直是在受蒋介石操纵的南京中央政权的牢牢控制之下，直至1949年10月广东解放。

综观本书所述，封建军阀在广东的割据统治，是从1913年的龙济光入粤开始，中经旧桂系的陆荣廷、莫荣新，粤系的陈炯

① 1936年9月，由于日本商人横蛮欺压中国百姓，激起北海市民的公愤，举行反日示威，日本商人中野被示威群众殴伤，后不治身死。日本侵略者立即从上海调派日舰两艘开赴北海，并企图强行登陆进行所谓调查。北海驻军翁照垣部为维护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拒绝日方人员登陆，并宣布北海戒严。日方又从青岛增派四舰南下，准备扩大事态。蒋介石本着一贯的妥协退让政策，命令余汉谋制止翁照垣部的爱国自卫行动，将翁部他调，并赔偿死者损失，讨好日方。

明，滇、桂军的杨希闵、刘震寰，到李济深、黄绍竑、张发奎、黄琪翔的短暂统治，直至陈济棠于1936年失败为止。对于这23年间在广东建立过时间或长或短的军阀割据统治的代表人物，总的说来，他们在广东统治期间，都给广东人民带来了灾难，阻碍了广东社会的向前发展。但是，由于他们对广东人民带来的灾难有深有浅，民愤有大有小，所以对他们的评价还应因人而异。正如我们在本书开头的“绪论”中所指出，对各个军阀统治者绝不能等量齐观。事实上，我们在书中的各个章节里，也力求实事求是、尽可能客观地反映出他们的功过，以便为读者提供全面地评价他们的历史地位的素材。况且，这些代表人物并不是在广东进行过军事割据以后就“盖棺定论”，他们在离开广东的统治地位后各自的发展也不尽相同。所以，考察他们毕生的功过，还必须包括他们后来所走过的一段道路。

在这些代表人物当中，龙济光、陆荣廷、莫荣新等，我们在本书中已述及他们分别死于何时。这几个人在结束了军阀生涯以后，对国家民族并没有做过任何有益的事情，便了结一生，他们无疑是以反动军阀载入史册。陈炯明在广东失败逃居香港以后，虽然曾多次派人向孙中山表示愿意和好，但连写一纸“悔过书”的诚意也没有，说明他还是坚持反革命立场、死抱军阀地位不放；实际上后来也多次参加过颠覆广东革命政权的活动。因此，即使他后来十分潦倒，死去时还显得有点“凄凉”，也不会得到人们的同情。《陈竞存先生年谱》和《陈炯明传》的作者，呼吁为陈炯明翻案，显然不会被正直的历史学家所接受。当然，正如本书所述，对于陈炯明还没有成为军阀以前的业绩，人们也会客观地给予应有的评价。

其他的代表人物，在广东失败以后走着不同的道路。张发奎

离开广东后仍然联合桂系，一直坚持反蒋立场，直至1932年冬才宣告下野，赴欧“考察”。1933年回国后参加了蒋介石的“围剿”红军的活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张发奎在参加指挥保卫上海、武汉的战斗中有良好表现，以后担任第四战区和第二方面军的司令长官，负责指挥两广地区的抗日斗争。1945年抗战胜利，任华南战区受降长官，在广州接受日军的投降。以后又任广州行营主任、国民党政府陆军总司令等职，但并未真正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国民党政府撤出大陆以后，他一直蛰居香港，至1980年病逝。

陈济棠1936年7月逃港，8月便赴欧洲“考察”。抗战爆发后，1937年9月回国，但一直受到蒋介石的排挤，郁不得志。1940年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直至抗战胜利。以后在广东闲居。至1949年面临全国解放才又被蒋介石利用，出任广东海南行政长官。我人民解放军1950年解放海南岛时，他逃往台湾，亦仅任资政、顾问等闲职，至1954年病逝。

李济深离开广东后即被蒋介石囚禁于汤山，恢复自由后一直坚持反蒋斗争，先后参加福建及广西的反蒋政权。抗日战争爆发后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战，但仍受蒋介石的歧视，只委以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桂林行营主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等闲职，未能发挥其才能。在抗战期间，李济深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力量保持密切的联系。抗战胜利后，筹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于1948年1月成立，被选为主席，后参加人民政协会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改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59年在北京病逝。

黄绍竑在粤桂战争失败后，1931年投靠了蒋介石，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内政部长，浙江省、湖北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度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后重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直至抗

战胜利。战后任监察院副院长、国民政府委员。1949年国共和谈时任国民党代表，谈判破裂后留在北京参加人民政协会议，后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1972年病逝于北京。

黄琪翔失败离粤后，即赴日、德“游历”。至1929年返国，参加邓演达的“第三党”，坚持反蒋。后参加过福建反蒋政权，失败后再避居德国。抗战后回国，先后担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等职务。1948年移居香港，改“第三党”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继续反蒋。后参加人民政协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过人民政协常委、国家体委副主任等职务。1970年在北京病逝。

杨希闵在广州叛乱失败就脱离军界，在香港居住一段时间后，举家迁居浙江绍兴，抗战爆发迁回昆明，仍过着与外界很少接触的寓公生活，解放后逐渐有所活动，1955年被邀为云南省政协委员，次年参加民革，曾任民革云南省委委员，1967年1月因病逝世。

刘震寰于广州兵败逃港，后投龙云任云南省政府顾问。抗战军兴，曾任中央国防委员、昆明中苏友协分会会长，曾参与进步活动，1945年龙云被逼离开云南，刘再迁港澳，生活潦倒，1972年病故于香港。

这些代表人物中的李济深、黄绍竑、黄琪翔等，他们作为军阀在广东割据统治的时间极其短暂，后来又先后参加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为人民革命政权的各级领导人。他们那段极短期间的军阀劣迹，绝不影响对他们应有的评价，他们还是以革命将领、革命干部载进中国现代史册！

杨希闵和刘震寰虽然在广东犯下了反人民反革命的军阀罪行，但失败后即脱离军界，并先后在不同程度上支持过中国人民

的革命或建设事业，所以不能简单地以军阀来作为他们的“盖棺定论”，他们后来所走的道路表现出是中国革命的同路人或朋友。

张发奎在广东统治的时间亦很短，后来虽然又参加过蒋介石政权的反共反人民活动，但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中华民族的独立生存立下了功勋。陈济棠在广东的统治时间虽然较长，但如本书所述，他在统治期间亦为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后来也并没有为蒋介石的统治出过更多的气力。因此，对这两位中国著名的军事将领，人们亦会作出具体的、客观公正的评价。只有这样区别对待，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在本书结束的时候，我们需要着重说明，我们撰写本书的目的，固然是为了历史科学的发展，同时也为了使读者通过本书，了解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统治下的广东人民的苦难，了解我们的先辈是在怎样艰苦的环境下生活和斗争，从而更加热爱今天的社会主义祖国，更加努力地去建设我们美好的未来！

后记

呈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尽管水平还低，但也是广东民国史研究会的成员多年的集体研究成果。

早在1981年，广东民国史研究会（原为军阀史研究会）全体成员，就对编撰一本军阀在广东进行割据统治的历史，进行过多次酝酿。后来，在对丁身尊拟出的最早写作提纲进行了充分讨论以后，确定由余炎光根据讨论意见，拟定了现在成书的这个提纲；接着分工撰写初稿。参加初稿起草的有中山大学的王晓吟（第二章第一、二节），暨南大学的余炎光（第一章及结束语）、周孝中（第五章），华南师大的钟珍维、夏琢琼（第三章、第七章第二节），广州师院的吴赐禄、彭梅娇（第六章第一、二、三节及第七章第一节部分），广东省社科院的沙东迅（第七章第三、四节），广东省政协的丁身尊（第四章），广州市政协的王文全（第六章第四节、第七章第五节及第一节部分），中山图书馆的倪俊明（第二章第三、四节）。初稿写成后，经余炎光和陈福霖（美国迈阿密大学教授，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客座教授）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由原起草人作了修改。最后，我们两人对全书作了较多的改写、补充、订正并定稿。

在讨论和撰写过程中，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广东民国史研究会顾问李洁之，广东人民出版社卢权、谭天河，广东省社联李鸿生等多次提出过许多宝贵的意见，广东省档案馆等单位给予很大支持，广东省社联提供了经费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余炎光 陈福霖

1987年冬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AyOTI4NDUuemlw",  
  "filename_decoded": "10292845.zip",  
  "filesize": 27322313,  
  "md5": "e71d55c212eb1e3d0ddbd10cf303c078",  
  "header_md5": "3ebdbfed84e656a6621fed7bd1a2e074",  
  "sha1": "ef677c6064cc1f1a2009ce40251aefc4d19d9f12",  
  "sha256": "9ab2704c9d4ced6861da31de69bf1bae632467b676bddeafe413f95d9a86a1e0",  
  "crc32": 3972519989,  
  "zip_password": "28zrs",  
  "uncompressed_size": 27492424,  
  "pdg_dir_name": "\u2500\u2567\u2558\u2534\u2555\u03b5\u255b\u258c\u00ed\u00ac\u00ed\u00ac\u2524\u2559\u2534\u00b7\u255d\u251c\u2563\u0393\u2561\u255c\u2502\u252c\u255d\u251c\u2560\u2500_10292845",  
  "pdg_main_pages_found": 377,  
  "pdg_main_pages_max": 377,  
  "total_pages": 386,  
  "total_pixels": 1537545601,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